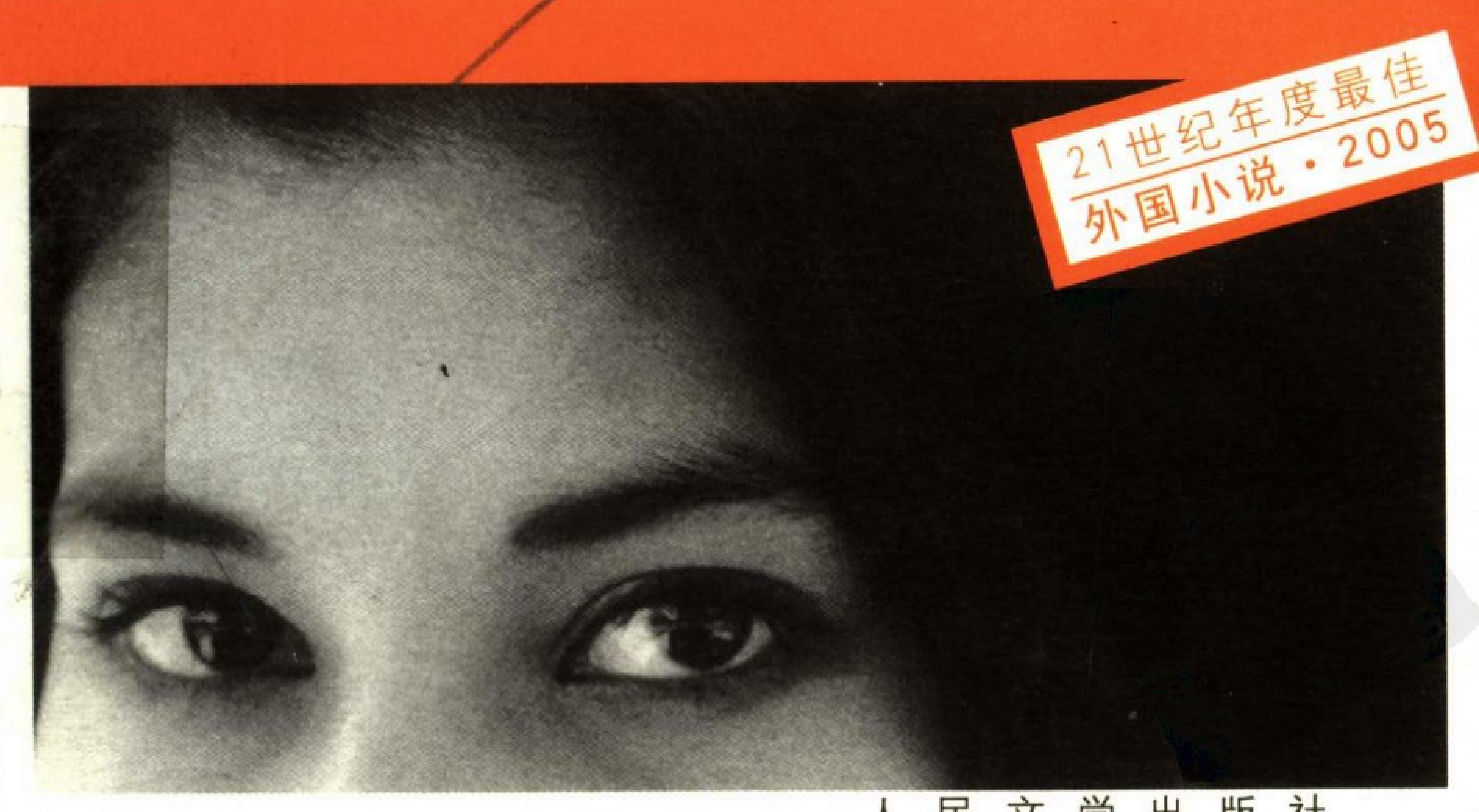


La hora azul

蓝色时刻

〔秘鲁〕阿隆索·奎托 著
刘京胜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蓝色时刻》是“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中西葡拉美文学入选作品。在清理母亲去世后遗留下来的文件过程中，秘鲁职业律师奥马切博士偶然得知了父亲生前在担任阿亚库乔驻军司令官期间的一段往事：十多年前，反政府的游击队武装组织“光辉道路”在那一地区非常活跃，政府军时常假借剿灭叛乱分子的名义乱捕、乱杀无辜的土著居民，其中，妇女受害尤甚，因为，她们在惨遭屠戮之前还要忍受被军官和士兵们强奸、轮奸的凌辱。奥马切的父亲曾长时间霸占漂亮的土著姑娘米丽娅姆，但是，那个姑娘最后逃出了魔爪并不知所终。出于弄清真相并在一定程度上代父赎罪的动机，奥马切决心找到那个受害的女人。在历经了无数坎坷与波折之后，奥马切终于见到了身边带着一个十多岁男孩的米丽娅姆。

2007



ISBN 978-7-02-005922-5
定价：17.00元



La hora azul

蓝色时刻

〔秘鲁〕阿隆索·奎托 著
刘京胜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 - 2006 - 3469

Alonso Cueto

LA HORA AZUL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蓝色时刻/(秘)奎托(Cueto, A.)著;刘京胜 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ISBN 978 - 7 - 02 - 005922 -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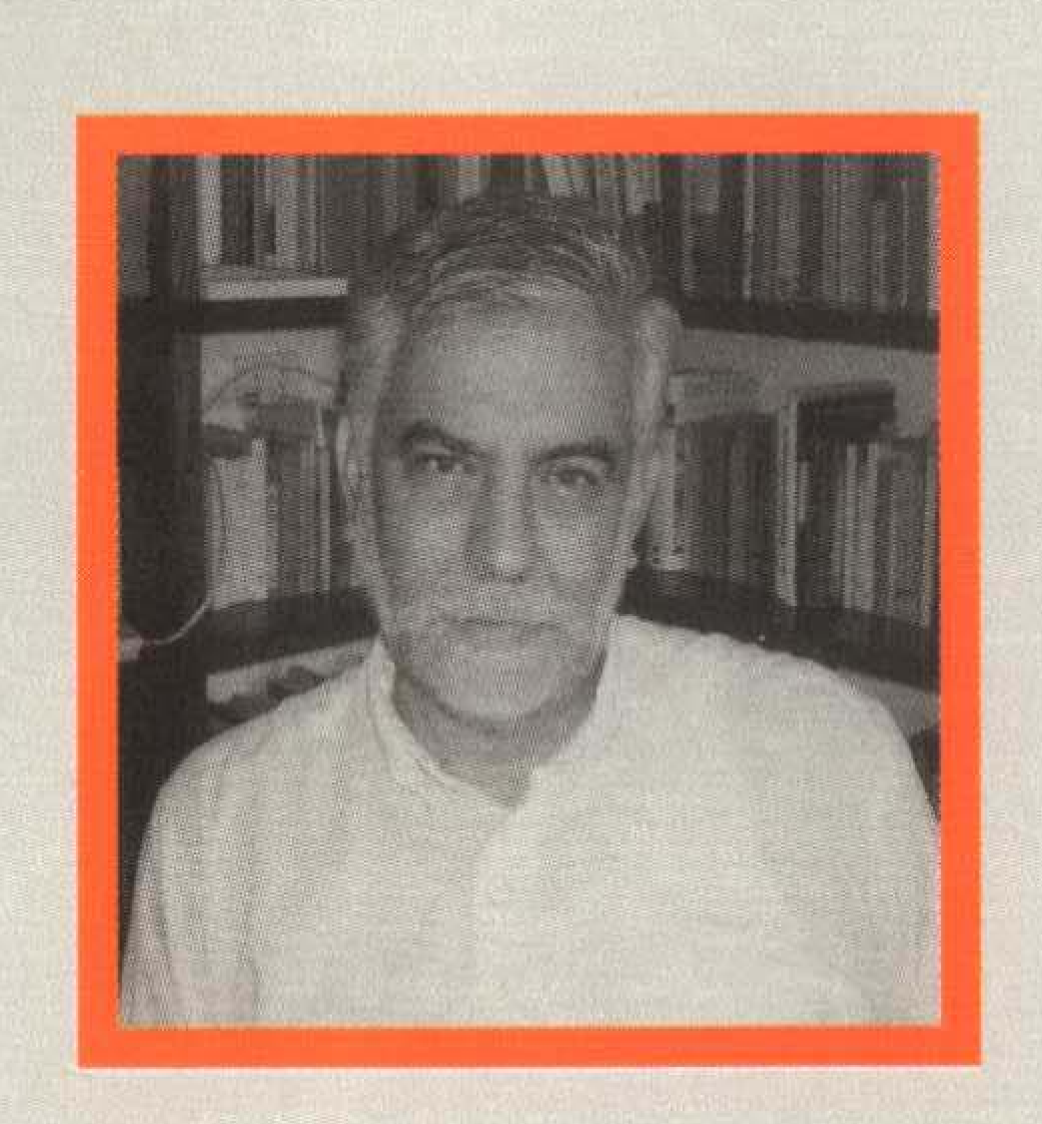
Ⅰ. 蓝…　Ⅱ. ①奎…②刘…　Ⅲ. 长篇小说 - 秘鲁 - 当代　Ⅳ. I778.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1536 号

责任编辑:胡真才　　装帧设计:柳　泉
责任校对:刘晓强　　责任印制:王景林

蓝色时刻
Lan Se Shi Ke
〔秘鲁〕阿隆索·奎托　著
刘京胜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00千字　开本889×1194毫米　1/32　印张10.25　插页2
2007年1月北京第1版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 8000
ISBN 978 - 7 - 02 - 005922 - 5
定价 17.00元



阿隆索·奎托（1954— ）

生于秘鲁首都利马。1971年进入秘鲁天主教大学学习，1976年毕业，获学士学位。1984年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1983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过去的战争》，从此走上文学创作道路。至今已发表作品十二部，其中主要有长篇小说《白虎》（1985）、《正午妖魔》（1999）和《大视野》（2003），短篇小说集《苍天》（1997）和《迪亚娜另有所爱》（2001），戏剧集《奇遇》（2002）以及散文集《华尔兹、诽谤和献媚》（2003）等。现任秘鲁天主教大学教授，并主管一个文学创作室，还在利马的《秘鲁21》日报开设星期专栏。《蓝色时刻》2005年由西班牙阿纳格拉马出版社出版。

出 版 说 明

评选并出版“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是一项新创的国际文学作品评选活动和出版活动。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由中国文学研究机构和文学出版机构为外国当代作家作品评奖、颁奖，并将一年一度进行下去，这是一个首创。因而，当 2001 年度的评选揭晓，6 部当选作品中译本面世时，立即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和兴趣。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活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及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联合举办，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评选委员会由分评选委员会和总评选委员会构成。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遴选专家，组成分评选委员会，负责语种对象国作品的初评工作；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及上述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委派专家组成总评委会，负责终评工作。每一年度入选作品不得超过 8 部。入选作品的作者将获得总评委会颁发的证书、奖杯，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组成丛书出版，丛书名即为：“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总评委会认为，入选“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作品应当是：世界各国每一年度首次出版的长篇小说，具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有益于人类的进步，能够体现突

出的艺术特色和独特的美学追求，并在一定范围内已经产生较大的影响。

总评委会希望这项活动能够产生这样的意义，即：以中国学者的文学立场和美学视角，对当代外国小说作品进行评价和选择，体现世界文学研究中中国学者的态度，并以科学、谨严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推进优秀外国小说的译介出版工作，为中外文化的交流做出贡献。

一项新创的事业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令我们感到十分欣慰，信心倍增。我们相信，2005 年度的评选活动和 6 部作品的出版，也一定会继续获得成功。而只要我们持之以恒并恪守评选的原则，这项“世纪工程”在整个 21 世纪的进程中必将获得持续的成功。

人民文学出版社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委员会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评选委员会

总评选委员会

主　任

聂震宁　黄宝生

委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叶廷芳　石南征　刘玉山　刘海平

何其莘　陈众议　陆建德　吴岳添　赵德明

聂震宁　黄宝生　管士光　潘凯雄

秘书长

仝保民　刘开华

西葡拉美文学评选委员会

主　任

赵德明

委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孙成敖　朱景冬　张广森　赵德明　盛　力

《蓝色时刻》的故事以动乱、暴力与罪行为社会背景，但却并非意在挖开旧的伤疤以加剧业已存在于不得不共同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的不同社会群体间的猜疑与仇恨，而是引导人们思考应该如何评估和面对历史上的伤害与责任，从而化仇怨为理解并开启新的共处天地。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委员会

La hora azul, cuyo argumento se desarrolla en un marco social de desórdenes, violencias y crímenes, no tiene por objeto reabrir las viejas heridas para alimentar la desconfianza y el odio arraigados entre los diferentes grupos sociales que se ven obligados a convivir en un mismo mundo, sino que invita a reflexionar sobre la manera de cómo se deben evaluar y enfrentar daños y responsabilidades históricos para convertir el rencor en comprensión y abrir nuevas perspectivas a la convivencia.

Jurado de la mejor novela extranjera del año siglo 21

致中国读者

《蓝色时刻》的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的利马。小说讲述了利马一位春风得意的律师阿德里安·奥马切的经历。他在母亲去世后，发现了一件在此之前他的家庭一直向他隐瞒的事情。在寻觅他家这一秘密的知情人过程中，奥马切了解了他的国家及所在城市的一些地方，而他以前根本想象不到会有这种地方存在。

小说可以被界定为是一种对各类家庭和社会常常回避的阴暗面的探寻。所有个人和群体——家庭、社会和团体——都下意识地想留存他们的秘密，以便自己能够继续发展下去。在每个人、每个家庭和社会的生活过程中，都会定期地，有时是偶然地，暴露出一些先前隐藏的秘密。这种暴露是我们人类对黑暗面的揭示。我认为小说的任务之一，恰恰就是收集这些特有的瞬间，让这些已被遗忘和延迟的时刻重现在我们面前，并且永远暴露无遗。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一个优秀的小说家会频频打开社会掩盖的潘多拉盒子。在讲述黑暗面的故事时，人们面对的是藏匿着恐怖、担心、非正义和暴力的社会。在进行了所有这些揭露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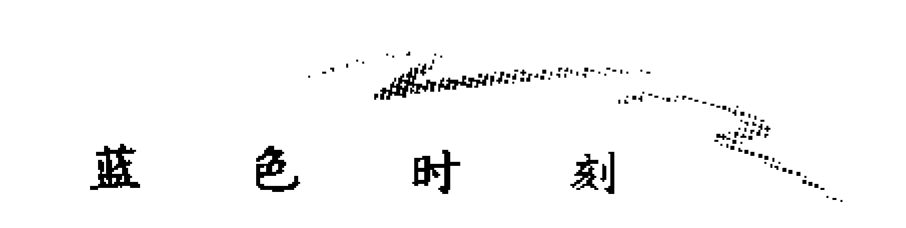
小说家也常常表现出希望来。

同样，在社会生活中，我们很多人幻想生活在一个与其他团体和个人截然不同的天地里，我们自认为与他们判若云泥。而现实常常是，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像秘鲁这样的多极文化社会中。那些自认为各不相同的团体又共处在一起，互相紧密牵连着，最终逐渐明白，他们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蓝色时刻》故事的发展过程中，主人公阿德里安·奥马切深入到了秘鲁的部分领域，以前他从未想象过会有这种地方，并且了解到了一些他原来认为不可能存在的战争年代的故事。他的旅行是对罪恶的魔幻世界的潜入。在某种程度上，正因为如此，小说才沿着倒叙的顺序，沿着主人公业已深入的地狱之旅，在寻找一个能够破解他父亲和他家之谜的女人的过程中，揭示了这些幽灵。他，一个生活于梦幻世界的人，第一次进入了现实世界。

我一直惊叹人类的能力，它能够打破周围世界的界限，寻找新的天地。如果说小说有什么吸引我之处，那就是它提供了显示人类能力的可能性，这使他们能够坚持自己的事业，忠实于自己的梦想，即使一切似乎都与他们的愿望背道而驰。

我很荣幸，由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介绍，这个故事能够被中国读者所知。我们秘鲁人民和中国人民被很多纽带联系在一起，不过也许其中一个重要的纽带就在于我们有着不同语言和多种民族共处于一个伟大国家的共同传统。这一古老而丰富的传统赋予我们两国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



我一直从其文化表现方面崇尚和赞美它们。中国的诗歌和艺术一直是我生活的一部分。现在我只是想对从你们那里所得到的一切表示感谢。

阿隆索·奎托

译者前言

《蓝色时刻》是一部写实小说，它以秘鲁政府军与光辉道路之间的斗争为背景，深刻反映了秘鲁社会的贫富悬殊以及政府军和游击队组织光辉道路一样作恶害民的严酷事实。

作者阿隆索·奎托是秘鲁新生代作家，一九五四年生于秘鲁首都利马，曾在秘鲁天主教大学学习文学。一九七七年赴西班牙，对西班牙诗人路易斯·塞尔努达的作品进行专题研究。一九七九至一九八四年，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就读，以一篇研究乌拉圭作家胡安·卡洛斯·奥内蒂短篇小说的论文获得文学博士学位。他迄今已发表小说（含短篇小说集）十一部，散文集和戏剧集各一部。出版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长篇小说《白虎》，旋即获得西班牙行星出版集团的维拉科查奖。由于他在文学创作上的突出成就而获德国安娜·西格斯奖。德国古根海姆基金会授予他二〇〇二年度作家奖学金。出版于二〇〇四年的长篇小说《大视野》，描写了藤森和蒙特西诺斯统治时代的秘鲁社会状况。著名电影导演弗兰西斯科·隆巴尔迪根据该书执导的电影《黑蝴

蝶》,在蒙特利尔电影节上作为最佳拉丁美洲影片获得格劳贝尔·罗查奖。

《蓝色时刻》是其新作,于二〇〇五年在西班牙巴塞罗纳出版,当年即获西班牙阿纳格拉马出版社第二十三届埃拉尔德小说奖。

本书主人公奥马切博士是一名职业律师和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他年富力强,事业有成,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更兼一份骄人的工作,月薪九千美元,真个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母亲去世后,他收到一封勒索信,这使他联想到早已与母亲离异的父亲在弥留之际对他的嘱托:父亲说自己在一个市镇当军团司令时,曾偶尔认识一个女孩,希望他能找到她。于是,他根据信件的线索及父亲当年手下两个干将提供的情况,终于找到了那个名叫米丽娅姆的女子。原来,政府军在与光辉道路分子作战中,双方都残酷虐待抓来的俘虏,政府军抓到光辉道路分子后,男的强迫他们做苦力,女的则先被军官玩弄,再交士兵轮奸,最后照着脑袋给一枪,免得留下活口。而米丽娅姆本来是一位极其漂亮的印第安少女,她被抢来献给司令,司令却一直将她据为己有。但已怀身孕的她终于在一个夜晚得以逃脱。然而,她的父母兄弟全被杀害,无家可归的她辗转来到首都利马谋生。当奥马切找到她时,她已在租用的理发店里工作,孩子已经十多岁了,而这孩子应是奥马切的弟弟。奥马切执意要资助她,但米丽娅姆拒绝接受任何帮助,只是希望他日后能悉心照料孩子。在他们频繁的交往中,两人越谈越投机,以致后来几次去旅馆开房间幽会。当米丽娅姆把一切事情

安排妥当，还清了所有债务，并买下了理发店之后，她因不堪忍受对亲人和往昔岁月的回忆而突然死去。奥马切悲痛之余承担起了对孩子的监护和抚养责任，因为他的信念是：我们都要为自己的爸爸承担罪责，也要为我们的子女承担罪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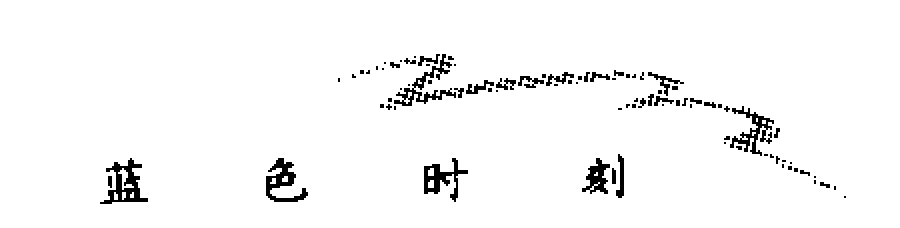
小说主要情节都基于事实，主人公的经历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原形。书中有关秘鲁光辉道路战争(1980—1992)的场景也是根据史实叙述的。作品中提到的光辉道路是秘鲁一个颇具争议的组织。它是秘鲁共产党的一个派别，正式名称是“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与另一派别“秘鲁共产党—红旗”并列而立。光辉道路成立于一九六九年，领导人是阿维马埃尔·古斯曼，其奋斗目标是通过武装斗争改变秘鲁的现行社会制度，最终夺取全国政权。他们的中心思想之一就是“除了权力，皆为幻想”。他们称之为“人民战争”的武装斗争开始于一九八〇年，地点就是书中多次提到的阿亚库乔。其两次暴力活动的高潮分别发生在一九八三至一九八四年间和一九八九年。在第二次高潮时，他们的暴力活动已经扩展到全国大部分地区。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二年间，光辉道路在首都利马造成大规模破坏，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之势，大有夺取国家政权的可能，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恐慌和动荡。一九九二年，政府出动军队进行严厉镇压，并抓捕了它的领导人古斯曼。一九九三年十月，古斯曼同当时的藤森政府达成和平协议，但他本人也并没有因与政府签订了和平协议而走出牢房。

本书与其说是揭露光辉道路分子的劣迹，不如说是控

诉政府军的暴行。政府军打着消灭光辉道路的招牌,到处烧杀抢掠。米丽娅姆并不是光辉道路分子,而是一个十七岁的印第安姑娘,却被政府军抓来献给司令先玩玩。只是由于司令喜欢她,才没有把她交给士兵们轮奸,从而也就避免了被奸后杀死的厄运。因为政府军抓到光辉道路分子后,男的强迫干苦力,女的则用来发泄性欲,轮奸之后一律枪杀。而政府军对光辉道路分子的虐待更是触目惊心,他们常把电线接在男人的睾丸上和女人的乳房上,以观赏他们遭受苦刑时的表情为乐事。

正是因为政府军同光辉道路一样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搅得秘鲁国无宁日,社会严重两极分化,人民生活水平日益下降。

小说是以奥马切的自述展开的。奥马切属于社会精英阶层,过着优裕的阔佬生活。只是由于追寻米丽娅姆,才使他接触到普通群众,看到了社会下层的丑恶现实;也是在追寻米丽娅姆的过程中,他逐渐了解到了被人们视为神圣武装力量的政府军和光辉道路的黑暗内幕。奥马切急于寻找米丽娅姆,找到后又要全力帮助她,是基于两个原因:一是有人利用米丽娅姆事件要挟和敲诈他,他怕有涉父亲丑行的事情暴露后,会给他的事业和声望带来损害;二是在与米丽娅姆接触后,米丽娅姆的勤劳朴实和年轻美貌令他顿生好感,而她那贫困的生活状况更使他动了恻隐之心,因此他决心要在经济上帮助米丽娅姆母子,以此来消除父亲生前给她造成的恶果,进而也减轻自己内心的愧疚,因为奥马切认定自己应该为父辈承担罪责。他的这种思想境界与那些



侵略了别国而又不肯认罪反而不断祭奠战犯亡灵的当权者比起来,真有天壤之别！而这正是本书的亮点所在。

我很高兴成为将阿隆索·奎托先生的作品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个译者,并且希望他的其他作品以及更多的秘鲁作家和拉丁美洲作家的作品能够陆续介绍到中国来。

刘 京 胜

二〇〇六年十月于北京依翠园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七日，一个由萨尔瓦多·克洛塔斯、胡安·奎托、埃斯特尔·图斯凯茨、恩里克·比拉－马塔斯和出版家豪尔赫·埃拉尔德组成的评选委员会一致决定将第二十三届埃拉尔德小说奖授予阿隆索·奎托的《蓝色时刻》。

优胜奖授予曼努埃尔·佩雷斯·苏维拉纳的《埃及》。

献给金塔·奇帕纳

和她比尔卡苏阿曼的朋友们

一个未成年的被捕女青年，被说服在洛斯·卡比托斯一个高级军官的房间里过夜。……三月三日凌晨，这个女青年逃跑了。

——里卡多·乌塞达 《死于彭塔戈尼托》

“是的，”我说，接着又几乎毫无意识地补充道：“一个人也许不仅要对他所做的事情负责，而且要对他看到或读到或听到事情负责。”

——哈维尔·塞卡斯 《光速》

一

这个故事开始发生前不久,《事物》杂志在它的《社交世界》栏目里刊登了我的一幅照片。

那是幅矩形照片,横贯整个版面的通栏。我微笑着面对相机,昂着头,上装时新,几个手指从我漂亮夫人克劳迪娅的肩后露出来。形象不错,自然又潇洒,属于那种会在摄影师面前露脸的人。我系着领带,头发梳理有致,一颗有十五年平静生活的婚姻戒指套在我的无名指上。我身旁是克劳迪娅、我的搭档爱德华多和他的夫人,米拉格罗斯……四个人都看着镜头,手捧威士忌酒杯,微笑中洋溢着亲切的矜夸,仿佛我们是那天晚上最幸福的伴侣而终于获了大奖似的。

一天,我们正在吃早餐,克劳迪娅把带有这张照片的

杂志递给我。我的小姨子不久从办公室打电话来。“你们看着挺有气质的,”她说。我的照片比那页上的其他照片都大,我挺高兴,但并不感到奇怪。

当时我看了半天,觉得挺不错。说实话,生活阅历对我挺关照。我当时四十二岁。月收入九千美元。体重八十公斤,对于我这个一米八二的个头儿来说也合适。我每天到健身房锻炼一小时。另外我还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有上百名很好的顾客。我得做很多工作,但是在办公室也能得到很多帮助。那时候有个朋友以指责的口吻对我说,我显得越来越得意了。

当律师本来就是我的天赋。在学校里,有一次我写了一篇随笔,题目是《日常生活中的权利》。那篇文章的主题思想就是,所有社会关系,甚至爱情和友谊的关系,都建立在一种默契的基础上。父母、子女、夫妻、恋人、朋友、兄弟姐妹,无须说明,都对自己的行为达成了一种协议。习俗建立了这种协议。如果谁打破这种约定,如果谁以某种不同于当时的方式行事,他就背叛了对这种关系的承诺,也就破坏了这种协议。法律基于人际关系。至少那个时候我这样想。孩提时代我就不仅喜欢法律,我还幻想能够写作。有一次我还写了一本冒险加浪漫的小说。

几个星期前,我开始想到我已经坐失的写作天赋。

我想到写作是因为我现在想讲这个故事。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看不到本书读者的脸也可以掩护我(一个已经签约的作家,要把他可恶的风格和他的名字放在本书里)。



我就叫阿德里安·奥马切吧。不过有些人会猜想我是谁。他们会认识我或我妻子克劳迪娅。我妻子克劳迪娅。叫她这个名字有点新鲜,就像叫个怪人。她那字母起伏的名字让我想起彩虹的样子,或者至少二十年前,在一个庆祝活动上认识她时,我是这样对她说的。恭维显得愚蠢,但却让她觉得风趣。

这个故事开始的那个年代,克劳迪娅称得上是陪伴典范。她衣着得体,陪我出席酒会,很快就成了其他律师夫人的朋友。

你不可能有比她更好的妻子了,岳母常这样对我说。她说得对。克劳迪娅凭她的衣着和举止,总会给朋友和熟人们留下好印象。她常常在家里举办长时间的精美晚餐,餐桌上布满了大盘的肉、沙拉和甜食。一些大律师——像穆尼斯、普拉多、罗德里戈——在我家一直呆到下午,临走时总是和我们拥抱告别。同样还有些政治家:费雷罗、洛德斯·弗洛雷斯,贝朗德本人有时候也来。大家都是好朋友。

我喜欢让我的女儿们在家里见到他们。我们有俩非常值得崇敬的女儿(提到她们,我现在想到应该用这个词)。

现在,大女儿阿莉西亚在天主教大学学习法律。她很高兴地肯定自己有这方面的天赋。她会像我一样成为律师。她是个聪明漂亮的姑娘(并不是因为我是她父亲才这样说的,你们会理解的)。她还处在自以为无所不知的年龄,不过同比她大的孩子在一起时,她还是那么可爱,甚至可亲。不是我夸张,她是智高一筹的人。小女儿露西亚像她姐姐一样聪明。露西亚是个善感的女孩,生来爱幻想,还

有些天生的恐惧,比如害怕黑暗和蜘蛛。她有丰富的想象力,而且需要亲热,所以她总是给我一个接一个地讲故事和笑话。她有活泼的眼睛、迷人的头发和修长的腿,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姑娘之一。她喋喋不休就是为了在三个比她大的人中间努力显示她这个小人儿的存在。

露西亚特别喜欢吉他音乐,总是和那些女孩们一起关在她的房间里听库尔特·科白因的唱片。她满十三岁后,我给她买了个低音吉他。好在这个乐器并不是特别吵。另外我们在圣依西德罗的五百平方米住宅也足够让我们每个人,包括两个清洁员、一个厨师和克劳迪娅的司机,可以远离她那琴弦的美妙乐声。

露西亚不弹奏音乐的时候,就常和我在一起。她给我讲小故事,倾吐她和她的朋友们的问题,她常要求吻我一下和拥抱我。这种拥抱至今在我的记忆里都是最珍贵的。我怀念那些时刻,因为我想,随着所有事情的发生,它们现在已属于遥远的时光。那时候,我的女儿还拥抱过另外一个男人,而他已经永远地消失了。

我妻子克劳迪娅继承了她母亲的巧手,换尿布,回答孩子们的问题,化解她们的抱怨。她读过有关七至十岁和十一至十三岁年龄段儿童行为典型特征的书籍。岳母就是一视同仁地关爱教育她的女儿们的,让她们以一种坚强、道德意识和对他人的理性关爱的交织性格走向社会。克劳迪娅以同样的方式对待阿莉西亚和露西亚。此外,她的教育方式也得到了我们殷实经济基础的支持。由于我同客户们的



良好关系(只能这样说),我的工作情况还是相当不错的。另外,岳父岳母靠他们在工厂多年的工作已经积攒了一笔钱。岳父请我们外出度假时总是令人不可思议地慷慨。他为我们支付最豪华的饭店,为我在酒吧开了个账户,还为孩子们买礼品。加勒比群岛是他们喜欢去的地方,结果有几个冬末,克劳迪娅和我都是黑黝黝的。

我很少能够抵御虚荣心的影响。我喜欢家里井井有条,有个和蔼可亲、又善解人意的女主人,几个在学校里善学又用功的女儿。我喜欢穿得好,我说这个也没什么不好意思。不过,我喜欢的这个,也是看时候…… 也就那个时候(现在我觉得那个时候已经显得很遥远了……),我是说,一个厄运包围了我,一只扼在我喉咙的手使我难以动弹,即使是做一些日常的事情。从早晨起床、梳理头发、穿好衣服,直到其他所有事情:开始这一天,开始一天的嘈杂,跻身于职责的长廊,逐步努力穿衣服和刮脸,设计穿戴,变成了绅士,在客厅里走出第一步。

也许是那种皮肤上的沉重感,那个已经扩散的悲哀,造成了我的梦境。并不是忧郁的梦,应该说是明亮的场景,我在里面释放我要做点激烈事情的欲望。

这是我那段时间里常梦到的情景。我赤身裸体。我意识到我是在岳父的家里,在丰盛的晚餐上,是个宴会。岳父看着我微笑。很多西装革履的人在享用酒会的食品。突然我手里多了个东西。是什么?是瓶调味番茄酱。我打开瓶盖,却把调味番茄酱撒在餐桌上。白桌布被染红了。岳父没了微笑,可他的客人们却为我的做法叫好。我忽然意识

到这不是瓶调味番茄酱。是手枪。一支手枪。我觉得使用它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我向每一个在场的人开枪,他们大笑着死去。最后我对自己的太阳穴开了一枪。我醒了。梦结束了。

虽然有点怪诞,可事情还挺开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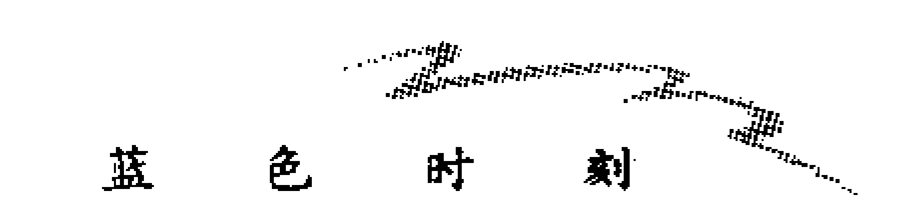
还有个反复的梦。在岳父家人的掌声中,我在他颌骨上拍了一下。掌声停止之后,我又拍了他一下。如此这般,反复几次。

这种冲动就像爆炸时发出的火焰。冲动产生时,我对自己感到疑惑,觉得自己可笑。可我总是沉湎在这些景象里,还带着点快感。

大概我说得过分了。并不是这样。我对家庭、工作、熟人和朋友都感到很满意。我觉得我对岳父也挺满意的,他总是请我们一道去旅行(我已经拒绝很多次了)。我喜欢坐在家里的阳台上,对面就是游泳池。我为接待朋友们感到骄傲和高兴。我没有理由去做任何事情来反对围绕在我周围的坚实壁垒。我的成就是一副安定剂。应该始终如此。我衣着的华贵就是我在社会上所作所为的印证。我从容清晰的声音总是给谈话蒙上柔和的色彩(有一次克劳迪娅以赞美的口吻这样对我说)。

直到几年前的一个早晨,一切都改变了,那是母亲去世的那天。母亲的去世也许是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她的病拖了很长时间,所以那个时刻来临时,我早已想到了。然而这个消息还是让我陷入悲伤之中,不能解脱(谁还有什么最终不能解脱的吗?)。



那天早晨，她的护士诺尔马打电话，告诉我这个消息，她的话仿佛击打了我的全身。“夫人已经昏迷了，先生，当时我正在厨房，忽然感到一个声音，我跑向卫生间，发现她在地上，我找到了她，不知如何是好，她刚刚洗完手，她最后一直在洗。”

我曾多次想象，她一人站在镜子前，看着自己——她蓝色的睡衣，修长的身材，高耸的肩膀——直到倒在地上。我仿佛听到了她身体发出的声音，先是一声粗闷的撞击，然后胳膊和衣服垂下，一直寂静，直到别人发现她。

我赶到母亲家，只是为了看看她是怎么走的：松软的身体裹在睡衣里，腿交叉在地砖上，嘴角下垂，带着惊恐的表情。

小粉刷已经从她手里脱落，掉在一个角落里。这是她在世的最后一次修饰，她刚刚梳完头发。这是个富有魅力的遗体，已准备好接待前来守灵的人。我抱起她，想跟她说话，可尽管我接触死人的经历不多，我也意识到，我抱的不是一个身体，而是一块肉。她的脸像被施了巫术。我叫了救护车，而这仅仅是履行程序而已，是一线希望的机械表示。我手里感觉到她睡衣的布料，她皮肤的余温，她面颊的惨白。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年，悲痛一直挥之不去，还有我过去和现在对她的崇敬…… 我对她的崇敬、尊爱、感激，也许感激，只是一种表达方式……所有这些都伴随着我。

母亲是以一种战略的快速去世的，没有任何仪式，没有告别，没有声明，没有家庭会议。她的遗嘱早就准备好了。她曾不时不动声色地低声托付我一些小事情。

“我的衣服和鞋,你喜欢的可以留下。剩下的就送给西夸尼的卡门教派教民。我把家里的桃花心木大座钟留给你。等事情都完了,你可以把它拿走。”

从来没有过做作的宣讲,而总是在上车时或者电话里告别之前给予中肯指教。在她还未改变话题的时候,我常对她说,你别这样说。她已经对我说了。她很平静。

在医院和殡仪馆里,克劳迪娅都陪伴在我身旁。在她帮助下,我通知了亲戚们。其中最重要,也是最远的亲戚自然就是我的弟弟鲁文,他住在新泽西。

就这样,几年之后,我又见到了他。

我弟弟鲁文。那天下午,我在机场等他,由于悲伤而心神不定。破碎的跑道,焦急的出租司机,还有两个龌龊的看车人,央求着要给我洗车……

鲁文从海关出来后,我走过去,拥抱了他一下。

过早形成的便便大腹,渐显的下巴肉,宽宽的大牙。他在新泽西成功的喜悦使他的肚子大为见长。从机场去教堂的路上,他大声回忆着同我妈妈在一起的情景。他急促的高声由于呜咽而岔调。“我忘不了妈妈,我忘不掉,听我说,我觉得她正在跟我说话,我好像看见了她。这些又浮现在我的脑海,听我说。她为我做了蛋糕,上面用草莓组成了‘鲁文’的图案,我的腿骨折了,她站在我身旁,抓住我的手,她到学校接我,然后我们一起去吃甜食。哪个妈妈能做到这样?”

车里,鲁文坐在我身旁,不时举起双手,发出哀号。



我们到了法蒂玛教堂的灵堂。一看到棺材,他就抱住棺材,摸着棺盖,哭泣起来。先是高声哭,继而嚎啕。几个亲戚走过去,拍他的身体,还抱住了他。

整个夜晚,他坐在那里,有几次和我站在一起接受吊唁。第二天,他陪我站在第一排。他不时揩着眼泪。他最后一个离开灵堂,第二天早晨又第一个来到。我呢,整个晚上向朋友和亲戚们重复着同一套话:"谢谢你来看望,非常感谢,这很突然,是的,她已经患了癌症,可这次是由于心脏衰竭。"

克劳迪娅一直陪在我身旁,除了由于露西亚哭泣而把她带出去的时候。阿莉西亚更坚强些。我从远处看着大家:朋友、同事、亲戚,一群群,聊着天,询问着。我透过我的悲痛、礼貌和力量望着他们,就像透过一层厚厚的玻璃。到最后,跟这么多人说了话以后,我的身体开始疼起来。

一切都很迅速:向墓地缓慢行进,神父最后致辞,在鲜花中下葬棺材。然后是回程,大家列队而行。那天我向那么多几年未见的人致意…… 所有叔叔和表兄弟们,所有的朋友们,所有来灵堂哀悼的人。一个都不少。就像是个典礼。被看望的是我母亲,而我和兄弟接受大家的拥抱。

鲁文继承了我们父亲的沙哑嗓音、粗糙的双手和酒糟鼻子。某种程度上就是父亲的再生。他越来越像父亲。侏儒越来越像那个生他的丑八怪。父亲的脸庞以那种少见的方式拼凑而成:像块石头地,很难想象那上面会有我母亲细嫩手指的触摸。好像两个人来自于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

一边，母亲低吟的歌声催我入睡，她纤细的身影在早餐桌旁等我。而另一边，是父亲的狂笑，他生硬的嗓音，还有那指关节光秃的双手。

我的父亲。我已经竭尽全力让我远离对他这仅有的回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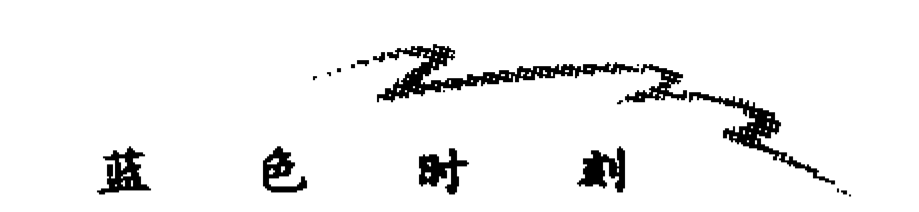
他的去世只留给我一缕茫然的遗憾，一种被义务强加的悲痛。前一天，我去军事医院看望他。我看见他靠在床的栏杆上，胡子很长，睡衣脏兮兮的，正同一位神父没完没了地说话。

那天，他看见我走进来，坐了起来，张开双臂。“孩子，你来了，妈的，我真不能相信，你终于来了。”爸爸嘶哑的嗓音，短促的呼喊，睡衣上的脏条痕，瞪圆的眼睛，高举的双手，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他高举着双手跟我说话，“我做了多少孽，我们怎么会一直没见面呢，而现在……我有这么多事情要跟你说，孩子们怎么样？都好吗？哦，都好，听着，有点事儿我想跟你说，儿子，你看，如果什么时候，或者，你看到鲁文了？不，我没有见到他，好吧，那听着，我想让你知道点儿事，有个女孩，我偶尔认识的女人，要不，我不知道你是否能找到她，反正，如果行，你就找找她，那是在战争的时候。在万塔。有个女孩儿在那儿。我求求你找到她。在我死之前。”

他正要对我说什么，一个护士拿着针管走进来，“不，你出去，我正在跟我儿子说话，有个女人在万塔。”

“行了，别说了，让他们给你打针，爸爸。”

别人告诉我，那天晚上他同护士们吵，同值班医生吵，



“让我儿子阿德里安来，”他老是这样对他们说，“让他赶紧来！”他本来想把输液的针头拔出来，直到他突然安静下来。第二天早晨他起了床，要了早餐，可忽然他缩成一团，就一直这样。他死了。

在灵堂里，母亲和我献上一束花，和他的几个朋友说了话，然后走了。总之，那次我们在那儿呆了也就不到一小时。其他的就是办理安葬手续和接受那些心不在焉的礼节性吊唁。

我从母亲那里继承了理想主义、伤感、军人的乐观精神和对音乐与阅读的热爱，也犯下了由这些美德衍生出来的罪恶。她的纯真毁了她，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让她堕落。她同外界第一次、也是唯一的接触就是与我爸爸相遇。

我的妈妈原来是个清秀、温和、爱幻想的女孩，在贝伦学校接受了系统的教育之后，忽然在一次庆祝活动上认识了这位海军军校学员，他身着深色制服，制服上还别着徽章。据我几个姨妈讲，我父亲那故作的英俊青年举止——他的制服，他被风度掩盖了的粗鲁，他那轻慢的风趣——在母亲的头脑里产生了一种幻觉。这让她产生了错觉。年轻爸爸带饰带的制服出现在她家门前…… 随着这身制服，妈妈上了他的雪佛兰，听他讲海军军校里的训练…… 你好，贝阿特丽斯…… 下台阶时，他伸手扶着她…… 你看起来真漂亮，美人……今天早晨六点咱们就跳进大海，游了两个小时…… 看着下面的世界，那是什么感觉，你在那里看到了那么多的海洋生命，有一天我要带你同我一起去海底考察。

已故姥爷的愤怒和姥姥的伤心丝毫不起作用。母亲决意与那个军官结婚,他曾许诺要给母亲美妙的生活,可是据母亲讲,从来没有过美妙。

父亲的唯一长处就是以他谄媚的表象掩饰了他是什么人…… 就这样一直到他们结婚,我母亲同他睡在了一起(我觉得母亲并没有同他睡在一起,只是她看着他在自己身旁躺下,看着他起床)。于是随之降临的是酩酊大醉的夜晚,她孤身独守的早晨,吼叫……

按照母亲从小被培养的品性,她是个模范离婚女人。她不说前夫的坏话,因为她不提他。她也不接受其他男人的邀请出去(尽管门口不乏激情涌动的情郎)。也许她的沉默就是对她愚蠢天真的承认。有时候父亲的名字以某种方式在谈话中出现,她总是随口说出几句得体的话,什么"谁知道他怎么样,我们但愿他好"。有一次她还托人给他带去一份材料。

母亲全身心地履行了她孤独生活的各项程序——在客厅里听古典音乐,身着白色和蓝色衣服,同要好的女友交谈。不过,她曾对我姨妈弗洛拉说过,前夫是女人永远也摆脱不了的灾星。"大家都会说你同他结过婚。这你可避免不了。"

我也摆脱不了他。在上学的时候,我可以以一定的次数见到他,到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少得多了,而等他回到阿亚库乔后,也就见到他五六次。他在阿亚库乔过了几个"鳄鱼"(有一次他对我解释说,在战区这样称呼一个季节)。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习惯了母亲那种小心翼翼的



卑怯。她的慎独表现了她的高尚,可她也有她的实际目的。据我的一个姨妈对我讲,母亲觉得我们最好能维护父姓的尊严。我们既然不能祛除它,就最好用我们自己的行为,应当是审慎的纯洁行为,给它增加些光彩。只是有一次,在我的坚持下,她谈到了同他的关系。"你看,我觉得我已经意识到了离婚后我是什么人,"她说。"以前,我不知道,我那时太简单了,我认为我将要经历的是美好的生活。我不知道我当时想什么呢。现在我知道了,我只能孤独,好吧,我只能接受它,不过我也知道,我也得到了补偿,至少我还有你们,有你,有鲁文,有这么漂亮的孙女们,我有我的女友们,实际上,我并没有停止做事情:读书俱乐部,我们为穷孩子们织的衣服,音乐小组,我们还做贺卡,做很多事情。我的生活如此充实,阿德里安,有你们,有孩子们,如果你弟弟再多给我写信…… 那就再好不过了…… 是啊,不过他可能太忙了,我想……"

另外,关于父亲,我偶尔也有自己的想法。有时候,我喜欢自己遐想,想到他是个伟大的军人,一名与光辉道路进行战斗的英雄,一个勇于去阿亚库乔的人,面对一群有组织的杀人犯。谁能做到这些呢?

对阿莉西亚和露西亚,我不止一次地略带敬重,甚至略带盲目崇敬的口气谈起她们的军人祖父。一个良好家庭模式里的孩子总会在生活里有更多的成功机会,克劳迪娅和我已经印证了这点。母亲对此当然也赞同。最重要的是要让孩子们知道:她们有个坚强的靠山,她们生活的成功就是家庭传统的结果,也是她们努力和自律的结果,克劳迪娅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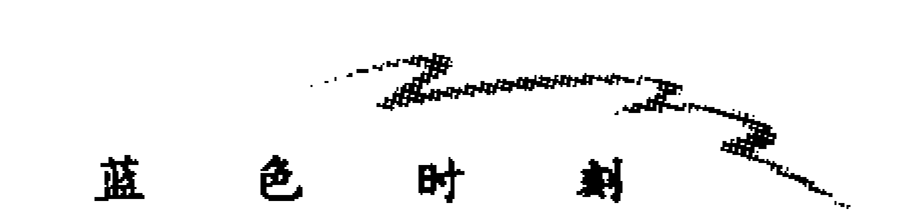
对我说。而你爸爸,作为地道的军人,就是个严于律己的人,因此他是个卓尔不群的人。

于是,很多年来,我一直坚信父亲在阿亚库乔同光辉道路的恐怖分子进行战斗,还有他为保卫我们的祖国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尊敬他。

小时候,我们见他时总有些盼头。他来看鲁文和我的时候,带我们去电影院,去吃鸡肉配土豆,这样可以佐证他的教诲(得努力工作,懒惰什么也干不成),还有他的黄段子(一个蛋对另一个蛋说了什么?)。

父亲骄横得意的影子有时候也在这个母系堡垒里盘旋,而我只能透过堡垒高高的窗户观望世界。我从很小的时候,就置身于这坚固的大宅里。母亲委身于她道德支柱的阴影里,从未走出这个城堡。离婚后最初几个月显示的些许勇气又加固了那座建筑的基础。

婚姻的路途对于她来说是艰难的,姨妈弗洛拉常对我说。"她忍受了你爸爸两年半。在那段时间里,她总是为他准备早餐和晚餐,陪他去参加与他军人朋友们的聚会,怀着痛楚的亲情有过两次生育,并且作为默默无闻的妻子,耐心地过着她千篇一律的生活。在他第三次早晨才回来时,一切都改变了。那天中午,在家中的客厅里,她站在他面前,字正腔圆地对他说:'我对你好色之徒和玩世不恭的毛病感到恶心,并通知你,我要正式离开这个家,这个家庭。'他惊讶地听着。那天下午,她看着他走了,还向他仔细交代了她刚刚为他收拾好的箱子。不久,她开始在我姨夫卢乔的事务所里工作。"



这些都是从姨妈弗洛拉那儿听到的。她从家庭单身成员时代起，就已经目睹母亲的不幸，就仿佛看到的是一个不幸的女人，而她同时又是个特别的观众，是个叙述者，是个次要角色。

弗洛拉姨妈告诉我，"你母亲的决心（无论如何也要结束同你爸爸的关系）从婚后几天就开始了（我觉得她结婚的当时就意识到了）。经历了这个痛苦和惊愕的发现之后，她在餐桌上和谈话中看着那个男人的愚蠢和粗鲁日益见长（以前我怎么没发现呢？她常说）。婚后的第三年，她下了最后的决心。因为有你们两个小家伙，你妈妈就让你爸爸住到另外一套房子里，从分居之夜起，他一直住在那里。"弗洛拉还告诉我，"你妈妈说：'我会把离婚材料给你送过去的。你能七点左右回到家吗？''听着，讨厌的东西，你甭想和我离婚！如果你想离的话，咱们就去打官司！'而你妈妈回答道：'咱们可以去打官司，不过到时候你得付我一大笔养老金，你知道吗？'接着，她又和缓地对他说：'就这样吧，送信人七点会把材料送过去，让你签字。你最好签字，阿尔韦托。这件事上你得听我的！请你别要你的大男子主义了，那只能是更愚蠢！'她就是这样对他说的。"

离了婚，母亲的面颊又恢复了气色，她热情高涨地投身到对鲁文和我的养育，她从这个悲剧中又重新得到了尊严。她向所有人证明，她置身于这些不幸事件之外。她的勇气正是出自她沮丧的悲剧。不看他，不听他说话，不了解他的事情，可以穿戴舒适，保持着微笑和高昂的头，同她的女友们一起组织茶会和音乐聚会，这些成了她面对失败的情操

标志。她总是寻求从各方面向我们拓展她的情操。她教导我们要保持冷静,"你们遇到问题时,"她常说,"得把问题整体考虑,仔细分析所有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后选择一种。"她也热衷于衣着的话题,"一个人穿的衣服是他精神的反映。"她总是说。我们童年期间,母亲最常做的决定之一,就是为我们购买精制的衣服。她多次从米拉弗洛雷斯的哈里斯店给我们带来西服、新衬衣和领带。我总是穿这些衣服。可鲁文从来没有觉得这些衣服舒服。在我们家铺着白色地毯的客厅里,他从未感到称心如意过。一有机会,他就去美国定居了。走后,他回来过几次,但都时间很短。虽然母亲几乎没说过,但她一直惦念着他。

幸好,在他在利马呆的几天里,我没向他说起这些。他不配对母亲的去世悲伤,我想。

二

在利马的那段时间里，我几乎天天见到他。我们一起看遗嘱，每人平均分到一份。我们同律师谈，又去了公证处。我们把家里的一些东西进行了分配。同时，我还得自己去办理安葬手续。耐心地接听吊唁电话，忍受失眠，以泪缓悲，阅读报纸上的告示，逐渐承认她的离去，清理空缺的位置，还有那些写着她名字的信件和明信片源源不断地到来。

一天晚上，在姨妈弗洛拉家里的晚餐上，我坐在鲁文旁边。挨着他那么近，我又发现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穿灰色三件套，留着短发，而他的油光散发洒落在带皮护肘的外衣上；我的声音认真柔和，而他沙哑的话语里不时夹杂着粗话。

他有点发福了。鲁文最近的发福使他的缺点更加明显。他以自我为中心,奔走于世界。腰间和面颊的赘肉,形成一个环,凸出了他血管上结实的脂肪,粗糙的脸上是稀疏的眉毛和小牡犊般的眼睛,他到处奔走,不过他的体形可真对不起社会。他沙哑的声音就是他身体肥厚的一种释放。看着他这样,我觉得有点想笑,也许还有点儿厌恶,不过从另一方面讲,我又觉得在某种方式上,我又是同他联在一起的。母亲每次想起鲁文时,思念之情总是充溢着她湿润的眼睛。这当然不是指责他很少给母亲写信或者疏于掏钱为母亲治病的时候。“最好就这样,我比他大,就该如此,”我几次对母亲这样说。

安葬后的一个星期,鲁文要回新泽西了,我们一起吃午饭。我们商定在他住的饭店里会合,这是最合适的(克劳迪娅看不上他,所以我把她解脱出来,免得她还得忍受他在我家里吃午饭;说实话,我也不想让我的女儿们多看见他)。

两点,这是约好的时间,就要到塞萨尔饭店了。我走进一个广场,又沿着迭斯·坎塞科大街走了几个街区。

不知为什么,那天我注意到了人行道的路况,以前我倒没怎么注意:水泥开裂,高低不平,地砖重叠。一种潮气的味道仿佛从裂缝和小土洞里冒出来。

我碰到了鲁文,他正从出租车上下来。他身上背着一包礼品(我认识个外国妞儿,我想把这些羊驼毛做的小东西带给她,挺精致的,会打动她的)。我让他把东西放到房间去,我在餐厅里等他。



我一边喝咖啡、看报纸，一边等他。一会儿他进来了，头发湿漉漉的，牡犊般的眼睛放着光。他坐在我面前，向侍者招招手。“酸皮斯科酒，要双份的，赶紧点儿，先生。”

我也要了同样的一份酒。我相信喝口酒会有助于我面对这次谈话。

饭店的餐厅里都是黄头发的游客，这就造成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这个由金色人组成的空间里，鲁文和我就像是昏暗柜台里的布娃娃。游客们看着我们，像是在微笑，也许他们想把我们俩人包起来，当玩具带走。

喝完酸皮斯科酒，我同意要份鸭饭，这是侍者推荐的，他把食指和大拇指合在一起，上下摇动着手说：“很好吃，先生。”可是我没有接受鲁文叫的菜豆，那上面有个煎鸡蛋。鲁文问起我的家庭，我说“很幸福”，然后就不说话了，好像刚向他透露了个秘密似的。他说他本来想去看看我的女儿们。

“下次吧，”我回答说。“她们在学校里事儿挺多，马上就要考试了……”

“好吧，那咱们再来杯酸皮斯科酒，再来两杯，先生，你不要？最好别要了，我已经喝了一杯了，下午我还得工作，妈的，可是，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大胖蛋？”

“我也不知道。听着，可是我给你写信，你没有回，你是有很多麻烦事，有工作上的，也有妈妈的。你知道，你要是给我写了信，要是给我回了信，我就得给你打电话了，你还记得吗？”

“是的，我记得。”

“好吧，行了，咱们把那些烦心事忘了吧，我还得要份玉米饼。再来一杯酸皮斯科酒和一份玉米饼，先生。”

“真的，真的，美国是个伟大的国家，”他说，“可是那些外国佬还是没学会做咱们这样的甜食。都是面粉，都是水果甜食，没有什么能比得了玉米饼，听着。”

我点了一支烟。

没想到和他在一起，我能如此平静。我们舒舒服服地坐在座位上。侍者们争着要为我们服务，我们吃得不错。那天真痛快！

鲁文狼吞虎咽地吃着玉米饼。他一连串给我讲了三个黄段子，还不时拍着我的胳膊。他谈起了他的前妻，谈起了他去的高档妓院，谈到他一晚上能花多少钱，谈到他称之为生活哲学的东西：“该操就得操，老兄。你看妈，”他又补充道。“我认为她从来没有快乐过，从来没有。她本来可以更多地去旅行，可以到新泽西来看我，谁知道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消遣方式，”我回答说。

“什么叫自己的方式？有些人，他们的消遣就是不怎么出门。他们愿意自己听音乐，或者在家里看书或看电影。对于一些人，这也挺惬意的。妈的，你说什么傻话呢，兄弟。”

我们继续谈妈妈，他问我她最后几个月的情况，我说她总是祈祷，还听音乐，同女友们一起喝茶，有时候还打听他的情况。终于，我把我原来想到的都告诉了他。

“我觉得她最好的事情就是同爸爸分手了。”

鲁文紧闭嘴唇，抬起一个手指，把它从一侧摇到另一侧。

“为什么？”他问。“爸爸挺精神的，妈妈也很漂亮，可她不是他要的女人。”

“当然不是。”

“另外，她总是在心里看不起他，像他这样在社会上有脸面的人，又能怎么样呢，这不是对母亲失礼，不，这不是。我漂亮的妈妈就在我这里，”他抓着自己的胸脯，“谁要是说她的坏话，我把他的屎抠出来，可是爸爸也挺精神，是个好人，一个正常人，他有他的事情，可他还是个好人，人就是这样，男人就是这样，你明白吗，我不同意你的说法，听见了吗？”

“不知道，我觉得他们是两个很不同的人。爸爸总是挺大男子主义的。”

鲁文咬了咬牙，喝了口酸皮斯科酒，看着我。忽然闪出一丝凝滞的眼神。

“他并不是那么大男子主义。”鲁文停了一下，看着窗户，捶了下桌子。“你想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吗？你知道吗，一天晚上我看见他在那儿哭起来，爸爸搂着我，对我说他没钱了，像这样的穷兵，他常这样对我说，连买衣服的钱都没有了，将将够付水电费，再剩点吃饭用，可我挺住了，他拍打着自己，捶自己，为了我的国家，为了打击恐怖分子，我挺住了，他举起手指，可是很幸运，我有我的孩子，这就够了。我有俩儿子，他重复着，一边还拍打着自己的胸脯。”

“妈妈与爸爸结婚，大概是因为她音乐听多了，爱情小

说看多了,产生了浪漫思想,同他结婚也是个天真行为。我觉得是爸爸的军装使她爱恋,爱上了他的形象,而不是这个人。后来,了解了这个人,她就开始失望了。"

鲁文用餐巾纸擦擦嘴。突然他又一次举起食指,从一边摇到另一边。

"我不信,"他说。

"不信?"

他喝干了酸皮斯科酒,又要了一杯。

"你知道,我每年都请他去纽约。最后一次他是和几个朋友一起去。他同两个朋友一起去了。"

得知他同鲁文在美国呆的时间比和我在利马呆的时间还要长,我心里感到一丝不悦。然而,事情是完全可以解释的。爸爸同弟弟在一起要比跟我在一起感觉好得多,意识到这点就不会动怒了。

"你们在那儿干什么了?"

"我带他和他的狗腿子去了 X 窑子,"他补充道。"鸨母开的妓院。那儿的窑姐,你一进门,就像看见一泓泉水,"他张开双臂,"刚进门,就出来个极靓的妞儿,'你好,家伙们,跟你们干真来劲!'她这么对你说,还请你喝一杯,那是老鸨的地方,我们一块儿把她干了。当然是我请大家,因为他们是秘鲁穷光蛋。可他妈的老头子目瞪口呆。外国佬在妓女方面比我们技高一筹,她们训练有素,会伺候你,有的贵妇人愿意的话也可以当婊子。"

侍者送来酸皮斯科酒,他一饮而尽。他又要了一杯啤酒、一杯咖啡,还往牙缝中塞了根牙签。



“你看老头子在那儿怎么样?”我问。

我觉得有些奇怪。只是现在,母亲去世了,我才允许自己对父亲有点好感。

“好。老人挺好。是的,他已经不太行了,有点吓着了。他想可能有人会打探阿亚库乔和战争的蠢事。他已经被记者吓得差不多了,他这样对我说。”

“什么?”

“这老头儿还真有点儿倒霉,妈的,他也有他的事。”

伙计送来啤酒和咖啡。

“请慢用,先生们,”他嘟囔着说。

我喝了口水。

“有点儿倒霉? 为什么?”

他拿起杯,像是在嚼啤酒,接着说。

“你知道爸爸当时干什么吗?”他一边说一边用牙签剔牙。“你知道他在那儿有一次,或者就是他在万塔的时候,或者说他在军营做的事吗?”

“好吧,他在与恐怖分子战斗。就像其他许多人一样。这应该挺招人嫌的。”

“妈的,老头子真有点混蛋。”

他拿出牙签,端起咖啡杯,定睛看着咖啡晃动。那是杯卡布其诺浓咖啡。他的嘴唇上沾着白沫。侍者站在我们旁边,双手叠放在一起。

“先生们还用点儿什么吗?”

鲁文要了杯白兰地,并命令我陪他喝一口。他每次说点什么时,都要晃晃头。

“那么来杯矿泉水,先生?”

“是的,一杯矿泉水。”

他盯着我。两眼冷酷。

“妈的,你倒是喝点儿呀。”

“我下午还得工作。”

“妈的,你倒是喝点儿呀。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笨蛋?”

“这倒是,可是我在这儿,听着。我没走,是的,可你告诉我,关于爸爸刚才你要说什么?”

他深深呼出一口气,摊开双手。

“妈的,是的,你也该知道了,因为,老东西有时候必须杀恐怖坏蛋。可他不是杀了就完了。男人他派去干活……是为了让他们说…… 而女人呢,那就,有时候就干女人,而后有时候还把她们交给部队,让他们干,最后给她们一枪,他就干这事儿。”

伙计送来白兰地和矿泉水。鲁文长长地呷了一口。

我默默无言,好像麻痹了似的。看着泡沫在杯子里上升,我觉得有点奇怪。

“先干了她们,又把她们交给部队?”声音从我这儿发出来,是要证实我刚刚听到的话。“你怎么知道的?”

“他的一个军官对我说的。”

“谁?”

“一个军官,马丁内斯上尉。他和爸爸一起去新泽西的时候我认识了他。瓜约·马丁内斯。昨天晚上我在我朋友查乔·奥索里奥家里碰到了他。你还记得查乔吗? 我们在



他家喝了几杯。他告诉我老头子干了那些事。有几次先干一个女恐怖分子,然后再把她交给部队,让他们排着队干,最后在她脑袋上打一枪完事。他们总是对她说事后就放了她,这样对她干什么她都得接受。他们告诉我,这样她们也会忘记了害怕。”

我向一旁望去。游客们已经走了,一个小伙子绷着脸在收拾桌子。我感到一种茫然。难道事情就像他说的这么简单?

窗户上映射出一层暗淡的光线,将将能够照清排列的桌子。有几辆车向另一侧驶去。一辆黑色三轮摩托车上装着空瓶子。一个男人不慌不忙地踩动着脚踏板。

“你相信这些吗?”我试探道。

“相信,他们是这样对我说的。”

“我不知道,不过有很多故事都是编出来的,还夸大其词。”我议论着。

一只苍蝇飞进餐厅,在鲁文头上飞舞。他几次把手抬起来又放下。

“可是,有件事你知道吗?”他两臂交叉在胸前,微笑着补充道。“有一个女的跑了,听着。有一次有一个跑了。”

“有一个跑了?”

“他们这样对我说的,是这个意思。是的,那么,就像有人说的,再好的猎人,也有失手的时候。老头子也不总是对的。一个女囚犯从他那儿跑了,那是因为他爱上了她。你得知道。”

“他跟你说过什么吗?”

“没有，一点儿都没提。他能对我说什么呢？是瓜约告诉我的。好吧，不过也应该理解老头子…… 我敢肯定是战争让这个可怜的老头子成了半个疯子。他们说你身处战争就是这样，让你变得这么坏，就是这样。你一点儿都不懂。”

“我不懂，可是我不能相信。”

“你不能相信什么？”

“所有这些。”

“你为什么不能相信？”

“不知道。”

“战争从来都是臭狗屎，好兄弟。所有战争。”

“这我想到了。”

鲁文喝完了杯里的酒。

“妈的，真好喝。你陪我再喝一杯，大笨蛋。”

“行。不过我想再要一杯酸皮斯科酒。”

侍者说马上就给我拿来。

“好吧，那咱们就为老头子的健康干一杯。也为了老太太的健康。”

我们沉默了一阵。侍者终于拿来了酸皮斯科酒。它像糖浆那么黏，酒吧侍者柠檬放得太多了。我喝了它。我们又聊了一会儿。

我看看手表，对他说我得走了。他耸耸肩。

我站起来，他也跟着站起来。我拥抱了他一下，表示告别。忽然我们交换起电子邮件地址来（他说他有不止一个地址）。他用他的胖手指告诉我哪个是他天天看的地址。

在那一瞬间，我已下决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再见到



他。

我上了车，打开收音机。“有一次有一个跑了，一个女囚犯从他那儿跑了。那是因为他爱上了她。你得知道。我敢肯定是战争让老头子疯了。”

红灯亮了，我停在奥瓦洛·德尔·帕西菲科路口。

我坐在写字台前，审阅着卡诺先生的合同，突然我看到了父亲的脸。他两腮下垂，眼睛有些发炎，宽宽的牙齿，以他沙哑的声音一再对我说，“不是这样，孩子，不像鲁文说的那样。”

他站在写字台前，面对着我，把头伸到合同这边来，带着一种知错者的隐约微笑，可向我微笑，是让我审判他。我看见他伸出手来想与我握手。他有几个手关节很粗，像螺母。现在父亲正看着我，他坐着，已经意识到我刚刚知道了那件事，而且全部都表现在脸上，坚硬的皮肤，石头般的嘴唇，眼睛湿润，我觉得我是第一次看见他穿军服。黑色和绿色的斑形图案混合在一起，还有军帽，宽宽的缨带，一身行伍披挂……

有一次父亲命令我去学习美国法律。“这适合于你，听着，别当个大笨蛋，孩子。”

这是他最喜欢发布的命令之一。还有其他命令。我还在学校上学的时候，他常常叫我给他几个将军朋友的儿子们打电话，和他们一起出行。“妈的，给萨尔瓦铁拉将军的儿子打电话，那儿有号码，看看要不要给他打电话，混蛋。蒂托和卡乔是阔少爷，他们会邀请你去他们的俱乐部，让你

玩球。”

他的影子消失了。

他命令我去国外继续学习或去找他将军朋友的儿子的刺耳噪音,和他命令杀死他刚刚糟蹋过的女人的声音是一样的。杀死她们之前,他也许用他粗粗的、没有毛的指关节打过她们。他的指关节我还记得。

公园里,一切好像陡然变得荒凉和凄惨。花朵在草地上组成了小块的长方形。石头雕像。树木。黄斑块状的草。一个穿蓝制服的警卫在土路上漫步。

突然,珍妮的声音吓了我一跳。

电话铃刚刚响起。

“卡诺先生到了,阿德里安。”

“好吧。请他进来。”

在家里,克劳迪娅问起我那天的工作,又问起同鲁文的聚会。我回答说一切都正常。我不想再见到他了。

可那天晚上,克劳迪娅睡了以后,我又往饭店打电话。可房间里是电话录音。我留了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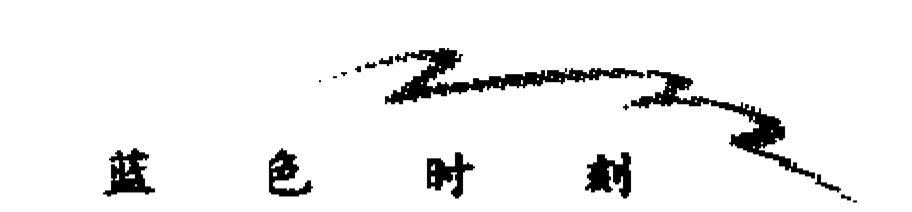
我躺下,在惊恐中入睡。

第二天早晨,我出去散步。

街道向前延伸。几个建筑物,一些树,一条黑色水泥公路。

在办公室里,我再次拨通了鲁文饭店的电话。

我听到了他沙哑的声音。



“你不想让我送你去机场吗?”我对他说。

“你别担心,我已经叫了出租车。”那个声音说完打了个哈欠。

“但我可以送你去,老兄,”我说。“另外在路上咱们还可以说说话。”

“那好吧,”他说。“我应该十二点到达机场,不过也可以一点到。你提前半小时来。”

我十二点半在饭店门口与他碰头。他带着狡诈的微笑欢迎我,随手将一张钞票扔给为他推箱子的小伙子。他给了十美元。“去买汽水吧。”他对小伙子微笑着说。车刚一发动,他得意地松了一口气,向我承认说,“我正在逃离一个此前一天晚上一直缠着我的女孩子。那女孩儿一听说我有绿卡,立刻就贴上了我。她一点来找我,赶快走!”

路上,他对美国社会的未来做了一系列的预测。“美国社会完全是物欲横流,”他说,“人们想的唯一的事情就是钱,钱都叫人谈厌了,什么都是钱,那儿就是这样,所以有那么一天,我带着成捆的钞票,住在卢林这儿的一个小农场里,你会看到的,我来养鸡和羊,有个小菜园,里面有些小动物,在这儿喝啤酒,看电视。让外国妞儿见鬼去吧,我要找个当地好女人照顾我,为我做饭,所以我想到这里来。”

“你想什么时候来?”我问他。

“嗨,妈的,这还得等几年。”

午间的灰色笼罩在树上。鲁文粗俗的声音。缓缓的肮脏交通。

我终于通过了信号灯,进入阿尔默·法塞特大街。看到了机场的旗帜,正带着一种邪恶的绝望摆动。

我们全速前进。差不多快一点半了。

通过了大门的检查,我向警察行了一个滑稽的军礼,向他出示了我的证件,帮我弟弟卸下行李。然后我说服警卫让我同鲁文一起排队。

排上队,我们推着行李向前走,我第一次沉默了,这倒与他向我提到的有关一个外国妞儿"贼美的"大腿无关。我终于提出了已经埋藏了几小时的问题:

"喂,你昨天说的,关于爸爸的事,是真的吗?"

"什么事?"

"他在阿亚库乔的事,跟女恐怖分子。"

"跟女恐怖分子?"

"就是强奸她们,又下令把她们杀掉,是真的?"

他看着我。队伍向前走,他把行李推了一步。他已经到了安检员旁边了。

"啊,是真的,是的。他们这样对我说的。怎么了?"

"他们具体跟你说什么了?"

"就是我对你说的,就那些。把那些女俘干了,我不知道她们是不是恐怖分子,这个我不知道。不过有时候干完她们,又把她们交给部队。不过只是有时候。"

他把手提箱的背带放在肩上。一个小伙子走到我们身旁,向我们问好。"你好,鲁文,"他说。"你们不记得我了?"他对我们说。"我是你们的邻居。我们在公园里踢过足球,你们不记得了? 我是乌戈。"

“对了,小乌戈,”鲁文说。“没错。”

那家伙终于走了。

“还有一个女的从那老头儿那儿跑了。”我说。

“啊,是的,有一个跑了。他们对我说过。”

“告诉我,关于这个女的,他们具体说了些什么?”

“妈的,笨蛋,我已经对你说过了。有个妞,老头子喜欢上了她,没把她交给部队,自己留下了,没别的。或者说,老东西也浪漫了。”

鲁文笑起来。他走到了安检员那儿,回答他的问题。

“他留下了?”我问。

“什么?”

“那个女的,他留下了?”

“他留下了。一天晚上,那妞跑了。他们这样告诉我的。”

“谁对你说的?”

“谁? 瓜约·马丁内斯,我告诉过你。”

我们已经到了服务台前。

“你在哪儿见到他的?”

“我得向前走了。”

“可是你在哪儿见到瓜约·马丁内斯的?”

“我跟你说过,是在一次聚会上,就这样。”

“可在哪儿聚的会?”

“在查乔·奥索里奥家,我对你说过。妈的,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嗨。”

“你别生气,我只是想知道一下,我在哪儿能找到查乔·

奥索里奥呢?”

“我怎么知道。我也几年没见到那个伙计了。”

“那你在哪儿碰到他的?”

“妈的,你怎么了,笨蛋?”

“没什么,没关系。告诉我,那个查乔在哪儿住?”

“妈的,我现在不能给你掏手机,笨蛋。另外,你为什么想知道?我不想让你搀和我的事,听着。你想给他打电话,或者你要干什么?”

“不知道。万一有什么问题呢?可能也有人会问我这件麻烦事。”

“最好别提它了,呃。别再说这个了。”

“行。别担心…… 那就再见,鲁文。你马上就到服务台了。”

我在他肩上拍了一下。“咱们再联系,噢,一路顺风,”我又说。我试图再拍他一下。随即我迅速离开。然而,还没到玻璃门,我就又向他转过身来,向他抬了一下手,以示告别。我感到了一丝悲哀。

三

我行驶到滨海大道时，兜里的手机开始震动起来，像个愤怒的小动物。

是克劳迪娅，她提醒我当天晚上还要去参加家长会。“通知要求我们都准时到达，因为有一大堆东西要看，阿德里安。”

“在这种场合准时到达意味着对孩子们的尊重，不准时是种不够尊重的表现，已通知了所有人，”她说，“现在不仅是当妈的去开会，当爸爸的也去参加所有会议。”

“咱们在那儿碰头。”我说，“我从办公室去。”

“知道了。你弟弟怎么样了？”

“很好，好的，他永远也改变不了。他一辈子都是这个样子。”

那天下午我去见了一群企业家，他们想生产一种新品牌啤酒。

我对客户们做了前期会议讲话：生产许可证、股东体制、注册登记、律师费用。

他们要求降低费用。我并没有听他们说，而只注视其中一个人。他胖胖的，粉红色的脸，秃秃的方头上有几个突出的色斑，好像已经在上面呆了很多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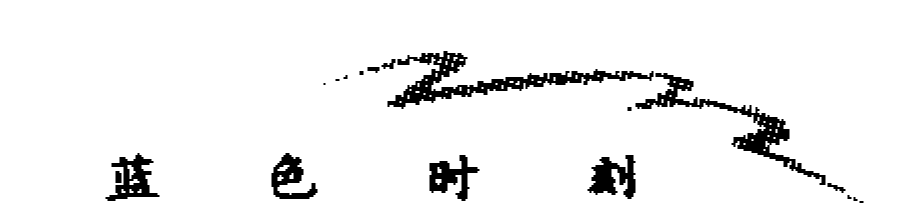
我比克劳迪娅提前到达学校。有几个家长已经聚集在门口。他们谈论着政治消息。克劳迪娅穿着她柠檬绿色套装，真是无可挑剔！一片低声谈论的声音，直到校长走进教室。

校长是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包装在合体而华丽的三件套西装里。他的声音显得异样和冰冷，就像机场里的广播。他做了个十分得体的开场白，谈到了秩序和创造性，以及学校强调的两种品德。而后各个教师逐一介绍了他们课程的进度和目标。

家长会很快结束了。我快速走下台阶，在偌大的校园里走着，一种空荡荡的感觉搅乱了我的步履。突然，母亲，母亲的面孔出现了，她从泥泞的水泥地里看着我。

她的离去难以让人接受，这是不可能的，在事实面前我也不会承认。世界如此之大，从四面八方向我压过来……好一阵沉默。犹如一个突然爆发的寂寞。

我和克劳迪娅一起走到门口。又碰到了其他家长。我快速走向车子。克劳迪娅向我伸出手。



一到家,我就看到了一份唁函。“我等了一些天才给你们写信,可我已为你们做了很多祈祷。我们十分怀念贝阿特丽斯,她现在正与上帝同在。”

唁函是劳拉女士发来的,她是母亲的校友。还有其他明信片。母亲的伟绩之一就是保持了童年的爱心。昨天晚上我和劳拉去了电影院,而后又去了一家蛋糕店,那儿的咖啡和美味小点心太棒了,我们开心极了,今天我和蕾韦卡去做弥撒,她说她有了第五个孙子,你想想。她让我看照片,一个漂亮极了的小家伙。妈妈的声音回荡在她朋友们的明信片上。

“我要保留这些地址,回信向她们致谢。”我说。

“是的,当然了。明天就回信。多好的女友们啊!”克劳迪娅说。

“她有很多女友,她总是以爱待人。”

“你会伤心吧?”

“不,你别担心。”

她抚摩着我的头。

“你上来吗?”她一只脚踏在台阶上说。

“不,我还有几份文件要看。我得整理一下箱子。”

“想让我帮助你吗?”

“不,你去吧。我马上就上来。”

我看着她上去了。

我走进书房。

我害怕并推迟了面对母亲的箱子的时刻。那是个黑皮箱子,打着金属带,还有个锁扣。

我拿出箱子的钥匙。

箱子里有用天蓝色带子捆着的束扎,这是她一生保存的东西。有材料,收据,也许还有信和照片。

我首先既害怕又带着期望想到的,是在箱子里发现她一个未婚夫的信件,由于恋情或虚荣,或者觉得可惜,她没有急于把它们扔掉。

我不知道母亲在与父亲的婚姻存续期间或之后,是否有秘密情人。如果她还活着,我也许不会原谅她。而现在,我却希望她有。发现她生活隐秘一面的期望吸引着我,因为她已经极度地循规蹈矩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对自己说,她的品德,她的风范和她的胆小怕事,可能已经足以让她免于涉足恋情关系了。不,她没有做过。她没有秘密男友。她从不专门为一个男人化妆和穿某件衣服。她已经太庄重了。

不管怎么说,她即使有情侣,也早把信件和卡片销毁了。癌症已经有足够的耐性,让她有时间消除她私密情感生活的痕迹了。她完全可以把握她将要留下的生活回忆。也有可能是她不想毁掉某个能够暴露秘密的卡片或信件。也许她私下希望人们知道她的秘密情史,或者某段情事,这段事她在世时没有勇气传播,可死后却敢于承认并展示给我,大概还带着一丝苦涩的得意。只有现在,只有这样,她才能反叛于那个高贵克己女人的形象?这是保留一段不光彩秘密的需要,是一种不顾一切的企图,一种在黑暗中被磨灭的报复。一份情书,一张照片,一段从沉默中发出的不光彩……

实际上，我最害怕看到的是隐秘日记，它可以揭示她对我们的真正看法。她对我的失望，对克劳迪娅和孩子们的不满，对鲁文的思念，对自己孤寂的私下抱怨。也许还会有件珠宝或她儿时的一件衣服，一个衣着陈旧的布娃娃，这些都是她渴望幻想和美貌的明证，而她不得不把它们藏在梦想的箱子里。

可没有任何关于这些的东西。

那个晚上，两三个小时的时间里，我打开束带，一页页地查阅。有的信封打开时还放出一阵尘埃，每阵尘埃都预示着一种新的揭示。她还保留着她写给表姐妹和女友们信件的复印件。我读了一下。“看着孙子们长大，我真高兴。有时候我还去学校接他们，这是种割舍不下的快乐，昨天晚上我和安赫利卡、雷韦卡在一起，我们去了小白店，雷韦卡有十个孙子，连她自己都不相信。”

见纸思故人。她的脸庞，她的姿态，她的白色衣服，都刻画在束结和信封上。我感到一种柔情的恐惧，知道她正在肩膀后看着我，斥责我想找到点意外的东西。

我继续找着。我意识到她的笔画已经拉长，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扭曲。

我找到一组大信封。里面有她还是女孩时的照片：身着浴衣，身着晚礼服，在青年节上，在儿孙们生日的时候，那醉心和由于羞涩而显得愈发珍贵的幸福片断。

在另一个信封里，有一堆材料：完税证明，房产证明，收据和证明，还有发票。另外一个信封里，有她在上学时的成绩册，她年轻恬静，为她的贝雷帽和好成绩而近乎微笑。

我觉得我在表演着一个场面，是她已经预料到了的场面。俯身于箱子前，强烈的灯光照在我的脸上，我正一张张地翻阅着……

我又打开一捆有关家产的材料，很多支付证明(她还是那个习惯，保留着所有的材料，有的是四十年前的)。还有些新照片，跟我外祖父在一起的，跟我的几个姨在一起的，还有我弟弟和我小时候的照片，和她在一起，都没有爸爸。我还找到一些家信。是我姨在加拿大居住时写来的，有外祖母到欧洲旅行时写来的，还有我们小时候为她做的生日贺卡，还有成绩册。

大约午夜时分，我孤身一人，被灯光的灼热照得身心疲惫，一边擦着面颊上的汗水。我陡然注意到有个信封是同其他信封分开放的。是个褶皱的信封，字体迟钝扭曲，像是被连成一串的虫子。

发信人处只有个人名字：比尔马·阿古尔托。

我慢慢取出信纸，字迹从蓝方格纸上显现出来，这是学校的一种作业本纸。我对着灯光端住纸，开始读起来。

贝阿特丽斯·奥马切夫人：

你的丈夫奥马切军官是个大混蛋，他给我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不幸。我的侄女在万塔遭到了拷打和伤害。我的侄女是好人，她与恐怖主义从来没有牵连，可是来了几个士兵，把她带走了，而且你的丈夫奥马切伤害了她，夫人，他强奸了她。所以，夫人，诅咒将降临到你的孩子们和你的头上，夫人。你们会一直受到诅咒。这个诅咒将持续很多年，对你，对你的孩子们和你们孩



子们的孩子身上。肯定会这样！

比尔马·阿古尔托

我合上信，又把它重新装入信封。

我问自己，母亲是不是在最后几个月里没找到它，以便撕了它，她本来肯定要从箱子里清除掉这个痕迹。

也许是信掉落了，它单独在一旁，没有和其他信封和材料捆在一起。她是不是同家里家外的某个人说过这件事？

我重新整理了纸张，把它们照原样捆好。做这事的时候，我再次害怕她会走进房间，发现我。

我关上箱子，把钥匙放进抽屉里。

没有什么事急着做的。她的月付和税务都及时付清了。我们已经在银行开了账户，我可以拿到家里的钱。

然而，那天晚上，失眠以比往常更大的力量反弹了。它就像一种结实的暴力、一种松软的灼热向下压，床显得太小了。

我一直醒着，看着天花板。

差不多两点，我起身打开了电视。

正在播放老一套的喜剧节目。看了一会儿，我关上了电视。

我骤然意识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站起来，开始在屋里走动。比尔马夫人的侄女就是我弟弟鲁文跟我提到的那个女人。就是逃跑了的那个女人，那个他说父亲爱上了的女人。她就是阿古尔托夫人跟我说的侄女。

我下楼到浴室喝了杯水。每走一个台阶，都发出一阵

鼓一样的声音。我打开箱子,又看起信来。"他给我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不幸。我的侄女在万塔遭到了拷打和伤害……来了几个士兵,把她带走了,而且你的丈夫奥马切伤害了她,夫人,他强奸了她……""可是有个女的跑了,"鲁文说。……再好的猎人,也有失手的时候。我的老头子太疯狂了,就赖战争,战争就是这样。"

四

我像往常一样，七点起床。是星期三，我已经约好和我的合作伙伴爱德华多一起在小白店吃早饭。

爱德华多比我更像律师。鬓角比我短，肚子比我小，手提箱比我的大，蓝领带也更漂亮。爱德华多的举止比我更柔和又更坚定。他的车比我的车大点。他比我更熟谙法律。他常常跟我说起正在销售的新式手机和便携录音机（我只是听，不久前他还向我出示了一个可以照相、有五十种颜色屏幕的手机）。

我不想让人觉得我看不起这些东西。我感谢爱德华多。他在办公室里对工作的严格要求，他同大公司的良好人际关系，当然还有他的诚挚，近乎是友谊。不过有一点他让我愤怒。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看他这么幸福和完美，

就想以某种方式伤害他;我想从他身上找到某根线路,然后割断它,看他倒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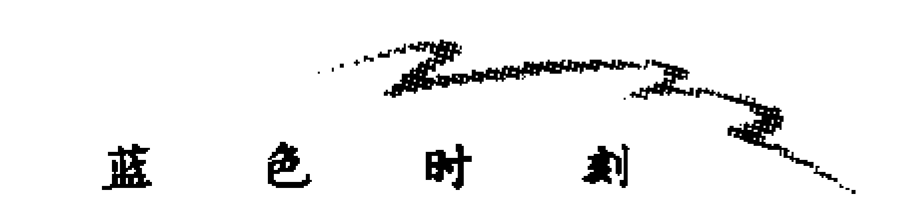
早晨八点,小白店里已经挤满了我们这样的人。穿着三件套的男人们,聊天或抽烟,还有的人埋头看报纸。

那天爱德华多和我约定在那儿见面,确定律师事务所的人员辞退问题。我们谈到了几个人员的问题:女秘书迟到,还出现了书写错误,信使出去办事两个小时还不回来,有一个青年律师总想早退。

我到那儿的时候,爱德华多正坐在里面的一张桌子边等着我。我要了杯咖啡,对他说,"你注意到了在这儿坐着的所有人吗,爱德华多?大家都互相注视着,说着话,忙着自己的事情,大家都对自己所处的角色很满足,都如此平静地做着自己的事情,而大街就在旁边。你不觉得有点滑稽吗?"爱德华多说他不明白我说的意思,并问我是否感觉合适。"自从你母亲去世后,你已经历了很多事,知道吗?"他一边对我滔滔不绝,一边又摆动着手臂,好像在忍受肋部的疼痛,还把手机举到了头上。他在餐巾纸上写了个电话号码。

"你注意到数字的含义了吗?"我在想。"7代表着生活中的很多希望,就像一个高雅的图形树立着,与虚空相对。9和11却十分丑恶,而2如此天真,让人直想保护它。行了,行了,别瞎想了,说真的,我也不知道怎么了,不知道我为什么说傻话,我得去看看心理医生,你认识心理医生吗?"

爱德华多看着我。"你好像心神不定,听我说,别想那些破事了。咱们干咱们的。"



我低下头，呷了口咖啡，咖啡烫了下我的嘴唇。“行，咱们干咱们的。”

我们一致商定了即将辞退的所有职员。我们列了个名单，写了一些朋友和熟人的名字，以便问问他们是否有合适的替代人选。我并没有感到那个罪恶夜晚给我留下什么痕迹，可是出于小心，我还是喝了三杯咖啡和两杯橙汁。我本来还可以喝伏特加。

我向爱德华多谈到我兄弟回来的事，不过当然没有谈更多的具体情况。

我们告别了。我上了车。

我断断续续地开着车，沿着帕尔多大街的缓慢车流漫游。我想到了比尔马·阿古尔托的信。

坐在车里，手抓着方向盘，我感到爸爸那天临死前说的话已经渗透进早晨的寒冷空气中。他的话语就像小妖魔，沿着轨道在我周围跑动。他已经警告过我，已经非常明确地对我说了。有人在我后面按喇叭，我体会到了父亲在军事医院去世那天那些话的轰鸣。“有个女人，在万塔，在阿亚库乔，我必须告诉你那个女人的事，你得找到她。我求你在我临死前找到她。”

我看着他对我说话。他的声音生硬沙哑。

帕尔多的大树把我径直带到了海边。我迎着海继续向前走，来到堤坝上。

几年来，我丝毫没有重视那些话，以为那是一个男人临死前说的胡话。

我向右转。我已经过了埃斯皮纳尔大街的两个街区。

我费了不少劲才掉过头来。

我慢慢驶向律师事务所。

到了事务所，我还坐在车上。我最担心的是这件事情给我来之不易的声誉带来影响：如果传开了，爸爸的事自然会影响我的职业形象。一个律师无论是在三件套的西装上，或是在灵魂上，都不应该有污点。爸爸在万塔拷打并杀死了女孩子。其中一个跑了…… 这不是好事，必须否认它。

我必须顾及自已的声誉。得是正派人，家庭好，有名望……这些可以安抚客户的神经。任何不健康的事情都不利于生意。另一方面，幸好弟弟鲁文在国外。他如果住在利马，很难掩盖住他的丑恶名声。鲁文·奥马切大醉几次的事就会和他的姓氏一起成为那些好事者饶舌的话题，在我们圈子里不乏这种人。

父亲去世前不久向我提起了她，在某种程度上，这事情本身就是对他的归咎。

我到了事务所，接待员递给我几封信。办公室里，我把手提箱扔到沙发上。一种窒息的热似乎把我的西装紧缩了。我解掉领带，打开电脑。珍妮进来问我是否需要点什么。我说不需要。自从父亲去世后，她对我更加关照了。

对于母亲的事的悲伤仍然萦绕着我，这再自然不过了。我还得忍受以后可想而知的事情。我知道，我还得攀登痛苦的陡坡，濒临一系列悬崖峭壁，期待到达顶峰；也只有到那个时候，才能开始轻松地下坡，恢复平原的宁静，我是这



样看的，这种地理比喻帮助了我，这是个继续攀登直到终于能够下行的问题。

可是那天上午，我坐在窗前的阳光里，蓦地，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的不是母亲，而是万塔的那个女人。

那女人现身了，背景是一片山，就像个没有面孔的身体。她只一个人，披着一件黑纱。她躺在父亲身边。她是映在一堵烟墙上的一个长长的身影。在办公室意想不到的沉静里，父亲在她身边的形象一次一次地出现。我看到他们在一起，他穿着自己的军服，而她现在赤身裸体。我觉得就是那个画面开始了后来发生的一切。

五

我看到了柜子上的电话簿。奥斯卡·奥索里奥。查乔·奥索里奥。是鲁文的朋友。他的名字就在那儿,是前五页奥索里奥名字中的一个。

我拨通了电话号码。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接了电话,也许是个女孩。

"查乔先生不在。他今天上午出去旅行了。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先生。您是哪一位?"

我挂了电话,又打开电话簿,想找比尔马·阿古尔托的名字。我在所有阿古尔托的名字里找。没有找到。可是出现了V·阿古尔托。可能是维克托或维多利亚或瓦妮莎。本来这样打电话就够荒唐的了:"喂,下午好,这是比尔马·阿古尔托夫人的家吗?她几年前给奥马切夫人写了封信,



关于她侄女被强奸的事。不过你们错了。我母亲是米列尔小姐，更准确地说是贝阿特丽斯·米列尔夫人，她由于一次感情意外，一个从未完全明了的事情，同奥马切先生结了婚，是他强奸了你的侄女，夫人。"

我正大声说着话，电话铃响了。是克劳迪娅。她刚接到她父亲的一个电话。我听她在电话里说：

"听着，阿德里安，听我说件事儿，是好消息，听见了吗？我爸爸给我打电话，问我放假时咱们女儿准备干什么。他说咱们干吗不全都出去旅行，也就是咱们四个人，再加上我爸爸和我妈妈，你觉得怎么样？就是爸爸邀请咱们一块儿去度假。"

"去哪儿？"

"咱们就去加勒比，去玛格丽塔岛，特别漂亮，你说呢？"

"我不知道。我这儿还有一大堆工作，看看再说吧。好吧，咱们一会儿再谈。没有人给我打电话吗？"

"噢，有个夫人给你打电话，声音不太熟悉，你等等，就在这儿，有个叫比尔马·阿古尔托的人。"

"比尔马·阿古尔托？"

"是的，比尔马·阿古尔托。她的声音特别难听，很少听到过。她说在报纸上看到了你妈妈的讣告。她想和你说话。那个女人是谁，阿德里安？"

一阵沉默，喉咙发紧。"以后我告诉你，"我回答。

"不过，她说什么了？"

"她打听你，很少听到过这种嗓音。她说还会给你打电话的，然后就挂了。就这些。这电话让我有点儿不安，真

的。你不知道她是谁?"

"我可能知道,不过说来话长,我以后再跟你讲。"

"我怎么对我爸爸说旅行的事?"

"最好咱们待会儿再说,待会儿再说旅行的事。"

我搓了搓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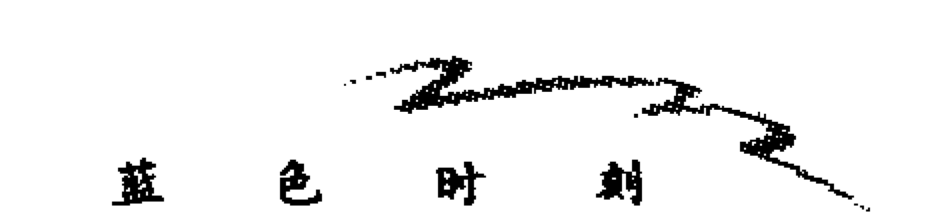
比尔马·阿古尔托有我家的电话号码,她已经打了电话,马上还会打的。

她会再打电话,肯定的。只是等待的问题。而现在,最好什么都不做。

我坐在办公室里,着手准备格拉家族企业的报告。他们想把鸡鸭连锁店扩张到几个省去。

中午,我给母亲的表兄费德里科表舅打了电话。费德里科是个医生,他在洛德·科克伦大街的诊所有一群固定客户。靠他妻子、我舅妈佩帕的财产,他过得不错。

费德里科表舅与众不同的特征就是他的声带。他说话的声音像个出类拔萃的男中音,嗓音圆润,句句到位。"今天有个客户挺有意思","我得去诊所上下午班了","我觉得是看新闻的时间了"。他的家里一直井井有条,而家里唯一让人想不到的就是他有条雄长毛狗。他总以"您"称呼它,让它出房间的时候,也总是先打开门,说句"劳驾……"同对他的狗一样,费德里科表舅对我们也很客气,但从不亲热。他想送给他的外甥们的最好礼物就是他的声调,并配以他自己挂在家庭评审台上的风度奖牌。有关他们家的一个故事就是,费德里科表舅看秘鲁队的足球赛时,每当进球时,他就大喊"记上,记上"。同我舅母佩帕做爱之前,他总得先



对她解释道："等一下，我得把我的衣服挂好。"

我打电话到他的诊所，真幸运，那里当时没有病人。他坐着接待了我，高昂着脖子，仿佛是他恰如其分的领带结支撑着他的脖子。有时候我想，那个领带结就是启动他的按钮。

我问他感觉怎么样。他回答说好，理所当然地好。

"知道吗，我接到了一个叫比尔马·阿古尔托的女人打来的电话。她说认识我妈妈。你知道她是谁吗？"

"我没听说过这个名字，没有，比尔马·阿古尔托，没听说过。她是你妈妈的熟人？"

"不知道。"

"你都好吗，你对你的生活完全满意吗，外甥？都挺好，都挺满意。"

那天晚上，在家里，我遇到了克劳迪娅的几个姊妹，她们正准备品尝我的小姨子卡明查刚从阿根廷带回来的葡萄酒和巧克力。克劳迪娅为我热了盘肉，给我送到餐厅，问我那天的工作怎么样。

"我们得辞退几个人，不过其他都挺好。"

"都挺好？"

"是的，没问题。"

吃完饭后，我走进书房，打开电脑，开始和电脑玩象棋。

电脑的象棋游戏数据库里只有两种情绪，绿光和红光。虚拟大脑启动的数字和字母表明它的玩法是不留情面的，一般情况下使用的是固定招数。一个人战胜了电脑，会有一种特别的快感，就像战胜了上帝。怜悯从来不会成为障

碍。打掉它的威风，逼机器就范，迫使它打出被打败的信号，看着这个小可怜虫不得不亮起红灯…… 我已经完全喜欢上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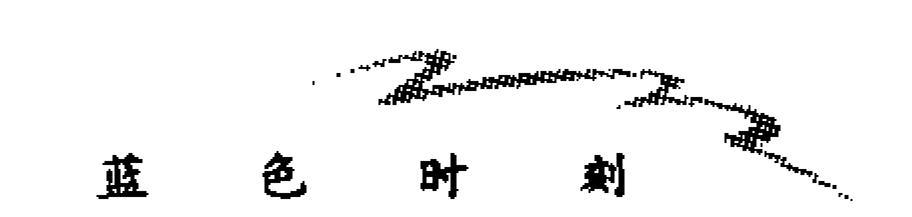
那天晚上，也许是由于小姨子们的玩笑的影响，我有些精神不集中。电脑很快就赢了我二十二步，想到我最近的战绩，这真让我十分羞愧！无论如何，我也要报仇。然而，出乎意料地，我换上了白屏，写了比尔马·阿古尔托的名字。

第二天，我路过珍妮身边时，向她问好，然后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

珍妮是我的秘书。

珍妮头发又长又直，戴着银耳环，皮肤像油橄榄般发亮。她身上的一切都仿佛在向外辐射。她的眼睛放出敏捷的光芒。青丝就像个披散在空中的莹莹发网。她总是带着饱满清晰的圆润声音说话，并伴之以手势。她的话题从天气到几个最老的客户的更年期，无不涉及。

珍妮有种咄咄逼人的智慧，却总是隐藏在她那倨傲不驯的心里。她是个业余心理分析师，总是为客户和同事的行为找出最新理由。“可怜的小东西，他小时候没有把他喂好”或者“看得出来，你在家做不了主，就想在办公室做主”之类是她常说的话。当她不得不到公共注册处找文件的时候，总是说些“他们要是不理我，我就过去撕碎他们的脸”之类的毫无顾忌的话来。然而当她接听客户电话的时候，她也可以以她最甜蜜的声音说出“下午好，卡诺先生，非常高兴听到您讲话”。



珍妮是被克劳迪娅家的人介绍到事务所的。她从第一天开始就占据着秘书的座位。她起草合同,确定预约,查阅《民法》,安排日程,更重要的是她履行了和睦相处的规则。她的判断和提问都很得体,对客户坦诚相待(她以同样的礼貌忍受着一些人的夸夸其谈和另一些人的索然乏味),同我说话时毕恭毕敬,但也直率。

她有些小缺点。她的嗓音极度沙哑,几乎让人讨厌,有的衣服也过于花哨,我让她注意一下。她不算漂亮,可我喜欢看她,因为她身体的每个部位都恰如其分。

我喜欢珍妮,欣赏她,也许还嫉妒她。她干什么都匆匆忙忙。她二十岁就结了婚,二十四岁时离婚,二十八岁再婚,次年却丧偶,膝下无子。她几乎是暴跳如雷地与第一任丈夫分了手,那是个和蔼、爱热闹,还有点说不清的人。她的第二任丈夫一天晚上出去找她,在寻求和解时出了事(有时她还会哭泣着想起他)。她是个精力充沛的女性,当过两个侄女的母亲和三个经理的执行秘书。有几次,我曾幻想充当她临时和替补丈夫的角色。她对我的忠实还表现在,每当听到有人批评我的工作时,她都为我进行缜密的辩护,而我想婉拒某人的电话时,她都能替我掌握好借口和语调。

那天珍妮拿着日程表等我,日程里包括通知辞退一项。爱德华多和我事先已商定亲自将辞退的通知告诉本人,每个人负责通知名单四个人中的两个人。这是必经的辞退程序,已不是第一次了。要用平静的口吻,即使被辞退者让我不快,也要用近乎愉快的口吻。

就用这种隐秘的微笑,我将消息通知了送信人,一个自

负又暴躁的小伙子。可是，辞退那位满篇书写错误的女秘书时，我必须把我的惋惜隐藏起来。秘书是个苗条寡言的女孩儿，两只纯朴的眼睛。她听到这个消息后，问我是否能帮她另外找个工作。我说我很愿意帮助她。两个人去了人事办公室，去拿结算支票。午饭时间以前，我完成了我的程序。大概我不会平静地用午餐，不过在傍晚之前，我有足够的时间恢复过来。

大约一点，我就要同爱德华多出去吃午餐的时候，珍妮走进办公室。

"有位叫查乔·奥索里奥的先生打电话找您。他说您给他打过电话。"

在电话里一听到他的声音，我马上就想起了他的面孔。宽大的面颊，鼻子上满是疙瘩，四方脑袋。我们曾经见过面，他总是和我弟弟在一起，他们一起出去，我留在家里。

"怎么样，阿德里安？有什么好事……？"

"你好，查乔。这么多年了……"

"对，是的。又找到了你，真好。有一天鲁文到过我家。他是来参加聚会的。"

"对，他跟我说过。"

"知道吗，我对你妈妈的事非常痛心，阿德里安。她是位非常好的夫人，你妈妈非常有涵养。"

"谢谢，查乔。"

"好吧，我没问你怎么样，因为我知道你过得非常好。你常在报纸上露面，到处露面。"

"好吧，是记者们随便照的。"我炫耀着。



说着话，查乔的面孔已经慢慢在我的记忆里成形。

“不，怎么会随便照的呢。就照你，你是个人物，阿德里安。”

“你找我有什么好事？”

“是我想见你一会儿。咱们什么时候能见面？”

“我也不知道，你说吧。随便你，听见了吗？”

我顿了一下。

“咱们现在去吃午饭，你觉得怎么样？”我问，“你有时间吗？如果你愿意，我请客。”

“现在？”

“那当然。”

他犹豫着。

“行，就这样，阔主儿。”

“就这样。我一点半去接你。告诉我你的地址。”

我挂上电话，站起来。在房间里转了几个圈。

我想我的办公室太小了，也许哪天我会让人扩大一下。

珍妮拿着一打需要签字的支票走进来。我看着她。她很少把妆化得这样糟糕，突出了睫毛。眉毛被用细长的眉笔描过。

“你好吗？”她问道。

“是的，怎么了？”

“不知道，你看上去不太好。有什么事吗？”

“都挺好。”

我约好一点半去接查乔,不过我想提前很多时间出去。

天气冷漠。黯然的光线蒙在水泥墙上。桑洪大街上的车缓缓地行驶着,好像都停止了。我到了哈维尔·普拉多,上了桥,进了圣博尔哈颜色各异的交织小巷。忽然我见到了那条街的名字:李斯特。已经离那个地址很近了,不过比预定的时间还早一刻钟。我决定按门铃。黑色的栅栏,碎木条的大门,玻璃彩饰镶板,还有细长又干瘪的攀缘藤。

一个大约二十或二十二岁、身着橙色运动衫的女人开了门。她胸前有迈阿密大学的标志。她让我进去。客厅中间有个铂色玻璃的大桌子。我坐在蓝色沙发上,对面是个鸡蛋形的镜子。一颗耶稣滴血的心脏在灯光的烘托下正看着我。我等待着。一阵杂乱的声音从二楼传来。

我终于见到了他。

查乔·奥索里奥。一张从我小时就已定型的脸,身体短粗,结结实实,嘴唇硬邦邦的,长勾鼻子。从他脸的比例来讲,他的眼睛特别小。相反,嘴却似乎要从脸上溢出来,头发像狂草。他带着脏骷髅般的微笑看着我。他向我伸出手,"嘿,真是的,阿德里安,这么多年了,我刚见过鲁文,我对你妈妈的事表示最深切的悲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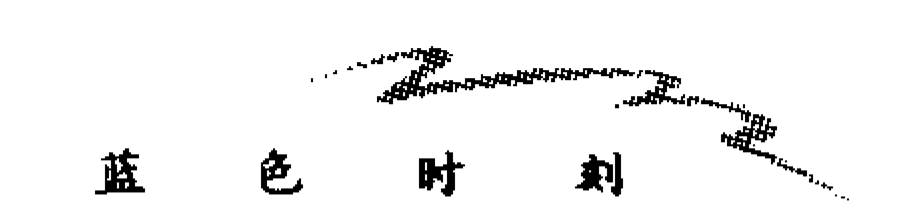
"谢谢。"

"走之前你不想在这儿喝杯朗姆酒吗?"

"行,就这样,来杯朗姆酒,咱们就走。"

我尽快地喝完了酒,催他走。

他像个内秀的运动员。他的动作——拿杯子,倒酒,搁冰块——都比需要的速度快。



上了车，我建议去拉科马尔的咖啡咖啡馆。他晃着头同意了。实际上，也很显然，我不想同他去人特别多的地方。咖啡咖啡馆是个非常舒适的地方，视野好，有美味的沙拉，而且那个时间几乎没人。

根据我在日记上的记录，那天，我们刚从查乔家出来，街道好像被一束突如其来的光引爆了。太阳瞬时隐进了云彩的一个角落里。查乔好像骤然成了一个光中之人。他坐在我旁边，开始说话。

"你还是小孩的时候，我常去你们家。我好像现在还看到你当时的样子，我到了以后就问鲁文在不在，你就说'不在，先生'。你就是这样特别有礼貌地说的，你挺认真的。我常带鲁文到你爸爸那儿去，是的，就为这个我总去你家，你不记得了？"

我把车停在地下停车场里，下了车。一个穿蓝色工装的人冷不丁地把我吓了一跳，他央求要给我洗车，"就要四个索尔。清洗内饰，十个索尔，先生。"

"得多长时间？"我抢先查乔一步，上了露天平台。从靠着海边的阶梯向下走时，我看到一大群穿短裤和拖鞋的游客，大家在栏杆前站成行。

我们到了咖啡咖啡馆。草秸椅，黄栗色的桌子，还有华纳斯的音乐。大海沿着玻璃墙一侧伸展开。查乔站在窗前（草秸看着不错，你看那浪，从那儿，从海底下，从那么远的地方飞溅过来，伙计，我得带我侄女来，她刚进大学，我请她到这儿来吃冰激凌，就在这个地方，我带她来，作为对她努力的奖赏，妈的。"

听他说着话，我漫不经心地看着一线低沉的云。

我要了份牛排加沙拉，一杯红葡萄酒和咖啡。查乔要了浇汁通脊，啤酒和蛋糕。我事先已声明这次我请客。

查乔唠叨了半天，埋怨经济状况，“现在十个索尔什么也干不了，”他一直说。“以前用十个索尔你至少还能买点什么。就这么回事，是的。见鬼，我从部队退役后，这儿那儿的干点小活，通过一个朋友，我进了秘鲁石油公司，不过后来藤森上台后，我又只好离开了。现在我为一位先生干点事儿，不过就到月底，他已经对我说了。再往后我就不知道了。再继续找吧，没办法，就是这么回事。是的。”

我一边看他吃，一边鼓起勇气把事情对他说出来。

“查乔，有件事我想问你。”

“说吧。”

“你和我爸爸在一个军营，是吗？在万塔的军营。”

“是。妈的，那段时间真可怕，听着。我都不知道我们是怎么从那儿出来的，真操蛋！”

“是的，我能想到。先说气候就特别差，对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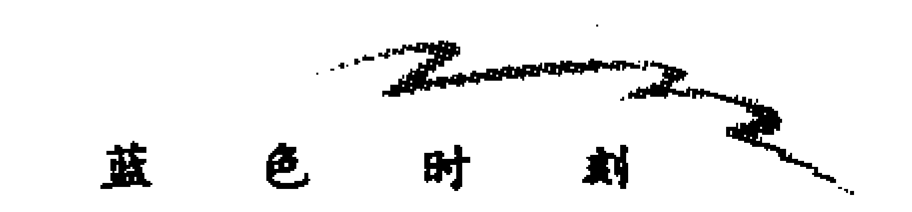
“妈的，那个鬼天气，鬼伙食。还有鬼战争，鬼恐怖分子。”

“是的。不过我想问你点儿事，查乔，”我面对着他，几乎带着微笑，“有个姑娘从我爸爸那儿跑了，这是真的吗？”

查乔把叉子放在桌子上，拿起餐巾。他一边嚼着一边跟我说话。嘴上沾着一块西红柿。

“妈的，告诉我，谁跟你说的这个倒霉事？”

“鲁文告诉我的。”



他向下看着。他把肉块和炸土豆拢在一起,又把米饭集中起来。

我让侍者再拿杯啤酒来。

“你爸爸是个伟大的人物,伟大的军人,妈的,并且他还是个伟大的秘鲁人。”

他上下挥动着小臂和细长的手指。

“我知道,查乔。我知道。你想让我把实话告诉你吗,查乔?实际上我是想让你跟我说说他,告诉我关于他的一切。我跟你想谈的就是这个,不想谈别的事情,想让你说说他,告诉我他做过的事情。我知道那儿的条件很困难。这是在利马想象不到的。我知道。我不想让你不高兴。”

他看着我,一边叉起一块土豆。

“行了,兄弟,”他平静下来,“最好咱们还是谈点儿别的事情。”

我们又说了一会儿话。我问起他的家庭。他说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学会计,另一个学法律。两人都快毕业了。一个儿子想年底结婚。

我迂拙地想使他情绪好起来,说也许他马上就要当爷爷了。他露出了笑容。

“你呢?你有两个女儿。”

“是的,两个女儿。有一个快中学结业了。”

“你该知道,我爸爸跟我说过那个女人,”我抽冷子嘟囔了一句。

他喝完了啤酒,把杯子放在桌布上。

他眼发凶光。

“他对你说的？”

“我去医院看他的那天，最后一天，那天他说话有点不寻常，说了些含糊不清的事情。”

“他跟你说了点那个女人的事儿？”

“或者说，他说有个女人，在万塔，在阿亚库乔有个女人，你必须找她。差不多这么说的。我当时一点儿也没在意。他说的是不是就是她？”

“可能是，可能是。”

我开始用手指敲着桌子。

“我看你还是有点儿烦。对不起。我知道，要谈论那个时代的事情是非常困难的。”

他看了一下我。低下头，转向一侧，就这个姿势，目光迷失在远处。

“关于这件事，你都知道什么？”他低声说着，目光终于又逐渐回到盘子里。

“你说得对，我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才问你。”

侍者送来一杯咖啡，他匆匆吮了几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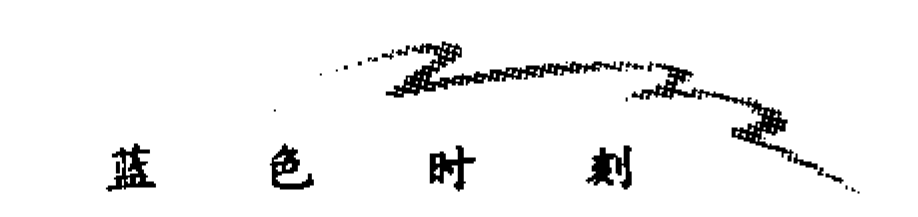
“妈的，我热了。”他抱怨着。

“是的，空调开得太大了。咱们让他们开小点儿。你想要杯水吗？”

侍者送来冰水。查乔喝完咖啡。有段时间，我们没有说话。他用餐巾纸长时间地擦拭着嘴，像是在拖延时间，不让嘴闲出来。然后他又把餐巾叠起来，放在手下。

“再来一杯吗？”我问。

“不了。”



顿了一下,他忽然举起杯子。

“你如果请我喝这个,我请你在另外一个地方喝一杯。”他低声说。

我看看表。在另外一个地方?

“行,走吧。”我说。

我们上了车。

“咱们去看个朋友。”他告诉我。

“看谁?”

“一个朋友,你马上就会见到他。他看到你会高兴的。”

路上,查乔同我说起他同妻子的关系不好。他原想跟她分手。“她太自私了,总是想她自己。我们整天吵架。我也打过她,有时候我得厉害点儿,让她明白,女人就是畜生!”

他不时地笑,是从他几乎闭着的嘴里露出的短暂的笑。

到了萨拉韦里大街后,他不断给我指路。

“从这儿进去,往那儿走,”他把手指向车窗。

“咱们去哪儿?”我问。

“你马上就会看到。”

我们到了布雷尼亚。经过几条小街。我们沿着一面布满一块块干油垢的墙壁向前走。

我们来到阿里卡大街。街上满目龌龊,我们还得不时地跃过街上的洼坑。我们在一个大门前止住了脚步。

一个粗壮的男人为我们开了门,他在查乔肩膀上拍了

一阵子。

“我来介绍一下瓜约,”查乔对我说。

他的眼睛细长,就像老鼠的眼睛。衬衫敞开着,露出肚子上一片白毛。圆肚皮,粗手指,脸上布满了疙瘩和色斑,胳膊上有一串黑痣。他说话的声音就像个小女孩,从这张大老鼠般的脸上发出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在瓜约的身旁,查乔就像个小娃娃。我们坐在一张桌子旁,桌上铺着蓝白道的塑料桌布。房间里大块的水泥地面上,还带着撒过锯末的痕迹。

“看看,对了,瓜约,你想请我们点儿什么,听见了吗?”

一个矮小的女仆正在洗盘子。

瓜约叫她过来。“卡门,卡门,”他的纤细声音划破了空气。

小女人塌鼻子,眼睛像两块碎玻璃。她甩甩手,又在围裙上擦了擦,拿着两瓶啤酒向我们走来。她随手把啤酒拎到桌子上,就像拎上两只被砍了头的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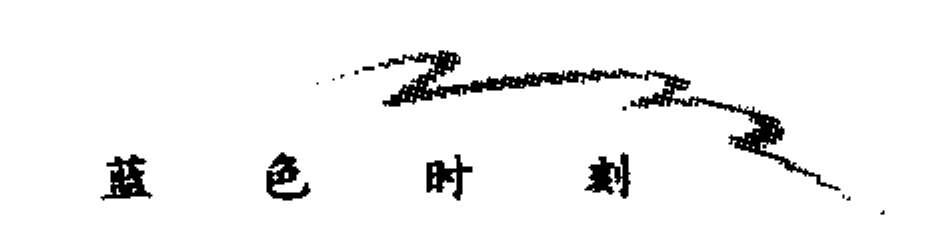
“你什么事,朋友?”瓜约问我。“我以前见过你,你干吗老穿得这么讲究,听见了吗?你就像个穿三件套的闲人,知道吗,就像那些在报纸上露面的人,要不就是你想穿戴成这样,让大家都知道你是谁,不是吗,妈的。”

“别跟我朋友胡来,瓜约。”

“可我并不是没教养的人,伙计,我说的是实话。”

“可你别这样。你不知道他是谁吗?”查乔扶着我的肩膀说道。“他是司令的儿子。”

“司令的儿子?奥马切司令的儿子?”



“他是阿德里安·奥马切,瓜约,是鲁文的哥哥。”

“什么,什么?这不可能。奥马切司令的儿子?”

他站起来,伸出一只手。

“太好了,太好了,”他说。

我们坐下来,瓜约举起杯子,又对我说了声祝你健康。

“不过这不可能,你是阿德里安?”很快我们就喝完了两瓶啤酒。

下午慢慢过去了。瓜约和查乔回忆着几个他们共同的朋友,“那个笨蛋怎么样了,我们从来没有他的消息,听说他在阿雷基帕有个小庄园。”一层珍珠般的汗粒蒙在瓜约的皮肤上。查乔却没出汗,他越说越快。

“你的餐馆怎么样,”我问。

“妈的,还行,可并不是所有来这里的人我都接待。晚上我得关门,因为这儿的街道挺操蛋,知道吗?”

瓜约说他曾当过警察,然后又给一个企业家当保镖,他想就这样干下去,想一直照顾重要人物,保护那些人,甚至是保护圣彼得①,“不是吗,这就是我的命,祝你健康,伙计。可我们一直是朋友,去他妈的,我和查乔总在这儿见面,他说着把手放在查乔的肩膀上。”

他不时地中止话题,来赞扬我的爸爸。我以最大的热情感谢他的称赞。

大约四点半,我拿出手机,告诉珍妮取消我所有的约会。我正在聚会。

---

① 耶稣的得意门徒之一,在此比喻非常重要的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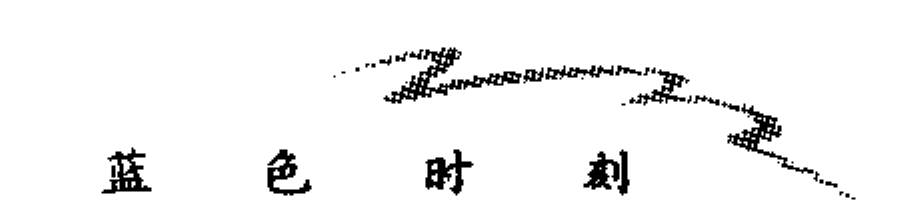
“就是这样，我和查乔总在这儿见面，”瓜约一直说着。“我们见面是因为我们能够从那个讨厌的战争中逃出来，这是个奇迹，哎呀，这是个奇迹！可也死了不少人，比如谁来着？好吧，”瓜约张开双臂，“你还记得罗萨斯技术员吗，”他问查乔。

查乔说：“记得，他怎么了？”

“好吧”，瓜约摊开着双臂说，“我忘不了这个。”

“有一次，我们跟踪恐怖分子，跟踪了很长时间，见他们进了一座房子。于是我们包围了房子，喊话让他们出来，可是他们不出来，那是座树枝棚，于是我们扔手榴弹，把房子点着了，他们就像老鼠似的跑出来了，我们乓乓地向他们所有人开枪，把他们全杀了，他们像小耗子一样倒下了。他们刚刚经过一个叫圣弗朗西斯科的小镇，把镇长杀了，而且还藏在他家里，可是我们赶到了，包围了他们，我们喊话让他们出来，并向房子开了火，于是他们一个个走出来，我们把他们全杀了，我们乓乓开着枪，最后一个人举着红旗叫喊着走出来，我们也开了枪。我们过去时，他们都已经倒在地上了，可那天是非常悲惨的一天，对于我们来说很悲惨。我的一个朋友，技术员罗萨斯，死在那儿了。我的朋友罗萨斯在那儿去世了。

“我们已经接受过训练，学会向他们开补枪，可是我们漏了一个，没注意到他，有个恐怖分子没死。他躺在那儿，受了伤，可这家伙没死。他用尽最后的气力，将他的法尔枪瞄准了罗萨斯，已故的罗萨斯，向他开了枪，打响了他别在腰里的手榴弹。可已故的罗萨斯当时没有死。他挺了两个



小时。我们呼叫，叫直升飞机来，可直升飞机没有来，没有来，罗萨斯祈祷着。我扶着他的头，鼓励他，对他说忍住，而他把他的小儿子托付给我，告诉他我特别爱他，他跟我说，‘你照顾他，帮助他，还有我妻子，还有我母亲，你得向我发誓告诉他们，瓜约，告诉他们我想他们，还有我死得安心，我在天上，在天上看着他们，我在天上照顾他们，我是在保卫秘鲁时死的。你特别要告诉我儿子，听着，让他向上看，告诉他我在一颗星星上，让他跟我说话，你别忘了，向我发誓。’我尽力让他平静下来：‘你别这样说，别这样说，你会看到你儿子的，他几岁了？你还会看到你的孙子们，你会看到的，直升飞机马上就来，你别这样说。’‘可你得发誓把我的话告诉他们。’‘好，如果你愿意，我就发誓，可你会好的，直升飞机马上就来了。’

“他是我的朋友，我看着他流血，给他鼓劲，可是猛然他呆在那儿不动了，好像把肚子里的气一下子都呼出来了，我的朋友就呆在我面前不动了，妈的，他突然闭上了眼睛，他的身体僵住了，身体僵住了，这我忘不掉，不管怎么样我也忘不掉，我看着他突然就呆在那儿不动了，不动弹了，瘫了，好像什么都不是了，知道吗。直升飞机好久才来，等来了，也没用了，我们就这样让他死掉。就是这样，不过我现在还能看见他的嘴唇在动，他的嘴唇都干了，快死的时候嘴唇上还带着白皮。但愿他死的时候还想着他能活下来，他能得救。我们希望这样。”

瓜约说话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是在一个酒瓶的海洋里航行，感到惬意的眩晕，他的话就在这种眩晕里飞扬。查乔

和瓜约继续聊着天，一会儿是他们聊，一会儿跟我聊。他们高声说着话，就像在发表自我演说。他们不时停下来为我倒啤酒，或者谈他们最近同某个女人的艳事，不过总体说来都是谈战争的事情。过了一会儿，他们还来了劲，谈起了一些拷打方法。"有时候，我们把他们按到浴缸的水里，让他们承认。即使我们不这样做，他们也会这样对待我们，就是这样。有时候，我们把电线接到他们的睾丸或乳房上。不过只是有时候。"

在同他们在一起的四五个小时里，我好像在看他们在舞台上表演：两只兴高采烈的猴子忘情地自吹自擂，像两个摆弄不同颜色回忆之球的杂耍，两张嘴就像两个漏勺。

一切霍然发生了变化。我还清楚地记得，查乔用手指指着我，以一种甜蜜的声音对瓜约说："听着，他刚向我打听那次跟米丽娅姆的事，听见了吗？"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的名字：米丽娅姆。当他举起一满杯啤酒的时候，我意识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我刚才是同我爸爸的两个心腹打手一起喝了几个小时的酒，他们就要吐露那个女人的事了。

六

“米丽娅姆？米丽娅姆姑娘的事？”查乔把目光转向一旁。瓜约倒满了杯子，开始说起来。

“那么好吧。有一次，我们给你爸爸带去了从一个镇上找到的一个印第安女孩，你爸爸把她交给了部队，我们干了她，然后又把她清除掉了。后来我们对其他女人也一样，是的。我们总是对她们说，只要她们同意跟我们睡觉，我们就放了她们。我们就这样对她们说。要不就是她们只同意跟军官睡。我们干了两三回。至少对那些女人，我们都在她们脑袋上打一枪，杀了她们。恐怖分子更是狗屎，他们是用大石头砸脑袋。

“一天，就是在附近的一个镇上，我们碰到一个漂亮的女孩。那女孩特别漂亮，特别年轻。她身材细长，长长的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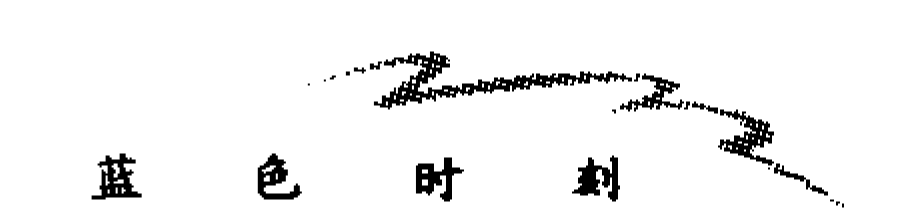
发,大眼睛,特漂亮。我们是在万塔旁边的镇上碰到的。我们发现了她,女孩的妈妈抓着她,不松手,‘别把我女儿带走,’她对我们说,我们就给了她一枪托子,老东西尖叫着倒在地上,我们把姑娘弄到卡车上,她像疯子一样乱踹,后来我们把她交给了你爸爸。你爸爸那天晚上留下了她,可是第二天,我们还等着他把她交给我们,把那个姑娘交给我们,你爸爸房间的门没有打开。门没开,知道吗?你爸爸不想让我们得到她。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了,他没让把她交给部队。也就是说全部队都在等着她,可他留下了那个姑娘。他出来了,把姑娘留在房间里。中午我们再次看到了她。我们看她出现在窗口,可她只开了一会儿窗户,姑娘吓得要死。她眼含泪水,头发已经仔细梳理过,后来她关上了窗户。就这样。你老爸喜欢上了那个姑娘,不想让部队弄去她。他不想让部队杀了她,而所有的士兵都骂你爸爸,可我们让他们住嘴。就这么回事,我不懂你爸爸怎么忽然心肠变软了,他那几天挺高兴,让我们早餐给他送鳄梨,和她吃。你爸爸为她都疯了。"

瓜约拿起杯子。查乔点头认可他说的话。我漠然地听着,不知道是否对他有所反应。

"她就是那个跑了的姑娘?"我问道。

瓜约抬起手,左右晃着头,一边给自己又倒上了啤酒。"没跑,"他说。"这就是你不好了。没跑。是我们放她跑了。"

"妈的,是跑了,"查乔打断了他的话。"她给我们两个人每人猛击一下子,就跑了,笨蛋。"



“你最好说是从你手里跑的,你想搀和,要不是你就没事了。要是让我看着她,屌蛋,她跑不掉。问题是你喜欢她,查乔。你喜欢她。”

我看着瓜约。“那姑娘什么样?”

瓜约开始说了点。“一个美极了的印第安女孩。”

查乔打断了他的话,“我们把她从卢里科查带来,那是万塔旁边的一个镇。我们在那儿遇到了她。可她跑了。跑了,我们再也没有她的消息了。你爸爸回来后,知道了这个事,大怒,把我们关进了牢房。他像个疯子,开始到处找她。你老爸把我们关了两天。最后他亲自拿着钥匙把我们放出来,拥抱我们,我们一起喝了一顿,他痛哭流涕地对我们说,‘没有一点她的消息。’士兵们都嘲笑我们,直到后来我们又给他找了个好的,我们也一样,只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才不再嘲笑了。”

“她怎么能从军营里跑出去呢?”我问。

“因为一天晚上你爸爸去了瓦曼加,”查乔说,“他去和一个从利马来的将军开会。他去了,留下我们看着她。这是他的错。那么,好吧,我们的错就是我们跟她说话了,跟她什么都说,什么都说了点,我们还拿了几瓶啤酒,开始和她喝啤酒,她装着喝了,可没喝多少,几乎没喝,这我们没注意到,她拿起杯子,只喝了一点点啤酒,我们在你爸爸的办公室里,他去和一个指挥官开会,他要在瓦曼加过夜,就是说,我们得整夜看着她,于是我们打开收音机,听萨尔萨音乐,喝了几瓶啤酒,忽然我们对她说要跳舞,她先跟我跳,后来和他跳,突然他想吻她,她躲开了,我训斥他,对他说你干

吗想跟她搀和，她是司令的姑娘，我们吵起来，突然我觉得脑袋跟炸了似的，原来印第安姑娘已经抓起一个瓶子，让它在我脑袋上开了花，对他也来了这么一下。瓶子在我们两个人的脑袋上碎了。我们已经半醉了，不是十分清醒，她把我们放倒在地上，我们第二天早晨才醒来，瓜约被冻得比我先醒了。”

“她怎么能从军营里出去呢？”我问道。

“因为她穿着瓜约的军装，是的，我不是正跟你说吗？女孩穿着瓜约的军装，出了军营，她对瞭望哨说出去一下，哨兵信了，以为她是瓜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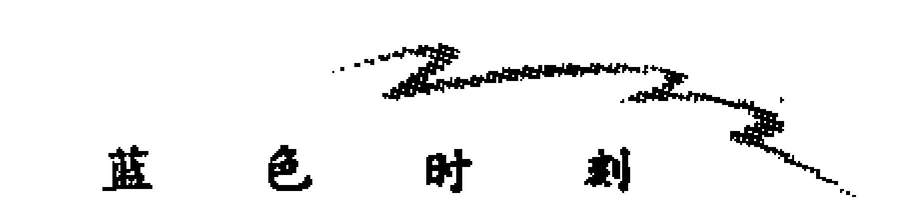
查乔拿起杯子。他指着瓜约，就像是用胳膊向瓜约开枪。

瓜约揉着颌骨，听他说话，又耸耸肩膀，看着我。

“女孩穿着瓜约的军服，戴着他的贝雷帽，”查乔接着说，她点了一支瓜约的烟，出了司令房间的门，她刚一出门就看到了瞭望塔上的哨兵，就用瓜约的嗓音对他说，就用这种嗓音，‘我出去转一圈，’她这样说，哨兵第二天早晨告诉我们，她说我出去转一圈，哨兵说嗓音完全一样，跟瓜约的嗓音一样，样子也差不多，嘴上叼着烟，瓜约抽烟就是这个样子……于是哨兵开了门，让她出去了。他让她出去了，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们在里面被扒了衣服，喝醉了，都赖他。”

“你们一直没找到她吗？”

“没找到，”查乔说，“你爸爸到处找她，可也没找到。他最终原谅了我们，再也没有那个女孩，那个米丽娅姆的消息了。”



"什么米丽娅姆?"我问。"米丽娅姆是什么。"

"她就叫米丽娅姆。她告诉我的。可他喜欢她,"瓜约指着查乔说。

瓜约拍着查乔的肩膀,"他喜欢米丽娅姆,他喜欢,你不喜欢她吗?"查乔用愤怒的眼睛盯着瓜约。"瓜约一再说,他却说不,可是他喜欢米丽娅姆。你老是看她,像狗一样在她身边转悠。"

"从这儿滚出去,"查乔说。

"你喜欢她,就是。你迷上了米丽娅姆。所以是你找她喝酒,找她跳舞,你不记得了?另外你知道她不是光辉道路分子。你知道她就是随便一个姑娘,我们带她来军营,就是为了带个人来,给司令带个女人来。也就是说,你也知道,如果带一个像她这样的女孩来,他会喜欢的,他会知道感谢你的,可后来你也喜欢上了她。就是为这,你才把她带走的,你不记得了?你进了她家,把她从她妈妈那儿拽出来,带走了她。你是为你才带走她的,不是吗?"

瓜约的话和他女孩般的笑声交织在一起,而且声音总比查乔的声音高,查乔一直盯着他。汗珠在瓜约的白头发上闪着光。查乔用一只手把他拨开,好像是在掩护自己。他的耳朵都涨红了。

"喂,你怎么了,查乔,"瓜约笑着。"你怎么这样了?"瓜约推了一下他的肩膀。

瓜约想往查乔脸上掴一掌,查乔却回敬以一记响亮的耳光,声音脆得就像鞭子响。

两人站起来,开始扭打。他们纠缠在一起,互相推搡

着,还有皮鞋在水泥地上摩擦的声音,两人都紧绷着脸。

我站在他们旁边,最终也没有去劝架。

还是女用人把他们拉开了。矮小的女用人突然出现,手里还举着瓶子,她站在两人面前,盯着查乔,大喊:"够了,查乔先生。"

查乔看着她,走开了,向桌子踢了一脚,把桌子踢了起来。一个瓶子落在地上,碎了。查乔深深呼出一口气,用两只凹陷的眼睛盯着瓜约,说了句"你一直是一堆臭狗屎",就消失在门外。

我猛然感觉到了街上车辆的声音。街上已经黑了。

"妈的,这个大笨蛋有点粗鲁,"瓜约一边指着门外说,一边慢慢地坐下来。"行了,咱们再来瓶啤酒,怎么样?"

"行。"

"卡门,两瓶切拉啤酒,"他喊着,已经挥汗如雨。

"不过,真是这样,查乔特别喜欢这个姑娘?"

瓜约大口地喘着气。

"是的,所以他才想抓她,"他终于说话。"我在那儿和他一块儿看着她。我正要去吻她,就在这个时候他插了进来,就在这个时候,她向他脑袋上砸了一酒瓶,然后又砸了我。我觉得她已经意识到他喜欢上了她。她扒了我的军装,还要尽量模仿我的声音,她得模仿尖嗓音,好出军营。这个姑娘挺聪明。'我出去转转,'她对哨兵说,嘴上还叼着烟。就这样骗了哨兵。我有时候散步,那儿有危险,不过我只是晚上在军营周围转转,这个她知道,于是她就对哨兵

说,‘我出去转转,’哨兵以为是我。或者说,她个儿头跟我差不多,看她还抽着烟,就让她出去了。她晚上一个人穿着军装在万塔走,娘的,谁都可能杀了她。我觉得她有点疯了,知道吗? 瓜约拍着自己的脑袋,她有点疯了,不过她好像说过,死也比当囚徒强。这丫头说得对。"

他用手在额头上抹了一下,目光转向一旁。

沉默了很长时间。我听见有只狗在吠。吠声变成了持续的尖叫声。我想可能有人在打它。瓜约搓着下巴,又把手捋过头发,喝了一大口啤酒。

"不过,你想让我对你说点儿什么呢? 真的我觉得他看上了那姑娘。真的。"

"看来是。"

"是的。喂,再给我们拿最后两瓶来,喝完完事,看看,卡门,再拿两瓶来。来吧,为阿尔韦托·奥马切司令干杯。干杯,阿德里安。你叫阿德里安,对吧?"

瓜约继续讲述,我只能听着。

"你爸爸生活特有规律,他总是起得很早,我们一起列队出操,你爸爸特严格。不过后来他也有点犯懒了。他和那个姑娘,和玛丽娅姆在一起的时候,作息时间有点变了。你老头儿变得更好了。"

我又喝了些啤酒,味道又苦又涩,泡沫向上翻滚着,父亲的名字在桌子上盘旋。我几乎不记得后来我们都说什么了。

"那个姑娘,你们把她从万塔旁边的一个镇上带去的?"

我问。“那个镇叫什么名字?”

“卢里科查,叫卢里科查。在万塔旁边。我们把她从那儿带走的。好吧,不是我,是查乔带走的。是从她妈妈那儿夺走的,他对她妈妈说,‘我们只是把她带走问问’,他带走姑娘时,姑娘的妈妈还在哭。我觉得他从看见她时就开始喜欢上了她。可是他不得不把她带到你老头儿那儿。”

矮用人端来一盘还散着油味的炸鱼条。瓜约用叉子把几块鱼条叉成串,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他张着嘴,就像在打哈欠。

“你老头儿从没跟你讲过?”

“没有,真的,他怎么会告诉我呢?没有,还有就是,那个时候我见爸爸的次数不多。”

我正要站起来告别,瓜约伸手拦住了我。“等一下,我告诉你件事儿,”他边嚼边说,“我不知道是不是该告诉你,可是我得告诉你,为了纪念你爸爸,知道吗?”

“你要告诉我什么?嘿,先把你的嗓门降下来,小子,你是给烫着了还是怎么的?”

他的大眼睛湿润,脸就像一个虚胖孩子的脸。

“我一点儿也没有烦,相反,认识你挺棒的,又想起了我爸爸。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瓜约目光转向一旁,手搔着额头。

“你不发火了?”

“不,真的,”我顿了一下,“跟我爸爸的朋友在一起,我怎么会烦呢,瓜约?”

“噢,好吧。那么,我告诉你,”他说着咧出一丝微笑。



“我给你讲，听着。你知道吗，那个米丽娅姆，有一天我又看见她了。”

他把放在桌子上的一只手向前伸了一下，看着我，眼里放着光。我感到一阵寒噤。

“你又看见她了？那个跑了的姑娘你又看见了？可你不是对我说过，你们再也没有看见过她吗？”

他举起一个手指头。

“查乔没有看见她，可是我看见了，知道吗，我看见了。”

“什么时候？”

“妈的，那是我给达索工程师当保镖的时候，给他干活的时候，我陪他去和银行的一个管理人员谈事，那是在圣伊西德罗。我和达索工程师在一起，我忽然请求他允许去买瓶印加可乐，于是我去了附近的一个小店，我进去了，看见小店里接待我的姑娘盯着我，我记得她脖子上有一串金项链，穿白运动衫，大大的眼睛，是她，我不能相信，知道吗？她看了我一会儿，我给了她钱，接过印加可乐，妈的，我觉得那个姑娘一直在看我。就是说，她看着我，我转过身，她还看着我，然后又从旁边看着我。我看看她，妈的，我明白了，是她。就是她，就是米丽娅姆。她就在那儿，在她的小店里。我忘记这是多少年前的事了。至少有几年了，就是她。就是和你爸爸在一起的那个姑娘，她本来已经留下来和他一起过的，结果从我们这儿跑了，她耍了我们。米丽娅姆就在那儿，她找给我零钱，又看着我。我看看她，把可乐放在柜台上，几乎没怎么喝，也就留了瓶可乐，我赶紧脱身，马上离开了，回到了银行。妈的，后来我往后看，看见她走到小

店门外，就在那儿。她站在那里，就那么站着，看着我，一直看着我，我好像现在还能看见她的样子：她穿着蓝布工装裤，白运动衫，长头发，还有脖子上的金项链。我忽然想到她会跟着我，可幸好她就站在那儿，没有跟着我一直到银行。我坐在银行里，等着工程师。我不时地往路上看，看米丽娅姆来没来。妈的，我都害怕了。”

突然他举起双臂。

“我不明白我为什么给你讲这些。她不会从你手里跑掉，你也别跟查乔说。”

“我不会对任何人说，你放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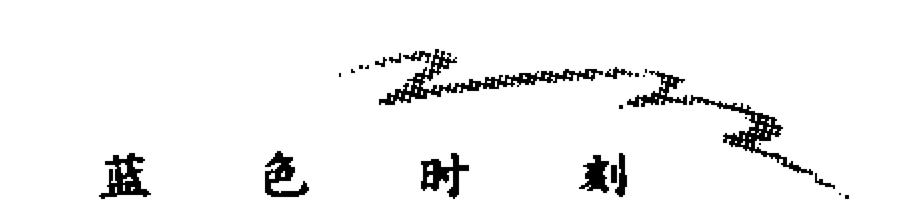
“我跟你说是因为我醉了。我想如果你老头子还在，我首先要做的，就是跑到他那儿，告诉他我看见了她。肯定是。所以我告诉了你，知道吗，因为我已经不能告诉他了。米丽娅姆就在那儿。那个印第安女孩就在圣伊西德罗看着我。”

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女用人在厨房里传出一阵洗盘子的声音。

“告诉我，那个小店在哪儿，你在哪儿看见她的？”

他摇摇头。

“达索工程师总是去有树的那条街上的维塞银行，叫五月二日大街，就是圣伊西德罗的哈维尔·普拉多旁边。应该就在那旁边，其中一条街就是。我没回去过，连走近都没有。这是很久的事了。我甚至没对查乔说过。幸好你爸爸不知道。再来两杯吗？好吧，最后一杯，知道吗？你真的有点像你爸爸。认识你真棒，真的。”



瓜约那天下午在布雷尼亚他的餐厅里的话仍然回荡在我耳边。他的粉痘脸，细嗓子和他长毛绒衬衫也历历在目。

“有时候我们把他们塞到浴缸的水里，让他们承认。查乔喜欢把电线接到女人的乳房上，他喜欢这样。有一次我们把在镇上碰到的一个女孩子带到了你爸爸那儿。即使我们不这样做，他们也会这样对待我们，伙计…… 女孩的妈妈抓着女孩不松手，我们给了她一下，可是老太太还是不松手。”

瓜约说话的时候，女孩的形象在我面前出现了，她和我父亲在一起，背景是黑色的。

我终于向瓜约告别了，不记得我走的时候说了什么。也许我拥抱了他。我觉得自己置于车窗的保护之下。那天下午，一场悭吝的细雨降落在萨拉韦里大街的车流上，树冠沉重地晃动着。“她怎么能从军营里跑出去呢？因为那个特别倒霉的家伙穿着瓜约的军装，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你爸爸简直疯了，开始到处找她。”

到了埃赫西托大街，我把车停下来，下了车。海风扑打在我的脸上。

我在海伦娜·德珀泽巧克力店前停下车。我走进洗手间，洗洗脸，梳梳头。又买了点巧克力。走进家门时，我又整理了一下领带。差不多是八点了，当然我不希望我的女儿们注意到我这个样子。

至于克劳迪娅，她应该明白，一个人如果是去同父亲的朋友聚会，回来时不会不有点醉醺醺的。

我打开房门，进了卧室，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向克劳迪娅简单地解释了一下。“你躺下会好些，”她说，然后就离开了。阿莉西亚正在她的房间里学习。露西亚正在听音乐。我走进去，给她们每人分了一块巧克力。我踮着脚来到浴室，在镜子里看着自己，五官变小了，眼睛醉得变了形。我几乎记不得我是如何把车开到家的。白天的那些人物……每个人都为自己辩解，又都指责别人。

我穿上睡衣。

头靠到枕头上，我感到头轻松一些了。

如果我的某位客户，我的合作伙伴爱德华多或者事务所里的实习生那个时候看见我，他们自己都不会相信。我这个蜷缩在床上的醉鬼，居然得到了夫人的谅解。我眼睛睁得像两盏灯，脑子里想的就是自己的父亲，父亲的军官们，还有那个从他们那儿跑掉的阿亚库乔的印第安姑娘。

七

早晨两点。我上卫生间，头都要炸了。我吃了两片阿司匹林。我不敢在镜子里看自己，样子大概够难看的。

从卫生间出来，露西亚正在等我。瘦削的双腿，细长的眼睛，一只手捂在嘴上。

“我在房间里听到有声音，爸爸，没事儿吧？”

“没事，孩子哎。别担心。”

露西亚好像消失在黑暗中。有人会扑向她吗？我问自己，一位老妪会从衣柜里跑出来打她吗？

我陪她到了她的房间，和她一起打开箱子和衣柜。什么都没有。

“看见了吗？可是我能和你们睡在一起吗，爸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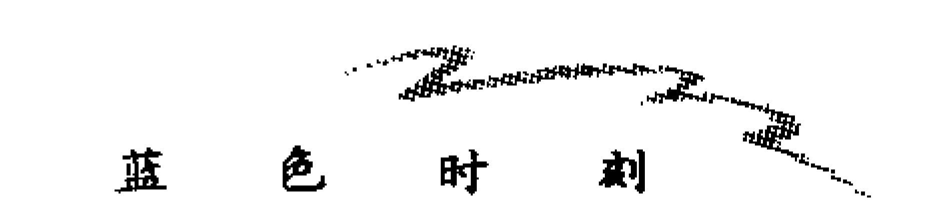
“当然，孩子。”

她在我身边躺下，我搂着她。克劳迪娅并没有动。我睡着了，醒来时，露西亚的一只手正放在我脸上。我欠起身。好一会儿，我沉浸在最兴奋的快乐中——看着我女儿睡觉的快乐。平滑的肌肤，舒展的眼睑，松弛的双腿。只有孩子才睡得这样投入。看孩子休息本身就是种休息。露西亚十岁了，我担心将来她那过度敏感的心脏会给她带来麻烦。看见一个新娘走进教堂，她会高兴得热泪盈眶，读恐怖小说就会毛骨悚然。看着她睡觉，我带着超前的思绪问自己，她会有什么样的新男女朋友，毕业以后的生活会怎样，她会去哪些国家，她是否能足够坚强、足够果敢地抵御那些等待她的失望和失败？我能在她身边呆到什么时候呢？

我感觉到克劳迪娅起床了，我又睡着了，睡到七点。一般在这个时间，家里就会忙活起来，节奏就像咖啡壶的水沸腾和小餐馆厨房的声音。

我起了床，又进了卫生间。卫生间里有瓷砖，有浴巾。这里就像个家，一个有镜子的洞穴，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极乐世界。我按照往常的习惯，刮刮脸，淋浴，穿好衣服，把我的身体当做一棵成熟的圣诞树布置好，而且几乎把准备展示给客户们的礼物也收拾好了。我喷了香水，脸面光亮，系着红酒色的领带。我为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感到惊诧：一个是可怜的情感妖魔，皮肤滋润，穿着内衣，头痛欲裂，差点儿在卫生间里引发了他的首次暗自饮泣；而另一个是标准的社交绅士，灰色三件套，衣洁领净，在律师事务所里发表讲话。

我坐在餐厅里，端着一个瓷杯和一个玻璃水杯。



女儿们去学校后，我向克劳迪娅讲了我同瓜约和查乔碰头的一些细节。我告诉她，他们是我父亲战争时期的两个部下。他们给我讲了一大堆事情，一大堆有关拷打和处决的事情。可是什么事呢？好吧，他们讲了几件事。军官们把死人扔到垃圾坑里，好让猪啃尸体，让死者的家属认不出他们。有一次，三个士兵当着婴儿母亲的面杀死了婴儿，然后又在婴儿尸体旁边强奸了他的母亲。

“别再说了，”她乞求道。

“好吧，不过这实际上是对光辉道路行径的回应，他们把抓到的人活活烧死，并且往已经烧成炭的尸体上挂上牌子。光辉道路的一个普遍的习惯就是，把村镇的镇长当着他的妻子儿女的面杀死，又把尸体挂在他们面前，强迫他们庆贺。他们把婴儿的尸体挂在树上。这都是他们对我讲的。我以前也听说过这些。我也看见过照片。你还记得报纸上登过照片吗？”

克劳迪娅低声叫着，“太恐怖了，我不能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她去了客厅。

在办公室里，头又疼起来，我几乎不能在办公椅上坐着。一个不太习惯于喝酒的人不应该同他父亲的朋友们往一块儿凑，这是前一天的唯一教训。珍妮进来看我，对我说你看起来有点儿不舒服，我给你片阿司匹林，或者如果你愿意，再来一杯浓咖啡。

我上午一直同爱德华多谈辞退和替补人选的事。一切都正常。被辞退的人只是要求得到推荐信。

要说从办公室逃跑，爱德华多是内行，所以他带着怀疑甚至幸灾乐祸的微笑对待我前一天的缺席。我一般不会晚来，于是爱德华多很有分寸地庆祝这件事。按照他的说法，我应该娱乐，放松，偶尔消遣一下。“你太专注于你的家庭和工作了，这是个问题。”他问我是不是和一个女性在一起，那个幸运女孩是谁。我的解释是我遇到了几位长时间未见的朋友，我和他们一起喝酒，所以晚了。“实际上，他们不是我的朋友，是我父亲的朋友，”我澄清道。“哎呀，这种聚会带劲，”他说。

“好吧，说咱们的事，”他打开一个文件夹，“这个月又增加了两个新客户，值得我们庆祝一下，伙计。”

中午，喝完珍妮为我准备的第四杯咖啡后，我独自去吃午饭。我把几份未处理完的文件塞进手提箱。我几乎是习惯性地走向拉科马尔，进了拉里茨。

我要了一份沙拉一杯番木瓜汁。我没有拿出原准备审查的合同，而是取出记事本，开会时我在上面做点记录（或装着做记录）。这是我从大学后期形成的习惯之一。在一张纸上记录近几天发生的事情。我现在还留着那天写的那张纸。

发生的事情

1. 母亲去世。

2. 发现了一个叫比尔马·阿古尔托的人写的信，信上诅咒母亲和她的所有后人。

3. 她往家里打了电话。

4. 同我弟弟鲁文重逢，他披露了父亲在战争期间的表现。

5. 遇到查乔和瓜约。

6. 那个叫米丽娅姆的姑娘的事，父亲留了她的命，她却从军营里跑了。

猛然，在这个让我惊愕的事件里，我想起了点什么。

我不知道我听到的这些是真的还是杜撰的。

我觉得前一天下午，在同瓜约争吵之前，查乔已经说过，米丽娅姆逃跑的时候，已经怀孕了。

我写到：

7. 也许我还会有个弟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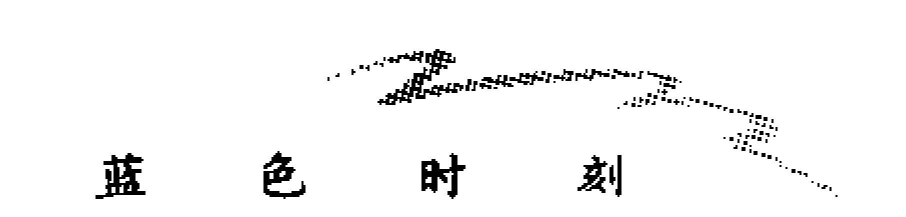
八

随后的几天里，我每天起床时都有种沉重的罪恶感，它随着上午的延伸而逐渐解除。

我觉得我正在受到惩罚。不是正义的惩罚，而是一种随遇而生的惩罚，一种偶然的诅咒。先是母亲的去世。由此引出恶果不断：鲁文回国，查乔和瓜约的出现，米丽娅姆的故事。

我想，一个被爱的人的完全死亡却让我们充满自责。你为什么不做点事情让你的母亲多活些日子，你又做了多少努力，以便同她多呆些时间？你爸爸是什么人，竟下令拷打了那么多人？为什么现在什么都回来找你了？这是种常态的焦虑，附着在我的生活中，我觉得我就是自己的傀儡。

在办公室里，一切都显得正常。我说的话依然恰如其



分，“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明天我给你答复”，“法律在这方面的规定是很明确的”。如果某个教授给我摄像，他完全可以把我当做律师的楷模展示给他的学生们。我有感染力。

我继续处理着事务所的事情，提出我的意见，审阅老客户的报告，同爱德华多交谈，筹划着接纳新客户的策略。为了忘掉所有这些，我还常常去看望我的朋友普拉顿·阿查。

普拉顿是我一贯的朋友。他父亲曾在几个学校里担任过哲学教授。阿查先生对柏拉图对话如此热衷，以至于有时候还在家里的客厅里表演些高尔吉亚[①] 和费德鲁斯[②]的片断。年轻的时候，我去过他家几次，看他表演对话片断。阿查先生的孩子们可以背诵他的演说，而普拉顿的母亲埃梅琳达·阿查夫人则端着盘子，为来客们送奇恰酒和馅饼。阿查先生系着领带、戴着金表、穿着条形图案马甲，还做些评论。聚会最后，还有一轮回答问题，我们这些人，也就是由他儿子的朋友们提问。接着我们大家吃蛋糕，埃梅琳达夫人还给我们分礼物。我的朋友普拉顿是为了纪念“思想者”而接受洗礼的，不过他很快就拒绝继续学习他父亲为他安排的哲学专业。我是在大学里认识他的，他当时学的是法律，可他又放弃了这个专业，而学起了平庸却收入颇丰的牙科。普拉顿身体壮实，心地善良，常常给人以教诲，还经常哈哈大笑。他总是系着红色或橘黄色领带，这更

① 高尔吉亚，古希腊哲学家，修辞学家。

② 费德鲁斯，古罗马寓言作家。

突出了那张厚嘴唇的脸和他像扇子一样展开的粗硬头发。他戴着精细的眼镜,试图以此修正他粗犷的面孔,掩饰两只笑眯眯的大眼睛。我们有时一起吃午饭。偶尔我们两对夫妇还一起出去看电影。他夫人格拉迪斯简直就是他的翻版。岁月使得她与丈夫的身体和灵魂更相匹配。她膀大腰圆,总是笑容可掬,两只手硬得像螃蟹。克劳迪娅简直忍受不了格拉迪斯·阿查,可还得将就着她,好让我高兴。普拉顿总是以当年拒绝他父亲指令那样的决心来解决世界上的问题:没问题,没事儿,不用担心。

那几天,我向普拉顿讲了同鲁文、瓜约和查乔发生的所有事情。“你老头儿是这样的人,不会吧?你妈妈对你什么都没说?你想做的是找到米丽娅姆?可是,你就是找到她了,又要对她说什么呢?”

到了母亲的祭月。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我那段时间的情绪。世界好像变得更大了,事物仿佛离我更遥远了,连我天天坐的那把椅子上,似乎也没有我坐的地方了。我并没有发现任何可以指摘她的地方,这更加剧了我的痛苦。

她在遗嘱里把财产平均分给我和鲁文,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在她那儿并不需要情感的专断行为,而把更多的东西留给我(我留在这里,留在利马和她在一起)。她的公正意识一直占据首位。关于如何处理她的衣服、鞋和提包,她也留下了指点意见。除非我想留下点什么,所有的东西都应该送给西夸尼卡门教派的教民事业。我留下了一个栗色皮包和一双鞋,把它们放在我衣柜的一个盒子里。皮包和



鞋是她的东西,让人感觉到她的皮肤。这点我想了很多。

一股在宇宙中漂移的感觉,一个随波逐流的孑然躯体,一种难以用“痛苦”或“失落”之类的词语来形容的怪诞体验。我未来将保留的回忆对我就像是种宽慰。在随后的几年里,话语、形象和同她在一起的情景片断都会汇集到我这里,而这种情景片断我现在还想象不到。这些回忆将支撑着我,也许还能鼓舞我。她的恬静,她的热情,她和我女儿们在一起时的小小欢乐。

那个星期二是她去世一个月的弥撒。

我不是特别虔诚的教徒,可她是,也许经历了各种事情之后我也会是。在一段时间里,鲁文和我每个星期日都陪她去做弥撒。没有比上帝更好的陪伴了。当她独处的时候,她同上帝说话。这给我极大的安慰。

“孤独带你去找上帝。我并不特别信这个,妈妈,我不知道。马查多有句诗,人自言自语是为了有一天能同上帝说上话。”

“那多好啊,”她说,“可这不是真的。等待是徒劳的,唯一管用的就是追寻。而且是同其他人一起追寻,和其他人联合在一起。这些其他人就在教堂里,就在弥撒上,就在你的女友里,就在你的城市里,在那些无处求助的穷人里。必须想到他们。在弥撒上我们想到了他们,否则什么时候才想到他们?做弥撒的好处就在于给你时间,让你看着别人思考,阿德里安。现在谁会用半个小时来思考?谁会有时间来看别人,向其他人问候?我进了教堂,想你们所有人,也想自己。我想自己,也想你们,想我的熟人,和那些一无

所有的人。”

母亲的嗓音以一种清澈的坚韧传播开来。一次弥撒，一次聚会，一次大会。大学聚集在一起。这些对她十分重要。对于我来说，问题就是无论是弥撒还是神父都让我厌倦，很厌倦。可这次，为了我的母亲，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有时我还会想到，那个叫比尔马·阿古尔托的人物也可能会出现(在家里，更麻烦的是在教堂里)，低声咒骂着我父亲所做的一切。

然而，做弥撒的那天，凉爽的下午，七点半，在卡门教派教堂里，一切都在静静地进行着，拥抱，感谢，美好的回忆。在教堂的出口，几个妈妈的女友和亲戚向我走来。其中两三个人向我讲起了妈妈的事情，我刚刚发现的开心情景：衣服弄脏了的那天，她很快就把它洗干净了；还有就是一天下午，她从椅子上摔下来，手里还端着杯子。她在地毯上滑倒了，太滑稽了，茶水差点儿撒到她身上。你妈妈就是这样，那么高贵，总是那么庄重。

看到长凳上的小小人群，看到领圣餐的队伍，听到神父嘴里发出的“我们的姊妹贝阿特丽斯”名字，我已经平静下来，几乎已经放松了。鲁文从我给他发的邮件里知道了全部仪式过程，他回件说了句感谢，又讲了他新认识的一个外国女朋友。

有一段时间，我已经忘记了比尔马·阿古尔托，再也没有得到她的任何消息。做弥撒的第二天，克劳迪娅又向我提起了这个人。“也许是个疯子随便打的电话，我对她说，咱们不说这个了。”

然而，在我的梦魇里，我得承认，我听到了电话铃响，从听筒里传出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声音，"你好，奥马切先生，我是比尔马·阿古尔托，我想跟你谈谈我的侄女米丽娅姆。"

也就在那几天，事务所里的一个实习生基克·萨拉斯差点儿死了。

基克是由几个律师朋友推荐来的，刚刚开始同我们一起工作，仅仅几个星期，他工作做得很出色。他不苟言笑，彬彬有礼，很主动，在讨论的时候，总能信手拈来适用的法律条文。对于像我这样健忘的人，看到他来参加讨论本身就是个好兆头。

这个实习生想在这里站住脚，一个星期六的早晨，他去办公室工作。大约是十一点，他坐在办公桌前，翻阅着《民法》。突然他感到胸口有种疼痛感的压迫。中午珍妮打电话通知了我，当时我正要跳进赛艇俱乐部的温水游泳池。珍妮说救护车先是把他送到阿梅里卡纳诊所，然后又转到了格劳大街的阿尔梅纳拉医院。

我决定去找他。阿尔梅纳拉医院是个又大又破的大楼，在老圣费尔南多学院对面的街区里。我从安达瓦伊拉斯街道进去，随着不尽的车流断断续续向前走，进了又脏又窄的阿夫陶街道。窄小的门，带栅栏的窗户，满盖灰尘的墙壁，还掉了一大块石灰，高低不平的人行道，乱七八糟的破车冒着浓烟。我缓慢地前行，终于来到了凯略马街。一小群清一色的人：衣服脏得发亮，短腿，身体向前倾着。

一群人在等着一个医生看病。

他们的脸都转向墙上的一个电视机。现在我又重新看看他们,感觉这个场面就像个宗教活动,有点儿像我母亲做弥撒。一小群昏昏欲睡的人,向上看着。候诊室里的电视屏幕是个神圣的信号,也是唯一活动的东西。所有人的眼睛都被吸引住了,处于本能的幻觉状态。

有人告诉我,我们的实习生基克在重点监护室,我同看门人说了一下,进去了。石板地走廊,一排铁床,一张桌子,医生在那儿写着什么。床上的人们面黄肌瘦,表情呆滞,身体的其余部分几乎都裹在被单里。由于已苟延残喘,他们表情僵化,躯干和腿都缩短了,手势也僵硬了。其中一个人嘴角下垂,一副被吓呆了的表情。我想死亡里也会有苟且的丑陋。一个垂死人的眼睛的颜色是唯一没有名称的东西。

我在小床前停下来。那个人脸上满面白须,目光呆滞,手已经皮包骨头。生命对于他的身体来说已成障碍,使他几乎不能完成垂死人的生理过渡。一个女人走近医生,打听她丈夫的情况。

医生告诉她,他刚刚去世,并用手指着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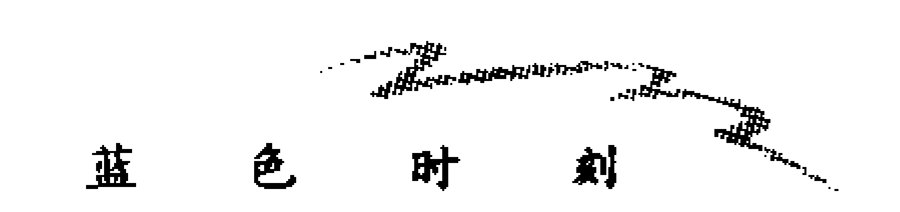
我看到那女人斜靠在墙壁上。她已经痴呆了,眼睛湿润。一个护士走过来。

“夫人,您是不是想让我把你丈夫的小东西放在口袋里?”

女人抬起头。

“小东西? 什么小东西?”

“他的钱包,他的手表和戒指。如果你愿意,可以把它



们装到一个口袋里。”

女人没有任何表示。

我沿着楼道向前走。病床一个挨一个，像个集市。一群护士来来回回，推着活动病床，往胳膊上扎吊针，向新来的病人问话。

我继续向前走，找到了基克，他正和他爸爸在一起。我问了一个医生，他证实基克刚才患了梗塞。

“我们付不起诊所的私人保险，博士，”他父亲对我说。“我们只能把他带到这儿来，听说这儿有好心脏病大夫。”

旁边，基克挺安静，而且精神状态很好。“从现在开始不许吸烟，另外我们还会控制你的饮食。我们会尽力帮助你的，别为那些保险不承担的药物担心。”

我对自己的角色感到幸福和满意。

基克的父亲对我说，“在阿梅里卡纳诊所已经做过透视和心电图，可是匆忙转院，忘了把结果带到医院来了。大夫正要呢。”我没说话。对于我来说，承担一个高贵灵魂角色的次数并不多(我总认为慷慨是另外一回事)，可是犹豫了一阵，我还是自荐去阿梅里卡纳诊所取心电图结果。

那是个星期六的晚上。在去圣伊西德罗路上，迎面驶来的车里坐满了情侣。

终于到了医院。我走进急诊室，打听做心电图的恩里克·萨拉斯先生。与阿尔梅纳拉医院不同，阿梅里卡纳诊所像是个空旷的大房子，一座豪华饭店，所有的门都封着，有的还有小小的玻璃灯箱(“这儿是男孩”)，还有花束。我走进安静又清洁的走廊，来到一个圆形大厅前。看到最里面

有个X光室的牌子。

环境比我刚才去的那个医院更洁净，更阴郁，某种程度上也更伤感。在我身旁，有个女孩脚上缠着绷带。医生对她说她已经骨折了，女孩痛苦地呻吟喊叫着。她的父亲抚摩着她的头，一再对她说马上就会好的。

我又回到阿尔梅纳拉医院。所有躯体一致广泛的沉默又重新让我感到惊异。有个女孩脚崴了，她出的声音比一打垂死穷人出的声音还要大。我想，不管怎样，事情也有它不幸的滑稽一面。

我离开了那些病人。在走廊里，我遇见了医生刚刚告诉她丈夫已经去世的那个女人。她穿着丧服，头发干涩，眼睛变小了，皮肤也显现出一种早衰的黯淡，整个身体都像是被罩上了一层死亡的征兆。两位先生正在同她低声说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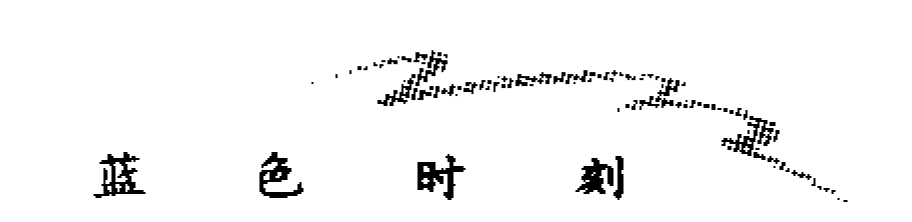
那天晚上，我跟克劳迪娅谈了这件事，她建议我喝点酒，看个电影盘，好忘掉这件事。

“好了，行了，行，”我对她说。

“你别这样，亲爱的，”克劳迪娅对我说。“别沮丧。医院会治好他的。小伙子会好的，你看着。”

星期天，我们看报纸，在海豚餐厅吃午饭，看望岳父岳母。克劳迪娅和她的姊妹们为我的岳父母的星期天安排而争吵。带老人去她家吃午饭的女儿家庭可以获得本星期的道德奖。有时候问题只是谁最先打电话的问题。按照我岳母的决定，有几个星期天我们所有人一起吃午饭。

星期一，我早早来到办公室。有几个实习生去医院看



望基克。做完手术后，他应该好多了。

珍妮提醒我当天的几个约会，晚上还有一个。我受邀去参加我的客户蒂托·特兰组织的晚宴。蒂托刚刚得到有关他的银行和一家意大利公司合并的确实消息(我们事务所为他办理了一切有关手续)，所以他决定要在五月二日大街的赛费里诺餐厅里庆祝一下。蒂托是个能言善辩的小伙子，他早晨七点起床，做一个小时的器械锻炼，每天八点半坐到办公桌前。他以同他讲话一样的激情进行工作。与他共进晚餐就等于坐在充满黄段子的桌前吃晚饭，晚饭掺杂着加蒜面包，烤饺，闲聊天，威士忌，大声地干杯，比萨饼，鸡尾酒和浓咖啡，乱哄哄地不到凌晨两点不会结束。同这样的客户一起消磨时光也是律师的职责。

第二天，我看到办公室窗户上糊了一片湿东西，可能是某只鸽子闹肚子拉的。我坐下来。屋里灯光昏暗。我看到办公桌上有个信封，字是歪歪扭扭地用铅笔写的。我打开信封：

奥马切博士：

我叫比尔马·阿古尔托。你今天来曼科·卡帕克街388号，拉维多利亚。下午四点。别带任何人来，就您自己来。这对您非常重要，奥马切先生。怀念您的母亲。此致。

比尔马·阿古尔托

是张横格纸，是从练习本上撕下来的。叠成四折。在

这张纸上写每个字都很费劲。

我叫珍妮来。

“谁把这个信封拿来的?”

“不知道。我估计信交给外面的门卫了。”

“你去问问他。”

“怎么回事?”

“以后我再跟你说。你去看看是谁把它带来的?”

我举着信封,好像仅凭一看就能再看出点什么。珍妮回来了。

“他说有辆老式车,大概早晨七点来的,是个小伙子给您的。他叫过门卫,自己连车都没下。是什么?”

“你听说过比尔马·阿古尔托吗?”

“没有。谁是比尔马·阿古尔托?”

“你看这个。”

这时电话铃响了。有人要找爱德华多,结果他们错把电话转到我这儿了。珍妮按了下按钮。信纸在她的手上颤抖。

我斜靠在座位上,开始翻报纸。

她挂上电话。

“她想干什么?”她看着信纸问我。

“我想她要敲诈我。”

“为什么?”

“因为他们知道点儿我父亲在阿亚库乔的事情,他当时在那儿服役。”

“那你怎么办呢?”



“我去搞清楚。”

“您最好和司机一块儿去。让内尔松陪着您。”

“你觉得合适吗?”

“那当然。那个女人是谁?”

中午,我在办公室里吃了份番茄和窝苣沙拉,一块奶酪糕和一瓶矿泉水。最后我又要了一杯咖啡,吸了几支烟。我在地毯上转了几圈。

三点半,内尔松来了,他是司机。

内尔松是个退役警察,据推测,他在十年前的一次追捕中,打死了两名罪犯。他站在事务所的厨房里讲那件事。我先抬起右臂,几乎都没瞄准,就扣了扳机。我在北圣博尔哈迎面遇上罪犯,当时他正拿着从银行抢的钱逃跑。内尔松说的时候还抬起手,晃着头,觉得自己一直是在广场中心。他眼睛又黑又凶,干涩的头发贴在脑壳上。他现在当司机挣的钱比他当警察时挣得还多,可他还是怀念在国民警卫队当警察的年代,还不时告诉我,他不仅是我的司机,而且还是我的保镖。他坚强,有礼貌,就是话说得有点儿太多,不过跟他在一起,我感到安全。

上了车,我让他寻找曼科·卡帕克街第三街区。我想拉维多利亚应该是条双行线街,通向广场。内尔松坐在方向盘前,把地图放在一旁,抬起头。“我说句话您别在意,博士,像您这样的一位先生为什么要去那个区呢?”

我们来到了曼科·卡帕克广场。印加人的雕像悲愤地望着地平线。

正午的白色阳光下，人影憧憧，那些人轮廓模糊不清，有的还仨一群，俩一伙，在街头的破长凳、秃矮树和广场的枯黄草坪之间游荡。药店的招牌，发绿的字体，被污垢涂得破烂不堪的墙壁，铁制窗户，售票员的喊声，公共汽车粗笨的单调声响。广场的角落里坐落着一个水泥颜色的教堂。一对老人静静地吃着一袋胡桃。

我让内尔松把车停在教堂附近，在那儿等我。

在路上，一个擦鞋匠跟着我，生硬地乞求我，要给我擦鞋。我到了曼科·卡帕克街，向左拐弯。我看到了墙上的牌号。这是个餐馆，塑料的桌子被木板分隔开。石砖地面已经被踩磨得发黄。人口一侧有块黑板，上面用粉笔写着：古巴式米饭三索尔，土豆配鸡块四索尔，橄榄油面包一索尔。在木制柜台里面，一个女人正站在放汽水瓶的玻璃柜后看着我。

她那一张小脸扭曲着，都快被她的大嘴吞噬了。突然她指着我，“奥马切先生？请到这儿来，奥马切先生。”

她身后出现了个小伙子。他坐下来，一直看着我。他穿着黑色长袖运动衫，上面有巴特曼的图案。

我猜想他是那个女人的儿子，在那里保护她并威胁我。我靠在已经破裂的塑料挡板上。我觉得我现在还能听到比尔马·阿古尔托下面对我说的这些话。她的声音快速又有气无力，就像水龙头发出的咻咻声。

“下午好，先生。第一，感谢您来。我得跟您说点事儿，先生。您的父亲是个坏透了的人，他多次伤害了我的侄女——米丽娅姆，多次伤害了她。她手里有他的小东西，小

信件。我们还有照片。以前我跟您的母亲联系。她给了我很长时间的钱，让我别跟新闻界说，让我别跟记者说您爸爸和我侄女的事。可是现在夫人去世了，我特别伤心，先生，您的母亲是位特别好的夫人，非常高贵，可是现在我们只能跟您处理这件事了。您的妈妈遵守了诺言，您也应该一样遵守。”

说话的时候，她总是轻轻晃动着手。她的指甲很短，几乎都嵌到手指里去了。

我开始转动着桌上的糖瓶。金属的声音使我镇静下来。

一个警察进来，要瓶矿泉水，小伙子站起来给他拿了。

我尽量保持镇静。我把两只手放在桌子上，迎面看着她。

“夫人，您听着，”我对她说，“您讲的这些我是第一次听到。我还是婴儿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我也不是经常看到我爸爸。我离我母亲很近，可是我从不知道您跟我讲的这件事，夫人，对不起，我不相信她会为了保密给您钱。我能不能问一下，您跟我说的这些，有什么证据？”

这时，那个小伙子走过来，说了点儿什么，让人不能理解。她用眼神制止了。

“我只看过您妈妈一次。一位高个子、令人尊敬、很标致的夫人，这我还记得，博士。她在你们家里接待了我，那条街叫什么来着，豪尔赫·巴萨德雷，在圣伊西德罗那块儿，她在那儿见了我一次。我去那儿了，或者说我去了你们家。我去了，跟她谈了话。你们家的客厅里有个大座钟，我还记

得。你们没有吗？我去过。她告诉我，每个月让位先生给我送钱来。他每个月到我这儿送钱来。奥斯卡先生，别人叫他查乔·奥索里奥。那位先生来这儿。他每个月的前几天送一千美元到这儿。他只是替您妈妈干事的。现在我跟他谈过这件事，他说，可是他说您的母亲已经去世，没钱往这儿带了。他也只是为她做事，帮她的忙。他知道怎么来。所以我才打了电话，让您到这儿来，继续完成我对您说的事。您不必来。那位查乔先生来。您把钱交给她，交给查乔先生。您就踏踏实实地做这件事情，博士。"

查乔的面孔浮现了。他正在海边的餐厅里看着，告诉我说我母亲是个伟大的夫人。

"还有您说你有照片和我父亲的东西，"我低声说。

"照片，我们有照片。让您的爸爸丢丢脸。如果您不给我们那份钱，我们就告诉新闻界，先生。您要是不信，博士，"她慢慢接着说道，"您要是不信，我们可以给您看照片。我们有三张照片，可以让您看。您想看吗？您的宝贝爸爸在军营里有照相机，就是他自己照的，是他自己用的照相机。他把照片送给了米丽娅姆。"

她盯着我，露出一种威胁的微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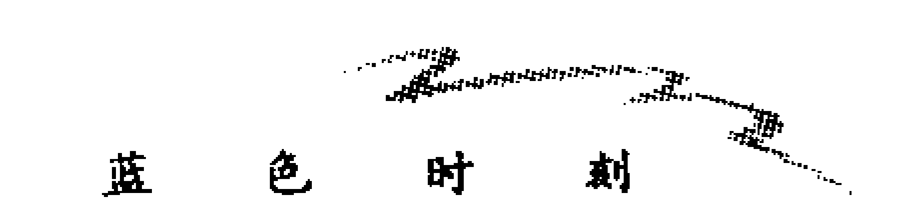
"是的，把照片拿来，我想看看。"

她没有做任何表示，小伙子却站起来，走向柜台。

回来时，他手里拿着一个皱巴巴的信封。

他把信封递给我。我举着信封，保持着一定距离，慢慢打开。

三张大照片滑到我手里。



图像有点虚,不过足以认清是我父亲的脸庞和部分身体。他赤身裸体和一个青年女子在一起。是他。是他?

她的长头发几乎盖住了她的整个脸。不过,可以看清她鼻子和额头的轮廓,嘴唇上有个发亮的点。

第一张照片上,他们站着。侧对着相机,两人站着,他一条腿跨出她的腰间,正吻她,而她几乎倚靠着他。她的面颊上有块湿迹。

另外两张照片更模糊。他们在床上,可以看清折叠的毛毯,都是他在她上面。

灰蒙蒙地将将能看清他们的脸。这大概就是我父亲在同朋友们逗着玩的时候,当做证明而炫耀的那个东西。

"这些照片如果出现在节目里或者报纸上对您可不好。现在还没有人过多地谈论您父亲,但以后有了这个,谈论他的人可就多了。这是您最该考虑的事情,先生。还有其他照片,这几张我们也都复制了。就看您的了。"

门口附近一直是小公共汽车沉闷的行驶声音。是种持续的声音,收款人的叫喊、喇叭声和车身呼啸交织在一起。那声音轮回追逐着我们,时低时高,有时还和比尔马·阿古尔托的声音混在一起。

"您这是在讹诈我,阿古尔托夫人。"

"好吧,您如果愿意这么叫,就这么叫吧,博士。可您必须给钱,就这样。我要跟您说的是,如果我出了什么事,有人就会让这些照片直接到达报纸和电视台。直接到达。法官那儿也会有,您的朋友那儿也会有。您妈妈的朋友们也会看到照片的,奥马切先生。"

我靠在椅子的靠背上，椅子发出轻微的嘎吱声。

"原来事情是这样，阿古尔托夫人。一个地地道道的讹诈。"

"好吧，事情就是我说的这样，阿德里安博士。您看着办。"

我注意到，那个小伙子一直神情慌张地看着那个女人。

"好吧，阿古尔托夫人。我需要更多的证据。告诉我，我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这位小姐，找到米丽娅姆。我想跟她谈谈。"

她正面看着我，一动不动的小眼睛里放着光。

"您不会看到她。您永远不会看到她，先生。永远，永远，永远不会。"

"好吧，不过我需要她告诉我这是不是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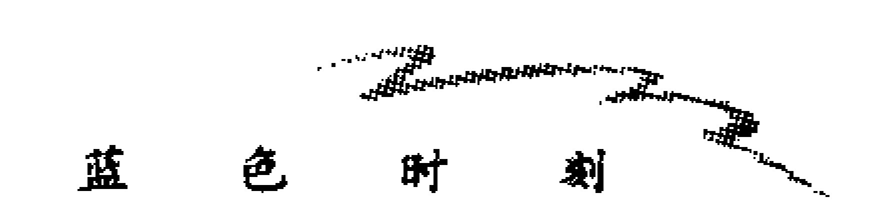
"您见不到她，我也见不到。我也不想再见到您了，先生。明天是这个月的一号。让查乔先生明天这个时候把钱带来。每个月的前几天，我们都在这儿等他送钱来。我只是想您派他来，不要其他任何人。我把他的地址给您。谢谢，下午好，博士。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就这样。"

她递给我一张横格纸，上面用蹩脚的正体字写着查乔的地址。

女人站起来。小伙子侧身让她过去，又随着她走到柜台后面。

她消失了。小伙子坐在凳子上，看着报纸。

街上的喧哗声又在我周围响起。



我来到人行道上的时候，一辆小公共汽车戛然而止。售票员，也就是个孩子，头上顶着块布，冲着司机喊着什么。我找到了内尔松。

“咱们去圣博尔哈，不过快点儿。”

一路上我几乎一动不动。我觉得怒火要从我的皮肤里爆发出来。那女人的声音钉在我的胸口上，还画出了查乔的脸庞。“让查乔先生带钱来。我只想让您派他来。”

很快就到了他家。内尔松下车去打听。

一个女人出来了。

“查乔先生不在。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我用手机给他打电话，可总是录音的声音，请您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号码。真逗。一个打手和讹诈者还摆这个架子。“你尽快给我打电话，我听到了我自己断断续续地声音，我要跟你商量点事，马上给我打电话，查乔。”

我走进办公室，看到一个清单，上面列着我该审阅的材料。一股愤怒的热烈冲动使我动弹不得。我看也没看那堆文件夹，就把它们扔到了地上。看到纸张飞起来，我一次又一次地踢踩它们。

“怎么了，阿德里安？”珍妮说。“你怎么会这个样子，听见了吗？你看起来像个孩子。”

她开始收拾起来。

那天晚上我一直呆在事务所里，大家都走了。办公室里的东西——电脑、书籍、墙上的画——好像都变得活生生，伺机扑向我。我来到花园里，在院子里转了一圈，又回

去了。我给自己倒了杯伏特加。

阿古尔托夫人,您的孩子哎。

父亲的照片,那个女人的声音:您的妈妈一直对我遵守诺言,您也会遵守的。母亲缥缈的身影,正把一千美元放进信封里,交给查乔……

还有另外一个场面,这回不是脸,也不是身体,而是一个像女人影子的东西。那个女人,米丽娅姆。一个灰色的影子,一连串模糊不清的线条,无法确定她的面孔。看不清,可就是她。我想看到她,跟她说话。然而,即使找到了她,又会怎么样呢?她至少会在我面前铺天盖地地把我父亲大骂一通,也许还会向我要比她的婶婶还多的钱?父亲为什么会给她留条活路?她怀孕的事是真的?当然,我没敢向比尔马·阿古尔托问这些。

我难道有个小弟弟,就在我看见她的那个肮脏地方与她一起成长?

九

整个晚上的其余时间里,我都在拨查乔的手机。每次都是录音的声音,我又重新按键。我拨了几回,每回都拨五六次。在间隔的时间里,我继续坐在写字台前,写着报告,不远处放着一杯伏特加。

我不时停下来,再拨电话。

经过几番努力,我再次习惯性地按了键,忽然,查乔的声音出现了,旁边是萨尔萨的音乐声。

“我一直在给你打电话,知道吗?”

“什么事? 我听不清。”

“你在哪儿?”

“我在马克西姆。”

“哪儿?”

“就这儿,滨海大道的一个迪斯科舞厅。”

“我得马上跟你谈谈。”

“行,行,不过你明天给我打电话吧。”

“可就是一分钟的事。听见了吗?”我开始喊起来,声音要超过音乐声。“告诉我你在哪儿,我要见你一会儿。”

“可我不是一个人,还有个女孩,知道吗?”

“好吧,可是你离开她一会儿,咱们说说话,然后我就走。”

晚班保安走进办公室,“您的夫人正打电话来,博士。”

“我待会儿给她打,你告诉她。”

“不过最好明天。”

“我现在就去,查乔。我马上过去,你等着我。”

音乐震耳欲聋。

“行,你愿意来就来吧。”

迪斯科舞厅是座黄色水泥殿堂,金色柱子,几只聚光灯照着飞扬的尘埃。

我走进舞池,从三四对无精打采的舞伴旁经过,站住脚,透过飞舞的绚丽灯光看着舞池中央。在舞池的一端,查乔正和一个鬈发女孩在一起。我走过去。

“我现在得和你谈谈,查乔。”

“你等这支曲子完了,别捣乱。”

“不行,”我说道。“我得马上走,咱们谈谈,我就走,你接着玩儿。”

“实在对不起,小姐,你先跟着节拍跳吧。”



“行,去吧,我的查乔,”鬈发女孩说。

“到底什么事,你干吗来烦我,阿德里安。你怎么了,听见了吗?”

“没什么,”我说,“我没什么要紧事。”

我们坐在一座大窗户旁的几个塑料垫上。一束龌龊的灯光散落在玻璃上。

“你什么时候开始给阿古尔托家送钱的?”我问。

“什么?”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往阿古尔托家送钱的,笨蛋?”

他低下头,蓝红色的灯光在地上散开了花。

“你说什么?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我知道,查乔。他们跟我说了。我和比尔马·阿古尔托夫人谈过。你现在告诉我,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母亲让你给那家人付钱的?”

他用手摸着后颈。

“不知道。”

“告诉我,查乔,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去送钱的,告诉我。你要是不说,我就控告你,把你投入监狱。明天你呆在号子里就舒服了,明白吗?”

音乐突然变了。是一首沉闷而甜蜜的叙事曲,嘶哑的声音拉长了声,有几对舞伴已经出来跳舞了。鬈发女孩交叉着双臂,站在附近看着我们。

他的嘴在慢慢颤抖。手又向嘴唇抹去。

“有一次你妈妈给我打电话。她让我给她帮忙……”

“她给他们钱有多长时间了?”

“妈的，我不知道大概有多长时间了，真的。大概有三四年了吧。她让我不要对任何人讲。我把钱给他们送过去，就这样。”

“每月一千美元。”

“是的。他们给你打电话了？”

“他们跟我也要这个数，让你送去。”

“他妈的。你妈妈什么都不想让你知道，明白吗？”

“行了。可是现在他们要我给他们钱。”

一个影子现身了，是那个鬈发女孩。

“宝贝查乔，你要和这位先生呆到什么时候？我自己都等烦了。”

“再等一会儿。去吧。你去给我买瓶啤酒，你自己也来一瓶。拿着。”

他拿出钱，交给她。鬈发女孩走了。

“那个女人还对你说什么了，阿德里安？”

“什么都没再说。她让你明天过去把钱给她。”

“她让你看照片了？”

“是的。”

“行了。”

我看着舞池，然后向他转过身来，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

“你管送钱，那你拿多少，查乔？”

“我？”

鬈发女孩拿着一瓶啤酒走过来。

“查乔，咱们走吧？”



“当然要拿，多少？”

“妈的，你怎么这么讨厌，伙计。你这样问我有多讨厌。真烦人！阿德里安，好吧，你知道什么，笨蛋？我走了，离开这儿，反正，我们已经谈过了。我和我的姑娘走，伙计。”

“咱们走吧，离开这位先生。”女孩说。

她挽着他的胳膊。

查乔茫然地看着我。他的胳膊弯成钩状，好像要打我。

“你妈妈什么也不想让你知道。她仅仅感谢我，为这个活给我小费。你妈妈是伟大的贵妇人，知道吗，一位贵妇人。”

“你觉得我们能在哪儿找到那个女人，找到米丽娅姆？”

“好吧，你要不走，我自己走了。我自己去跳。”

“行了，住嘴。你不会找到米丽娅姆的，伙计。你找不到她。”

他把手举向头，又把手落到前额上。然后双臂交叉，像是在说你奈何不了他。

“她跑的时候真怀孕了？”

“谁跟你说的？”

“我觉得瓜约或你有一天说过这事。你说的。”

“妈的，我不知道。”

“难道不是你说的吗？”

“我不记得了。”

“你当时在不在？”

“不知道！”他喊起来。

有几张脸向我们转过来。

“得了，查乔，够了，甭管他，走吧，跟我走，走，咱们跳舞去。”

“你甚至不知道她姓什么吗?”

“好，我走，查乔，我等够了，听见了吗？你跟他怎么有那么多话?”

女孩消失在舞池里。

查乔又喝了口啤酒。他把酒瓶举到眼前。

“米丽娅姆很多年前就死了，这我也是听说的。关于她的事，其他的我都不知道了。”

他消失在舞池的烟雾里。更多的人进了舞厅。一会儿查乔又跳着舞出现了，他在灯光中笑着。

记得刚出来时，我几乎找不到自己的车了。我打开车门，坐在方向盘前，一动不动。挡风玻璃上有一种骚动不安的寂静，一束聚光灯柱在玻璃上掠过。

我曾一度想回去找他。

我能对他说什么呢？我发动了汽车。路对我显得特别长。

迪斯科舞厅的声音还回响在泥泞路上。开了一会儿后，我才缓过神来。已经到了哈维尔·普拉多大街，马上就要到家了。

我进了客厅。我觉得这是个丑陋的地方，迪斯科的声响继续在轰鸣。一切都悄然无声。还不是太晚，可克劳迪娅一直是十一点躺下，以便第二天早晨精神抖擞地去上她的健身课。

我坐下来。母亲那徐缓的令人敬重的大座钟占据着客厅的主要位置。它似乎正在通过它的大眼睛评判着刚刚发生的事情。我把大座钟搬到我家来,它是家里一个高大稳固的象征,近似于家庭祭坛,一个在门口旁边迎接和告别我们的物件。

去事务所或大学前,早餐上,我总是看着那些数字圆圈、那些条状图案、那些带有轻度黄斑的白色底盘。

母亲也是每天看几次大座钟。她看着那尖尖的表针,包在罗马数字底盘上的暗淡皮革,硬邦邦的十二点和六点刻度。她看钟的时候,也许是还想着预定的时间,查乔该按门铃的时间,而她应该打开门,把该交给阿古尔托夫人的装有一千美元的信封给他。

大座钟对我来说就像个揣测过去的玻璃球,一个勾勒各类人物的圆圈。母亲从银行回来后,打开门,一张一张地数钞票,把它放到查乔肮脏的手指上。每张钞票都经过她的肌肤,然后又进入了一个由她封口的信封。母亲慈祥坚毅的面孔,几个晚上曾给我以安慰的嗓音,这个面孔和嗓音就是那个女人的,她每月去银行取钱,然后就用曾经抱过我的双手拿着信封,而阿古尔托夫人看见这个信封会绽出微笑的。

然而……她形象上刚刚启开的裂缝并没有影响她的风采。这也许能在某种程度上有损于她。我要是她,也会这样做,而且也只能这样做,即使这让我愤怒,让我悲伤,我也不能埋怨她向我隐瞒了这件事。我的生活在一条已经完美铺就的道路上进展,而它正是由于父亲的被遗忘才完美。

她设计、施工和保养了这条路。现在我发现了这件事,我觉得她正回来做解释。我必须理解。我又能怎样呢,孩子?那个女人威胁说要把你爸爸的事传出去。你说,还有别的选择吗?我只能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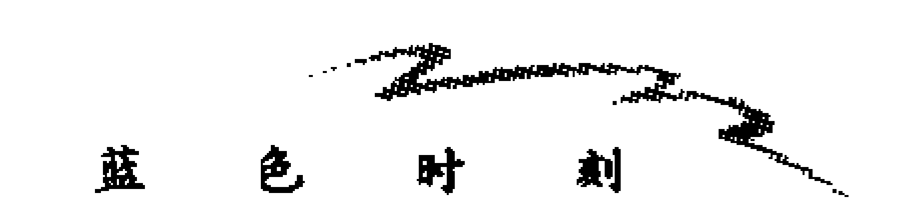
表针沿线移动,忽然又发出一声轻轻的钟响,一个三音符的音乐声,是凌晨三点,这个时候我都在家,在睡觉。十点,母亲给我最后一个吻。我与母亲已经一起做祈祷。得保护你爸爸,保护你们。我也没有办法,你应该理解我。

我庆幸我能只身一人在此,几乎置身在黑暗里。空气中湿气黏稠。往事在目,在静谧的客厅里,她坐在沙发上,紧闭着嘴,我只能拿钱,还能怎么样呢,这对于阿德里安是件很丢人的事,我还有什么办法吗,除了他,最好对谁也别说。我数好钱,把钱放到信封里,那个小伙子来,直到下个月之前,我都忘记这件事。就是这样。是这样吗?

我躺在克劳迪娅身边,摸摸她的肩,吻了她。

我被窗外的声音惊醒了。早晨九点,都这个点了,这对于我这个有早起生活规律的人可不光彩。我看到了克劳迪娅的纸条。“早晨好,瞌睡虫!去完健身房后,我去我妈妈家。女儿们在学校。”

我穿着睡衣,坐在床上,我还是坐在这边。起床,淋浴,穿好衣服,跳一跳,活动一下筋骨。这是我每天的业绩。先绷紧肌腱,然后站起来,待会儿穿衣服,再跳一跳。淋浴就是道关卡,是创造业绩的机器,一个人进去时蓬头垢面,出来就成了绅士。



在车上，我接了几个手机电话。收音机里播放着议员和部长们的声音。

一到办公室，我迅速见了一位客户，就叫过珍妮来。

“昨天怎么回事？”

她睁大了眼睛听我说着。

“我不能相信。”她一再说。

“我想认识那个姑娘，认识米丽娅姆。”

“不过不是说她死了吗？”

“不知道，我觉得查乔不过是说说。”

“可他对你说过她死了。”

“谁知道。他说他也是听说的，可是我不相信。”

“可你为什么要找她？”

“我想看看她的脸。”

这时候电话铃响了。

珍妮拿起了话筒，用的是她办公室里用的轻柔嗓音。

“是查乔·奥索里奥先生。”她捂着话筒说。

“噢，行，你告诉他，可以十二点来。”

“好的。”

她挂了电话，看着我。她的头倚在一只手掌上，手指甲向前。

“好吧，我想我就把钱给他，不知道还会有什么事情。”

“你有把握？”

“不，我没把握。可是现在得拿出一千美元，交给他。然后我再看看如何拿回那些照片。现在我们只能靠这个争取时间。”

珍妮站起来,靠在办公桌上。

"关于那件事,我有个问题不明白,阿德里安。"

"什么?"

"可以设想那个姑娘,那个米丽娅姆,好吧,可以设想她因为军营里发生的事,因为被关押和那里发生的一切而受到了伤害,对吧?"

"对。"

"那么她被关押的时候,为什么要留着那些照片,又把它交给她婶婶呢?姑娘的头脑这么冷静?这个我不明白,知道吗,一个正派女人不会保留如此丑恶的记忆的,你不这样认为吗?"

"你为什么设想她是个正派女人?"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设想。尽管我不认识她……"

我正面看着她。我坐了下来。

"你冷不防也说出了道理。"

"不管怎样,让内尔松盯住那个奥索里奥先生,还有那个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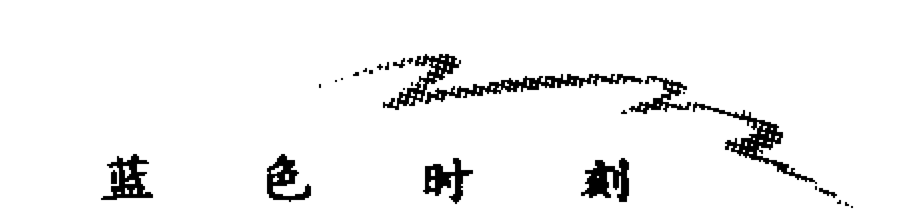
我叫内尔松来。

"是的,博士。"

"有个家伙要来取个信封,"我对他说,"珍妮会告诉你是谁。我想让你跟着他,告诉我他去哪儿了,听明白了吗?你能跟到什么时候就跟到什么时候。告诉我他做的所有事情。别让他看见你。"

他的眼睛里放出了光。

"行,博士。"



中午，查乔来了。他穿着黑色西服上衣，里面的粉色衬衣上系着灰领带。他头发梳理过，冲我微笑。

“我想请你原谅，”他对我说，“昨天晚上的事。原谅我，真的。我和那个姑娘在一起，又喝了点酒，不知怎么回事，如果我表现不好，原谅我，阿德里安。还有那天和瓜约在一起时的事。我不知道那个魔鬼怎么了。”

“行了，你不用担心。不过我想让你告诉我，关于米丽娅姆，你知道什么？”

“那个印第安姑娘？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你对我说过，她已经死了。”

“不，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说这个，我什么都不知道，真的。”

他交叉着双腿，坐在我面前。

“我感谢你做了这项工作。”我说。

“不，别感谢我，别感谢我。我只是想帮个忙。”

“你当这个差使，要从我这儿收多少钱？”

“不，是的，别生气，听见了吗？不要，不要，我一点儿都不要。我做这个只是为了保护你爸爸，纪念你爸爸。我想成为你的朋友，阿德里安。你知道我是如何尊敬你的父亲大人。”

我给他信封。他接了过去。

“你最好数一下。”我说。

他用手指捋了每一张钞票。他手指上的细细脂肪就像

肉虫在一个聚会上跳舞。

他站起来,向我伸出胳膊。

“你滚吧,”我对他说,“直到下个月之前,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他报之以微笑。

我关上了门。

珍妮望着我,眼里闪着光。

“这人真丑陋!”

“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去公共注册处,得看看是哪些人买了五月二日大街的那些地方。”

“为什么查那儿?”

“瓜约说他看见米丽娅姆在一个小店里卖东西,在十四街区一带。那块儿是维塞银行的地方。”

“一个小店?”

“对,不过现在已经没有小店了,只有楼房。所以得去看看谁是老业主,是不是他们把地皮卖了或者在那儿盖了楼房。看看是不是会有某个老业主能够告诉我们她在哪儿。”

“你这么想找到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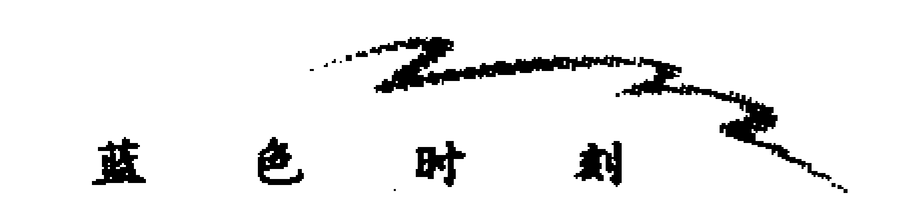
“是的。”

“为什么?”

“不知道。”

珍妮看着我。她低下了头,盯着显示屏。

“行,吃午饭的时候,我去公共注册处。”



我回家吃午饭。下了车,我看到门前的灌木枝叶茂密。我想把这一切都告诉克劳迪娅。

见到她时,她正打电话。她抬起一只手。女儿们已经吃过午饭了,正坐在自己的电脑前。

我去跟她们打了招呼,吻了她们,问她们当天学校里的事。“我真受够了,”阿莉西亚叹了口气,“明年就要考大学了。”

我坐在桌前,克劳迪娅挂了电话,坐在我旁边。她开始谈论她表妹马里塔和波查之间的矛盾。我心不在焉地听着她们的事情。

克劳迪娅讲得明确又流畅,就像是在给孩子们上课。“波查的爸爸总是给她最好的礼物。从她们小时候开始。好在马里塔从不记仇。直到有一天……”手机在我衣兜里震动起来。

我掏出手机,样子就像拿着个护身符,我听到了内尔松的声音。

“那个混账查乔和那个女人吃午饭,博士,是我刚刚看见的。他是那个女人的好朋友,博士,是这样。我拍了两张照片,他们没发现。我眼看着她给了他几张钞票,我亲眼看到她给了他钱。”

“我马上过去。”我说。

克劳迪娅不说了,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说我会尽早打电话告诉她。她跟着我一直到门口。

我感到了车轮箍的吱嘎声。

汽车一辆辆地落在了我后面。

克劳迪娅把电话打到了我的手机上。

“你怎么了,”她问我。

“他们骗了我,我以后再跟你说。”

我挂了电话,又拨通了内尔松的手机。他告诉我,查乔刚刚离开拉维多利亚。他和那个女人是摽在一起的,博士。我亲眼看见她给了那个恶棍一笔钱。就当着我的面给的。我装着进去买汽水。他们马上把钱都收起来了。可是我已经用照相机把他们照下来了,博士。

在去查乔家的路上,整个故事逐渐成型了。每到一个红绿灯,都会有一个我认为已经发生的情节补充进来。

这是建立在一系列可以证实的场面基础上的。第一个场面,父亲喝醉了的时候,向他的朋友们炫耀他和那个印第安姑娘玩的花样。第二个场面,查乔在我父亲的房间里找到了那些照片,也许是在父亲去世后。第三个场面,查乔随便找了个女人,来向我母亲讹诈。最后一个场面,他说服那个女人给我打电话,继续他的生意。是不是这么回事?

我脚下带着声,猛踩在油门上。我想要是能在查乔家里找到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把他拿的那份要回来。

到了圣博尔哈的里茨大街。还没下车,我就看到了他。他也刚到。他把车停在我的车旁,带着洋洋自得的微笑下了车。

机不可失。

我接近他,用尽全身力气推着他,叫喊着,“你刚才和那个女人一起讹诈我,你每年都讹诈我母亲,混蛋,我肯定那些照片是你在我父亲去世后从他那儿拿走的。你真是个臭

王八蛋!”

我真是异想天开,因为刚一开始打他,我就意识到了我的劣势。他的胳膊像两把锤子,我感觉到他先打了我几下,接着就是长长一阵火辣辣的疼痛。我的脸碰到了水泥地上。我站起来,扑向他。我终于把他扑倒在花园里,听到了他的一连串咒骂。我刚看见他站起来,就感到他一拳把我的颌骨打得够呛。我眼前一片漆黑,惊骇不已,两只手抓着地,被血腥味呛得喘不过气来。我站起来,可又摇晃着栽倒在一块草皮上。他正冲我叫喊着什么。

当我再次站起来时,查乔已经进了他的家。我吐了吐嘴里的血。满是尘土的衬衣沾上了污渍,浑身汗水淋淋。我走到门前,开始踹门,还捡起几块石头,砸碎了他家所有的玻璃。我不时地再次抓起石头,继续抛掷,直到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所有的玻璃都碎了,可我还是继续扔石头。

我倒下了。我揩干眼泪,终于坐到了车座上。胳膊在抽动,可我还是把汽车发动起来了。我一边开车,一边抽泣,还不时擦去泪水。

街道在我面前迟缓地展开。

我终于把车停到了家门前。

用人胡斯蒂娜看见了我,她把手捂嘴上,“夫人,夫人,”她喊着。

克劳迪娅出来了。

“哎哟,我的天啊,你怎么了,”她问。

她跟着我上了楼梯。

我进了浴室,脱掉衣服,把它扔在衣筐里。

克劳迪娅还在敲门。

“没什么事,我洗一下,”我说。我打开喷头。我让克劳迪娅帮我拿新衣服来。出了浴室,疼痛使我蜷缩在床上。

“你怎么了?”她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我去叫救护车?”她坐在了我身边。

“不,谁也别叫。”

“你能不能一股脑儿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阿德里安?”

“我跟一个混账打了一架。”

“跟谁?”

“一个过去和我爸爸在一起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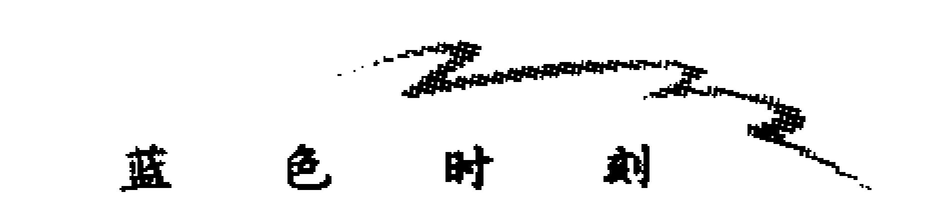
知道了全部事情经过后,克劳迪娅咬紧了嘴唇,她说最好别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还要看看我的淤斑和抓痕。我们得叫我表兄恩里克来,他是医生。我说我觉得伤得并不那么严重,如果哪儿断了,我就不能开车回来了,现在也不能在这儿说话了。克劳迪娅去浴室,拿来药膏、纱布和橡皮膏。

我打了电话,躺下来。克劳迪娅坐在我身边。

内尔松终于来接我了。“您干吗不告诉我,博士?否则,我本来可以叫一帮人去找那个混蛋!”他坚持说道。

我不顾克劳迪娅的请求出了家门。我向她保证马上回来。我冒着汗。一种罪恶的复仇欲支撑着我的身体,使我上了楼梯,摆脱了胃部和头部的刺痛。

我走进办公室时,珍妮正拿着内尔松拍的那些照片。“你怎么了?”她问。



“没什么，我打了场架。”

“你去看过大夫吗？”

“我只是有些淤伤，让我看看照片，”我执拗着。

其中一张照片上可以看到阿古尔托正把钱交给查乔。其他几张里，他们正在喝啤酒。我也不知道以前我为什么没有想到这点。我让珍妮去取一百美元来，并把照片放在衣兜里。“你好些了吗，”她问我。

“是的，我好多了。我去看看医生，马上回来。”

阿古尔托夫人见我进了她的居所，显出了惊诧。看来，查乔并没有把我们会面的事告诉她。

我在她身边坐下，内尔松站在我身旁。我让她看了她和查乔的照片，告诉她这些证据就足以让她在监狱里度过余生。

“你知道吗，”我接着说，“跟你说实话吧。拉维多利亚市的市长是我的朋友，我一天就可以关掉你的破饭馆，包括你的黑板、酒柜和你里面的那个穿黑运动衫的白痴。可是我太好了，我准备现在给你一百美元，换回所有照片的原件。”

她呆若木鸡地看着我。想说话，可嘴都快张不开了。“你要是这么做，我就控告你，”她回答说。

“可是你没想到电视频道的人是我的朋友，报纸的人也是我的朋友？你不明白，我的亲戚们也什么都不说？你不知道你已经被这件事缠上了？你要是跟谁提起这件事，我就会拿出我这儿你敲诈的照片，我很愿意把你送进监狱，判

你无期徒刑,因为另外查乔已经承认了,你好好想想。你是不是想让我现在就把警察叫来?"

她没有动,用她那褶皱密布的干瘪眼睛看着我。

"明天我带市政警察来。明天我们就关闭这个地方,你就到乔里略斯的监狱去,那个小男孩到卢里科查去。你觉得怎么样?"

"你怎么能够这么做,奥马切先生?你不能把我送到监牢去。我要告诉新闻界,跟你的亲戚我也要讲,我会告诉他们的。"

"你大概没听明白我的话,老畜生。你跟谁讲?你给谁打电话?你看,我过了这么长时间终于反应过来,而你又不能把我怎么样。我现在把照片拿到警察那儿,明天我们关了这个地方。他们会相信谁,信你还是信我?信谁?"

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只有车辆来往的声音。她陡然动了一下,突兀地叫道:"佩波,佩波。"男孩回过头来。"你把信封拿来,"她说道。

"什么?"

"把信封拿来,我跟你说了。"

她垂下了眼睛。男孩拿来了信封。那女人命令他把信封交给我。他用他傀儡般不解的目光望着她,不过后来还是服从了。

里面有照片和底片。我给了她一百美元,把信封装进衣服口袋里,站了起来。

内尔松走在我身旁。在街上,我感到了微风的轻抚。我全速向前走。我的身体在颤抖。我为我刚刚做的事情感



到害怕，又感到有些羞耻。可我又很高兴，甚至还挺得意。

一到车前，我突然想起来，手套盒里有把剪刀。那是克劳迪娅放在那里的，以便进入招待会前的最后一分钟采取措施。通常都是用来剪掉来的路上衣服上冒出的线头。

内尔松发动了汽车。汽车高速疾驶。我拿起了剪子。我再次看到了照片。

就在那儿，非常清楚，我父亲的脸。缠绵在一起的身体，依稀可见，可又无可避免地清晰起来。

我感到一阵恶心，可又不明不白地被吸引住了。我现在唯一的兴趣就是粉碎它们。三张照片，每张都是不同的姿势。父亲的脸要比她的脸近得多，一条龙正在黑暗中吞噬着它的猎物。我把剪刀架在了那脏兮兮的胶片上。沿着她的脸边，剪出了三张。

我手里突然有了三张身份证大小的照片，三张米丽娅姆模糊不清的面孔。

我用剪刀把其他部分剪成了碎片，特别是我父亲身体那部分。

内尔松已经正在把车驶出伊基托斯大街，进入墨西哥大街，接着又进了桑洪大街。我打开车窗，把碎片向后面的车流扔去。从车窗望去，碎片被丢弃了，跳跃了几下，呆在马路上不动了。

十

到了家。我慢慢下了车，生怕疼痛会加剧。

就应该叫恩里克来，我的表兄，他是医生。我对他说什么呢？我边走边想。

克劳迪娅开了门。她拥抱了我，“你怎么样，还疼吗？”

“好多了。”

“出了什么事？”

“我找回了照片。”

“你把它们怎么处理了？”

“我把照片撕碎了，扔到了路上。”

“没问题了？”

“没问题了。”

“把药吃了，这是止痛的，是布诺芬。不过还得叫医



生。”

“不，不用叫医生。我躺下就行了。待会儿我去找恩里克。你给事务所打个电话，告诉他们我不去了，行吗？”

“他感觉有点儿不好，现在不能去上班了，珍妮。”

我坐下来看电视。新闻节目，罗伯特·德尼罗的电影，欧洲杯球赛。痉挛渐渐消退了，我的腿又恢复了那种可以忍受的疼痛。

表兄恩里克来了，他为我做了检查，我对他说，“我同一个客户因为一个法律纠纷发生了冲突，我们两人还开玩笑说，我们的拳击手天赋都荒废了。”他对克劳迪娅说我很好，并拒绝接受一杯咖啡、茶水或啤酒（我工作的时候不喝东西，可现在不是工作，你是在我们家）。恩里克接了个电话，他还有个急诊，我们拥抱了一下，他匆匆而去。

晚上十点。

“你还疼吗？”克劳迪娅问。

我看她进了浴室，然后来到我身旁，吻了我一下，上了床。

我坐在沙发椅上没动，看着新闻节目和足球赛。

快到午夜时，我躺下了。不时被胳膊和腰上淤斑的疼痛弄醒。口渴、想尿的欲望和皮下灼伤的感觉断断续续地陪伴我到凌晨。有一次，我坐起来，从口袋里拿出了那几张照片。有三张脸。最清楚的那张照片上，她是侧面的，被闪光定了格。头发从一侧披散下来，恰似一抹烟雾。

我已经把我父亲身体那部分照片剪了下来，可是在她

肩上还可以看到他的环形手指。

我把剪开的照片收好,又躺下了。

我起了床。

在浴室里,我对着镜子看了会儿自己。

第二天我走进办公室,珍妮告诉我,瓜尔韦托·马丁内斯先生,也就是瓜约,正在等我。他在外面已经等了一会儿了。

我看着他走进来。他对我微笑。他特意梳了头。穿着西服上衣,系了领带。他尽量显得彬彬有礼,甚至愉快。

“你也和他们搀和在一起了?”瓜约说。

“没有。不过查乔跟我说了。你怎么知道的?”

“那个夫人自己跟我讲的。”

“她?”

“是她,就是比尔马·阿古尔托本人。她告诉我的。”

“多奇怪呀。”

“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她是查乔的姨。是他的姨。”

他冲着我微笑。

“就是说,那个女人跟米丽娅姆姑娘没关系,我想。”

“没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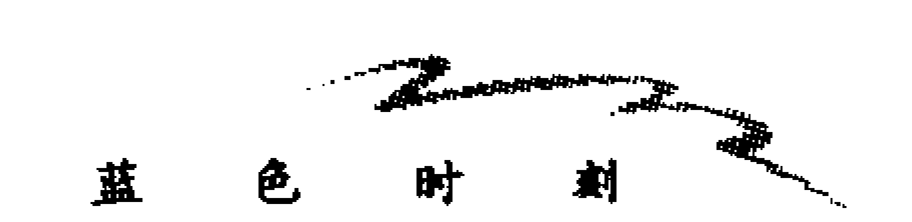
“查乔在我父亲去世后偷走了他的照片。”

“你是怎么让她说出来的?”

我假装在办公桌里找什么东西,考虑着如何回答。

“我给了她五千美元,她把照片给了我。你去问她去。”

“你给了她五千美元?”



"当然。有了这笔钱,她就可以踏踏实实地过日子了。现在你走吧,我还有一堆工作,伙计。我不想再看到你这张脸了,瓜约。"

他靠近我,眼里冒着火。

"你在骗我,不是吗?"

"你随便想。"

"这事我不知道,阿德里安。我从来没跟你爸爸做过这事。是查乔,是他。"

"这已经不重要了。"

他坐下来,伸开腿,双手放在衣兜里。

"你真的想去控告他们?"

"我还没想好。"

"查乔是个坏蛋,这不是要护着他,你别以为我想护着他。可如果你告了他们,也会伤害你。"

"我已经跟你说了,我也不知道下面该怎么办。反正这一切让我烦透了。现在你走吧,求求你。"

"你觉得这事很重要,对吧?"

"如果你想让我说实话,我觉得我越来越像个白痴。"

"你是不是要去告他们,听见了吗?告诉我实话。"

于是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我身体里爆发了。我站了起来,开始咆哮,我在他身边,高举着胳膊,高喊着,骂了一连串的脏话,还谴责他,"你拷打和杀害了那么多人,这个敲诈我母亲的人,我爸爸要是还活着,把你们两个都杀了,你们这一群乌龟王八蛋,我看着你们两个进监狱多好啊,你们不过是一堆狗屎!"我也不知道到底跟他说了多少。他有时候

还回答我:不过是查乔没钱了,他那个时候连吃的东西都没有了。可我继续喊着。我喊的时候,瓜约的脸没有任何表情,就像个大蛤蟆,他唯一的生命表现就是眼睛变大了。最后,内尔松进来了,对瓜约说请出去。瓜约看看他,耸耸肩膀,向走廊走去。

珍妮站在门口,问我是否需要点什么。她给我拿来一杯水,又为我关上门。

我坐在办公桌前,心脏急剧地跳着。我意识到我父亲不像他们,不是查乔和瓜约那样的人。父亲面临死亡的时候已经后悔了("有个女人在万塔,你得找到她"),那天他已经托付了我。可怎么解释呢?是他罪恶、思念、内疚的托付?"有个女人在万塔。有个女人,你得找到她。"现在我的手上已经有那个女人的面孔了,照片影像中有她的面孔和身体了。完成这个托付……父亲的幻影已经接近了我,已经对我说过什么,现在他又在重复。

晚上,我把跟瓜约的事告诉了克劳迪娅,她尽力安慰我,说我做得完全对。"跟那种人,没法说话,"她说。"但愿你再也听不到他们的消息了。"就在要去桑切斯·莱昂家之前(应邀去品尝马西亚准备的美味烤肉晚宴),在厨房里,我告诉她,我决定去找那个叫米丽娅姆的女人。

"找谁?"

"那个和我爸爸在一起的姑娘,就是那个跑了的姑娘。她叫米丽娅姆。"

"找她?你怎么找她?"

“我想知道她在哪儿?”

“哎呀,阿德里安,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

“我不想这事哪天让人知道。我得阻止她把这事说出去。”

“你要不惹她,她不会说出去的。你没有必要去惊动她。”

“是我爸爸要我这样做的。”

“什么?”

“他临死前要我这样做。只是那时我没太在意。”

“你没太在意?”

“我想他是在说胡话。他对我说,‘有个女人在万塔,你得找到她。’”

“那你现在想去找她?”

“是的,我得找到她。就为了他跟我说的这句话。”

“可当时你爸爸在说胡话,不是你说的吗?”

“是的,可胡说了真话。”

“可你找到她,又能得到什么呢?”

“不知道。我想弄清楚哪些人知道这件事。我不能有任何丑闻,你该清楚。”

“可你怎样才能找到她呢?”

“我也不知道。”

“好吧,咱们以后更平静地谈这件事。得另找个时间……”

她走出房间。

第二天，我们更平静地谈了这件事，随后的第三天也谈了。

这件事好像引起了她的兴趣，因为她看我十分坚决。

终于，在家里厨房的一次讨论中，克劳迪娅给我做了一系列预测：你会浪费时间，你会搅到问题里，你总会有幻觉，脑子里胡思乱想，我们需要你，你不欠那个随便认识你爸爸的印第安女人任何东西，就这样，听见了吗？如果到现在还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将来也不会有人知道。如果她到现在什么也没说，那她将来也不会说。你全力找她又能得到什么呢？你究竟怎么了？问题是你想找个借口离开这个家庭，听见了吗，问题就在这儿，很明显，你以为我没意识到？

我们正在争吵时，露西亚走进来，她哭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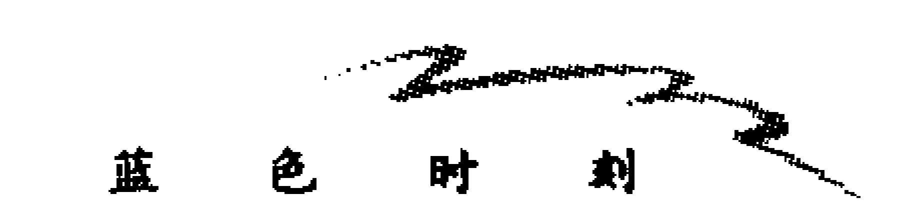
一天早晨，出门去办公室前，我打开钱包，又看看照片。米丽娅姆的脸庞。在那些影像里，肯定有理由得以吸引了我爸爸(爱上她了？)。细长的侧影，化了妆的面孔，嘴唇的光泽，炽热的眼睛，可以想象到黑暗中她身体的轮廓。我坐在床上，两手拿着剪碎的照片。我把照片藏了起来。

“阿德里安，”克劳迪娅满面春风地走进房间，“已经说好了，我爸爸请大家去玛格丽塔岛度假。这是你最需要的。星期一出发。”

“什么？”

“请咱们去玛格丽塔岛。我对你说过，你不记得了？哎呀，你可别跟我说你不想去。”

“去玛格丽塔岛？”



“是。是不是特棒?”

“咱们到那儿去干什么?”

“可是,阿德里安,这正是你最需要的。度几天假正是你最需要的。听见了吗? 有一天我跟你说过。”

“你和女儿们去吧。”我说着穿上了西服上衣,“我下星期还有很多工作。有这么多问题,我已经很少照顾办公室的事了。”

“可是,亲爱的,把问题再推迟一星期,行了,你把问题装到箱子里,下一个星期一再把它打开。咱们干吗不利用这个机会呢? 我爸爸和妈妈请咱们都去。钱都付了。饭店、餐饮、机票,都付了。另外你还说过,这样咱们还可以陪陪他们,要不,他们在那儿多孤独啊! 咱们带几本书去,躺在海滩上看书,行了,你说怎么样?”

“你说得有道理,你们不能放弃这个机会。这是唯一的机会。你们去吧。”

“不,不行。你别这样,阿德里安。你怎么了,你听见了吗?”

“我不能走。我们有新客户,整个星期都有聚会。”

她嘴里发出一个声音。

“问题是你不能看到我们家人了,”她嘟囔着。“或者说,我爸爸请咱们,你生气了,是不是?”她举起手,又伸向前面,“可要是他愿意请咱们,那又怎么样呢,亲爱的? 咱们大家需要的是个美好的假期……也就现在,孩子们这个星期学校里没课,就是。”

“我不行,克劳迪娅,你们去吧。”

我去了浴室,在镜子前整理了领带。

我听见克劳迪娅在电话里小声说着什么。

星期一到了,是我的家人出发的日子。我同阿莉西亚和露西亚一起吃早餐。我对她们说,我会想念她们。

“我们回来时,你还在这儿吗?”露西亚问。

“也就几天,”我解释道。“另外,咱们还可以打电话。”

我建议大家去比萨饼店吃午饭。

“哎呀,太棒了,”露西亚说。“我可以分一份玛格丽塔比萨饼了?”

“是的,孩子,随你的便。”

“咱们不能见面,”她对我说,“多难过呀!我们不在的时候,你干什么呢,爸爸?”

十一

那天晚上，从机场回来后，我想上街去。我很难只身走进家里。我可以在睡觉前散散步或者跑一跑。也许我应该和她们一起去旅行，我想。实际上，我没有任何合适的理由留在这里。

我穿上风衣，出了门。街道显得很宽阔，像个没有墙垣的隧道。

我开始跑起来。

一阵轻风拉长了树影。

我看着我的鞋敲击着水泥地面。敲击的声音似乎离我很远。环绕着公园的街道、房屋、电灯杆下的白光，仿佛都被细雨施加了魔法。

我知道这是我所住的市区，可又觉得好像我从来没有

在那儿呆过。那只是树木和建筑物的渺茫幻景。

某个房间里传出狗的狂吠。我加紧了脚步,又站住了。我想脱掉汗衫,可我明白,那样我会冷得发抖的。哈气的小气团喷发出来之后,立刻消散了。

一种盲目的愉悦推动着我的双腿。

我一直生活在这个城区里。走在这个城区里,它给我带来了美好的回忆。

再过去一点,就是母亲的家。再往前,是几个舅舅的家,再过去,是我的学校。那个街道系统涵盖了圣伊西德罗,米拉弗洛雷斯,构成了一个清洁房屋的网络…… 而现在,我孑身一人,没有克劳迪娅,没有女儿,没有任何理由地跑步,除非说是为了保持体形而锻炼,我只是想在夜跑中振奋自己,在疾步的时候,把自己的身体保持在空中。

到了高尔夫大街,我又沿着灌木丛跑。卡车在我身旁轰响,像是短促的枪声。

我决定向埃尔·奥利瓦尔跑。经过解放者大道和征服者大道,又沿着博斯克中心道奔跑。清风摇曳着树木,我觉得就像远处传来的哨声,也可以说是大街上的喇叭声。

我叫住一辆出租车。我有个想法,有点盲目,不过我觉得十分自然。我要求出租车司机把我送到阿尔梅纳拉医院。

出租车司机望着我,大概看我穿着风衣感到奇怪。他顺着桑洪大街走,在格劳拐了弯。我大口地喘着气,犹如击鼓。很快我们到了医院的铁栅栏旁,那些楼房和被遗弃的建筑宛若龌龊的幽灵,寂静也被小公共汽车马达声打破了。



我决定向右走。面前是格劳大街一片肮脏的情景:房屋的暗影,点点灯光,强烈的橡胶和烟雾味道。

我决意要去上城区的埃尔·安赫尔墓地。我对自己的决定并不意外,觉得再自然不过了。我下了出租车。

我,一个白人,穿着工装,出现在这条街上。看见我的人都觉得奇怪,我像是个怪人,一个奔跑的疯子,一个幽灵。

我继续向前走,来到一座墙下。污秽的光线一直照到了里面。不时又有冗长而吃力的汽车行驶的声音。我向前走,直到找到了那条向左拐向墓地的斜街。远处,我看到了一根顶柱的影子。我正走近一个教堂。

在街的另一头,有人过来了。一个低矮的影子,那个人挥动着胳膊,迈着军人的步伐。

我决定把速度加倍。

可能那个人已经看见了我(一个白人,在这个时间到这种地方来),来抢我的东西。不管怎么说,这事都不新鲜。影子越来越清楚了。他正在加快步伐。差五十米我们就碰到一起了。

我几乎能看清了。我站住脚,屏住呼吸。那人就在那儿,离我不到一米,他就在电线杆的灯光下。

他圆脸庞,目光呆滞,就像布娃娃的眼睛。

那人并没有看我,也没有止步,继续向前走,并没有转身。他经过的时候,我感到被空气轻轻击打了一下。

剩下我一人在那里,喘着气,看着他远去。

我来到教堂旁,踏上了先贤牧师墓地对面的小径。我觉得自己在飘浮。干涸的土地,开裂的水泥地,飘落的枯

叶，铁栅栏，墓碑的影子，一切都好像从远处飘过。突然，我听到了一个声音，一间房子的门开了。一群人围坐在一堆酒瓶子周围。几乎没有人转身看我。

我来到墓地门前。手持喇叭的天神，散落在甬道上的破碎花瓣。我坐了下来。我也不知道在那儿坐了多长时间，我看着自己的鞋，看着水泥地，一棵树慢慢摇曳。到处空空荡荡，万籁俱寂，就好像寂寞在那里组织了一支军队。

我在台阶上坐了一会儿，嘴巴倚在膝盖上。

一辆开着车灯的轻型卡车从拐弯处出现了。它在我面前停下来，一个警察跳下车。我对他说我很好。我拿出手机，现在是否有出租车司机还没睡觉？

来了辆出租车。

我回到了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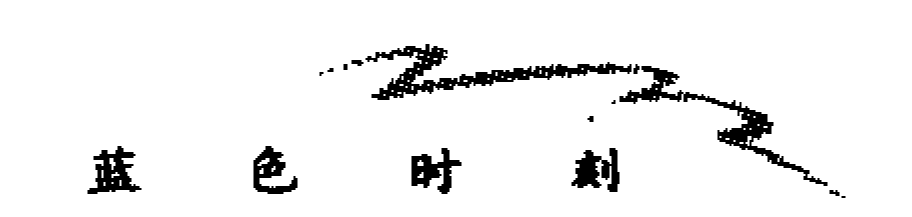
我冲了很长时间的淋浴。出来后，坐在沙发椅上。我睡着了。醒来时，已是凌晨四点了，电视里播放着有关加勒比岛的资料片。

她们在那儿吗？

早晨，我喝了杯浓咖啡，吃了蜂蜜面包片。我身旁有一道黄色虚线。鸟儿的歌唱从花园里传来。

在办公室，珍妮手里拿着张纸在等我。“我昨天去了公共注册处。这是业主名单，他们在五月二日大街那个街区出售过房产，他们在那儿见过米丽娅姆。一共有十七个。”

十七个可够我们找一阵子的了。整个上午，我们按照



地址一个个地打电话。所有打通的电话都说从未在那儿拥有或租过小店。

“可有三个人没打通，”珍妮说，“最好你亲自去找他们。”

“行。”

“我给你写个地址。”

我停顿了一下。

“我不知道我是否对你说过，我非常感谢你帮助我做了这些事情。”

“我做这些不是为了你，”她微笑着，“我也好奇，那个姑娘到底是怎么回事。”

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是埃里韦托·科蒂内斯，地址是耶稣·马利亚的格雷戈里奥·埃斯科韦多大街。第二个是安娜·玛丽亚·米兰达，住在圣博尔哈的拉斯阿特斯大街。第三个叫比托里诺·安科，地址是塞卡多的解放者大道。

第二天早晨八点，我开车来到了圣费莉佩居民区的矩形楼下，找到了埃里韦托·科蒂内斯的家。

我敲敲门。突然有个自称科蒂内斯先生的人站在我对面。他膀大腰圆，秃顶，惺忪的睡眼还有些冷酷，肤色像个年轻的恐龙。他紧闭着嘴巴，脸上带着不由自主的嘲弄表情。

“请原谅打扰您了，先生，”我说，“我是阿德里安·奥马切博士。”

“噢。怎么了？”

“我正在做个调查。是私事,没有任何法律问题。您是否在五月二日大街开过或租过一个商店?”

那人嘴里嚼着什么。有块肚皮露了出来,胸前挂着个铁十字架。

“我不知道任何关于商店的事,”他说,“我也不知道你是谁,听见了吗,我不知道你来这儿干什么。”

“您不知道五月二日大街附近有什么商店?”

“不知道,”他低声说,“你像个有教养的人,嗨,我不懂你到别人家问这些傻话要干什么。”

他关上了门。

我的下一站是圣博尔哈一条人迹稀少、斑驳陆离的街道。安娜·玛丽亚·米兰达出来接待了我。她穿着天蓝色的紧身女衫和长长的裙子,以她长长的脚脖子支撑着。连成一片的红色粉刺疙瘩遍布在整个脸上,眼睛像被压扁了似的,散露出冰冷的怜悯。

我对她重复了我的问题。她摇了摇头,什么也没说。她正关着门,突然又把门打开了。她发出了金丝雀般的嗓音:“我已经把我的房子卖了。我不知道任何关于小店的事,先生。不,先生。我什么都不知道,先生。”

我上了车。看看手表,十一点。我还没吃早饭。我把车停在一个餐厅前。我买了份报纸,要了咖啡和烤肉三明治,坐下来看报纸。社论版上有篇阿图罗·高纳的文章。“我对形势甚感忧虑,因为,亲爱的读者,您也知道,我也为秘鲁感到悲痛。”我翻到了演出版。看到一位名叫莫纳·马

拉佐的夫人从巴黎发来的文章。“我从巴黎给你们写信，我正看着旺多姆广场。昨天我和法国一群十分尊贵的人物一起吃饭。说实话，那真是美妙的聚会！那是群经过精心选择的人，在整个活动过程中，没有任何食客站起来上厕所。”我又翻金融消息版，看看那些总能让我平静的数字和号码。

有个影子猛然出现在咖啡厅门口。是个高大的人，宽肩膀，石头般的脑袋。他旁边有个瘦小的女人。她穿着带毛边的外套，脸上浓妆艳抹，蝴蝶裤，甜菜色的头发，内穿性感运动衫，下身一件男式黑色工装裤…… 就像一对性表演小丑。他们坐在我附近，看着我。在看报纸的那段时间里，我感觉到他们在笑，在议论着什么。我拿出手机，给普拉顿打电话。

“我们能一起吃午饭吗?”我问。

“行，只要你愿意。咱们去菲耶斯塔，我请客。”

我关上手机，去找那个叫比托里诺·安科的先生的家。他的家(也许是他的办公室)在塞卡多的解放者大道。如果从他那儿还得不到什么东西，我们就得按照名单重新再找。

到了桑洪大街尽头，我从司法大厦的楼梯旁走过，进了兰帕小街。我停了几次。排着长队的冒烟小公共，红绿灯前的扒手，卖饮料的小贩。我进了兰帕的一块空地，走到出租车队伍旁，那里的空气令人窒息。

我到了那个地址。那是一座楼，剥蚀的柱子，铝制扶手，墙上裹着奶油色塑料布。在一层，我看到一个玻璃柜里有一小堆橙子，一个金属榨汁机，还有块黑板，上面写着：橙汁一索尔。再往前，是电梯。我来到了五层，走进绿色楼

道，看看牌号。我敲了几次门，等待着。我把名片留在了门底下，可后来，当我从楼梯向下走的时候，又想到这也许并不是个好主意。我再次来到了车流中，到了圣马丁广场。一辆宽挡泥板的大型车在路中央行驶。

在办公室里，珍妮告诉我，她以她的名义查了一下。最近几年，五月二日大街有两块地皮已经售出盖楼用了。它们在十四和十五街区，其中一块是米兰达夫人的地址，就是那个说不知道任何关于小店之事的女人。另外一个是建在安科先生的地皮上。

整个上午，我们都在打安科先生的电话。

中午，我决定回到那座楼去，他的办公室可能在那儿。我可以问几个邻居是否认识他。

一个留长辫子的卖橙汁女店主一直看着我。我买了杯橙汁。

"你在这一带见过比托里诺·安科先生吗?"

"他就在那儿。"她用手指向我的背后。

我转过身去，他正向我走来。

是个栗色皮肤的人，大概有四五十岁，穿着黑色三件套，系蓝色领带，镀金袖扣。有对水灵灵的大眼睛。彬彬有礼中带着一丝紧张，昂着头。他走近了。

"安科先生?"我问。

他点点头。

"对不起，您不认识我。我是阿德里安·奥马切。我是律师，如果可能的话想跟您谈谈。"



我伸出手去。他迟疑了一下才伸过手来。

“可以,奥马切先生。有什么问题吗?”他温和地看着我。

“不,不是。是点私事。我不会占用您很多时间,我向你保证。”

我把名片递过去。他又看了我一下。他抬起手来,手掌向上,指向大门。

“您请,博士。”

我跟着他。我们上了楼梯。一个铁栏杆,楼道里只有一扇窗户可以透亮。他掏出一串钥匙,用肩膀推开了门。

他的办公室里有个木制办公桌,上面盖着绿色丝绸台布,涂漆地板,两个金属档案柜,另一头放着笨重的电话机。墙壁上一个滴血的耶稣受难像。一面旗帜和一个写着某大学名字的标牌装饰着他的办公桌。窗户朝向邻居的平台:晾衣服绳,堆积的木板,一堆堆脏沙子。远处可以听到大街上的嘈杂声。

他让我等一下,同时他把一些纸张放进档案柜里。他打开盒子,检查着每一张纸,又把它们放进纸壳文件档里。我坐在他对面。

他终于看我了。他把手伸开向前支撑着。我说我感谢他接待我。

“我是律师,正在找五月二日大街一个小店的主人。那人在十二街区有个小店。您不会不知道吧,安科博士?”

“对,是真的,在我的地块里曾有过一个商店,”他说,“我的一个表兄租了它。”

“您的表兄？谁是您的表兄，安科先生？”

“可是，对不起，先生，首先，要问一下，您为什么要找他，先生？”

“我想了解一个女孩，一个叫米丽娅姆的女孩。”我说。

他的脸愣住了。他的右手向桌子上抹去，像是要打扫灰尘。

“米丽娅姆？”他唧咕着。

“是的。您不认识她？”

他的一只手蜷在另一只手里，就不动了。

“认识，不过我不知道她人怎么样。”

停了一下。我向他微笑。

“您见过米丽娅姆？”

“见过，不过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到她了。”

“她在您的店里工作，有人告诉我。”

“可是您为什么要找她？”

这时候，楼里开始出现了一种类似水泵的声音，好像一个巨大的机器在喘气。声音越来越大，一瞬间达到了高峰，然后就降了下去。

“好吧，只是件私事，安科先生。”

“私事？”

“我估计他认识我父亲，是件家事。”

“噢。”

“能给我帮忙吗？”

“好吧，我把小店租给了表兄，可我不能告诉您太多，博士，您会原谅我的。”

我斜靠在椅子上。

“好吧,别担心,那么告诉我,我现在在哪儿能找到您的表兄?”

我看他犹豫了,晃着脑袋,仿佛在啃一个气球。

“我不知道他现在可能在哪儿,博士。这段时间我没见过我表兄。不过,请原谅,博士,您还没告诉我,您为什么要找他。”

“我是找她,找米丽娅姆。”

“为什么,博士?”

“为了我刚才跟您说的。我估计她认识我父亲……”

我停了一下,看见他正盯着我,然后他又低下头,把头转向一旁。

“她认识您父亲,您说? 在哪儿?”

“我估计是在阿亚库乔,或者说在万塔。”

他用一个手指轻轻敲打着办公桌。

“好吧,这不是我的事,”他说,“不管怎么样,我不能给您帮忙,博士。”

“您一点儿都不知道她的消息,或者有谁能告诉我点什么?”

他的眼睛在一瞬间发亮了。

“告诉我您的地址,博士。如果我知道什么,会通知您的。”

他打开抽屉。

他拿出个带兽皮环的记事本,手指头在舌头上蘸了一下,翻了几页。

他拿着我的名片，慢慢地写着，一笔一画，在每个重音的地方都划个小疙瘩。

我站起来，向他伸出手去。我刚转过身，就听到他的声音：

“有个问题，博士。”

“好，您说吧。”

“您父亲是军人？”

我夹着雪茄烟。

“是的。”

他观察着我。

“是海军学校的？”

“对，是海军学校的。”

“行了。”

他向下看着，关上了抽屉。

“如果我知道什么，就通知您。”

“谢谢。”

我猛然以最快的速度下了楼梯。

菲耶斯塔餐厅的装饰给人的感觉，是一群陌生人突然闯进了一个房间：一套家具，全铺的地毯，还有个天井。

餐厅的主打菜是鸭饭，炸豆饭，面糊汤。不过餐厅还有吸引人的附属方面。例如，它的样子像是个被遗弃的居室。菲耶斯塔的家具和地毯给顾客一种幻觉，当顾客坐在椅子上的时候，好像刚刚征服了一个家，而那个家庭的成员刚刚逃跑，或者正关在家里等待财产拍卖。来客可以在他的家



里为所欲为,并且是由别人来付款。

我进去的时候,普拉顿正举起一杯酸皮斯科酒。他对面有个杯子,里面也斟满了酒。

“我刚才看见你正停车,就给你要了一杯,”他对我说。

我在他旁边坐下。

“怎么样,阿德里安?”

“我这几天想做的唯一事情就是自己单独呆几天,想念我母亲。我去过她家几次。好像去看她…… 去看她一样……”

“可是死亡是个必须忍受的可恶东西,而后在生活中,还得面对它,想起它,从来不能无视它,不过也得忘掉死亡,听见了吗? 你也看到了,有这么多酒,这么多吃的,这么多要做的事情。你不能永远悲痛,知道吗,一阵子就行了,也就如此。就是这样。”

“你已经成了哲学家。大概是皮斯科酸酒让你这样想的,”我说。

“可能是。”

“好吧。”

“你从办公室来?”

我吮了口酒。

“我从利马市中心来。我去找个人。”

“谁?”

“我正在找个姑娘。”

“找谁?”

“找那个米丽娅姆姑娘。”

“你还弄这事呢?”

“这是他临死前要求我的。”

我喝干了杯里的酒。

“你找到什么了?”

“我刚开始同人谈。不过没有人认识她。或者他们只是这样说的。”

我跟他讲了我看过的三个人。普拉顿听着我说,一边大口地喝酒。他又要了一杯,看着我。

“很显然,安科先生知道点,你不这样认为吗?”

“但愿如此。”

“你要是看见了米丽娅姆,又对她说什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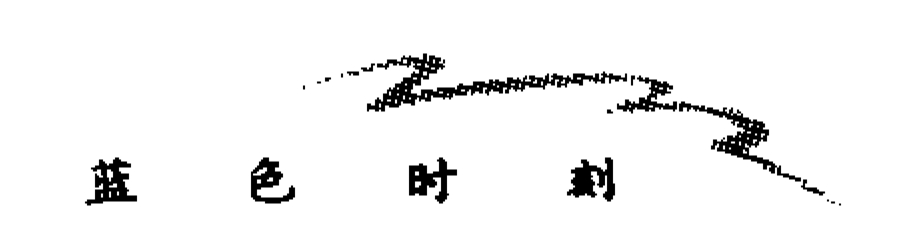
“我一点儿都没想呢。”

侍者走过来。

“两位先生是否准备用午餐了?”

我们要了浇汁通脊和啤酒。

“妈的,有一天我在街上遇到了我表兄,”普拉顿说,“这个表兄已经多年没见了。有个时期,我们天天在我姨家里见面。而现在我们只是形同路人,只是遇上时打个招呼而已。怎么回事,不是吗,人怎么还会变脸呢?我们先是敬重他们,我们总能见到他,可突然有点事儿,或者什么事都没有,你就见不到他们了,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过了段时间,你在街上遇见了他们,也只是问候而已,你又扬长而去。以前你还拥抱他们,可现在只在遇到时才打招呼。就是这样,知道吗?你的兄弟可以像个生人似的,要不就像个神父。而现在你拼命地要找那个你并不认识的女人。你要对她说



什么?”

“我跟你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让侍者再拿杯啤酒来。

“妈的,你要让她宽恕你,是的。你要对她说什么?”

普拉顿的嗓音简直是咆哮。

“要她宽恕我,为什么?”

“妈的,就因为你有个混账爸爸。”

“我对我爸爸的事没有责任。”

“当然是。不过你也有部分责任,知道吗?”

“为什么?”

“我们都要为自己的爸爸承担罪责,也要为我们的子女承担罪责。”

“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因为就是这样。”

“说什么傻话呢,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我认为我们有责任。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子女,不是其他人。他们就是我们。我们不能脱离他们。”

“不过对他们做的事,我们没有责任,就是这样。”

他微笑了。他把胳膊肘撑在桌子上,两手交叉在一起。

“你觉得你会对那个姑娘说什么?”

“好吧…… 我想问问她,我父亲是不是像别人说的那样坏。不过也不是这样。我也不知道。真的。我想找到她。我不想让事情传开。也许消息能够扩散,这对我可不合适。我现在感觉很不好,真的。”

"你怎么了?"

"我昨天晚上出去走了走,我忽然想起要走到墓地去,你不会相信的。"

"你怎么会这么做?"

"不清楚,只是心血来潮。"

"你在那儿有什么亡人吗?"

他胸前发出一个声响。普拉顿接了手机。"我不能谈,现在有客人,"他说。"别烦我。"

"祝你健康,伙计,"普拉顿说着举起了酒杯,"为了你妈妈,也为你爸爸。还为你找的那个姑娘,无论她在哪儿。"

刚到办公室,我就听到了珍妮的声音。"你怎么样,夫人? 真高兴听到你说话!"

是克劳迪娅打来电话。我拿起话筒。"我们在这儿都很好。这儿的太阳太棒了,女儿们高兴极了。你不觉得提精神吗? 你明天乘第一班飞机来,听见了吗?"

我同她说了会儿话,阿莉西亚和露西亚又跟我说了几句。"一切都好,爸爸,都好。"

那天下午,珍妮走进我的办公室。

"我找到了。"她对我说。

"什么?"

"比托里诺·安科在五月二日大街曾经有个小店。"

"这个我已经知道了。"

"他为一个雇员付社会保险。"

"为谁?"

"为一个叫保利诺·巴列的人。"

"你有他的地址吗?"

珍妮掏出她的记事本。

"保利诺·巴列住在一个叫万塔二区的地方。"

"万塔二区。"

"名字就是这么叫的。我听说那个地方全是阿亚库乔的移民。是在圣胡安·德卢利甘乔,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地址。"

我在我的电子记事本上记下了情况。

"他突然成了米丽娅姆的丈夫。"珍妮说。

"我不信。"我说。

"喂,阿德里安。"

"出了什么事?"

她靠在办公桌前,用她的大眼睛看着我。

"我觉得你虽然没见过她,可你已经爱上了她,是不是?"

"我没爱上任何其他人,"我说,"除了你。"

"太滑稽了。"

这时电话铃响了。

十二

我拿出利马的地图，上面有些说明。圣胡安·德卢利甘乔是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有一百多万居民，是城市北部的广阔地带。一条叫星球大街的街道连接着另一条叫费尔南多·维塞的大街。对于我来说，那简直是月球的地盘。我从来没想到会去那儿。我只是在电视报道选举结果的新闻中听到过圣胡安·德卢利甘乔的名字。

"谁打的电话?"

"美国大使馆。他们要发请柬来，请您参加爵士之夜的活动。是加西亚·阿莱格里亚演奏的。"

"行。我出去一下。今天下午有什么活动吗?"

"同奥尔蒂斯先生有个约会。"

"取消约会。要不就改到明天。"

“行。”

“好吧，要是有什么急事，你给我打电话。你通知内尔松，让他在下面等我。”

我到了门口，看到内尔松已经站在车旁了。

“你有地图吗？”我边关门边问他。

“有，博士。”

“那好，咱们看看到圣胡安·德卢利甘乔怎么走。”

“我知道怎么走，博士。咱们从这儿走，经过哈维尔·普拉多，然后就这么走，到环行路。对不起，博士，像您这样的先生为什么要到那种地方去？”

行驶在哈维尔·普拉多大街的时候，我想，所有的车辆都像大虫子一样，带着病毒，在街上滋生。有的车还找其他车，把病带给它们，然后转回来再传染给新的牺牲品。而其他人又力图躲避它们。真有意思。

我们在环行路的一个出口右转，到了一条窄小的街道，两旁是发黄的墙垣、旅馆和美元兑换处的招牌。这里就像个山洞的大门入口。现在我们是在一条四车道的大街上。电线杆排成行。道路在一个白色背景的地方化为乌有。所有这些就像个遥远的虚无的大杂烩。

在路上，内尔松向我讲述了瓦尔迪尔·萨恩斯前天晚上如何踢球得分。

一个警察告诉我们，我们应当一直走，直到马里亚特吉的雕像那儿，向左转，就快到万塔二区了。

“我们要在那儿找什么，博士？”

“找一个叫保利诺·巴列的人。”

"噢,那好。可为什么,博士?你要在那儿签个文件,还是什么的?"

"我要找到这个人。"

我们到了维塞大街。我们沿着维拉科查街心公园走,旁边是排球和台式足球[1] 的广告,还有地铁和加油站的指路牌。在中心狭道上有几棵幼小的棕榈树,可两侧只有石头、尘土和水泥块。房子都是平顶的,铁栅栏窗户,低矮的街门。离街道最近的地方,是商店的招牌,遮阳伞,装满水果的小车,一长串的摩托的士,学校、学院和牙科诊所的标牌,排成队的深紫色小公共汽车。"夏威夷音乐"迪斯科舞厅那儿还有个小旗,预告星期五晚上有个庆祝活动。我让内尔松把车停下。我们下了车,来到一个小店里,里面玻璃柜污浊。我看到了汽水。我要了两瓶,给内尔松一瓶,就又沿着街区走。我们来到一所学校门前。贝托尔特·布雷谢学校。旁边有个入学考试学校。一块牌子上写着"喂,请来国家工程大学"。我走近学校。一位教师解释数学问题的声音从二楼传来。能从那儿传来某个人的声音,我觉得有点奇怪。

我们又回到了车上。经过了一串牧师预科学校的招牌和几个教堂,我们找到了他们说的那个希卡马卡街区。

我们上了个坡,看到了一个公共汽车站。我们在一个叫米什基的餐厅前停下,马克斯先生接待了我们。他圆脸庞,头发高耸,宽宽的眼睛。他说话挺快,发的卷舌音都是

① 秘鲁特有的桌式足球游戏。



塞擦音。

“我们正在找一个叫万塔二区的地方，先生。”

“啊，就在下面。就那些房子那儿。那是阿亚库乔人在那儿建成的居住区。再过去是万塔一区，在监狱边上。这边是万塔二区。你看，加油站再往前。”

“咱们去那儿？”

我们又回到路上，在马里亚特吉① 的雕像那儿向右转，沿着条石路向前走。我们经过一块平地。后面有座校墙。到了那儿，我们又向右转。我们看到一群狗，还有砖头墙壁，窗户上都插着黑色棍子。汽车发出轰鸣。

我们在一座蓝色房子前停下。房子的窗户上装着栅栏，一枝叶片软塌的花茎由一根木棒支撑着。黑色小门牌，金黄色字体：就是珍妮给我的那个地址。保利诺·巴列就住在那儿，就是那个可能同米丽娅姆一起在小店里工作的人。

我下了车，站在那里，不能前行。不管怎样，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又对他怎么说呢？你跟米丽娅姆一起工作过，你很了解她，她是不是对你说过，奥马切长官曾经关过她？我是那个人的儿子，正在找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来了。

当然。这就是一段精彩的演说，当然是了。

我可能是个不太起眼的律师，可是那天下午，我这个怪人竟去敲一个叫保利诺·巴列的生人的家门。他住在我家

① 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1895—1930)，秘鲁作家、评论家。他的著名理论为拉丁美洲土著主义印第安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的几公里之外的地方，可却像有行星之遥。我来自于现实的另一面，在那面，人们出门乘车，睡在宽大的床上，醒来看着衣柜里成排的衣服。我要对他说什么呢？

一种奇怪的感觉使我止步不前。有个时刻，我竟想到米丽娅姆本人会给我来开门。

“需要我陪你吗，博士？”

“不，让我自己去，内尔松。”

我按了门铃，向后退了一步。一只狗立刻叫起来。门开了。

那人脸上的骨头很突出，显得脸很长。他穿着黑裤子，白衬衣，衬衣上还别着一个小金色徽章。他怯生和礼貌的动作使我放松下来。

“保利诺·巴列先生？”

“是，我就是，先生。”

“请原谅。您不认识我，巴列先生。我是阿德里安·奥马切。”

“是，先生。”

“劳驾，您能抽时间，让我跟您说几句话吗，巴列先生？”

“谈什么呢，先生？”

“几年前，您在五月二日大街的一个小店里工作过？”

他一动不动，两只小眼睛盯视着我，眼里露出一丝茫然的畏怯。

“可您为什么要问这个，先生？”他终于说话了。

“我正在找个姑娘，我估计她叫米丽娅姆。她也在那儿工作，也在那个店里。”

“您说您叫什么?”

“阿德里安·奥马切。”

我不说话了。

“她做了什么坏事了? 做了坏事了?”

“没有,她没做任何坏事。我想帮助她,真的。”

一缕头发垂在了他的额前。

“帮助她? 怎么帮助她?”

他声细如丝。他举起手,捋齐了头发。

“我是律师,想为她做点事情。”我看着他。

“做什么,先生?”

“那要看看她状况好不好,可能的话,我要帮助她。”我顿一下,又接着说:“这就是我要做的,巴列先生。”

他站向一旁。

“请吧。”他说。

我进了那间房子,石灰墙,黑色石地面,两个戴沙发套的沙发。我们坐下来。在我身旁,挂着一个金黄色基督图案的挂历。

“您是他的亲戚?”

“不是。”

“那您认识她?”

“不过您为什么要知道这个? 我不明白,请原谅。”

“我知道她年轻时过得不好,就是在她的镇上遇到了很多问题。我知道了她的境况,只想看看是否能为她做点什么,仅此而已。”

他向下看着。

“好吧，她是在利马的这个小店里干过，可小店的主人把小店卖了。要在那儿盖大楼，所以我们只好离开了小店。”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这儿居住的？”

“好吧，我来这儿是因为有帮老乡在这儿建了个居住区，我们都是万塔的，先生。”

“都是万塔的？”

“是的，先生，我们都是万塔的。”

“那您在附近工作？”

“我在蒙特内格罗－曼查伊的小公共汽车上当替班司机。总站就在这儿。”

“您知道在哪儿能找到米丽娅姆吗，巴列先生？”

他用手在嘴上抹了抹，然后又抹了几次。

“我不知道米丽娅姆怎么样了。小店关张以后，我估计她回万塔了。她是卢里科查的，她和她家人在那儿有个小店，我估计他们又回去了。过了这么多年，我再也没有她的消息。”

“对不起，巴列先生，您是怎么认识米丽娅姆的？”

“我们都是那儿的人，先生，我们都是万塔的。”

我把目光转向一旁。某个时刻，我甚至想到，他要告诉我，米丽娅姆就在那个居民区或者就在他家里。想到我竟会幻想在这儿遇到她，我自己也笑了。

“您觉得这儿能有人也许会知道点儿她的消息吗？”我问。

“不知道，先生。你得去问问。”



“米丽娅姆姓什么？”

“噢，我也不知道。在店里，我们就叫她米丽娅姆。我不知道她的姓，先生。”

我站了起来，给他写了个我的电话号码。我让他如果知道什么有关她的事，就打电话给我。

“谢谢。”我说。

走向车的时候，我才想到，从第一次跟他谈起这件事的时候，我就暴露了我的姓。

奥马切，奥马切的儿子。就是你在店里跟我说的那个恶棍，米丽娅姆。就是他的儿子，他就是来找你的那个人。他先是去了保利诺·巴列那儿，然后又找你找到了家。那个先生这么找你，他想干什么，米丽娅姆？他为什么要见你？他想结果你，想说服你不要把事情说出去，或者要给你钱，让你别说出去，要不那个先生想干什么，听见了吗？

也许当天下午他就会这样跟她讲。还有米丽娅姆的可怕经历，恐怕她在店里与他共处的时候都跟他讲过。

“你觉得怎么样，博士？”内尔松问，“有问题吗？”

“没有，没任何问题。咱们在这儿转一圈。”

“在这儿？”

“对，咱们去看看。”

我让他驾车沿着那个地方的街道走。有水泥和铁栅搭建的房子，有个女式美发店（我看到有个女美发师在给一位太太别烫发卷），一群若有所思的狗，一堆孩子在蹲着扔骰子。最后我让内尔松把车开回大街上。

到了柏油路上，我大声说：

“我很累了，内尔松。我想我应该到阿亚库乔休息几天。”

“去阿亚库乔，怎么会这样？”

“我也不知道。我一直想去看看。现在我家人不在，我可以去在那儿呆段时间。”

内尔松加快了车速。

“可为什么要去那儿，博士？有什么问题吗？”

“不，内尔松，没有任何问题。任何问题都没有。”

那天下午，我去了米格尔·达索书店。店员向我推荐了一系列有关光辉道路战争的书。我找了本细长型的书，只有近百页，是由为人民辩护出版社出版的，书名是《失踪者之声》。有十五件事，都是匿名的，记述上世纪八十年代在阿亚库乔呆过的一些人。

我买了书，进了多诺弗里奥。侍者端着杯咖啡走过来。

文章按字母顺序排列，都以年龄和出生地开始。几乎所有的讲述人都是女性。所有人都以类似的方式开头：一天晚上，几个士兵冲进我家，带走了我丈夫，他们来时，我们刚刚吃完饭，我们去军营找，他们说什么也不知道，让我们去另外那个军营看看。我不是想找杀害我丈夫的人。我现在唯一想得到的，就是我丈夫的尸体。我想知道他们把尸体弄到哪儿去了。我们在哪儿才能找到他的尸体。

我继续读着。看到了一个四十岁阿亚库乔女人的讲述。

一天晚上，我们都睡觉了，凌晨时分，他们闯进了我家门。有几个士兵，手里提着灯，大概有五六个士兵，带走了我儿子，只是询问一下，他们这样说，是为了询问他。后来，我们去了军营，他们说什么也不知道。后来又过了几天，我们没能找到他。没有任何人跟我们说起他的事。我们也再也没有见过他。我们去问了很多次，可是士兵们总是说，“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你们明天来吧，”总是这样说。现在没有我儿子，我觉得生活特别空荡。

我在日光灯下看书，一缕白光照得桌布上的餐具闪闪发光。

我望了下四周，又要了一杯咖啡，再次看起书来。我模模糊糊地觉得有群人进进出出，他们从我身边经过，有的人还向我问好。最后，我放下书，靠在椅子上。

我过了很长时间才坐直。

一天晚上，我们听到门口有卡车的声音，有八九个士兵踹开了门。他们砸坏了铁皮门，全进来了。他们来到我丈夫路易斯面前，抓住他的头发，拉扯他，他们说你这个狗屎恐怖分子，跟我们走。我对他们说，“他不是恐怖分子，”可他们还是拽走了他。我的几个孩子在哭，边喊边哭。我抓住他，抓住我丈夫，对士兵说，“你们就是杀了我，我也不松手，你们不能带走他，”可他们用步枪的枪托打我，对我说，“住嘴，女恐怖分子，我们把你也带走。如果你受得了拷打，我们就放了

他,"他们就这样说。那天晚上,他们带走了他,我也没睡觉。第二天是星期天,我去了洛斯·卡维托斯军营,他们对我说,什么都不知道。让我去警察局,他可能在那儿。我整天都在哭。我去了警察局,他们说他不在那儿。星期一突然来了个人,对我说,"我们跟你丈夫在一块儿,他们把我们放了,可把他留在那儿了,他们拷打了他。"于是我去了军营,却不让我进去。我去找律师,可我没钱付给律师,我无可奈何。军营一个叫巴尔索拉的军官对我说,"要是给他送只绵羊,就可以帮我找到他。"我把绵羊送去了,可什么消息也没得到。于是我们去了阿亚瓦尔库纳,是去万塔的公路上的一个地方,叫阿亚瓦尔库纳,他们把尸体扔在那儿。我只想得到我丈夫的尸体,即使他死了,也要得到他的尸体。我只是希望这些。光辉道路和军人都把死人扔在阿亚瓦尔库纳那儿。我和另外两个太太一起去的,她们也在找。我们看到的都是尸体,都被严刑拷打过,他们的肚子、颚骨、舌头、眼睛、指甲都被挖掉了,手指被砍断了。后来我回去了,找到一个士兵,对他说,"劳驾,请你们把路易斯的尸体交给我,我们只希望这个。"后来我又跟一个将军谈,可他让我走开。将军说他什么也不知道,不过他倒想知道我能不能为他找个用人,在他利马的家里干活。

"咱们没有爸爸怎么活?"我的一个孩子后来问我。

我的大儿子有时候为他爸爸奔走申诉。他到处奔走。我们如果有他的尸体,就可以到坟墓上去。至少

可以这样，但是我们没有尸体，没有。总想这个，我们的头都受不了了。我们至今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家里只剩下孤儿寡母。由于他的死，我们都成了孤单的人。

我看完书时，多诺弗里奥咖啡厅里已经人声鼎沸。几张桌子前已经挤满了人。一张桌子前，一群人在唱着“祝你生日快乐”。简直吵翻了天！我叫侍者来。待他来到我面前，我突然不知要对他说什么了。嘈杂的声音在继续。

十三

第二天早晨，爱德华多一见到我，就告诉我一个消息：

“我们开了个会，讨论新客户的情况。共有三个新客户，其中一个是银行的。”爱德华多很高兴，我也一样。

那天下午五六点，我正做着一件我从未做过的事情，在办公室里踱步。我从一侧走到另一侧。我周围的房间显得太小了，以至于我想到，要是在附近的五金店买把斧子，凿开墙壁，任意扩大房间面积，倒不算个坏主意，而且还挺开心的。这层房子变成了废墟，还有爱德华多的几声喊叫，我则在瓦砾上奔跑。

珍妮突然拿着去阿亚库乔的机票进了办公室。

“你真的要走？”

“当然。怎么了？”



“没什么,不过直到看着你上飞机之前,我不会相信。”

我给爱德华多打了电话。他问了几个问题后,同意我出去。“我早想到了,你想休息一下。你妈妈的事对你打击太大了,”他最后说。“你要去阿亚库乔?为什么?”

“听说那儿有个很好的旅馆,带游泳池。”

“带游泳池?”

“另外我还要为我的新住宅买些工艺品。”

我把机票放进衣兜里。

同卡诺先生共进晚餐后,到家时大约已十一点了。卡诺先生很容易相处。他谈话中最偏爱的题目就是他自己。他的房子,他的旅行,他的企业,他的女人们。让他高兴并不困难。海关对他通关时提出的问题也是太例行公事了:您的新房子怎么样?旅行怎么样?您的姑娘们怎么样了?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你的照片,太好了。那些问题就像手摇风琴的旋律,乐声一响,自负的猢狲开始随之跳起舞来。

到了家里,我坐到电视机对面。从按遥控器开始,我就知道要播什么了。我从一个频道换到另一个频道:一个接一个的乏味形象,持续不断的转屏声,嘈杂的声音加上旋律加上身体的变换就成了一部电影,一个有很多主角的故事,没完没了的变换外表,其实就是一个人物。真有意思。

没有克劳迪娅和女儿们在家,我感到失落。我在她们每个人的房间里坐坐。我有些伤感,躺倒在阿莉西亚和露西亚的床上。

那天晚上,我辗转在床,时醒时睡。最终已经四点半

了。飞机六点起飞。

在机场里,我穿过一群去库斯科的游客。去阿亚库乔的飞机只有五六个人排队。我们的飞机上了跑道。

那是一架十二座的福克飞机,座椅窄小。飞行员行动迟缓,面部憔悴,好像前一天晚上睡觉时没有把黑色眼镜摘掉似的。驾驶舱里一阵忙乱的声响。最后,飞机终于很自然地起飞了,它几乎是直线上升,然后在空中就位了。

每次上飞机的时候,我都处于一种新的期待和渴望状态,好像是第一次出门旅行。云铺地毯,风展长翼,舷窗里的太阳,对我好像都是新发现。我们五六个乘客在飞行途中也只聊了一会儿,一堆行尸走肉的货物倒像是一群最快活的人。

一个小时后,我们下面的气压逐渐下降,飞机擦着山峦边缘,对准了跑道,我们就要到瓦曼加城了。我感到了飞机轮子在跑道上的颤巍巍的震动。从舷梯上下来,我觉得天好像向我压下来,强烈的蓝色和山脉的轮廓使我加快了步伐。在这种凝结的纯净空气中行走,我感觉生疏。

我让出租车司机随便把我带到一个旅馆。他介绍了一串,供我选择。我挑了一个,因为我喜欢它的名字:三面具。

我们经过了兵器大街。我看到了教堂的正门和它侧面的大学。我想起少年时期圣周的一次旅行。当时我在大学里上学,母亲还年轻。我是和一群朋友去的。我们早晨起来就喝啤酒,弹吉他。

我下了出租车,迎面来了个细嗓子、小眼睛的小伙子。



我填了旅馆登记表，跟着小伙子沿着走廊来到了花坛对面的一个房间。

他给了我钥匙，问我想呆多长时间。我说两三天。房间在高台下面，一扇窗户朝向院子和花园。我躺在床上，想小憩一下。

醒来时已是十一点了。我拿着钥匙，走出房间。我意识到我很疲惫。

瓦曼加－万塔的火车站位于交叉路口。小公共汽车和卡车排成一队，司机们用眼睛搜寻着乘客。

一群穿着系带皮凉鞋的男孩子坐在卡车的车帮上。我注意到了一个扎辫子的小女孩，她的腿垂吊着。女孩子挺漂亮，黑色的眼睛炯炯有神，面孔细嫩，几乎是衣衫褴褛，我想她就是个大自然仍可抵御历史安排的例证。

两三个司机向我围过来。手里都拿着他们的车钥匙，都要送我。一辆宽体雪佛兰在那群人的后面等着。“就三十索尔，”他说，“包括来回。”

这个人一头鬈发，炯炯的眼睛，红色的长袖运动衫显出他那西瓜般的肚皮。“我叫安塞尔莫·拉莫斯，先生，愿为您效劳。”

我们上了公路。我问安塞尔莫，在战争期间他是不是住在那儿。

“太可怕了，”他说。他低沉的嗓音里迸出的唾沫飞溅到他的裤子上。“那时候走这条公路太可怕了。也就是说，走这条道是个纯粹碰运气的问题，或者光辉道路抓住你，或

者军队抓住你。不过最倒霉的是让光辉道路抓住。”

景色绵延,灌木片片,洼地土丘,河流蜿蜒,岩石无垠,一幅被云彩勾勒出的美景。我们沿着山间的一条柏油路前行。这是个石与土的地区,只有块块植物散布其间。空气清新,云罩蓝天,寒冷刺骨。有些小公共汽车和装载着箱子的卡车从对面驶来。

“你是万塔人,”我问他。

“我是万塔的。”

“那在战争时期呢?”

“我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那儿。要是你出来了,光辉道路就会抓住你,把你的车抢走。假如他们愿意,可以放你条活路,让你走回来。他们即使不杀你,至少也得把你的车抢走。就是这样,光辉道路分子就是这么干的,把你的东西全拿走。可有的人不让拿。我有个朋友乌戈·马塔。他不让光辉道路分子烧他的车。光辉道路分子截住了他,要烧他的车。他抗议,于是光辉道路分子就用一块石头砸扁了他的头。莱昂尼达斯·西斯内罗也是这样,他是个副镇长。莱昂尼达斯对他们说,‘我的村镇你们不能进来,’于是他们就冲着他的脑门开了枪。您为什么对这个感兴趣,先生?”

“我搞个调查。”

“您是记者。”

“不,我不是记者。告诉我,你们是否听说过奥马切司令?”

“噢,就那个在万塔的,是的,听说过,可我没什么印象。不过所有人都一样,全一样。而且,海军比陆军还坏。是这



样。一九八五年陆军来了以后，情况稍微好一些。陆军带走的人比海军要少些。”

“那个奥马切司令，你们知道他在军营里有个女人吗？”

“一个女人，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从来没有。你看，先生，”他说着指向右边，“那儿有好多尸体，你看。在这儿，你现在看见的这个桥叫小地狱。人们曾经在这儿一会儿找到一个尸体。光辉道路分子就把尸体堆在那儿，就在路边。军人也往这儿带，把死人扔这儿。所以人们把这个地方叫小地狱。”

我让他把车停下来。那是两条河之间的一块洼地。几块石头在草地上排成一行。我拍了几张照，可也不知为什么。

我朝山那边走，从右侧进了山，附近都是石头，我坐在草地上。

“那些尸体就在这儿，”我听见了安塞尔莫的声音。

我想，山坡这面的天然沟壑是存放尸体的好地方。它就在公路旁边，可以在尸体上面再摞尸体，节省了地方。是大自然提供的天然停尸场，是个露天大棺材。

“他们就在那里存放尸体，”还是安塞尔莫的声音，“谁要是从这儿过，在这儿在那儿都可以看到。总有死人送过来，被拷打过的，被砍断手脚的，就这样送过来了。有时候尸体在那儿放了几天，可后来军队来了，马上又把尸体运走了。有时候那些大兵把尸体放得再远些。”

这时，我产生了个有些滑稽的想法，却让我略感宽慰。我想，那美丽的天空，可以是死亡送给某个活着到此的人的

最后一个无言的欢乐，那人到此地时已经奄奄一息，他是看着这片浩瀚蓝天死的。

其余的路段是全速完成的。我们到了万塔的城市。窄小低矮的街道，建筑物是砖坯和石灰建成的，一群摩的司机，慢吞吞的大汽车冒着烟，右侧有座大山。

“您要去哪儿，先生?”安塞尔莫问。

“去军营。”

“噢，不过要去那儿，您得坐摩的。汽车上不去。您说个时间，我在广场上等您。”

我下了车。在拐角处，有辆摩的。车轮已经磨平了，车座也破了皮，可是发动机还能嘟嘟响。司机是个瘦弱的小伙子，头发都剃光了。我让他带我去军营。见他犹豫，我给他出了两倍的价钱。

我们顺着一条土路向前走。贴着山边绕圈后，开始上坡。我想我应该在那个地方拍张照片，我的父亲在那儿生活过一段时间。

一张照片，一个场景，在这里，我的回忆给他的面孔定了格。他穿着军服的身体，他的胡子，他的厚眼睑，鼻子旁边的黑痣，他向士兵们喊话的嘶哑嗓音。他的军服上污斑累累，有绿的，有黑的。我小看他就是这个样子，有一次他就是这样开着车去找鲁文和我。我是这样想象他的：头顶便帽，戴着防尘风镜，靴子上沾满了土，上了吉普车，奔驰在这条路上。

我们终于到了。军营就是一堵墙，一个瞭望塔和一扇大门。哨兵正看着我，手里抓紧了枪，像狗一样抬着他的

头。

为了争取时间,我问他能否开进去。

“不能进,先生。您不能呆在这儿。”

我按了按钮。

“滚,滚!”他对我说。

猛然间,他消失了。他可能就要开门了。我终于看到了里面的一部分。

也许那扇朝向里面的窗户……我本来想走过去,给那扇窗户拍张照片,也许那是他的房间。不过我得赶紧逃走,以免哨兵抢走我的相机。

我坐上了摩的,可忽然间,不知为什么,我让他等等。哨兵就要开门来找我了。

我在想象,从那扇窗户里观看一个满天星斗的夜晚会是怎样的感觉。叫米丽娅姆的女人,颤抖着双手,穿上瓜约的军服,走向这条路,几乎没敢回头看那个瞭望塔的瞭望孔,哨兵就在瞭望塔里。她点着了烟,全神贯注地启动了全身的肌肉,模仿着瓜约的腔调,“我出去转转。”她用肩膀摸索着可以向外走的地方,以免引起别人注意,就这样,她找到了一条通风带,通风带把她分离了出来,又把她引向瞭望哨。她说我出去转一下,然后就从瞭望哨下面走过,终于来到了外面的世界。她也许看到了一个奇迹,一只高举着的手正迎接着她的出走,直到把她送到右侧一个黑洞洞的地方。可能她就到了我现在呆的这个地方,她沿着那堆石头走,控制不住自己要奔跑的冲动,她抽着烟走在那段长长的路上,大摇大摆,不慌不忙,也没有转身,内心焦虑地想隐蔽

起来,终于走到了这条路上,从路上还可以看到军营。我竭力想象着她在那里的情形:她走在石头路上,冷得抱紧了双臂,走进黑暗中,走进了已经停滞的速度中。是这样吗,难道就是这样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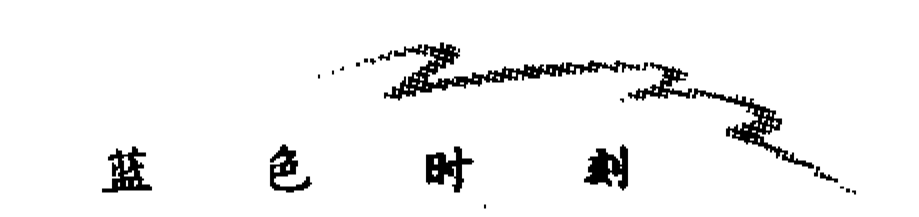
军营的门打开了,一个军官用手指着我。他向我走来。冲我喊着,“滚蛋,我要控告你!听着,谁也不许在这儿照相!”

我回到了摩的那儿,让摩的把我送到万塔体育场去。司机发动了摩托车。

“万塔体育场?”

“对,咱们去那儿。”

我从材料上了解过这个地方,万塔体育场是个足球场,里面有看台、盥洗室、办公室,而且还成了人们的一个话题,它曾经被海军用来作集中营和行刑室。有多少人死在了那里,几百,几千,几万?查乔和瓜约就在那儿干活。瓜约的声音。“你知道,查乔只要看一下囚徒,就知道他在水里能坚持多少时间。妈的,可是你对恐怖分子也太不像话了,伙计,你真是个臭狗屎,可他是独一份。行,谁也甭说谁,伙计。我们曾和卡米翁司令在一起,曾和科尔韦塔·阿尔瓦罗·阿塔萨上尉在一起。要说拷打,这是个最可恶的家伙,他不相信任何人。有一次,他把一个提问题的记者也拿下了。你还记得我们找到的那两个女教师吗?她们是光辉道路分子,我们给她们每人一颗子弹,那只是因为她们是好人。有时候,他往桶里装的不是水,而是装满了小动物,昆虫,还有青蛙和阿亚库乔森林的大蚂蚁。在接通电线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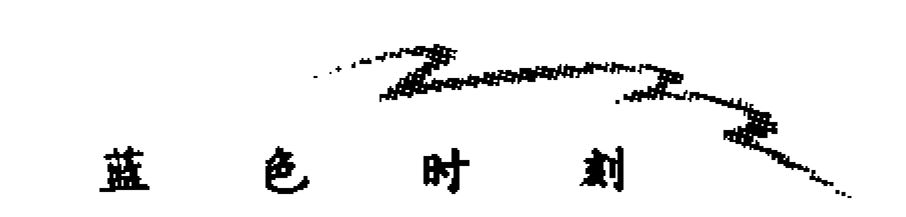
看看这些东西只能算个开胃菜。”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那儿看了多长时间。谁只要想到曾有那么多囚徒死在那里，就会觉得自己太渺小了。我忘了曾经在什么报纸上读过，说如果把那个体育场里的尸体都摆出来，可以绕体育场上百圈，这还得假设这些人并不是特别高(是某个记者诙谐的玩笑)。有一小段时间，我把注意力集中到窗户上。一排有三栏的长方形框架，每栏分为左右两块，中间由一条水泥栏分隔开。可如果从里面看，被拷打或被关押的囚犯从他们那个地方看，这些窗户就像是一串照亮了场地的光线链，是阳光照耀下的外界生命的灰烬。我还有个可笑的想法：也许那扇窗户——看着那扇窗户，看着那破裂的玻璃，看着那透进来的阳光——可以使人比平时更能承受时间。光明的希望可以延缓他的弥留时间，使他比初期更能容忍这种苟延残喘，让希望更无谓地延长，也许希望是一个人能够遇到的最坏事情，他延长了痛苦，或者也并不如此，那些窗户什么作用也没起，只是某个人从外向里观看时的遐想。

这个地方是什么习惯呢？查乔和瓜约已经讲过，如果他们情绪不好，一轮拷打可以轻易地持续整个晚上。我记得我读过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很多刽子手对于喊叫，身体的扭曲，乞求和疼痛的考验已经成瘾。给别人造成痛苦难道能够产生伟大的瘾癖？这是种慰藉还是防御？他们打人或杀人，却想不到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而行刑人唯一的巨大失落，就是看着囚徒死去，看着囚徒微笑着或者高喊着恐怖主义万岁死去，这肯定是最糟糕的事情。

一具微笑着的尸体可以刺激士兵,促使他们更快地带来下一个囚徒。想象这些,就让人感到震颤。一群要进入行刑室的囚徒,在进入行刑室之前,他们的眼睛交换着目光,互相鼓励,互相激励,也有的只是茫然地张望着。行刑人休息时还准备了咖啡、水、奶酪三明治。他们要强迫自己喜欢这样,就像钻进了牛角尖,来,咱们还得回去,看看谁能先挺过去。然后就听到了抽打脸的声音,电击睾丸或乳房的声音(能听到细微的劈啪响,瓜约曾经对我说过),墙后传来的号叫声,排着队进行强奸,人肉发出的恶臭,溅在你脸上的鲜血有股苦涩的味道,让人想呕吐。囚徒的太阳穴上顶着手枪,一群士兵在旁边哈哈大笑。对于囚徒们来说,单是直面那个场景,也是一种英雄壮举,他们要面对死亡,面对惨白的皮肤,经受几个小时拷打,一张桌子,几把椅子,还有那砖墙,一盏白灯,只能继续喊叫,打得越狠,叫得越惨。

可是行刑者也害怕,他们也会被打败,也会被抓住。他们笑着吃早饭。那天下午瓜约·马丁内斯这样对我说过。那是恐慌的大笑,士兵们笑着吃早餐,因为他们知道这可能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了。一次伏击,一颗手榴弹,一次突袭,巡逻中不知什么地方打来一枪。任何一秒钟都可能出现爆炸,血流成河,尸骨横飞,如果运气好,能有面秘鲁国旗盖在棺材上,也就行了。一个人就成了统计材料上新增加的数字。谁也不会想起你来。不过一个人如果习惯恐惧了,瓜约说,恐惧就成了一个又黑又硬的东西,几乎有了自己的形状,就像胃,就像心脏,恐惧就是个物体,就是个带毛发的东西,就在身体中间,并向四外扩散,有点结实,又长又



宽。恐惧会让你变成这样，只有杀了他们，才能驱散一会儿恐惧，让恐惧过去。你还能怎么样呢？

我对那个地方最后看了一眼，敲了敲水泥栏杆。然后我决定沿着万塔的街道走一走。

想到这个城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情况，真是不可思议。例如你看到的人。此时迎面向我走来的万塔人，这位头戴圆顶帽的先生，这位头发梳理有致的夫人…… 他们能够从那场战争中活下来，在我看来甚至有点奇怪。他们沿着大街踱步。他们也许去一个朋友或一门亲戚的家。他们曾看到有人在他们周围死去。而现在他们还在行走。

我走进一个咖啡厅，里面的椅子是塑料的。我要了瓶啤酒。人行道上有的人回过头来看我。缓慢朦胧的影子几乎在睥睨我，注视着黑色礼帽下面的这张脸。他们看我像个人类物体，一个偶然到了那里的可指认的物体。我也不能理解他们，从来不会打听他们的任何事情。我也不能理解士兵们，理解我的父亲，理解瓜约和查乔。当然他们不会逃跑，所有士兵都不会逃跑，而注定继续留在那里。

转了一圈后，我又同那个摩的司机回到了附近的小镇卢里科查。我碰到一个小店，木头门框，龟裂的石灰墙，里面桌子上的塑料袋里放着面包、汽水瓶、鳄梨和零散的路枯马果①。

一个扎辫子的女孩望着我。我问了她。“我不认识什

① 秘鲁的一种水果。

么米丽娅姆，先生，我不知道她是谁。”

我要跟她母亲说话。她回来时带来一个戴帽子的女人。

“我不知道有人叫这个名的，先生。米丽娅姆？我不认识。”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住在这里的，夫人？”

“我们来了也就一年。”

我想在镇上转一下。我去了卢里科查教堂，摩的司机告诉我，它以前叫圣安东尼奥·帕图亚教堂。教堂入口有个长长的院子，里面有石凳。我问一个小伙子，附近有没有神父，就这时，我看到一个神父出现了。

神父叫马科，长方形脸，大眼睛，粗硬的头发。他对我说他来自于库斯科。“我不知道什么米丽娅姆。可我答应你，去几个老教民那儿问问。中午我跟他们要开个会。你找她为了什么呢？她是这儿的人吗？”

“是的，她是这儿的人，”我想。“也许中午你能告诉我点儿什么。”

我又乘另外一辆摩的，在万塔一带转了一圈。

我们在武器广场停下来。棕榈树、带玻璃灯罩的路灯、木街凳，还有几朵红花。广场涂成了绿色，以纪念万塔被命名为安第斯祖母绿城市。我走进“海狼”柠檬海味馆，看到里面一扇门旁有棵向日葵。一个耶稣像，一条双色带从肩上穿过。还有个电视机。

我靠在椅子上，看到了市政大厅和一个迪斯科舞厅。海味馆的伙计告诉我，战争期间，军人们就带着万塔的姑娘



去那儿。那儿还有个唯一的电影院。几级台阶从人行道延伸到广场中心。一棵粗树投射出松散的树荫,就像是在水泥地上泼洒了一片污渍。对面有个黄色门面的砖顶药店,两座钟楼间有个带圣母像的教堂,圣母白蓝色的身体仰向天空,神圣心脏教堂是座高大的石头建筑,一个侍从告诉我,它属于救世主会神父教团。我观看着教堂正面,啤酒的泡沫在杯子里翻腾…… 一座被白铁栏杆罩住的砖石楼宇,门上方有个十字架…… 我又拍了几张照片。我不知所以然地被这个地方吸引住了,仿佛以前来过这个地方。

在卢里科查,我从何塞·费利克斯·伊瓜因学校的宣传广告栏前走过时,又遇到了马科神父。

在他身旁,有两位老人,是一男一女,都披着黑布,戴着帽子。他们不讲西班牙语。我请他问问他们是否认识米丽娅姆。一听到这个名字,老妪的眼睛发出了亮光。她开始讲克丘亚语。

"是的,还能记起她,"神父告诉我。

"有一天来了几个士兵,带走了她,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了,"他们说。他们问您是否知道点她的消息。她以前在卢里科查、万塔或瓦曼卡是否有什么亲戚?

老汉摇了摇头。她的父亲母亲都死了,听说因为他们不愿意把店里的食品给光辉道路分子,说光辉道路分子还带走了她的兄弟,强迫他跟他们打斗。后来光辉道路分子还袭击了这儿的警察哨所,又杀死了她的另外一个兄弟。他们再也没有这两个人的任何消息了,不知道有关米丽娅

姆的任何事情。房子一直关着。看上去像个鬼屋。他们也不知道有关米丽娅姆家的任何情况。

我与马科神父一起走到摩的司机等我的那条路上。

马科神父像个退役武士,手超常的大,瘦小的身子被教士服和一个大号的铁十字架拉得挺长。

“怎样才能抚慰这些人呢,神父?”

“他们不希望抚慰,先生。可是他们想倾诉,愿意把他们的事情讲给我,他们不再希望别的了,为此我要听他们说。我听,他们说,我继续听他们说,等他们走了,就剩下我一个人,我就尽力地哭,先生。我走进我的房间,躲在床上,我祈祷一会儿,然后就开始哭,我又侧过身来,仅仅是哭泣,我不做其他任何事情,我突然就哭起来,最好这样,然后我觉得好些了,我告诉他们要多祈祷,别忘了祈祷,特别是别忘了为他们的亡人祈祷,不过要愉快地想起他们的亡人,我这样对他们说,而他们就是这样想起那些亡人的,我也是这样。这样我们才能继续活着,可总是得哭,就是这样。”

十四

在万塔广场，我看到了安塞尔莫和他的雪佛兰。

返回瓦曼卡的路上，我几次让他把车停下来。我拍了一张又一张的照片。勾勒在黄昏山峦中的大树，蜿蜒在山坡上的公路。在我的右侧，是广袤的密林和岩石。

“能不能从万塔徒步旅行到瓦曼卡?”我问安塞尔莫。

“得爬上去。不过已经有人这样做了，还有人正在做。”他回答我。

“要是晚上，而且是寒冷的冬天，也行吗?”

“什么都行，先生。一切都可能。”

安塞尔莫把我送到了瓦曼卡的兵器广场。天已经黑了。

我在广场旁边的一条街道上走着，来到了一个带有玻璃和栅栏的地方。牌子上写着烤鸡加炸土豆。我走进去，坐在一张铺着红白方格桌布的桌子前。大厅宽敞，有个收音机音箱和酒柜。铁窗朝向一个若明若暗的花园。一个瘦削的小伙子，留着小胡子，眼睛蜡黄，正在柜台后面慢吞吞地刷着一个杯子。

那里唯一的菜就是沙拉、鸡肉加炸土豆。情景就像是一张以前的明信片。鲁文、父亲和我曾经在米拉弗洛雷斯的兰乔餐厅吃过几次鸡肉和炸土豆。我向伙计要瓶啤酒，他迅速离开，就像逃跑似的。我嘴上叼一支烟，这在高原的第一天里，好像是个错误。

只是在这时候，我才感到有个妇女坐在我身边的桌子旁。

我觉得从装束上看，她应该是利马人，或者至少是个大城市的女人：白衬衫，镀银项链，黑色的裤子，珍珠耳坠，几个手指上戴着戒指。她切着鸡肉，穿插喝几口啤酒，仔细地吞咽着。她不时地向我张望。

我想和她坐在一起。我想我可以采用传统战略，走过去，对她说些挑逗的话，例如“我们是不是原来就认识？”或者其他类似的话语。不过这些话都早了点儿。

我站在她身旁，只是简单地提议坐在她旁边（最糟糕的就是她拒绝了我）。

她没有回答，不过我坐下来以后，感觉到她已经恼火了。

“咱们聊聊吧。”

她告诉我她是阿亚库乔人,但是并不住在那儿。她已经在那儿呆了几天,第二天早晨走。

她嗓音深沉,每句话都像是一块沉重而又清洁的大砖头,在她周围建起了一道围墙。她的眼睛让我惊奇,又黑又大,看东西时总是像从远处张望。她的嘴扭曲而难看。

我对她说我刚刚到,只身在这个城市。她大概这才觉得我值得可怜。

“你从利马来?”

“是的。”

“出差?”

“不。我来找个姑娘。”

“找谁?”

“这儿的一个姑娘。”

“她是谁?”

“我父亲在这儿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姑娘。说来话长。你叫什么名字?”

她打开皮包,拿出记事簿,好像是要证明什么。她茫然地说飞机第二天早晨起飞。

有人开大了收音机的音量。是萨克斯、小提琴和吉他的声音。一群教民低声笑着。

她收起了记事簿。

“你叫什么?”我追问。

“吉奥马尔,”她说,“我叫吉奥马尔。”

她在皮包里翻找着什么。

“吉奥马尔?”

"这是个阿拉伯名字。我爸爸是文学教授。他读了安东尼奥·马查多的诗,他喜欢他的诗,这是关于一个叫吉奥马尔的女人的名字,于是他就给我取了这个名字。"

她的声音单调。可能在其他地方她不得不多次做同样的解释。

伙计把啤酒拿来了。

"你在这里有家吗?"

"没有。已经没有了。"

"那你来干什么?"

"来看看我的父母,他们在墓地里。也来看看那些剪刀舞的演员们。"

我把啤酒慢慢地倒进杯子。收音机里是一首瓦依纽[1],一个声音在重复着"亲爱的妈妈"。

"你喜欢剪刀舞表演?"

她用手指敲着桌子。

"不是我喜欢,"她说,"这是我的生命。"

"你的生命?"

"是的。"

她抽出一支烟,点着了,好像是要把我晾在一边。她不看我。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一家人进来了,从我们身边经过,坐在不远的一个桌子旁。两个孩子带着甜蜜又是恶作剧般的微笑,要了汽水。

我向后靠在椅背上。

---

① 一种当地民歌。



“你就这么喜欢剪刀舞?”

她没有回答我。

我曾经带我的外国朋友在几个俱乐部看过剪刀舞:有几个人穿着五颜六色的服装,旁边有把小提琴,随着平和的旋律没完没了地跳舞。

“你在这儿看到的剪刀舞跟在利马俱乐部看到的不一样,”她对我说,好像猜到了我在想什么,“在这儿跳舞有个理由。”

“什么理由?”

我感到坦然了,看着她,等她回答。

“因为舞蹈是面对痛苦的方式。”

“这跟痛苦有什么关系?”

“所有舞蹈都是对痛苦的一种挑战,舞蹈演员们不知疲倦地跳舞,把针穿在嘴唇上。这就打败了痛苦。”

“可为什么要做这些?”

“痛苦是对生活的一种馈赠。舞蹈家们跳舞是在抵御死亡。”

“我不明白。”

“舞蹈是对死亡的一种排遣。他们早已认识到了死亡。如果他们不在现实中反抗死亡,他们就在音乐中反抗,在宗教故事剧中反抗,在舞蹈中反抗。所以这里总会出现许多伟大的艺术家。”

她以一种狡诈的缓慢速度说着话,声调仅仅高于自言自语。她向后看着,是在对自己说话,几乎一点儿都不理会我。

“事情总是这样。所有的艺术都这样说，”我说道，“死亡一直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它能赋予自己重要性。不是这样吗？”

她笑了。她的牙齿又大又白。

“告诉我，你是不是走过通向阿亚库乔的路？你在晚上去过南边的高原吗？”

“没有。为什么？”

收音机停止了。水和菜盘的声音从厨房传来。

“因为你到了那儿，寒冷交织着风会通过毛孔进入你的身体，停止你的血液流动。如果你站在那儿，就会冻僵你的心脏。你要是死了，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你的尸体在哪儿，因为风会把你的尸体带到山的高处，你就永远呆在那儿了。”

“可我真的不明白你的意思。”

“这儿的人与别处的人不同，”她徐徐说道，“这儿的人不认为活着是正常的。他们一直惊恐地观望生活。一个朋友一次这样对我说，‘死亡是很优秀的教师。’”

小伙子不再洗盘子了。附近桌子的两个儿童同时说着话。

“在利马，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些。”我说道，觉得这是最恰当的话了。

“像你这样的利马人觉得这儿的工艺品很漂亮。然后你们就忘记了一切，继续开你们的车，继续你们的旅行。你看见那儿的那个小伙子了吗，那个刷盘子的？”

小伙子绷着脸。双手迅速地在洗手池里忙活着，可身体的其他部位却一动不动。

“他怎么了?”

“他离你也就几米远,不过地球与太阳之间的距离要小于你与他之间现在的距离。”

我做了个鬼脸,开始微笑了。

“你看,我猜测,你想让我感到有罪。可我没理由觉得自己不好。我一点儿也不了解他,我并没错。我有错吗?”

我在桌子下伸了伸腿。在那儿听一个完完全全陌生的女人给我上课,真是有点悲哀。可让我感到奇怪的是,这并没有给我带来不快的感觉,我甚至觉得我那个时刻挺欣悦。

“你肯定想过什么是谦恭,就是作为本分,作为穷人的义务,为了活着必须卑微,你能不能开始想象一下这点?”

她第一次提高了嗓音。她黑色的眼睛盯着我。

“有时候想过。”

“可你能真的了解这意味着什么吗?你感觉到受压抑,没有人理会你,大家都像对待狗一样对待你,而你又需要在主人面前卑躬有礼,以便不死吗?”

“所有人都得做到这点,在这儿在那儿,在所有地方。”

“可是沉默的人们比那些能够发牢骚的人的处境要差得多,你该知道。能发牢骚,那家伙,真是奢侈。而沉默相反…… 我也不知道…… 就像个山洞。”

我望着她。她的脸上没有任何情绪的迹象。她的漠然几乎可以说是丑陋的。

“是的,我想应该是这样。”最后还是我说了话。

突然她微笑了。这个时候她显得格外漂亮。她脖子上的血管都绷紧了,可她明亮的眼睛又盯着远处,就像幽灵夜

间发现了尸体。

“你不像是个坏人。”她盯着我说。

“非常感谢。”我笑了一下。

“我马上就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你如果愿意，就陪我去。”

“到另外一个地方？”

现在我又看见了她。我想某一天，在某个地方，吉奥马尔可能会读到这本书。我得说，她的声音可能在任何一个最意想不到的时间响起，当我在工作会议上不知所措的时候，或者在我空旷的卧室里。

“你会来吗？”

“你怎么会认为我对你感兴趣？”

“我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对我感兴趣。”她说着吐出一口烟。“你要是愿意就来吧。”

她把一团烟灰弹在盘子里。

伙计拿来账单。我举起杯子，好像要挡住我的脸。

我拿出钱包。她一动不动。她知道我会付钱的。

我们沿着一堵长长的石灰墙走着，墙体笼罩在山影里。几乎听不到脚步声。斑驳的月亮在上面照耀着。

吉奥马尔在一座木门前停下脚步。门板厚实，上面还有片片苔藓。她敲了一下门。门开了。一个年轻的男人把我们让进一个园子，园子里有草地和石子。这是座砖坯房，房顶是锌板的。我们走进一个小院子，走入一条走廊和一个圆形花园。后院的暗影好像拓展了空间。我们处在石头



墙内，对面是圆形的草坪和土地。

坐在我们身边的有男有女，有的戴圆顶帽，穿西服上衣，黑色裤子，还有的穿系带皮凉鞋。吉奥马尔递给我一把古柯叶。我感觉到牙齿间一股强烈的味道。

我意识到我们已经听了会儿音乐了。

舞蹈者戴着圆帽，穿着白边衣服，小眼镜，舞蹈鞋。他跳舞时，身体的一侧还带着金属片，小提琴手急速地拉着弓子。手和脚的动作，这些我以前都是远距离看到的东西，今天就出现在我眼前，好像是第一次发现它。剧烈的舞蹈使空气为之退让，就像是一种沉默积蓄之前的发泄。舞蹈者似乎脚不沾地。他什么也不扶，脚戳着地，仿佛坚信他是往日的使者，受托延续一个已经延续几个世纪的动作，而且在他之后还会有人继承和延续下去。

我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在某个时刻，吉奥马尔和我站起来，很快，我们又到了街上，一起走着，没有交谈。

在路上，我拉起了她的手。

我们来到了兵器广场上。

我们坐在一个凳子上，身处由环山形成的巨大空气井里。广场上空空如也。天空中的点点繁星给石头地面罩上了一层苍白的颜色。

"跳舞的人叫塞瓦斯蒂安。我觉得他认出了我。"

"他是什么人？"

"朋友。我现在不能看到他。"

"为什么？"

"由于我家的事情。"

“他一直跳舞?”

“就像他父亲和祖父一样。”

“你总来看他?”

“从我还是姑娘时开始。我在他和其他人身边长大。每到耶稣受难日,他们就开始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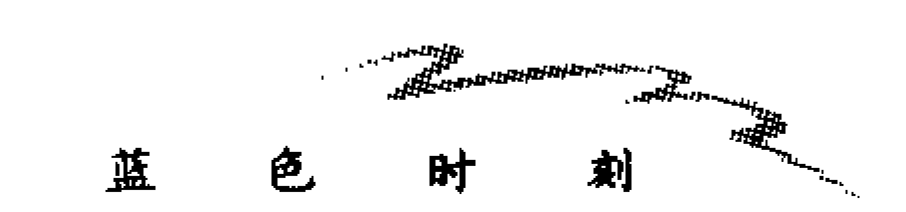
“每到耶稣受难日?”

“是这样。当其他人的上帝不在时,善良妖魔就可以露头,祈求大地的恩惠。”

我看见一条银线消失在大教堂的正面墙上。一个影子走向另一侧。有个人慢慢走着,向我们转过身来,接着又继续走他的路。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一个舞蹈家跳舞的时候,他就不再是他原来的人了,”她喃喃着,“并且抛弃了他的名字,他的记忆,他的希望。舞蹈家就是舞蹈。服装就是他的身体,音乐就是他的身体,空气就是他的身体。他已经不是一个跳舞的人。大自然在他身上呼吸。由于这个舞蹈家,树的生命,山的生命,小溪的生命都延续了下来,并归属于我们。所以,当世界终结时,我们的责任就是让它重新产生。舞蹈创造了它,音乐创造了它。身体就是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如果各种神祇都失掉了他们的身体,那就得把我们的身体送给他。剪刀舞的舞蹈家们是最先重造世界的人。所以他们还在跳,所以总有他们之中的某个人在舞蹈中维持着他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服装移动的时候,世界也在移动。舞蹈家是上帝,舞蹈是上帝,我们也是上帝。”



她停止了说话。一团云雾款款前行。这是个间歇性的大规模进军，就像是一群怪物的迁徙。

我们附近的几张报纸被拖动着，消失在墙角里，接着就形成一股狂怒的旋涡，随即又散开了。

吉奥马尔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僵化了的遗憾。她昂着额头望着我，身体直立在凳子上。

“你是谁?”我问她。“你为什么在这里?”

我靠近了她，把她紧拥在我的肩膀前。她几乎没有动。我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温存，黑暗中的双手，臂膀之间冷漠之星的爆发。猛然间她站了起来，离开了我。我看着她消失在大教堂边。她失踪了。

那天晚上我走了几个小时。我也不知道走过了多少条街。

第二天，我在地板上发现了一个矩形太阳。我淋浴了一下，穿好衣服，在院子里喝了杯浓咖啡。我给机场打了电话，他们说五分钟前刚有一架飞机起飞。我想起来了。我乘坐的飞机明天一早就起飞，她在餐厅翻看记事簿时说过。

我又在大学的内院里喝了第二杯咖啡，大学就在教堂旁边。在巨大的石地砖上，我仿佛看到了吉奥马尔，她晶莹的眼睛，还有她茁壮的黑头发，白色衬衫，修长的胳膊和结实的双腿。我站了起来。

我去了商场，买了把五弦琴、一支笛子和其他乐器。我也不十分清楚买它们干什么用。

十一点，我再次启程去万塔和卢里科查，这回是个叫萨

图尼诺·桑迪亚的司机陪我。他说他是老万塔人。我向他打听曾经在卢里科查居住过的米丽娅姆。“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他对我说。

车经过小地狱时,我一直凝视着这个地方。

在卢里科查教堂,我又见到了马科神父。他正在和两个女人说话,大概是一对母女。看见我过来,她们就告辞了。

“我有好消息了,”他对我说,“刚刚来到这儿的两个老邻居,卡西米罗和特奥多拉·西利普。他们可能知道那个姑娘。他们就住在这儿,转过去就是。”

我来到了那个家。开门的先生向下看着,头上戴着褶皱的帽子。

“米丽娅姆? 我认识她,当然认识。”

“你认识她?”

“是的,在她小的时候我就认识她。”

“那你知道她是怎么回事吗,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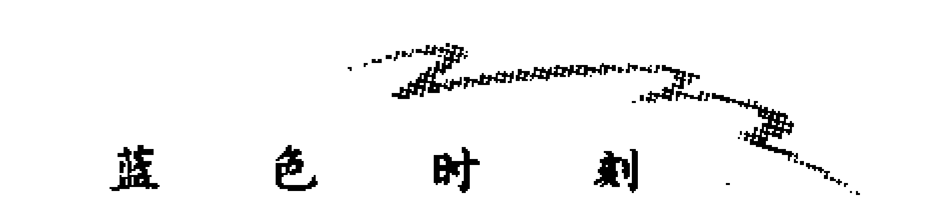
“来了几个士兵,带走了她,先生,就是这样,我们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再也没有听说她的任何事情,再没听说过。肯定他们已经把她杀了。”

“没杀。他们没有杀米丽娅姆。”有个声音从房子里面传出来。

男人转过身去。

“是特奥多拉夫人在说话吧?”神父问。

一个穿裙子戴帽子的女人出现了。她说话的声音有气无力。



她长长地粗声喘着气,好像刚才差点儿摔跪下,可她仿佛被一根绳子牵着,撑住了。

“米丽娅姆给我的小卡门写信。我在卡门的东西里找到了米丽娅姆的一封信。米丽娅姆给她写了信,先生。”

“一封信?”

“是的。”

“我能看看吗?”

女人回来时拿了个信封,上面有个地址,是利马的佩德罗·本图罗大街。我记了下来。

“我能看看信吗?”

“不行,这可不行,先生。”

“好吧。”

“这是给卡门的信,先生。”

“信是什么时候寄来的?”

“有段时间了,是卡门还活着的时候寄来的。”

“小店里就没有她其他的家人了?”

“没人了,全死了,先生。”

我告别他们。马科神父和我又返回,走向教堂。

“西利普先生的儿子也被杀了。”刚到门口,神父就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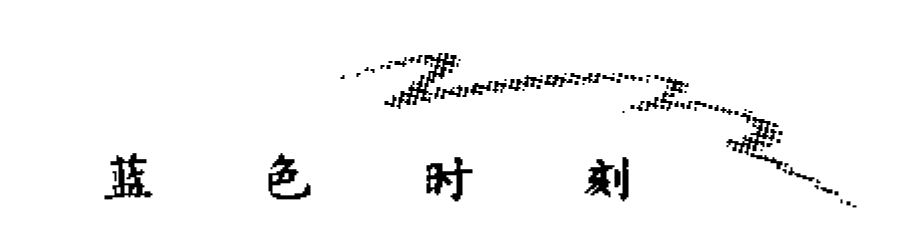
“就是我们刚刚见到的那位先生的儿子?”

“是的。”

“谁杀的?”

“光辉道路分子。他们往他身上浇上汽油,把他绑在山上高处的一块石头上,让他在太阳下慢慢焚化。就这样杀死了他,他就这样死了。西利普先生也知道。他知道他儿

子是这样死的。他没有一天不来祈祷，不来同我交谈的。每天都来。我也不停地跟他说话。另外一个姑娘，杰奥尔吉娜，她以前来过这儿，杰奥尔吉娜·甘博亚，我们见过她带着她的女儿从这儿经过。七个士兵强奸了她，就生了你看见的那个女孩。女孩刚刚知道这些，知道她的爸爸就是七个人中的一个。她是刚刚知道的。她就在那儿。那个女孩又能怎样呢？她只能继续活下去，她就是这样对我说的。继续活着。还有其他这样的人。我还认识一位夫人，她叫保拉·索卡，他们杀了她的七个孩子和她的丈夫。她有时候到这边来，有时候去阿亚库乔。索卡夫人向我介绍了那个小伙子，金塔·奇帕纳，他在那儿，你看见了吗？那个正走路的？他原来住在比尔卡舒阿曼。有个叫圣米格尔·德雷梅的村镇，光辉道路分子进去了，他们得知有位年长的先生，一位叫路易斯·萨拉特的先生。由于萨拉特先生曾给过陆军几个士兵吃的东西，光辉道路分子就去了他家，砍了他的头，还把他的尸体挂到了圣米格尔·德雷梅广场的树上，他们把萨拉特先生吊在那儿。他们把他放在那儿，并警告居民，谁也不许收尸埋葬。可是那位叫奇帕纳的小伙子见到萨拉特先生被吊在那儿，他看着难过，于是有一天早晨，他和一群朋友一起，把萨拉特先生的尸体放了下来，安葬了。他们把他安葬了。你明白我说的了吗？他们埋葬了萨拉特先生，因为他们希望萨拉特先生能够安息，看着他被吊在那儿，他们难受，于是奇帕纳和一群小伙子冒着生命危险，没有听从光辉道路分子，把可怜的萨拉特先生放了下来，让他安息。安葬完以后，由于害怕，他们逃跑了，藏在几个山洞



里。可是萨拉特先生终于可以入土为安了，而不是像块破布似的被吊在那儿。多亏奇帕纳，他才能安息。在那儿，你能看到他正走着。"

我们又谈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提议去喝杯烧酒，"喝点加糖的烧甘蔗酒，"他对我说。我们去了他的房间，我在那儿一直呆到我们该告别的时刻。

那天晚上，在旅馆里，我开始写作。这本书就是在那儿诞生的。我仍然记得桌上小灯的灯罩如何摇曳，还有笔尖的刷刷声。

睡觉之前，我出去在城里转了一圈。月亮反衬着黑暗，营造了一片朦胧之光。在那片光里，世界仿佛倒置，而我则到了另一侧，进入了一张巨型照片的底版之中。我离开市中心，沿着几条石街走着。

回到家，我就给正在玛格丽塔岛旅馆的克劳迪娅打电话。听筒里，她的声音显得欢乐之极。我告诉她，我在阿亚库乔。

"这你在你的办公室里跟我说过，听见了吗？可你到底怎么回事？"

"等你回来我就告诉你。"

克劳迪娅告诉我，岳父岳母对能在岛上多呆几天高兴极了。可我们几个人星期一无论如何都得回去。

"我去机场接你们，那当然。"

那天晚上，我一夜未醒。第二天早晨，我坐在兵器广场

的多诺弗里奥咖啡馆里看报纸。

我感到极度忧郁。想起吉奥马尔,我觉得就像个幻觉。我从未想过除了那个晚上,我还能见到她。然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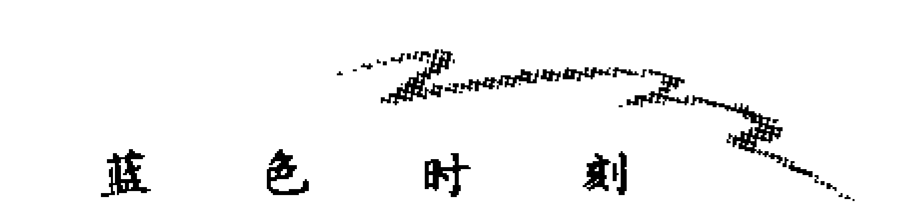
关于米丽娅姆,除了那个佩德罗·本图罗大街的地址,我并没有弄清更多的东西。她还在那儿吗?

我在车站买了返回利马的车票。我决定乘大巴车回去。旅程要持续整个晚上。当天剩余的时间里,我在城里踱步。我买了一本书,从中得到了一些资料。阿亚库乔的首府瓦曼加曾经是个大城市。它拥有三十三个教堂及其祭坛和宗教绘画。在殖民时期,它是从库斯克到利马的必经之地。圣多明戈教堂是世界上最瑰丽的教堂之一。十七世纪初,瓦曼加的建筑享有王国最佳建筑的美名。一个印第安传说讲述道,在瓦曼加,印加人比拉科查托着一只游隼喂它(这就是它的名字的来源)。还有其他资料。

到了车站。一种类似走廊的东西被当做候车室。我坐在塑料椅上,等待着上车时间的到来。有个人向我问好,说认识我。“我们曾一起在大学读书,他坚持这样对我说,我同你一起升级,我来阿亚库乔是为了胭脂虫红,我们正在这儿观察几种胭脂虫红植物,是这样。”

终于单独坐在座位上了,我在窗户上寻找某种可见物的踪迹。汽车发动了,所有的东西都在我周围颤动起来。

汽车沿着通向高原的长长弯道缓慢行驶着。我头上方的电视机突然预告一个动作影片,我想我得吃片药了。在几个小时里,在通往利马的漫漫路途中,我们要经过几千米



高的高原，那里有湖泊和石头。

我蜷在座位里，进入了天空如洗的玄青之中，觉得这次旅行中出现的几个形象对我是个祝福，将会伴我终生：马科神父、西利普夫妇、安塞尔莫、萨图尼诺·桑迪亚和吉奥马尔的面孔，以及救世主会教徒的教堂、万塔的兵器广场和军营的窗户。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有些类似于新天堂的东西。

空气逐渐稀薄起来。我向后仰着头，试图不理会窗外的黑影，睡一觉。汽车绕过一个山丘后，我猛然睁开了眼睛，看到了圆形的月亮，那上面寒光闪射，密布着冷酷的污痕。那天夜里，它将一直追随着我。

十五

我们到达时，沿岸一片雾霭。我在哈维尔·普拉多大街乘上出租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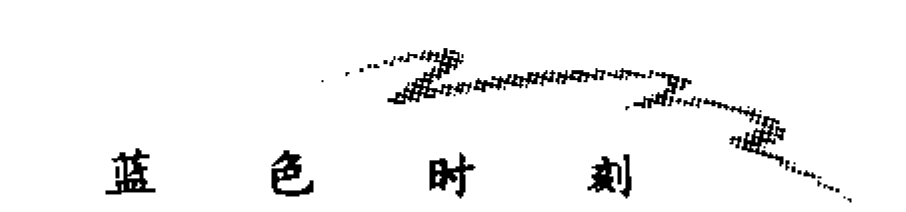
到了家里，我觉得客厅里的家具摆得更紧凑了。胡斯蒂娜常常在吸尘后做点变动。

我淋浴了一下，用完咖啡和烤面包片，就发动了汽车。

我向西利普夫人告诉我的佩德罗·本图罗大街方向驶去。

我按了门铃。一个穿天蓝色套装的女孩出来，告诉我夫人要到下午才回来。

我打电话，给珍妮和几个助手布置了几件事。办公室里，我又回答了有关我旅行的问题。“旅行怎么样，很好，都挺好。”



午餐时间,我在安加莫斯中餐馆遇到了普拉顿。我们的朋友莉莉亚娜·孔接待了我们。我们要了菊花鱼,白米饭和烧卖。

"旅行怎么样?找到米丽娅姆了吗?"

"我找的一些人想起了她。至少我现在有了个地址。"

"在哪儿?"

"在苏尔科。我马上就去。"

"可我觉得你状态不好。"他说。

"我自己觉得挺好。"

"好吧,咱们就要瓶啤酒。不,最好要瓶酸皮斯科酒。我看你状态很不好。"

"为什么不好?"

"不好,很不好,你应该在镜子里照一下自己。"

下午,我又来到了佩德罗·本图罗大街。

这是座只有窗户和铁栅的临街房,带个石头门廊。一长串攀缘花紧贴在墙上。

我按了门铃。有个声音问了声谁。我在对讲机里说了我的名字。一个女人开了门。

她高个儿,长颌骨,额头上留着一绺环形发。腰上系着实心卡子的皮带。她正审视着我。

"您好。先生?"她问。

"请原谅,福克斯夫人,我们并不认识,是别人给了我您的名字。我来找个叫米丽娅姆的姑娘。"

"可为什么?您是谁?"

“我是阿德里安·奥马切，是律师。”

“啊，对，我觉得我在什么地方见过您。”

“我们见过吗？”

“我曾见过您和您的弟妹卡明查在一起，不是吗？您对我说要找谁？”

“找米丽娅姆，她在这儿住过，我觉得。”

“米丽娅姆？”

“啊，是的，米丽娅姆，当然。”

“你怎么样，我是帕洛马·福克斯。您愿意进来吗？请进。”

我随着她，走过一座玫瑰园里的小路。

客厅里的家具全是白色的，一大块地毯和一坛黑色的花。到处布满了茶几，还有成群的玻璃小动物、烟灰缸、小灯盏。

“米丽娅姆在这儿干过一年多，”她看着旁边说道。

她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扁脚趾压在凉鞋上。大大的脚趾在地毯上伸开缩回，就像是一群躁动的儿童。帕洛马·福克斯在空中晃动着她的另一只脚，向上向下持续又略带恶意地晃动着。她穿着漂亮的长裙，颜色纷繁。一边说话一边掏着手指甲。

“我对你说什么呢？她是个聪明可爱的姑娘，有时候我们聊聊天，跟我说说她的事。”

“她跟你说过她在阿亚库乔呆过吗？”

“在万塔，是的，跟我说过。可没跟我说过任何有关战争的事，没跟我说过一点儿。”

“她是怎么来的?”

“我一个女友的雇员介绍来的,对我说是她表妹,我见了她,觉得她是个特别的人,她目光善良,你知道。讨厌的是她来时还带个孩子,好在孩子从来没惹过麻烦,总是不言不语,小孩是个沉默的小天使。米格尔。他叫米格尔,我想起来了。”

我打断了她的话。

“米格尔?她有个小孩儿?”我问。

“是的,一个小家伙。特别不爱说话,可特别好。”

“就是说,这是真的,”我问。

“什么?”

“不,没什么。我能抽烟吗?”

“不行,这儿不能抽烟,很抱歉。”

“好,请原谅,请接着讲。”

“好吧,就像我刚才说的,她在这儿时间呆长了,就几乎成了我的朋友。问题是后来我发现有时候她有点怪异,有时候晚上我听见门响,是关门的声音,我几个女儿也听见了,有几次把她们吓坏了,后来,好吧,后来我发现她有时候晚上出去,上街去,就是说,我有时听见街门响,知道是她,慢慢我也习惯听她出去的声音了,可一会儿她就回来了。第二天早晨,早餐也准备好了,厨房也收拾好了,都正常,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我并没说过她,只问她是否出去过,米丽娅姆说是,不过是去走走,就什么也不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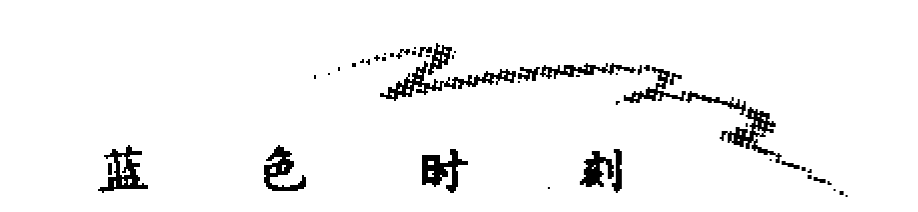
“不过有一次有点奇怪。一天晚上,我等她回来,在客厅里碰到了她。‘米丽娅姆,你怎么回事,’我问她,‘这个时

候你去哪儿了,''哪儿也没去,夫人,只是出去走走,因为我睡不着,'她总是这样对我说,可我看见她正出着汗,出了许多汗。我估计,是因为她走了很长时间,'可为什么不早晨走呢,'我常问她。可她不回答我。我觉得她是跑过,是跑,不是走。

"米丽娅姆就是这样,我能说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她这种表现有点儿少见。不过除了这个,一切都挺好,她打扫房间,做饭挺好,收拾桌子,有时候甚至跟我女儿们或我一起去电影院,差不多就像我的姊妹,她说过想当美发师,给她的美发店挂上"安第斯山祖母绿"的牌子,她常这样对我说。安第斯山祖母绿。她喜欢这个音。这是她故乡万塔的名字。我鼓励她,给了她几本书读,她读了几本小说,特别喜欢,她对我说。可后来我也不知怎么回事,一天早晨,她带着她的孩子出去了,她把她的床铺好了,房间都收拾好了,带着孩子出去了,把钥匙留在餐厅的桌子上,留了个条子说,谢谢,夫人!就完了,我们再也、再也不知道她的消息了。失去了她有点儿可悲,真的,她也有点忘恩负义,是不是?我也不知道她怎么样了。在某种程度上,最好她还是走,因为她挺漂亮,这儿所有的小伙子,邻居的男孩儿们,老追着她,跟她说这说那。这可不好,可她并不理他们,幸好。

"就这样,她有一天走了,就完了。

"是的,米丽娅姆走了,我再也不知道她的事了。有件事特别奇怪。她走的时候,我觉得特别不舒服,我女友的那个雇员我也找不到了,她就像个忘恩负义的人,就这么走了。不过我也不知道她是不是忘恩负义,她是怎么想的,她



原来是怎么想的，她后来会怎么样呢，我有几天感觉不好，后来就过去了，我可能说得太多了。我就是这样。她做什么坏事了？要不你为什么找她？"

"不，她没做任何坏事，"我对她说。"是为了一件事，我想帮助她。告诉我，你知道她姓什么吗？她姓什么？"

"米丽娅姆·安科，她是这个姓，她有时候把她的名字写在彩票上，想中奖。"

"米丽娅姆·安科。可能吗？我以前为什么没有想到呢？"

我赶紧向福克斯夫人致谢。

我看了看手表，是去机场的时候了。

海滨大道上的交通在我周围形成了一堵墙。有几次，我孤身一人，被四面包围在小型和大型公共汽车之中。终于可以向前走了，我看见了机场指挥塔。差不多已是飞机抵达的时间。我穿过玻璃门时，家人已经隔着海关向我招手了。

克劳迪娅和两个女儿带着微笑走过来。她们同时跟我谈论旅行的事情。

我听克劳迪娅说，旅行棒极了。

那天晚上，我照顾露西亚躺下，同她一起做祷告，"咱们什么时候出去旅行？"然后我又进了阿莉西亚的房间，同她交谈。"咱们得看到，你马上就要进大学预科学院了。是的，我已经开始看到这点了，不过我如果能在高中取得好成绩，就可以直接进入大学了。"

我去了卧室。一切又都按部就班。我同妻子上了床。两个女儿睡在她们的房间里。一切都好。

第二天早晨,我去了安科先生的办公室。我敲了几次门。

我问卖果汁的小贩。"我没见着他,"小贩对我说。

在事务所里,爱德华多一见到我,就谈起了有关前一天在戈麦斯·桑切斯家里聚会的新闻。"你干吗不去,听见了吗?"

"是因为我家人旅行刚回来。"

我让珍妮寻找所有有关比托里诺·安科的资料。姑娘叫米丽娅姆·安科。可能是她的叔叔、兄弟还是父亲?

中午我回到了家,从钱包里拿出了米丽娅姆的照片,把它放到了办公室的抽屉里。

下午,我回到了在解放者大道上的办公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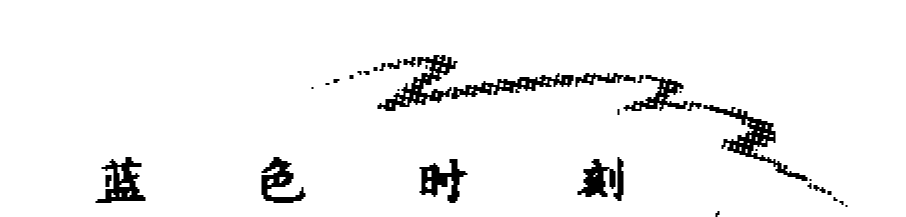
安科先生蒸发了。

第二天,我下楼走向早餐桌时,胡斯蒂娜刚刚准备好咖啡。克劳迪娅正在淋浴。

胡斯蒂娜和我站在餐桌前,她手里拿着咖啡壶,看着我,"给您倒上吗,先生?"

"是的,谢谢。"

她和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可逾越的障碍。胡斯蒂娜和我,我和胡斯蒂娜,我们两个人说不成一句话。先生和女用人(是这样称呼她们的?)。这几乎是荒谬的。两只出



于礼貌而眯小的眼睛,由于害怕而保持的日常距离,垂落的头发,瘦如棍子的胳膊。

这是我家的神秘点之一。一个日常的神秘。一个高大的白人与一个矮小的黑皮肤女人几年间共享一个空间。胡斯蒂娜。几年来,两个人天天相见,可在这全部时间里,并没有说过五六句以上不同的话。这些话就是家里行动的通行证,是对各自身份的再确认。都是些礼节性的话,是语言的外壳:早晨好,你告诉夫人,我晚点过来。今天能早点准备午餐吗?午餐很好,谢谢。胡斯蒂娜。好吧,先生。我们本来可以更自然、超脱地默然相处,而沉默是由熟知的话语造成的。我对她仅仅知道:她是卡哈马卡镇的,做饭很好,喜欢我的两个女儿。这些也就足够了。当然如此。

那天晚上,在我女儿的学校里,要举行祖国节的特别活动。要表演音乐、舞蹈和朗诵节目。克劳迪娅已经告诉我,阿莉西亚将担任活动的典仪官。

七点半,克劳迪娅和我已经坐到了学校的观众席上,并且不时向其他家长问候,他们也和我们一样,希望得到看自己的子女在舞台上表演的快乐。突然,灯全熄灭了,开启了一盏聚光灯,开始一片寂静。隔着一段距离,我惊讶地看到了我的大女儿,她定型在面对观众的灯光中间。

她被加勒比太阳照晒的皮肤更加黝黑。一身白色的紧身衣,以她十六岁的年龄,可以看出她的体形已经基本发育成熟。她的衣着、高跟鞋、化妆、项链、耳环,构成了成熟女人的完美体现。

阿莉西亚向观众道晚安,预告了活动中的几个音乐表演节目。面对家长观众,她几乎可以称为是职业主持人,展示出早熟少女的落落大方和深沉。

我想,女儿已变成女人的提示,是时间险恶魔法的结果。

我正想着写点儿关于这方面的东西。怎么写呢?

一个女孩进了魔术师的帽子。魔术师说了几句话,从帽子里掏出一个女人。一位父亲见他的婴儿在家里客厅的地上爬,出去了一会儿。回来时,他看到女婴已经变成了身着连衫裙的少女,房间里还充满了外人:是她的一群朋友。有几个朋友站着,有的还向父亲伸出手,彬彬有礼地对他说"晚上好,先生"。有个穿着三件套的人带着微笑走进客厅,向所有人伸出手。

我又把注意力转回到舞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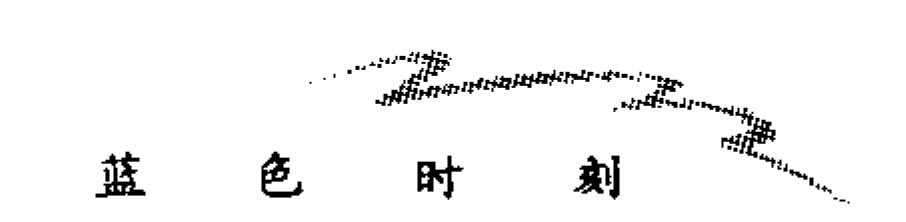
演出将以一个由最小学生表演的音乐节目结束。一个女孩朗诵她的诗:世界是个大花园,我们就是园丁。花儿必须天天浇水。爱情之水,温情的保证……

最后,家长观众中爆发出掌声。阿莉西亚大声向来宾们表示感谢,校长上台向学生们表示祝贺。"看你们阿莉西亚,多好,人们不断地对我说。"露西亚也很漂亮。

看见她们后,我们拥抱了她们一下。我建议全家出去吃比萨饼。

餐厅里,在比萨饼的艳丽颜色和葡萄酒的香气中,她们问起了我的旅行。

"我去处理一下你们祖父在阿亚库乔的一点问题。"



“什么问题?”阿莉西亚问。

“好吧,我觉得他伤害过很多人,就去调查几件事情。”

“调查到了什么吗?”

“没有,几乎一点都没有。我认为他在那儿虐待过许多囚犯。”

“他这么坏?”

“我觉得是,真不幸。”

“不过战争就是如此。另外,另外我们也不能对其他人做出评判,”克劳迪娅插话说,目光看着旁边。

侍者过来问我们是不是上饭后甜食。

那个星期天,对我是个例外,我要去做弥撒。当我提出建议时,克劳迪娅痛快地同意了,我们又说服露西亚陪我们一起去。

十一点的时候,教堂已经比较满了,在做弥撒的过程中,人会坐满。

说教的时候,我分了神,注意观察我坐的那个木凳。奇怪:油漆面上有划痕、刻线、裂缝,木头上有旧痕,也有新伤。我对自己在凳子上找兴趣的可怜能力感到诧异。我观察着,又发现了新的损伤。不过有一个很特别,是条长线,大概是某个病态小孩用折刀划的,是条仔细的切口,已经嵌入木面,并且穿过凳面,形成了一个对角。可以说是漂亮的。

第二天,珍妮一见到我,就告诉我一个消息。

“安科先生和他财产的资料,都在这儿。”

"什么?"

"我都拿来了。安科先生和他的全部财产。他有几块地。你看。"

她递给我一份注册处的证明书和圣胡安·德卢利甘乔市政府的另一份证明文件。

"他的地块在那儿,"她给我指着,"一个商店,一个加油站和一个美发厅。"

我看到了美发厅的名字,"安第斯山祖母绿",这就是帕洛马·福克斯跟我提到的那个名字。

"这段时间全力找她,她就在这儿。"

"在哪儿?"

十六

我来到维塞大街，向圣胡安·德卢利甘乔走去。

一辆用大挂钩连接的拖斗卡车从我身边经过，车身摇摇晃晃。一队运水果的小车，一排篱笆桩，摩的车站，围栅边的大堆劈柴，医生、学校、牙医的招牌，开阔的白色天空，一段段的混凝土街道，还有马里亚特吉的雕像，我应该在那儿向左拐。

到了万塔二区，就在保利诺·巴列家附近，他就曾在他家里接待了我。

我转了一圈，几个孩子回过身来看我。

我把车停住了。

就是那儿。

土筑的街道上，一堵石灰墙和一扇大门。

那是一个美发厅。招牌的字体是玫瑰色的，“安第斯山祖母绿　美容美发”。

我记得曾经经过这个地方，就是我去保利诺·巴列家的那天。

我站在门外边，好像在等待发生什么事情。我用手指敲着方向盘，用食指点击着一首歌的节奏，是我儿时的歌曲。“马利亚有只小羔羊，小羔羊，小羔羊。”我原来一直认为这首歌有种凶险之感。我觉得马利亚有个羔羊，她抚摩着羔羊，马上就要祭献它了。

我打开车门，靠在车沿上。

从这儿可以看到里面的大部分情况。一个镜子，一个摆着小塑料刷子的桌子，一些香波和油脂瓶，一个吹风机。

台子上，几把剪子从一个杯子里露出来。再过去一点，一个发卡盒。

墙上伸出一个陶瓷洗头盆。还有个告示：洗头两索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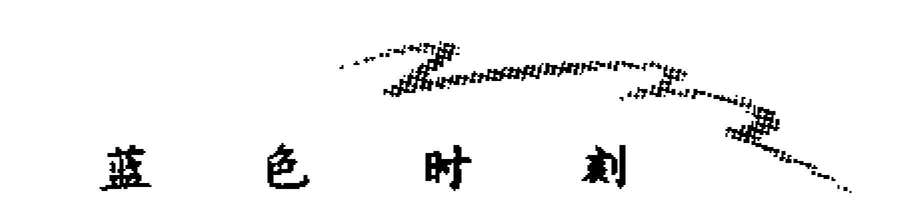
墙壁上是黄发女人的图片。“美丽的面孔就是灵魂的镜子。”蓝色和黑色的墙砖，地板刚打过蜡。

我站在门槛边。里面有三把椅子，三个小镜子。

其中一把椅子后面，一个女人正在为一位夫人剪头发。

她看了看我，只不过是扫了一眼，就继续她的工作了。我从比尔马·阿古尔托夫人家拿来的照片就放在我的钱包里，它们活灵活现地证实了站在我面前这个妇女的身体。是她，是米丽娅姆。真的是她？

她长长的躯干裹在白色的紧身女衫里，泥土色的皮肤



映衬着她棕褐色的眼睛。她快捷地为夫人剪着头发,身体由那两条不时弯曲的腿支撑着。蓝色工装下面是黑色皮鞋。

最可能的情况就是她以为我是个顾客。一个男人到女性美发店理发也不能算不正常,尽管我的黑色沃尔沃车和我的领带与这个居民区并不协调。

我摸索着坐在了椅子上,就在入口旁边。

她继续操动着剪子。两页剪刀片的嚓嚓声…… 就像一只小鸟在歌唱,我想…… 这是一只刚刚出生的雏鸟的鸣叫。

她稳稳地拿着梳子,从夫人的头上梳过。每完成一个梳头步骤,她都用手掌把头发擀压一下。

这个时候,我忽然觉得我在更近距离地看她。终于,她拿掉了夫人肩膀上的蓝塑料布,还拿出镜子,说:

"行了,梅尔乔里塔夫人,好了。"

夫人站起来,给了她几个钱币就走了。

她看着我。

"你理发吗,先生?"

我犹豫了一下,耸耸肩膀,说理发。我也不知道还要做什么,就坐到了椅子上。

她展开围裙,又在我的脖子处打个结。拿起了剪子。

"您想怎么理?"

"一般的。"

"不高不低?"她说着,用手在我的后颈部位比划。

"不高不低。"

我感觉到剪刀在头发上的颤动。从街上传来一些声音:一声狗叫,几个孩子的说话声,一个马达的响声。

当时的情况有些滑稽。我的手放在围裙下面,她就在我身后。

这不能不说有点儿奇怪。

我父亲曾经关押和伤害过的女人就在我的喉咙边操持着剪刀,刀刃就在离我肌肤仅有几厘米的地方移动。如果她认出了我,可能会自认为有权在随后的几秒钟里割断我的喉咙。

我仍然记得当时的一些细节。我甚至觉得我现在写作的姿势就像那天我坐在理发椅上观察她的姿势一样。

我在镜子里看着她,而她似乎只把注意力放在理发的地方,就好像我只是随便一个普通顾客一样。她当然不知道我是谁。不,她不知道。她怎么会知道。她正在我的头周围平心静气地工作。她的工作有条不紊,剪刀的每次碰击都发出迟钝的嚓嚓声响。

"你干美发很长时间了吗?"

"三年了。"

"生意怎么样?"

她迟疑了一下才回答我。

"行,还凑合。现在情况困难。不过还能对付,只能尽力对付。"

一个低沉的声音,应该说是快捷的声音,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它。它正在找齐我的发边,从我的头皮上溜过,又在我耳边扇动。声音忽然减弱了,它慢慢停了下来,不过随后



又继续了。

“你在这个居民区里有很多顾客吗?”

“总有人想打扮得像个样,”她说,“谁也不想自己难看。”

“当然。”

剪刀继续前行,滑过后颈,剪掉了太阳穴上多出的头发。它迅速剪去了鬓发。我盯着她的手指,手指长长,指甲尖尖。

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说话。

快完了吗?

于是我想也就这样了。

她给我理完发,我付给她钱,我已经看见了她,知道她有工作,于是我就可以放心了。我看见她从过去的生活中生存了下来,还凑合,有足够的尊严,而她过去的生活也有我父亲一份。在一个也是她家的地方里,她至少还有点儿收入。另外,也看不出她有什么难处。这就是我追寻的结果?

她转过身去,像是要拿点什么东西。她回来了,给我喷点儿水,为我梳头。她在镜子里看着我。

又是一段长长的沉默。街上的声音已经消失了。

沉默在延长,好像是什么东西的延续。猛然,我听见了她在我面颊旁清楚而低微的声音。

“奥马切博士,”她对我说,“我看您和他们跟我说的完全一样。”

我感到了一种突兀的空白，一个巨大的落差。

我吓了一跳，面对她呆住了。

我看她站在那里，纹丝不动，以一种类似惊奇的目光看着我，手里还拿着剪刀。我拿掉了围裙。

我见她在后退。

“他们跟你说什么了？”

她把剪刀放在桌子上。

“说你在找我，他们这样说的。”

她低下头，拿起了扫帚，开始打扫。她把头发扫到簸箕里，又拿起簸箕，把头发倒进一个筐里。

“谁跟你说的？”

一丝瞬间的微笑掠过她的脸。她拿起簸箕，送到墙角，放在扫帚旁边。她在凳子上坐下来，交叉着腿。我看见了她的黑色尖皮鞋。

她的上方，是一些微笑女人的图片：蓬松的头发，粉红皮肤，细长脖子。她们都看着我。在这个时刻，她好像是壁画的一部分，白色斗士剪影中的黑色女神。

她的脸神忽然有所恢复。她再次看着我，眼光闪烁着。

“您还没告诉我，为什么要找我？”

她的两只手放在腿上，像是力图保持镇静。

“我想认识你。”

“就为了认识我？”

“是的。”

她站起来，慢慢走向门口，向外看着。

“您想干什么？想让我不向任何人说出我跟您爸爸的



事?”

她走近大门,双手背后。她看了我一下。她转向大街的时候,一条血管从脖子上绷出来,又长又硬像根棍子。那个时候,我觉得她格外美,不过同时我也觉得有点讨厌。

“是的,我不想让你告诉任何人。”

“别担心,行了。”

她走向镜子,把剪刀放进一个盒子里。只有这时,我才注意到了她修长的腿,平展的腹部。

“美发厅这个地方是安科先生的?”

“您为什么对这个感兴趣?”

“只是好奇。”

她盖上盒子,把它放在抽屉里。

“是。他是我叔叔。我向他租的,不过我会把它买下来。您为什么问?”

“你付多少租金?”

她伸伸胳膊。

“这与您无关。”

“你付他多少钱?”

“您想给我钱?”

“你需要吗?”

“不需要。”

一阵沉默。

给她钱。这是我匆忙提出的一点想法。在那种时刻,这显得荒唐。不过我也想不到其他办法。

传来一阵声音,是外面一群人的声音,他们在谈论刚刚

结束的一场足球赛。

"我去过阿亚库乔。你知道吧。或者说,去过万塔,卢里科查。"

"对,我知道。"

塑料窗帘后面突然有什么东西在晃动。一个小孩出现了。有十二三岁,穿着白色运动衫,黑裤子,便鞋,正看着我。

"米格尔,走吧,到里面去。"

小孩消失了。

"他上学吗?"

"这跟您无关。"

一阵沉默。她抬起手,又放下了。

"您不想让我向任何人谈起您爸爸的事,对吧? 就是为这个来的?"

"是的,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我见她微笑了,是种粗俗的笑,一种长长的释放,过了一会儿才终止。

"好吧,别担心,先生,不会有人知道。"

她再次看着我。

"你是怎么跑的?"

"什么?"

"或者说,那天晚上你怎么能从军营里跑出来呢? 你是怎么从我爸爸那儿跑出来的?"

"您为什么要知道?"

"好奇。我也说不清。"

“仅仅是好奇?”

“别人说你已经死了。”

“谁说的?”

“查乔·奥索里奥。”

“他们知道我在哪儿吗?”

“不,不知道。你别担心。”

电话铃响了。她起身去接电话。

“是的,卡门夫人,别着急,我等您,我现在没顾客。”

她说话的时候,把头发放开了,头发柔顺地展开,披散在肩上。

外面传来一股烟的味道。她低着头,继续坐在那里。

进来一位夫人,身着深紫色衣服,问她过一会儿是否还在,说自己要去她姊妹那儿,一会儿回来。从我面前经过时,夫人向我点了下头,出去了。

“我看你活儿还不少。”

她抬起手,好像宣布见面结束了。

“好吧,您可以走了,先生,现在您知道了,我什么也不会做,不会告诉任何人。”

“我怎么才能帮助你呢?”

“帮助? 为什么?”

“我可以帮助你的孩子。”

我见她低下了头。

她在哭。

我决定走了。我在桌子上留了张钞票。刚走到门口,听见她叫我。

“奥马切博士。”

“哎。”

“您再也不要来了,求求您。”

我上了车。

我沿着大街往回开。天色发黄。一辆脏兮兮的卡车挡着我的路。我并不特别着急。

十七

那天晚上我梦见了她。我看见她再次做了瓜约和查乔跟我讲述的事情:喝了点啤酒,打了他们,穿上瓜约的军服。现在我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照片上她的脸,粗硬的眉毛,长长的面颊,光线里被拉长了的嘴唇。在我面前仿佛出现了某个洞龛里的圣母像,一个真实身体的奇迹。白衬衣,围裙,细长的下巴,半月形的三角脸。她站着,宛若悬浮在脚下那块抛光的地砖上,可又像是在从万塔到阿亚库乔路途的山间,在小地狱的洼地上,旁边是我父亲的墨绿色的军服。我尽力闭上眼睛。

起床后,我同阿莉西亚和露西亚吃了早餐。我匆匆忙忙,八点要同一个客户见面,是韦克厄姆先生。

堂埃克托尔·韦克厄姆是位绅士，他能以同一种窃窃私语变化出不同嗓音。到了五十岁的年龄，他得出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信念，就是他的嗓音是他利马绅士风度的最佳最有力证明。为了陪衬他的嗓音，他穿带袖扣衬衣、黑色三件套西服，锃亮的皮鞋，衣领上还别着两所大学的扣针，他曾经在那里担任教授。他跟我谈话时总是宣称，他要按照从小到大的重要性顺序来解释他的话题。说话伊始就是，"第一点谈的是……"他特别注意把舌头放在发 o 和 a 音的松软共鸣腔上。他的元音就像小垫子，可以柔和地在上面落座。他的厚嘴唇发出声音时也特别注意，并伴之以手的动作，手指肚不时地碰在一起，形成一个圈，以包含他的意思。他付钱给我，得到了一种昂贵的快乐，就是让人知道，他除了公司的四个咨询律师外，还有一个律师。堂埃克托尔有个芦笋出口公司，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靠他女婿埃米利奥的工作，公司还算运转得不错。然而他很少提到他的公司。比起对钱的喜好，他更感兴趣的是穿得好。他的三件套，他的发型，特别是他的咳嗽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手攥成团放在嘴上，连续释放三次，最后一次总是低声。长鼻子玷污了他的面容，可他把头发精心梳理成小圆盖，尽力弥补脸上这块多余部分造成的缺憾。

在事务所里，我们帮助他准备税务和规章报告，不过这只是个常规咨询。我们与他交谈主要是为了让他向事务所付钱。我听他谈他的政治见解，他的电子游戏，他的"多亏了家里人的工作，一种缓慢但是持续的工作，生意还能顺利进行"。那天上午，韦克厄姆先生向我解释说，他前一天晚

上睡得少了。"我睡不着，倒是处于一种持续不安的状态，表现出明显的焦虑。原因就是我的孩子们在弹吉他，"他解释说，"他们挺注意的，弹的声音挺低，可还是睡不着，我睡觉特轻。"

同韦克厄姆碰头后，我上了车。我已经感觉到我的车速极快。我驶过哈维尔·普拉多大街，上了北泛美公路，从支路向右拐，经阿斯卡鲁斯来到了维塞大街。

我就要看到她了，我必须见到她。

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我到那儿的时候，只有她一人在那里。我的心在怦怦跳，可我又不得不在每个红灯前停下车来。我看见小公共汽车一辆辆落在我后面。

我在马里亚特吉纪念碑转弯，经过了几条街，不过我又迅速转了回来，汽车扬起了尘土，一两个人转过身来看着我。

到了她那儿，我停下车来。下车时，身上已经沾了些尘土。我看见她坐在顾客的椅子上，正看杂志。

她盯着我。

"咱们能不能说几句话？"我问。

她没有回答，低下头来又看杂志。

我在她附近坐下来。

她围着围裙，头发松散着。

"您大概也知道，我不会同任何人讲以前的事，不会跟记者讲，不会跟任何人讲……所以您别担心这个，奥马切博

士。”

她站起来，面对着我。

“我想做的是帮助你，”我说，“没有别的。不过我真的是为了自己而做，或者说，是为了自己感觉好一些。”

“我什么都不需要。”

“那你的孩子呢？”

“也不需要。”

我用尽可能平静的语调说话。

“从这儿往前走，在希卡马卡有个地方，叫米什基，咱们为什么不去那儿聊一会儿？”

“为什么？”

她走到墙角，坐下来，可还看着我。

“我也不知道，就随便聊聊。”

她站起来，走到门口，看着街上。然后转回来，在桶里洗一些发卷和钢丝刷，流水的声音在整个房间里回响。

“您怎么会认为我会跟您出去，先生？”她问我，却并没有看我。

“我只是想跟你聊聊，没别的。”

“咱们没什么可说的。我求求您走吧，先生。现在上您的车，踏踏实实地走吧，就这样。”

她走近洗手池，把发卡卷刷洗晾干，放好。她面对镜子，更加沉默了。

“我从来都不了解我父亲，”我对她缓缓说道，“我想让你给我讲讲他的事情。”

“您不了解您的父亲？”

"我很长时间看不到他。"

"那么您想知道什么?"

我犹豫了。

"不知道,反正你能讲给我的。"

她把几个发卷放在抽屉里。

"您想知道的是什么?"

她关上水龙头,再次缄口不语。她又坐下来。

她两条腿交叉着,黑皮鞋前面是个金属尖头。蓝布工装裤长长的大腿部位绣着一朵花。

"咱们能到另外一个地方谈谈吗?"

"您想去哪儿?"

她的声音沙哑,而且有点不好听。她面对着我。

街上传来汽车发动机的声音,一阵接一阵的。

她终于再次抬起了头。

我再次重新看她的时候,她好像更年轻了。没想到,出乎我的意料,她拿掉了围裙。

"咱们去吧,不过只一会儿。"

"有人照顾你儿子吗?"

"他在梅尔乔拉夫人家。我去关门。"

她上了车,坐在我身旁。

挂车挡的时候,我触到了她的绒绒裤料。

在路上,我们没有说话。

到了米什基。马克斯先生好像认出了我。我要了杯啤酒。米丽娅姆说:"我什么都不要,先生。"

我们是在希卡马卡的山口高处。

从那儿,可以看到山坡上纵横交错着石灰砖头墙,低矮的房屋,电视天线。山峦在白骨色的天际描画出一条曲线。

她的手几次从头发上掠过。她很快地看了我一下。在那个时刻,我觉得她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你看,如果你能让我帮助你,我真的愿意这样做。或者说,我估计你不想接受我的帮助,可你至少还得为你的孩子着想。他多大了?”

“这与您无关,先生。”

“他上哪个学校?”

风吹动了她的头发。

她一只手放在桌子上,手长长的,细薄指甲,手指上戴着银戒指。很长一段时间,她没有说话。

“他在附近的一个学校上学,马里亚特吉学校。”

“你能养活他吗?”

“能。”

“买衣服和其他东西的钱呢?”

“我从美发室里拿点。”

“噢。”

“您为什么这么有兴趣,先生?我已经对您说过了,我不会对任何人讲您爸爸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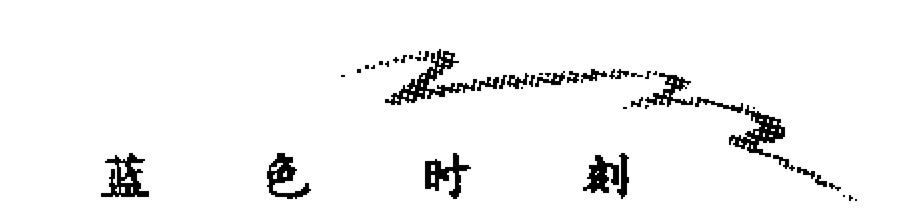
我靠在椅子上。

“我不久前才知道你跟我爸爸的事。”

“他们是怎么跟您说的?”

她的话就像一支箭。

“说我父亲把你抓起来,后来又和你住在一起,然后,过



了一段时间,你跑了。不是这样吗?”

她开始用手指头敲打着桌子。

“你怎么有了米格尔?”我追问道。

“您是在审问我吗,博士?”

“不,很抱歉。如果你不愿意,就不用跟我讲。”

有几个男人走进来。其中一个人紧盯着我。他衬衣敞开着,穿着黑裤子,脚上一双皮凉鞋。他们满脸尘土,可能刚在建筑工地上干过活。他们要了几瓶啤酒。那个人过了好一会儿才把头转向旁边。

“我在利马生的他,”说完,她又沉默了一阵,“在我叔叔比托里诺的帮助下,我进学校学习。可我没地方工作,于是我就在家里帮忙,就像个用人。后来我又重新上学,在美发店里找了个工作,后来我叔叔把这个地方盘给了我,我现在正要买下它。我就是这样做的,尽力把小米格尔抚养大,如果您这么感兴趣,这就是全部。”

她长长吁出一口气。

马克斯先生给我们拿来一瓶啤酒,两个杯子。

我给她倒啤酒,可她说一点也不喝。我们又沉默了一阵。

“这就是您想知道的全部事情?”

“还有所有你愿意讲给我的有关我父亲的事情。”

她低下头。

“您父亲并不是坏人,”她低声说道。

“你为什么这样说?”

她开始搓手。她把两只手攥在一起,一只手绕着另一

只手转。有一刻她把两只手放在嘴边,像是要洗脸。

“对您的爸爸,我特别恨,告诉您,如果可能的话,我想把您的爸爸杀掉,他骗了我,糟蹋了我,就在那个小房间里,我特别恨他,就是由于他们,由于士兵们,由于那些蠢货,我失去了我的家庭,我已经看不到我的家人了,我已经找不到他们了,他们已经死了,丢下了我,我原来特别恨您的爸爸,可现在我已经不恨了,差不多爱上他了。”

她靠在椅子上,继续看着我。也不知怎么回事,在那一刻,我想拉她的手。

“你在军营里和他一起呆了多长时间?”

“我不再跟您讲下去了。不过我想让您知道,您的爸爸爱您和您的弟弟。他无时无刻不谈起你们。好吧,就为这,我同意跟您到这儿来,告诉您这些。就这些,没别的了。咱们准备回去吧,我还得干活,博士。”

我们上了车。我慢慢开着车,把她送到了门口。

“请告诉我你的电话什么的。”

“为什么?”

“为了让你再给我讲点什么。我也可以跟你谈点他的事情。”

我意识到,我的嗓门已经提高了。她无动于衷。她打开杂物盒,找到一张过期账单,在上面写了个数字,说了声“行了”,就下了车。

事务所正等着我开会。

是有关吸收新客户的战略会议。

“没有什么战略，”我说，“只能工作。”

“再发些信好不好？”爱德华多问。“咱们干吗不向企业和大使馆发信？”

“可是我们已经发了五千封信了，爱德华多。”

我们一直争论到我们都累了，才换了个话题。

那天晚上，我告诉克劳迪娅，我去找过米丽娅姆。

“哎呀，我的天啊，”她说道。

我睡得比前一天好。天将亮时，我凑近克劳迪娅，抱着她，我们做了爱，情况就像我们最有激情的那段时间。她又成了性感女孩，一个有修长的双腿、善于温存而又肌肤柔润的姑娘。在一瞬间，我看到了米丽娅姆的面孔。

我淋浴的时候，还在想着她。

我情知我需要再次见到她，也许这是种自私的冲动，也许我不应该再去见她。然而我需要见到她，我觉得我需要以某种方式帮助她。我肯定她会接受我的帮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走出客厅，拿起了车钥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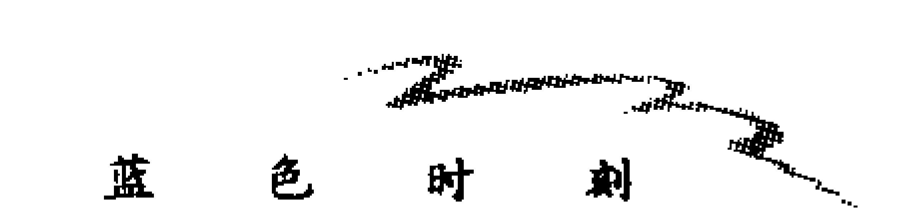
爱德华多一见到我，就告诉我一个平常的消息：我们那个星期得同事务所两个重要客户一起吃午饭。

“得同他们处理好关系，”他嘀咕着，“事务所百分之六十的收入都从他们那儿来，你知道吧。”

两位重要的客户是指莱蒂西娅·拉雷亚和阿罗多·加拉。我必须见他们，现在不应该想米丽娅姆。我得集中精力想他们的事情。

莱蒂西娅·拉雷亚，我得卷起舌头并颤动它，才能发出这个名字的音。莱蒂西娅五十出头，她总是上午中间这段时间出现在事务所里，每星期来两三次。事务所是她每天行程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她还去女友家和商店。进我办公室之前，她总是先站在门口，摆好姿势，像是要给自己默哀。她总是染着红头发，这种颜色更加剧了她面妆的夸张和她耳环的杂乱色彩。她走路总是左摇右摆，她原来受过训练，自己跟自己跳着曼博舞走路。她身上装饰的腰带、项链和手镯都像是填充玩具娃娃用的。她的来访让我高兴。从莱蒂西娅哨声般的嗓音进了大门上楼梯开始，我就准备接待她。她经过门厅时，总是低声重复说，就是由于她每月给事务所做的贡献，地面才这么干净。她精心整理一番之后才上楼梯，经过珍妮身边时还通报一声。如果我这儿正有另外一位客户，她总是高声说“啊，对不起，我在外面等着”，这就足以使跟我在一起的那个人结束同我的谈话。那位来访者几乎还未离去，她就站在门口停留片刻，像是在审视门槛，接着走进办公室。

她的服饰就是她的自我表现。紧身的裤子，红色或蓝色的衬衣，排扣坎肩，这是一种自负的张扬，乞求被人爱。她总是能找个借口请我帮忙，可实际上，她坐在我办公桌对面，就是要展示自己，让我听她说话。她想得也有道理，我作为她的律师的义务也包括听她说话，她的脖子有点疼（哎呀，我这儿有点发紧，还总好不了，听见了吗），她去过的招待会（我昨天晚上去了大使馆，那儿的虾卷真是棒极了），不



过我看蒂娜·布雷西亚的打扮实在过分了,特别是她的已经变成现实的整个梦幻世界,她的子女们就生活在那个世界里(我女儿比维安已经把她报名伦敦艺术学校的表格寄走了)。

如果莱蒂西娅来访的时间再短些,同她的谈话也让我开心。一般情况下,都是珍妮用某个有急事的电话打断了我们(卡诺先生的电话,博士,他说有急事),这时候,她掐了她的烟,祝我走运,还说要给我打电话,请克劳迪娅和我在某一天晚上去她家吃晚饭,然后跳着她的曼博舞,沿着由于她的贡献才清洁的楼道走了。而更经常的是,她又去敲爱德华多的门,又给他以同等礼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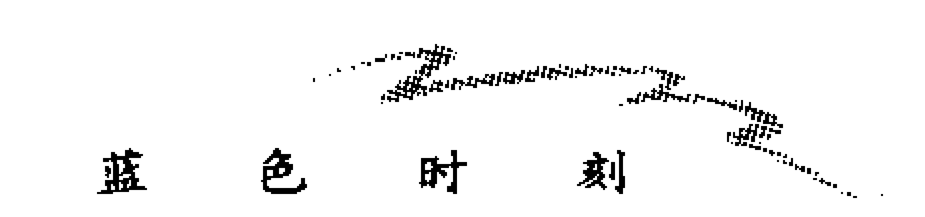
与莱蒂西娅不同,我们的另外一位重要客户阿罗多·加拉,在他四十岁的时候,就有了一笔财产,他也因此认为自己应该算个贵人。他总是穿坎肩和带袖扣的衬衣,头发总是喷上一层软龟甲般的发胶。他不耐烦的时候,总是向后轻轻抬起额头,眼睛里迸射出一种呆滞的冷漠,使他顷刻间进入了覼蜥档次,然后说出一句他认为是一锤定音的话,"我想马上得到"或者"我想现在就做"。血液的波动,就像某种矿物质减缓了流速,延长了他眼睛的神采,过一会儿才能回到原来的状态。阿罗多总是寻求用印象艺术的娴熟举止来表达他的粗鲁言谈。他坚信他能以他的权威、文化和良好外表使他面前的人屈从。在酒会上,他总是以他两片嘴唇发出的擦音和塞擦音在他的听众面前发表谈话,并伴之以一个轻轻的军礼,好像批准和印证了他刚刚讲的东西。

有一次,阿罗多邀请克劳迪娅和我去他家。进了他在

高尔夫大街的家,就像进了一个礼仪世界。第一个客厅里有一盏灯,三把松软的沙发椅和一个类似于神龛的东西,里面有阿罗多和他夫人卢查的油画像。过了一会儿,卢查出现了:小眼睛,龟甲般的发式,生硬而干涩的小嘴巴。凭着她的染发和长衣裳,卢查夫人的问候已经成为参加典礼的人的一个活动内容。两个子女左右陪护,卢查已经学会了在走廊里欢迎客人。见了她以后,我们这些典礼出席者被迫从一个桌子边走过,桌子上有一册封面上釉的《堂吉诃德》。接着,我们来到一个挂着总督画像的大客厅里,家具下面铺着厚厚的地毯。家具上都镶有绿色的滚边,家具腿的脚爪镀成金黄色。客厅中间,一个玻璃台上陈设着各种颜色的小盒子和一个烛台,墙上挂着一把刀和一把剑。

同阿罗多的谈话如同走进一个博物馆。他可以引导他的听众走过几个不同的展厅,前厅总是由经济形势的主题构成,接着就是有关社会进步的思考。他带领我们参观中厅,这是由他个人有关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公共和个人道德的意见建成的。这些微型发布会,他总是定期举行,而且会上是声音低,手势高。"我个人主张关系的彻底开放,"他低声宣称道。接着,他就海阔天空地开始发表他有关民主、滥用毒品、控制出生率等各种问题的见解。按照会议的日程,谈话结束后,我们这些来访者就按照他向我们展示的顺序,赞扬了他所拥有的各个方面:他的夫人,他的子女,他的家具和他的思想。

阿罗多以做作油滑的虚伪精神设计出一座座宏伟的建筑,可在它们背后,却隐藏着他各种阴暗的需求。他从贫穷



少年的窘境上升到企业家的宝塔，他继续上升的台阶就是在以后任何一届政府里谋求一个政治席位。他向事务所投入了钱财，而事务所只是他为实现这个目标的又一个工具。我频频在电子邮箱里看到他的邮件："工业部副部长巴罗哈先生让我提交一份有关我们去年交易的法律框架报告。如能尽快从您的办公室里发送一份文件副本，我将不胜感谢。"我把报告发过去以后，他总是用一句话回复："已阅，同意，谢谢，阿罗多。"

作为卡涅特一个庄园管理员最小的穷孩子，对升任的着魔可以说是阿罗多从童年时期就开始修炼的正果。阿罗多鄙视他的父亲和兄弟们，却热情地向庄园主冈萨雷斯·潘塔家族的成员们大献殷勤。有一次，冈萨雷斯·潘塔先生乘车来到他的庄园，瘦小的阿罗多赶紧跑过去开车门，并伸出手去扶他下车。有个故事在利马的午餐和晚餐上流传：阿罗多伸着手、迈着未来舞伴的芭蕾舞步引导着他的冈萨雷斯·潘塔先生，由此奠定了一个让阿罗多上升为乘龙快婿的尊贵地位的跳板。终于，靠着他同卢查·冈萨雷斯的婚姻，他如愿以偿。他是个幸福的男人，而我又用我的微笑和工作为他成为幸福的男人做了我的贡献。"已阅，同意。"当然如此。

十八

那几天，我给米丽娅姆打了几次电话，留下了我的留言。

有一次，我同她通话，可得到的只是两三句拒绝的话。

当然，我也无法解释。我想象她就在面前的时候，总被一种迷茫、一种无限忧悒驱赶着。她蓬松的头发、棕褐色的眼睛、腰间露出的一圈肌肤，还有她侧站的那种姿势。我必须见到她。像我这样的男人居然会这样想一个像她这样的姑娘，这真是有点不可思议！

我同普拉顿谈了这件事。“忘了她吧，别再管这件事。那么好吧，你要是喜欢她，就跟她结婚。可是，你要干什么？”

总之，他一再劝我，“你别找这麻烦了。”

我现在还十分清楚地记得那天发生的一切。那是一个冬天的下午,天空中意想不到地显现出晴朗。珍妮和我刚刚谈论完这件事,电话响了。

是阿罗多·加拉的声音,好像已处于紧急状态。"我很恼火,阿德里安,"他嘀咕着,"事情是我已经请求您和事务所替我向工业部长阿尔维特斯博士发送一份报告,可他刚刚非常遗憾地通知我,你们没有把文件发送过去。我不能理解,作为企业的事务所以及您个人能够如此地缺乏责任心。很少会有这样的事发生。我只是有些不快地告诉您这些。"阿罗多的轻声细语使S的发音更细,使颤音更颤。起初我还想做点解释,可后来我决定听他说完。最后我终于对他说,"我去查一下报告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打电话问爱德华多。这时珍妮进来了。

"一个女人给您打电话,她不愿意告诉我她是谁。"

听筒里的声音很清楚。

"请原谅,博士,我是米丽娅姆。"

"米丽娅姆?"

"是的。"

一阵沉默。

"我们能见面吗,博士?"

她拒绝我多次,可那天下午,为什么突然给我打电话呢?那天,我驾车行驶在维塞大街上。忽然在电话里听到她的声音,我感到很意外,甚至来不及问自己这是为什么。而且后来,随着事情的发展,我常常问自己这个问题。

我把车停在美发店旁，走了进去。

就她一人，坐在椅子上，正看杂志。她抬起头，露出短暂的微笑。她站了起来。

她化了淡妆，我把那当成一种对我的取悦。

那天下午，我们在米什基喝啤酒时，我给她讲了我在事务所的工作。

“与客户见面，写报告，查询书籍。有时候还特别累，可有时候我又很喜欢。”

“有一次我也曾想进学校学法律，”她微笑着对我说。“为了讨还正义。”

那是我第一次见她微笑。又长又舒缓。

她抬起手，手腕上有个镀银手镯。

那是一次短暂而友好的见面，我们没有谈起我父亲。

我把她送到了美发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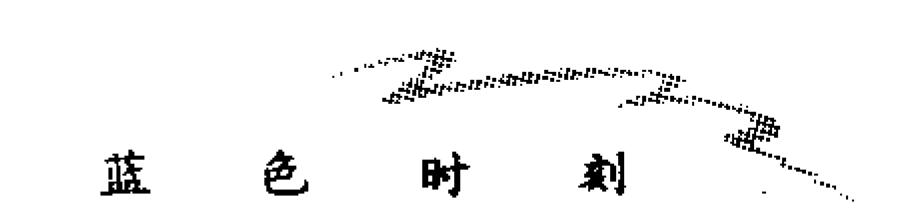
返回家的路上，我在一家餐厅前停下车，要了杯威士忌。我想一个人呆一会儿，好好回忆一下刚才与她的见面，回味一下刚刚发生的事情。

我小口抿着威士忌，呆了一会儿。

我的脑海浮现出米丽娅姆清晰的面孔，微笑的声音和嘴唇的光泽，她因微笑第一次露了出来的牙齿，她的长头发，棕褐色的眼睛，银手镯，还有声音。

“谢谢，我过一星期再来，”我对她说，“过一星期再来看你，还是这个时间。”

第二天，我上班迟到了。其实我就是在家里的客厅里



浏览报纸。

内阁危机，提出了新部长们的名单，在巴黎出了个阿兰·加西亚，电视上播放藤森总统的记者招待会。报纸上还登了阿维马埃尔·古斯曼的一些声明。“我不是恐怖分子，而是人民战争的指挥官，”根据埃菲社的报道，他在牢房里总是这样说。我看过他的照片。

阿维马埃尔熟悉的面孔就是当下局势的写照。

他油光满面，一个罪恶的圣人，一种来自于污秽皮肤的悄然爆发。这并不是一张开心而扭曲的脸，就像新闻节目里看到的那些犯罪团伙头领的脸，那些脸上带着凝固的快乐，这种快乐由于他们充满欢愉和风险的生活而变得粗俗。阿维马埃尔的脸是一个由于重心吸引而按部就班地集中在一起的五官组合，干涩的黑眼睛像两块鹅卵石，粗犷的身体由于狂暴而显得轻浮，体内暗藏愤怒，脸皮是一张蒙在血炉上的冰冷被单。那张脸上尽显猥亵阴暗的粗暴…… 有时候，我尽力把那张脸同已经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与其他人不同，狂暴使他能够面对世界，而他那种面对世界的目光就是他向他的追随者们提供的品性，一般人总是俯首帖耳，寡言少语，只是由于有了他，他们才抬起了头…… 要表现出狂暴，期待狂暴。

“你听见我说话了吗？”克劳迪娅问我。“我正跟你说话，可你什么也不说。”

那几天里，家里的平静生活出现了波折。克劳迪娅斥责我，说我处于一种持续的心不在焉的状态。跟你说话就

像在跟墙说话，我也不知道你总在想什么。

她担心之余，犯了个错误，就是在孩子们面前提起这件事。我总是推托说我累了。

然而实际上，我已经开始处于一种非常好的状态。我做的每件事都觉得做得特别好，我断定，我同客户的每次接触或者所做的每个报告，都会为事务所的繁荣和世界的进步做出贡献。

我开始每星期二到米丽娅姆那儿去。我也说不清为什么把星期二当成了习惯的日子。也许是因为她星期二给我打了电话。这成了我们确定的一个规则，以便我们能够继续见面。

我去的时候，有时候她在干活。如果只有她一人，她就会对我微笑一下。在小区里，肯定议论很多，说有个男人每星期二开着沃尔沃来看她，可她从未跟我谈起过。

她跟我出去之前，总是稍许穿戴打扮一下。跟我谈起她儿子米格尔时，她的眼里就放出光芒。

呆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我们喝杯咖啡或啤酒或米什基的汽水。总是马克斯先生招待我们，而且一直很周到。他总是注意先问她，再问我。我沉浸在我们的谈话中。跟她在一起，我的面前就好像又展开了一个巨大的空间，我们可以在那里走上几个小时。她谈她前一个星期做的事情，谈米格尔，谈她的女友梅尔乔拉，谈她对父母和兄弟姊妹的怀念。我跟她讲我的家庭，讲事务所，讲普拉顿，讲我的女儿们。同她说话的时候，我几乎不能呼吸。所有的话题都吸引人，因为都是新话题。看起来有点奇怪，可就是这样。

她说的一切，包括她接待的顾客，她跟米格尔的对话，她邻居的事情，例如梅尔乔拉和帕斯夸拉的事情，都能引起我的兴趣。我问她更多的，是她对她在万塔的童年回忆，这个话题，她谈的并不是特别多。

告别之前，我总是给她一个信封，里面有点钱（信封总是封着的，她接过来时，什么也不说），接着，我把她送到美发店附近的某个地方，可从来不在一个地方，以免在小区里引起更多的议论。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觉得她已经习惯于在告别的时候，我在她面颊上吻一下。伴之以这个吻，我还要把胳膊放在她肩膀上，从我这方面来说，这真有点过分了，可这样搂着她，能够让我动情。我闭着眼睛，让我的嘴唇在她那瓷实而温暖的皮肤上摩擦。我忽然感到了羞涩和胆怯。如同一个小伙子和他的第一个恋人。

当然，除了珍妮和普拉顿，没有别人知道我的这个行动。

“我觉得你和别的女人有交往。”一天晚上，我们睡觉之前，克劳迪娅对我说。

“当然了，我真笨，我以前怎么没注意到呢？事情就是这样。你和另外一个姑娘在一起，肯定是事务所里的姑娘，一个年轻漂亮的实习生，她总是找你，现在事情就是这样，你别说你没有，可是你会看到，我要查查她是谁！”

我开始否认她的指责，这是当然的。后来，我只能忍着听她诉说。

我想隐瞒我跟米丽娅姆的约会。我只跟她讲过我第一

次约见米丽娅姆的事,可能是由于害怕才讲的。

当她相信我跟办公室的任何一个姑娘都没有关系后,我们俩之间的情况逐渐好转了。每天早晨,我都得想办法处理与她的关系,这真是件头疼的事!我得想早餐的时候跟她说什么,她可能会怎样回答,我要找什么借口才能晚回来。这可是个长期的危机,是沿着一条熟悉的道路延续的危机。我觉得我不会同米丽娅姆有任何亲密关系(在那个时代,我的这种思想看起来有点难以理解)。可是我无法向克劳迪娅解释是什么把我和她拴在一起,我无法向克劳迪娅解释,也无法向我自己解释。

在那段时间里,我不时遇到普拉顿,他告诉了我一个消息,他的夫人要生第四个孩子了。

“你的钱包够给第四个孩子用吗?”

“够。我的诊所里有病人,牙疼就是钱,幸好人们都不怎么刷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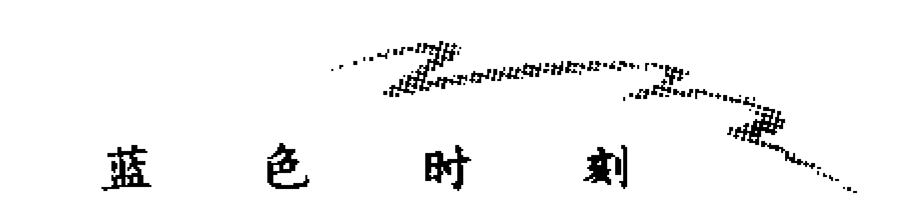
“你还和米丽娅姆在一起吗?”

“是的,我去看她。”

“看到什么时候为止?”

下午,我接待了波苏埃洛先生。从建事务所以来,他就是我们的客户。可是我却好像第一次见到他。

波苏埃洛先生细长脸,带着憔悴的微笑,油光光的栗色头发形成了润泽的波浪。他的眼睛在皮肤上浮动,就像美杜莎在海中荡漾。年轻时,他曾在韦基基俱乐部的几次台球比赛中获胜,现在,他总是尽可能地炫耀他光辉青年时代



的余威：身穿开领衣，白裤子，面带亢奋获胜者的开怀微笑。他是个固定客户，我和他商定，我去看他，让他向我进行常规性咨询。珍妮打电话告诉我，大家都出来看伟大的费尔南多·波苏埃洛先生上楼梯呢。

他穿着浅色三件套西服和棉布衬衣进来了。他保持着固定的微笑，往椅子上坐的时候都没有变化。

“你怎么样，费尔南多，真高兴看到你！”我对他说。

“听着，我听收音机里现在有首特别好的歌，”他回答我。

“它的词特别好，‘我有千次性欲，却没有做过爱。’这可以说是我生活的警句，知道吗？你觉得怎么样？”

“我也认为很不错。”

“没什么好做的。‘我有千次性欲，却没有做过爱。’多好啊，听见了吗？”

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情况。波苏埃洛的演说稍一停顿，我就站了起来，走向门口，离开了。我走了。我从他身边走过，下了楼梯。他看见我出去了，只是用目光跟随着我。珍妮停下笔，我想她是想叫住我。

我很快来到了街上。

我把一个很好的客户撂在我的办公室里坐着，我却抓住我汽车的方向盘。手机响了，我把手机关上。我仍然记得路上留下的长长马达声。

我终于看到远处的山。进了小区，在离她门口很远的地方停下车。

我在土道上走着，尽量不发出声响。我向美发店里探了下身子。

米丽娅姆在那儿，站在洗手池旁，洗涤梳子和钢丝刷，手指在水流中抹动。

她穿着黑裙子，蓝上衣，一条向前弯曲的腿露了出来。我透过洗手池的水声看着她。在窗户中白色光线的映衬里，她的身体向洗手池微微前倾，女衫下面可以看到她腰间的一圈肌肤，这个部分向街上展露着，它土色皮肤的柔和与门口的寒冷空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的背形成一个坡，飘逸的头发从上面顺势垂下。在她紧闭的嘴唇上有股毅然决然的态势，它可以是微笑的起始，是孤独的闪光。她手捏钢丝刷活动着，一条腿在前，承受着躯干重力的隐隐外延。水流在她身下迸发出声响。她身后的石灰墙上，有梳着各种发型的女人图片，有耶稣受难像；白色的屋顶，两把椅子，一些散落的个人物品，看来是不想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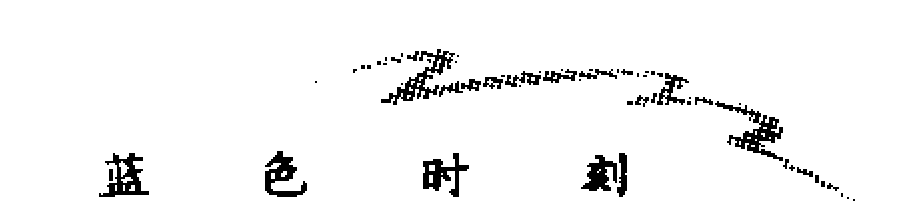
我决定离开。我上了车，回到大街上。我在两辆公共汽车之间摇摆。我猛然踩了刹车，把车停到路旁。

我又返回去。还是她一人。

那天下午，她给我讲了点儿她的事。我们之间有块红花桌布。她说话的嗓音坚毅流畅，一气呵成。她好像在背诵一篇已经熟记在心的演说。

她大概是这样给我讲述的。

“我逃跑时还穿着瓜约的皮靴和军服，是的，就是这样。我先到我家。我敲门，叫我爸爸和妈妈。可你再怎么叫，也



没有人搭理你。没有人。整个卢里科查,好像全空了。我只能离开。他们会到那儿找我的。于是我想去瓦曼加,我一路走着或跑着去。我唯一想的,就是到瓦曼加我叔叔比托里诺家去。我得跑整个晚上。我唯一害怕的是早晨之前,也就是在天亮之前到不了那儿。天亮了,巡逻的士兵就会看见我,或者光辉道路分子也会看见我。有点儿月亮,看不远,不过一样可以跑,还几乎不出汗,天那么冷,我害怕碰见光辉道路分子或士兵。整个晚上,从卢里科查到万塔,又从万塔到瓦曼加。

"我开始跑,我必须跑,我得在天亮之前赶到,不能停。于是我想,最好能在路上看见一条细红线,这条线不是沿着公路走,而是沿着大树、草地和山坡走,我可以用眼睛让这条线变得更长,我自己让它变得更长,用我的眼睛在我面前变出一条线,我就顺着这条线走。

"开始我只是跑,我想跑得更快,皮靴挺沉,可我不能脱了它。于是我想上山坡,直接上去,我想离公路远点儿,我忽然感觉很好,忽然有劲了,好像有只大猫进入了我的身体,带着我全速奔跑。我甚至忘记了我的腿,恐惧使我觉得好像有只猫在我脚上,这就是恐惧,不过它也给我更多的力量,这样我全身都感到了害怕的痛楚,害怕的痛楚从内心烧灼着你。我的脚,我的皮靴开始同我一起飞奔。我什么感觉也没有,什么也不想,只是跑,我忘记了我是在向瓦曼加跑。风在我身边呼啸,我感觉不到土在飞扬,感觉不到寒冷,一个人可以跑一辈子,一直跑,或者说,人跑不动了,可身体在跑,即使你说算了,身体还想逃生呢,身体还要继续

跑。最初还有个道理，就是你想逃跑，我只是想找到我爸爸，想看到我妈妈，他们在哪儿？他们在我叔叔比托里诺那儿，我想，在瓦曼加，我也想到他们突然都死了，光辉道路分子已经把他们杀了，我想事情可能已经这样了，不过我也没有确切消息。于是我的脚跺着地，问他们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一只脚跺地，问他们在哪儿，另一只脚回答说他们在哪儿。于是我看见了他们，我想我看见了他们，我想我会在瓦曼加见到他们，我想他们会去那儿，他们在瓦曼加，在我叔叔家里，他们在我能看见他们的地方，他们在空中，在空中显形，我就这样顺利地跑着，现在我想起来了，我当时想就要到了，我就要见到他们了，我就要见到我的妈妈和爸爸了。眼泪并不好，它让我脸上更加寒冷，我越哭，就越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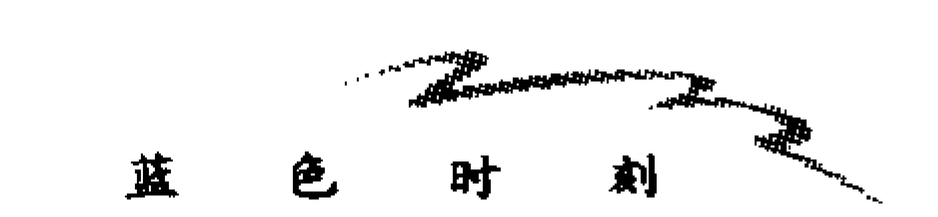
"后来，我跑着，我已经忘了我是在跑，身体在跑，我开始想前面将要发生的事情。等天变蓝了，等天空是蓝色的时候，士兵们就会找到我，他们会看见我，会把我带走，会把我杀了；要是光辉道路分子来了，也会杀了我，就像杀害我父母、杀害我兄弟姊妹一样。我希望继续是晚上，全部道路都是现在这样黑，我跑着，是在土路上跑，在黑石头上跑，月亮仿佛不时在叫我，月亮向前行，我觉得它是在给我劝导。山边没有路的时候，我就在公路上跑一会儿，不过后来又回到野地里，又回来。我一直在想，明天早晨就是死亡的时刻，将会降临一个嘈杂的清晨，不过这必须是在明天天亮之前，我已经到了我叔叔的家门口。我当时还是在寂静中，在黑暗里，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那天晚上，我有几次忘记了我为什么要跑，可是我还是跑，继续跑。有两次，我的身体



停住了,而我没有停,可是听人说,体力耗尽了,身体就停住了,有两次我晕倒了,在地上睡着了,可是后来把我冻醒了,我站起来,接着跑,我已经不知道我为什么在跑,已经快到了,可是就要到早晨了,就要天亮了,我就会看到天空的蓝色。看到瓦曼加的房屋时,我多高兴呀,已经是蓝色时刻了,他们会看见我,士兵们会找到我。我得赶紧到家,差不多就要到了的时候,只有那个时候,只是当我看到了蓝天的时候,我才腿疼得哭起来。腿也瘫了,我藏起来,看见远处有巡逻队,我用手指抠着地,进了田野,到了街上,我全速奔跑,终于到了瓦曼加,没遇到任何巡逻队,天空近乎晴朗,是时候了,我无声地跑,几乎脚不着地,到了万卡贝利卡街,那里住着我叔叔比托里诺,我看见了他家的旧木门,缠着铁丝,我开始发疯地敲门,直到他开了门,我抱住他,我们搂在一起,哭得很厉害,他把我爸爸妈妈和兄弟姊妹的事告诉了我。我现在还能听到那天他趴在我肩膀上流的眼泪,还能听到他的饮泣。全都死了。光辉道路的人杀死了我哥哥,因为他和士兵们在一起,我爸爸和我的另一个哥哥死在一个枪声不断的晚上,当时光辉道路攻打卢里科查,我的父母和兄弟们都死了,我叔叔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当时就倒在地上,昏过去了,后来我醒了,面对着窗户,取下窗户上的一块玻璃,划破了我的静脉,我本来应该死了,如果能死掉,我就死了。我的手指在颤抖,手上全是血,这我还记得。我还能记得我的手当时的样子。可是我叔叔把我送到医生那儿,那是他的一个朋友,给我治了伤,就是靠我叔叔,我才还在这儿,是他救了我。

“当天我叔叔比托里诺给了我衣服。在街上，我看到几个士兵，可他们没理我。于是晚上，我叔叔弄来钱，把我带到公共汽车车站，无泪地哭着，以免别人看见我去了车站，到利马来。车刚出阿亚库乔，几个士兵在公路上拦住了汽车，可我有我表妹的选民证，上面用的是另外一个名字，这是我叔叔给我的，于是他们放过了我。我就这么睡睡醒醒，到处都是漆黑一片，后来有一次，我醒来，猛然看到了利马，看到了大街和汽车，看到了红绿灯，看到了楼房，看到了在人行道上呼喊的人群，看到了高大的电灯杆，可没有人看我。大家都各走各的路。我表兄保利诺在车站，他带我走。‘来吧，孩子，你会好的，别担心，米丽娅姆，’他这样对我说。我在喧嚣中边走边发抖。他把我带到了他家，他住在阿方索·乌加特大街，那条街上有几条公路，我简直不能相信；我见到什么都哭，所有的一切都让我想起我的家，我为我的父母和兄弟而哭。我留在了保利诺家。后来我帮助他照顾他的店，他和几个朋友一起，把我送到医生那儿，把我送到产科医院生孩子。米格尔出生了，我给他取了个大天使的名字，米格尔。我叔叔比托里诺也来到利马，帮助我。幸好他认识一位夫人，这位夫人又认识另外一位夫人，帕洛马夫人，我去了她家，她接受了我。就是这样。时光就这样过去了，岁月就这样过去了。米格尔长大了。可我总是这样，每天同我妈妈和我爸爸，还有豪尔赫说话。我和他们说话，我一直和他们说话，直到今天。”

很长时间的沉默，只能听到从远处隐隐传来的汽车声。



我突兀地说出几句有关生活坎坷和需要重新振作的话来。

“唯有时间能够帮助你，你可以让时间去完成它的工作，”我说。我的话太滑稽了，猛然间，我一句话还没说完就闭了嘴。

她说她得回家了。

于是我坚持我们第二天再见面。我再早点儿来，三点来。她又一次微笑着同意了。她站起来时，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漂亮。

回家的路上，一个警察在维塞大街拦住了我。

“您有个车灯不亮，先生。”

“很抱歉，警官。”

“得罚款，”他对我说。

“我会付给您的，警官。”

警察用手电筒替我照着，接过钱，低声说了句“谢谢，您得多注意”，就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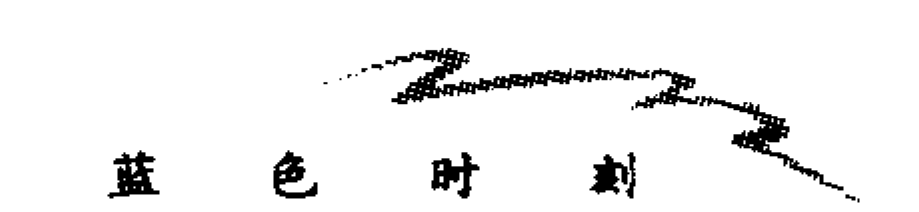
回到家，我给自己倒了杯酒。

十九

随后的几天里，我发现克劳迪娅有一定道理。虽然荒唐，可我还是觉得我与她之间有很大距离。我们还是同在一个卧室，我还是坐在她旁边看电视，有时候我们还一起去岳父岳母家吃饭。也还不时地做爱，挺高兴的。然而，我只有去看米丽娅姆的时候，才感觉到真正的愉快。

跟米丽娅姆说话，让我觉得比跟克劳迪娅做爱还幸福。我们约会的时间挺长。我总是星期二的下午去看她。我去接她，去米什基喝啤酒。我们总是单独在一起。

有时候，米丽娅姆会沉默很长时间。我们就停顿一会儿不说话。她的眼睛里有一种难以揣测的光亮，一种总是来自于很远地方的光亮。可是，尽管她有这种目光，我现在想，她并不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反而有点儿令人不快……



那段时间里，她总是穿同样的衣服：白色或蓝色的上衣，侧面绣着黄花的蓝工装裤，黑色尖皮鞋，她的动作很果断，可我总是觉得她好像随时会发抖。她的举手投足仿佛都不是她自己的行动，就像身体不是她的身体一样。

我不了解她，我永远也不会了解她。我也不知道她怎样感觉我：是仇恨、好奇，还是有点儿兴趣，也许是出于一点儿好感，她才跟我说了点儿我父亲的事。

一天下午，就我一个人在事务所。我忽然心血来潮，想到我们应该在她那个小区以外的一个地方见面。

下一个星期二，我建议她和我一起去圣伊西德罗。我是在她那儿跟她说的。她拿着钢丝刷，"去哪儿？"她问。

"我也不知道，咱们去圣伊西德罗吧，我住在那个小区里，"我说。

"好吧，我几乎不认识那儿。那咱们就走吧。"

去的路上，她跟我谈起米格尔在学校有进步。

我把车停在解放者大道的一条横街上，和她一起走到油橄榄森林。那天天气晴朗，块块云朵在天上慢慢飘动，忽隐忽现的太阳照耀在红色人行道上。

我想可能会有熟人看见我和她在一起，不过那个时候，我觉得没关系。

我们默默地走着，没有说话，不过我觉得在这种沉默中有一种默契，就像那是我们的一个到达点。

在我们周围，弯曲的油橄榄树干好像带着被拷打的表情，呆在那里一动不动。我们坐在离公路不远的凳子上，后面是座绿色大楼，前面是池塘，黑水就是从那儿流过来的。

一束阳光从裂开的云层后面透射出来。我看着她发亮的眼睛,还有衬衣和长腿的侧影。一股微风撩动着她的头发。

随着冲动的暴发,我握住了她的手,而在此之前,我一直抑制着这种冲动。我慢慢把头凑过去,看着她的侧脸。我碰到了她张开着的嘴唇,还感觉到她的头发在我面颊上轻轻撩着。

一只鸽子开始在我们面前跳跃,是只灰色的鸽子,抬着爪子,跳着轻盈的舞步。一群穿着校服的女孩,刚从学校跑出来,在我们周围踱步。她睁开眼睛,往旁边挪去。她看看公路,说咱们该接着走走。

回去的路上,我们没有说话。看见橄榄树旅馆,我提议去喝一杯。

"最好还是回我家吧,"她说,"有点儿晚了,米格尔大概已经到家了。"

"好吧。"

"我可以从这儿坐车回去,你不用送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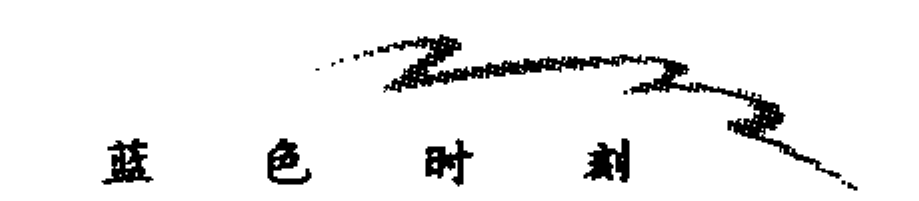
"我送你吧。"

回去的路上,我不时转过头去看她。

她快速下了车。

那天,一回到家,我就有种赴汤蹈火的感觉。一直有场运动在等待着我,现在我才明白,我必须退让。所以那天晚上,每当遇到克劳迪娅的时候,我都把目光转向旁边。

随后的一个星期,我和米丽娅姆去了维森大街的一家餐厅。她喝了瓶矿泉水和一杯咖啡。在车上,我们拥抱,接



吻。我仍然保持着对她徐缓的涌动激情。性总是处于亢奋的状态。我的身体沉湎于拥抱之中,好像进入了一个充满阳光的地方。

"我曾有过一个男朋友,"她对我说,"他是个好人,可他知道这事后,就不理我了。"

"他什么时候知道的?"

"他知道了全部事情的时候。"

"他是怎么知道的?"

"我自己告诉他的。"

"后来呢?你再也没有男朋友了?"

"没有了,再也没有了。曾经有过几个,他们接近我,可我不想了,我什么也不想知道。我再也不想这事了,不想男人了。就这么怪。"

晚上,一回到车上,我发现我的车灯和反光镜都被偷了。我马上换上了新的。

现在想起来,我觉得奇怪,可在那段时间里,还是比较自然的,我们从来没有谈到我们的情感。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说过她吸引了我,或我需要她,或我喜欢她。我甚至没对她说过,我总是等待星期二到来,好去看她。她也没有对我说过任何类似的话。我们当时只是见见面而已。

下一个星期二,我去美发店接她。出乎意外,她把我让进她的卧室里。一张铁床,白色墙壁,一个耶稣受难像,一张桌子和一个两眼煤油灶。米格尔的床在角落里。房间小而简朴。墙上有些画。

随后的星期二，我带她去拉罗莎航海俱乐部吃午饭。她从未想到能去那样的餐厅，她告诉我。她只是在商店旁边的木制人行道上走过，她曾依偎在栏杆上，看海涛汹涌，拍击着石头平台，又在柱子上撞碎。一群海鸥迎风展翅，静止在空中。

还没看菜单，她就点了黑黄油石首鱼。

“有点像福克斯夫人做的那样，”她对我说，“有人到她家的时候，她就做这道菜。”

我看她小心地移动着刀叉，把鱼切成小块，慢慢送进嘴里。在那张桌子上吃饭，周围是靠海的大窗户，她好像有点喘不过气来，不过她没有对我说这些。

她穿着蓝色上衣，黑裤子，戴着银项链，她说这是不久前买的，只是为了像今天这样的场合买的。那天是她的生日，所以推迟了一天，请她吃饭。

“米格尔怎么样？”

“不知道。要是能看到他更高兴点儿，我就好多了。”

“你怎么跟米格尔谈他爸爸？”

“说他把我们甩了，说他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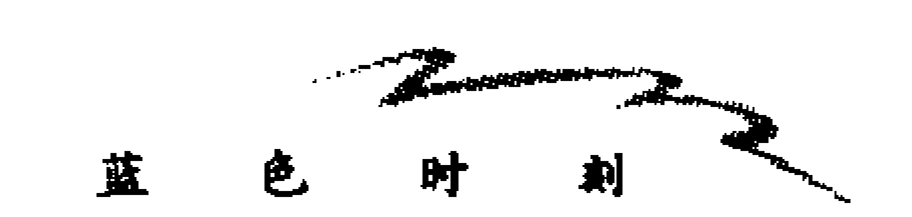
“学校里呢？”

侍者往她杯里又倒了些红葡萄酒。她望着侍者。侍者有礼貌地对她说了点儿什么，离开了。

“学校里没有人问他爸爸的事。”

“他学习怎么样？”

“成绩一般，可问题是他在班里特别孤独，朋友很少。



米格尔很少说话。”

“老师们怎么说?”

“我和他们谈过。不过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往心里去了。”

“看看咱们是不是能做点儿什么。米格尔需要赶快去看看心理医生。”

“你认为有必要吗?”

“咱们可以跟心理医生或某个人谈谈,帮帮他。”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好的办法。”

“好吧,要是你觉得行,就告诉我。”

吃完饭,她呷了口葡萄酒。一群穿戴像行政官员的人进来了。我认识其中一个人,一个叫雷纳托·拉奥斯的律师,他进来时,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带着微笑告诉我,他的事务所已经换到了新地方。我向他介绍了米丽娅姆。他看着她,说了声“很高兴”,然后说了句“向你家人问好”就离开了。

“他是谁?”

“一个同行。你跟我说说米格尔吧。”

“有时候他还好。周末他在家里帮我,有时候,我们还在家里小聚一下,邀请小区里的一些人来。”

“周末小聚?”

“总有邻居出点什么主意。有时候是肉鸡宴,每人自己买一份,大家聚在一起吃。我们还放音乐。我们打开收音机,自娱自乐,不过我也不知道,不知道我是什么感觉。有时候,我就去保利诺家和他姊妹家,就是我表妹家,我们聊

天，什么都聊，不过聊得更多的，是那些已故的人，我们谈他们谈得最多。”

“整个小区的人聚过吗？”

“每年九月十四号，我们都集中在一起。我们全都去看迈纳依圣女节。那是感恩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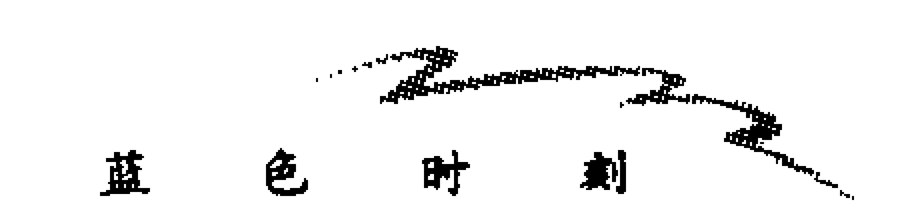
侍者推着甜食小车走过来。她不要，可我想说服她要点儿什么。

过了一会儿，我们往停车场走。直到上了车，我们什么话也没说。浪涛涌过并盖住了石头。我为她打开车门，她有些奇怪地望着我。我坐在方向盘前，“谢谢，”她对我说。

一上车，我就开始吻她。

一个长长的吻，热吻中我感到了她皮肤淡淡的咸味和一种回味无穷的温润。她把手放在我的脖子上。

我斗胆简述一下接着发生的事情过程。尽管我不知道，我是否为已经发生的事情后悔，我现在还是深感羞愧。我们来到米拉弗洛雷斯的一条街道上，街上阒无一人。她跟着我。我觉得我是在空中行走。我们走进一个旅馆的房间，好像我们已经决定在那儿住了。刚一关上门，我们就开始拥抱，接吻。房间有个大大的窗户，微弱的光线照在床上。我现在还不能忘怀的，我的嘴唇不能忘记的，是她如何缓慢而又暴风骤雨般地吻我，她恬静而热烈的湿润嘴唇吻在我的嘴唇上。她的眼睛像两个坚硬的物体，有种晶莹的深邃。现在我还能想起这对眼睛，我觉得它们就像打开入口的两个深洞，激励我开始一次漫长的旅行。我们一起脱衣服。我忽然觉得在她面前很无助。她灼热的皮肤征服了



我。她奉献，同时又逃脱。她的腹部和腿在我周围盘绕，可是她的脸好像定格在远处。我感到一股柔情在我体内上升，迫使我去包围她，并让我确信我要给予她的，只能是我的身体。刚进入她体内时的狂暴和温情让我相信，只有我们单独在一起。在这刚开始的沉静中，只有她和我。

那天晚上，回家的路上，我把车停到了离小区一个街区的地方。电线杆上的灯光洒落在树叶上。

我觉得自己都瘫倒了。我想米丽娅姆，就像我们正在经历着一个美妙的故事，这有点荒唐，我只能大声地说话，想说服自己。你是个律师，是个已婚男人，你有两个女儿，你现在感觉到的(或者我们说，你以为感觉到的)完全有悖于你的身份，这如果说不叫人感到愤怒的话，也几乎叫人感到可笑。

第二天，我把事情告诉了普拉顿。

“你别犯傻了，你太抽风了，”他对我说，“当你想见她的时候，最好喝点酒。”

下一个星期二，我去接她，看见她出来时，打扮得像要过节似的：头发浓密蓬松，嘴唇形成了柔和的弧线，手指甲很长。

她一上车，就跟我讲她前一天过得特别好。第二天还有个洗礼和婚礼，大家都想打扮得漂亮些。美发店里挤满了人。

“人活多长时间才算好?”她突然问。

“多长时间？”

“是的，三十，四十，还是五十岁？你觉得人能活多长时间，你觉得？”

“不知道。能活多长活多长吧。”

我们在红绿灯前停下车来。一辆装满干土的卡车在我们上方颤动，我们离它太近了。

“可你觉得哪个数字好？”

“哪个数字？”

“三十，四十岁？”

“这我没想过。”

“我一直在想这事，一直想。”

“为什么？”

“不知道，”她说着伸开了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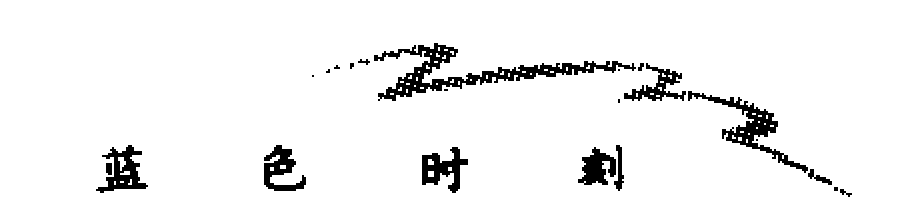
“你为什么会想这种事情？”

我关上了汽车发动机。

她看着我，摸着我的手，用胳膊搂着我。我在她脖后颈上吻了一下。她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

那天晚上，我回家的时间比以往晚些。克劳迪娅看都不看我，继续睡觉。我尽量隐瞒我出去找米丽娅姆，找了些平常的借口：有会，还有会，还同客户吃晚饭。说实话，我觉得真对不起她！

一星期后，出了件事。米丽娅姆和我去维塞大街一个颜色刺眼的餐厅吃饭。我们要了两份比萨饼。从我们一到



餐厅,我就觉得会发生点奇怪的事情。米丽娅姆眼圈发黑,面目憔悴,好像特别心神不定。

从上车开始,她就不说话。她坐在我身边,几乎一点儿没吃。她差不多没有回答我有关她近几天事情的问话。最后,就要吃完饭时,我也不说话了。再继续问也没用。

“你要是不跟我说话,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出来,”我对她说。“你最好还是呆在家里。下一次,我另外找个姑娘,她至少能跟我说话,不像你,跟木头似的。”

她没有动,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已经准确地预感到她将要做的事情。她两手放在桌子上。一切都发生在四五秒钟内。猛然间,她从桌子上抓起餐刀,嘴里发出短促的叫声,直向我的喉咙刺来。我把头偏向一边,可她还是划到了我,一点儿血滴到了我的衬衣上。她重新拿着餐刀向我进攻,可在这个时候,我抓住了她的胳膊,迫使她放下家伙,餐刀掉在了地上。她站住了,长头发披散在她脸上,她用她冒火的眼睛盯着我。她走到公路上,消失在公路另一侧的一座墙后面。

我出去找她,可是没有她的踪迹。我上了车,血已经不流了,衬衣上留下了血渍。

我驾车慢慢向办公室驶去。我只是希望没有人看到我。我在办公室有件备用衬衣。伤口疼痛,可不是很厉害。我在发抖。

到了办公室,我迅速从珍妮前面穿过。我洗了洗,换了衬衣,坐在办公桌前。克劳迪娅在她母亲家,今天是她妹妹卡明查的生日,我待会儿也得过去。

我想给米丽娅姆打个电话，可后来放弃了这个打算。

我再次驾车行驶在维塞大街上，从我们刚才吃饭的那个餐厅旁经过。我顺着公路和土路走。美发店已经关上了门。小区里鸦雀无声。我敲了敲门，没有人回答。一切显得都很静。

我忽然转了个身。

她就在那儿，离我只有几厘米远。她盯着我，眼珠都要瞪出来了。她走近我，搂了一下我，她哭了。

“我请你原谅我，”她对我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知道。”

我们上了车，又回到公路上。我在路边寻找旅馆。

那天下午，我们裹着被单，从旅馆的窗户里看一个小孩放风筝。真奇怪，我从未这样近距离地看过风筝。小孩双手拿着龙舌兰线轴，风筝迅速上升，几乎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之外。

“我也有个这样的风筝，”她忽然对我说，脸上带着微笑，“我的风筝有个长长的尾巴，是在我们镇上做的，我们用自己衣服的碎片做了个尾巴。”

“风筝？”

“对，你不喜欢放风筝吗？你不觉得自己可以飞到天上吗？”

“说实话，我从来没有过风筝，也没想过要有。”

她又转过头来，像是在看小孩。

“他跟米格尔年龄差不多。”她说。



“对。”

“你知道，我正教米格尔画菜园，我们家有个小菜园，就跟原来我们家的那个一样，完全一样。他有时候就画我们的菜园，画了好几张呢。”

有一段时间，我们没有说话。

是不是到问她的时候了？

应该问她。

怎么问呢？

“告诉我，米丽娅姆，跟我说实话。咱们先不谈别的事情。”

“大概应该是这样：告诉我，咱们能不能把事情最后弄清楚？米格尔是我弟弟，是我父亲的儿子，我和你也算是一家人？”

我感到远处有车声，俨如浪涛汹涌。一阵马达声高了起来，宛若一声长叹。忽然，我听到了小鸟的尖叫声，尖叫声就从我们附近的地方发出来，我看不见小鸟，可是能听见它们的声音。也许它们在房顶上。

阴郁的天空犹如一大块暗淡的毛玻璃，几乎要把我们吸纳进去。她的眼睛在燃烧。

“你相信上帝吗？”她突然问我，“你相信上帝和圣母马利亚吗？”

“不全信。”

“我信，”她说，“我从来没有不信过。直到那次我割静脉的时候，在划破静脉之前，我还念叨着耶稣的名字。我知道不管他在干什么，他总会和我在一起，我清楚。”

“你跟米格尔说过这些?”

“对,我跟他说过。”

“那他呢?”

“他有时候跟我一起祈祷。”

“你没跟他说过他爸爸?”

“没有,我们不说这些。”

顿了一下。我又一次问自己,是不是到时候了。事实上,从来没有一个合适的时刻。需要她倾诉的话已经私下说过多次,当然还会继续说下去,而现在又正好与她面对面。

我尽力面对着她并露出微笑。

“告诉我,米丽娅姆……”

“什么?”

我坐在垫子上,突然意识到我的姿势有点儿荒唐,好像一个法官坐在审判台上。我把胳膊放了下来。

“告诉我,米丽娅姆,你儿子…… 是我弟弟?”

她看着窗户,一种微笑的抽搐瞬间改变了她的表情,不过她又马上恢复过来。

“不。”她低声说。

“好,那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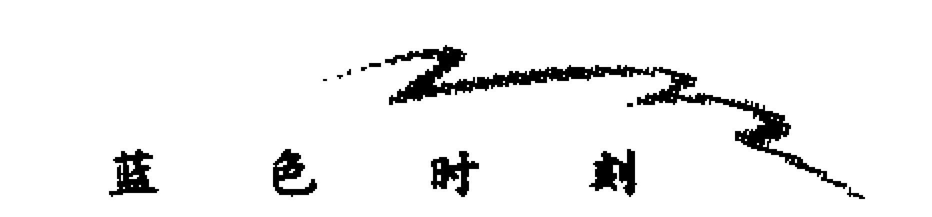
“那么什么?”

“没什么,没什么。”

“你想知道谁是米格尔的父亲?”

“不,没必要。”

她不说话了。



“真的，这并不重要，是不是?”她终于开口了，“这事不重要。米格尔就在那儿，他是个孩子。我也不知道他将来会怎么样…… 我只想，是的，我唯一想的就是他……他能够无忧无虑地生活，没有悲伤，没有像现在这样长时间的沉默。这就是我想要的，真的。”

她抱着枕头，然后又伸出手来，让手在被单上滑过。

“对于任何一个母亲或父亲，最重要的就是知道他的子女过得好，”我忽然说道，自己也觉得滑稽之极。

她把头靠在靠背上。

“我特别害怕，真的，我害怕已经过了这么多时间，我害怕他长大。”

她的声音如同一根看不见的游丝。

“可这为什么?”

“因为等米格尔长大了，他的沉默也会与日俱增。我总是想这个事，因为他几乎从来不和其他小孩说话。他只跟我说话，跟梅尔乔拉夫人说话，有时候也跟他舅舅说话。可他说得不多。等他长大了，我也不知道，这种沉默也许会更加严重，可能使他更暴躁或更忧郁，比现在还糟糕。有时候我看他发愣，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觉得他会不会出什么事?”

“我跟你说过，咱们可以带他去看心理医生。”

“可是如果心理医生询问他，很多事情都会回到他的头脑里，尤其是我的事情，他见我哭过多少次，会有很多事情出现，我觉得这样不好，对他更加不利。”

“他没跟你谈过?”

“谈过，跟我谈过几次。可他去了学校，从学校回来还是那么孤独，他很少有朋友，对我也很厌烦。他才十三岁。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我可以把他带到能有人帮助他的地方去。”

她摇摇头。

她穿上了衣服，我也把衣服穿上。我们站着，面对面。她走到门口，手里拿着发夹。她突然转过身来，背着手，面朝墙壁。她的嗓音里没有任何情绪激动的表现。她看着我，目光炯炯。

“我希望他不要记着我，我不是来给他讲有关他祖父的事情的。他也不该想这个。他不应该想到他的舅舅和外祖父母被人杀死了，想到我曾经在万塔经历的战争，以及所有有关我父母的事情。他得住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得觉得自己能够生活下去。你不觉得这是一个母亲所能够给她儿子的吗，但这还不够，或者说还不仅仅这些，还得说服他必须要活着，让他想到还有很多好事在等着他。晚上，他祈祷的时候，请求上帝让他感觉良好。他必须想到他能够过得好，即使他在这儿，即使他没有太多的希望，好吧，我也不知道。但愿米格尔过得好，即使他总是遇到问题，也能过得好。这就是我现在想的，所以我不想让他知道以前的事情。我希望他有一天能够工作，能有朋友，能有个家庭。希望他健康，他能有吃的，有衣服穿，也有个家庭，有间房子，一个他能天天回到那儿的地方。有时候我想，他的生活会怎么样呢？他的情况会怎么样呢？他总是这样少言寡语，以后能摆脱这种状况吗？他有一天能够上好大学吗？他能上班

吗?他能有个家庭,过正常生活吗?我只能给他悲伤吗?我每天有的只能是悲伤吗?我必须有希望,你不这样认为吗?我必须这样想,我必须让他想到,他也能这样,不过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我也不清楚。有这么多死人跟你说话,一个女人要有希望是很困难的。”

她走到床头柜旁,拿起了水杯。

“你不能丢掉希望。”我终于开口说话了。

她朝下看着。

“你知道吗,有一天,米格尔对我说‘我特别爱你’。他就是这样对我说的。”

“他知道他会永远和你在一起。”

我们俩人都不说话了。

“现在,我一看你,觉得你有点儿像你爸爸。”她对我说。

“我像他?”

“对,有点儿像,眼睛,脸型,有点儿像。还有,你和他一样,有些方面你跟他有点儿像。他是个暴躁残酷的人,可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他很脆弱,和我在一块儿,他特别脆弱。”

我垂下目光。此时听到旁边某个房间的电视打开了,接着又没声了。

“你不恨他了?”

“我恨他,可后来我喜欢他了,我特别喜欢他,我却必须离开他,可是我仍然喜欢他。你爸爸是最坏的人,可是和我在一起,他又是最好的人。他把我关起来,可又没把我杀掉。你知道吗,士兵们会强奸我,杀死我?他把我关起来,强迫我和他在一起,可我看他又是如此脆弱,我也不知道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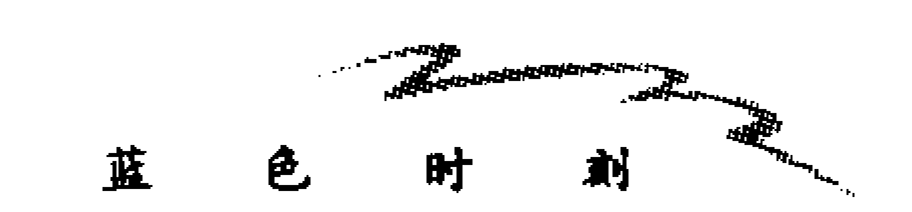
什么，他多次请求我原谅，对我说他感到恐惧，他和我生活在一起就踏实，然后他就说他爱我，他给我讲他的生活，那么多的事，有时候，他还跟我谈起你们，你们的孩子。他待我好，可是我……”

“……如果你不跑，你会死在那儿……”

“他只能杀了我。他只能放了我或杀了我。甚至有一次，我看见他哭了，我尽力想让他感觉好点儿，因为…… 我见他说到了你，他哭着说到了你和鲁文。他怕你，我觉得。他谈到鲁文，说了很多鲁文的事。总是阿德里安和鲁文。现在，我看他有道理，你是个好人，比他还好，可也和他一样。”

“看来你比我还了解他。”

“可你爸爸又做了那么多可怕的事情，他派兵杀了那么多人，他又特别怕光辉道路分子来了，把他也杀了，不知道，我看他害怕，有时候我们搂抱在一起，好忘了我们自己，或者忘了我是他的囚徒，我们也会被杀掉。我只是想回去看看我的家人，可是他，好吧，他已经知道我家里没人了。可是我不知道。有一次，他对我说，但愿我们能永远在一起，可很显然，我们不能，我们不能，他有一天会离开万塔，那么我也得跟着走，无论如何，我都得离开。我还太小，才十七岁。我要么逃跑，要么死掉。我跑了。可是现在，我已经没腿可跑了，或者说，我已经没心跑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可不管怎么样，太累了，好像都累到骨头里去了，你站起来，活动，走路，干活儿，跟人说话，做事情，可我的身体已经承受不了了，我特别想我的家人。我特别想他们，我和我的家



人一起成长。我想我爸爸,每天早晨我和他一起去菜园;想我妈妈,我和她一起用大锅给大家做饭;我还想我的兄弟安东尼奥和豪尔赫。豪尔赫还是个孩子,可眼睛特别大,总是问我能不能有一天从那儿跑出去。他这样对我说,'咱们有一天能从这儿跑出去吗?咱们找一天从这儿跑出去?'可是豪尔赫没跑,我爸爸也没跑,我妈妈…… 他们都留在那儿的某个地方,留在那儿了,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尸体在哪儿,将来会在哪儿。我好像看见了他们,看见他们在我家门口,我不知道他们到底留在哪儿了。"

她降低了声音,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说话。

"噢,可是你只能离开他们,让他们消失。你什么也做不了。"

"你觉得米格尔怎么样?"

一道长印横过她的额头。她已经坐到了床上。她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脚微微向前晃动着。

"我想了解他,帮助他,我对你说过。"

"可你觉得合适吗?"

"他是个挺精神的孩子。"

她额头的皱纹消失了。她不说话了,眼睛向下看着。

"最近,我祈祷得越来越多,可我自己编祷告词,我自己编的。我同上帝说话,对他讲我那天做的所有事情。我还跟他谈到了你。"

"你每天晚上都祈祷吗?"

"每天我都编一段新的祷告词,就像我穿了件新衣服。"

"你这么信上帝?"

“当然了。我还要穿上我的好衣服跟他说话。”

“你喜欢穿得好?”

“是的,我喜欢穿得好。不过我穿得好不是为了给别人看,而是给自己看的。我喜欢自己穿戴,梳发型,也喜欢让别的夫人好看。”

此时,街上有人打开了收音机,收音机里播放着萨尔萨音乐,是奥斯卡·德莱昂演唱的。

“告诉我,你需要多少钱买下美发店?”

她向一边看去。

我感到,她对我跟她打听价钱有点不自然。奥斯卡·德莱昂的歌声继续高声播放着。歌曲结束了,接着就是一个颤动的声音“刚才你们听到的是萨尔萨之王的歌”。

“没关系。我关心的,或者说我最关心的是米格尔。跟米格尔有关的事情你关心吧?”

“是的。”

她又站了起来。

“告诉我,我去美发店的第一天,我们初次见面,你怎么知道我去找你了?”

“我叔叔比托里诺说的。还有保利诺·巴列。我跟他们说,我不想见你。可你还是千方百计地找到了我。”

“你后悔了?”

“没有。”

我低下头,吻了她的手。我感受到了一种湿润的温热。

“我不能不见到你,”我说,“我必须得找到你。”

“可你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她说,“你从很远的地方来,

你该知道这个,对吧?"

"为什么?"

一阵长长的微笑掠过她的脸,那是一种咧唇露齿的微笑,就像一个长长的伤口刚刚绽开。黑纱巾罩住了她的脸颊。我想对她说,我好像爱上她了,可我忍住了,我觉得这有点太荒唐了。

"好吧,我觉得我们该走了,"她低语着,"是不是晚了?"

我开着车,慢慢向她家驶去。

下车之前,她望着我,微笑了一下,在我的嘴上长时间地吻着。猛然间,她离开了。

我看看表,还不算晚,可以去岳母家露个面,祝贺小姨子的生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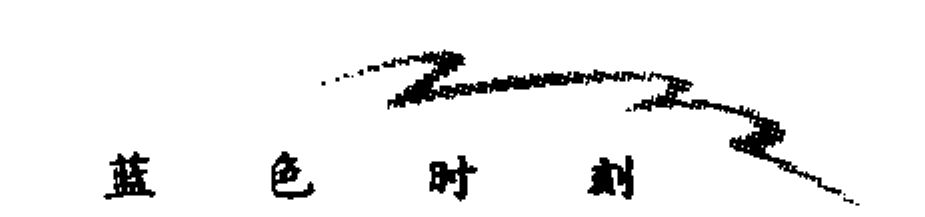
二十

一到公路上，我就有一种困倦的感觉。米丽娅姆望着我，山间的道路一片昏暗，阴影重重，你感觉怎么样，米格尔？路上的交通信号灯把我阻在了一辆公共汽车的后面。

红灯一亮，过来一群常守的乞丐。我一般情况下都不会转头去看。但是，那天晚上，我注意到了一个扎辫子的姑娘。我给了她一个钱币。

吃蛋糕的时间，我到了岳母家。

第二天，我很早起了床。我给露西亚检查了作业，她就要考试了。她正在研究行星。“在冥王星上，温度低于二百二十度，在海王星上有风速高于每小时两千公里的风。能有这么大的风吗，爸爸？”



办公室里，爱德华多见到我，告诉我一个前一天发生在波查·格拉床上的消息，她是我们一个客户的夫人。“我正和她在一起，突然手机响了，学校来电话，说她女儿患腹泻，于是她就在电话里告诉老师应该吃什么药，并且马上派人把女儿接回来，听见了吗，真有意思，可挺扫兴的，不过也挺有意思。”

星期六，我和露西亚去了电影院，去看巴特曼的最新电影。她所有的女友都看见了她。我拉着她的手进出电影院。有一段时间她拉着我，不过后来又松手了。当时，我们在迪亚戈纳尔大街上。

一大群人在街上转悠，我和露西亚坐在公园的一个凳子上。她给我讲了学校里一个男生的事：他叫拉米罗。课间休息的时候，他走过来，让我们请他吃点东西。

“你们请他了吗？”

“请了，我们觉得他有点可怜。他有时也带点饼干来。”

“你不要吃他的饼干，露西亚。是什么饼干呢？”

“那个男生是什么人？”

“一个小屁孩儿，爸爸，你别担心。你总是那么多心。”

星期天，在克劳迪娅父母的家里。岳父那几天总是滔滔不绝，什么都谈。他刚刚去过迈阿密的一个海鲜餐厅，在那儿吮手指头。餐厅的服务生待他很好，已经记住了他的名字。

星期一,我与一个客户在拉埃涅餐厅进午餐。这是巴莱罗·帕尔马侯爵的餐厅。我正品着红葡萄酒,吃着带鱿鱼的海鲜饭,手机响了(我还想着那被铃声打断了的黑色米粒)。

“你好,奥马切先生。”

那是一个塞擦音,模模糊糊地有点熟悉。

“怎么回事?”

“我是保利诺·巴列,先生,您还记得吗?”

是那个在万塔二区的家里为我打开带玻璃铁门的男人。

“保利诺,是的,你好吗?”

“米丽娅姆刚刚死了,先生。”

我看着盘子里的黑米粒,孤独的半杯酒,抬起头,站了起来,沿着过道走去。

“米丽娅姆?”

“是的,她刚死了。我们正在她家里为她守灵,在美发店,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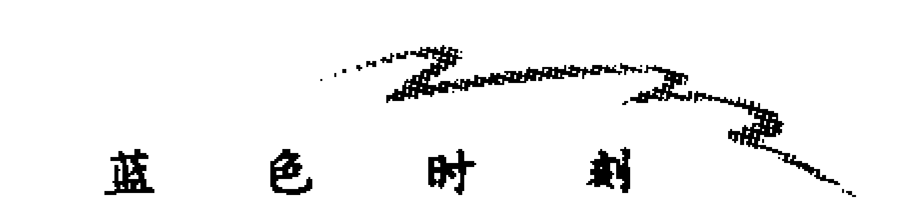
“噢,谢谢,保利诺。我马上过去。”

我收起手机。

我走到我的客户塔托·阿里松先生面前。这是个塌鼻子、粉红面颊的家伙,脸上雀斑点点,两只爱尔兰眼睛随时准备微笑。

“有什么问题吗?”

“是的,你看,塔托,这个事咱们是不是明天谈?我有急事。”



“行,那么我把所有文件都送到你办公室。”

“交给珍妮,”我说,“我今天下午就看。”

我留下一张钞票付账,迅速离开了。

我发动了汽车。路上两旁的汽车都落在了后面。我从一辆蒂科车前面穿过,那司机冲我喊着什么,我继续踩着油门飞驰。

油门已经踩到了底,汽车狂奔,好像争取时间就能在她死前见到她似的。无边的灰色天空高高在上,五颜六色的小公共汽车都被甩到了后面,维塞大街似乎永无尽头。我很难想象我曾经拥抱过、进入过的身体会夭亡,被死亡的恶魔擒获,嘴唇冰冷,眼球泛白,成为一个陌生的身体,躺在某个棺材里。前几次我也走过这条路,当时她在等我。现在她再也不会等我了。然而此时,我正从一堆小公共汽车旁经过,脚踩油门,手按喇叭,低声重复着她的名字。到了马里亚特吉雕像,该向左拐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在冒汗,手都快抓不住方向盘了。我松了松领带,看见雕像时的身体反应,就像前几次一样,催我到她家,看她上了车,依偎在我身旁。保利诺说,米丽娅姆刚刚死了,先生,这话却产生了一种她正在接近我的感觉。米丽娅姆刚刚死了,她最后还是死了,以死亡告终。就好像她刚刚生活了一天就死了一样。一个提前到来的结果,一个在她生活中多次预见的结果。

在拐角处,在拐到那条街之前,我停住了车。我突然迸出一个想法,我没必要到那里去。我可以回去,这很简单,

回到我家，不要知道任何有关她、有关米格尔、有关我父亲的消息。她的死亡已经结束了这段涉及我声誉的历史，我已经没必要向任何人做出解释，要想让事情这样了结很简单。回到我的办公室，接受塔托·哈里森的文件，给他转过一笔钱去，只要听到他的某个家人说话，就把电话挂了。我用手指敲打着方向盘，回味起我第一天在她家门口想起的那首歌："马丽有个小羔羊，小羔羊，小羔羊。马丽有个小羔羊，有一天她会把它杀掉，把它做熟。"

我把车熄了火，随即又发动起来，继续向前驶。已经很近了。

到了那条街，我看见一群人穿着黑衣服。

这几乎让我感到难堪，我的沃尔沃就像一条黑色的船只进入了尘土和乱石的海洋。我被居民区里的人包围了。有的人看着我，还互相窃窃私语。那个时刻，我觉得他们都在仇视我。幸好，过了一会儿，谁也不大在意我了。

就是在我第一次见到她的那个房间里，镜子和图片已经被摘掉了，椅子都靠墙放着。

那个大木头箱子放在一堆砖头上。

一条长凳上坐着一排妇女，有两三个女人把手伸在胸前做祈祷。

我走近棺材，那是一副薄木板，钉着几个钉子，上面放着一个长十字架。有几对目光跟随着我。

忽然听到有人叫我，我转过身来。

是保利诺。



我们走到街上。

“她是怎么死的?”

“心脏病,”他把手放在胸前说道,“她犯了梗塞。堂比托里诺这样对我说的。”

“她当时在哪儿?”

“昨天晚上在她家里。可怜的小米格尔当时没和她在一起。比托里诺先生发现她时,她已经死了。”

“既然心脏不好,以前为什么不想想办法?”

“她不知道,我觉得。她不知道她身体不好。她留下的钱正好可以买这个店铺,并支付她的安葬费。她昨天向比托里诺先生付了最后一笔款。小店已经是她的了。她去做了弥撒,还做了忏悔。一切都完成了,她就死了。”

“她为什么不告诉我她心脏不好?我本来可以帮助她。”

保利诺的眼睛闪着亮光。

“我不知道,先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肯定她不知道她身体这么糟糕。”

一群妇女开始高声祈祷。

我们上了路。

来了一辆深紫色的现代牌汽车。车停稳之后,我看见比托里诺·安科先生从车上下来。

他还穿着我在解放者大道办公室里见到他穿的那身三件套。他看见我,好像并不惊奇。他向我点了下头,扬长而去。

“巴列先生,”我再次转向保利诺,说道。

“哎。”

“那天我来这儿找她，您为什么不告诉我，米丽娅姆就住在这儿？”

保利诺看着我。他眼睛里有一道血丝。

“她不想见到您，先生。她从堂比托里诺先生那儿听说您正在找她。她都知道。”

“她不想见到我？”

“她最初不想知道任何有关您的事情。可后来，她跟我说，她想了解您。再后来她就等着您。我本来想给您打电话，可她不让。‘你别打，他会来的，会来的……’她总是这样说。”

“可您为什么对我说，她可能在阿亚库乔？为什么不告诉我她就在这儿？”

“好让您不再继续找她。她就是这样跟我说的。为了让您不再来。可很快她又跟我说，‘您跟她挺好的。’前不久，她这样对我说。”

又有新的人群进来，他们向前伸着手，低着头，有的人脖子上还戴着念珠。前面有一片窃窃私语声引导着他们。

在墙边，我看见了米格尔，他穿着黑色的衣服。

孩子拉着梅尔乔拉夫人的手向前走，人们已经为他穿戴好守灵的衣服，黑色的上衣、领带和皮鞋。

安科先生过去拥抱他，可他几乎没动。

这时，一辆带着出租车标牌的轻型载重车停在门口。一位孱弱的白头发神父下车，走了进来。一小群人围拢过来，神父重复了几句祈祷词。



那是个悄然无声的聚会。从一阵轻微的声音,勉强能听出是在念玫瑰经。一股汗味和土腥味。神父抬起手,祝福大家,然后离去了。

我靠在门边,双手背后,肩膀和背上沾满了尘土。我对那些人感到一种极度的恐惧。我是个生人,关于我的情况,有的人了解,有的人怀疑。

米丽娅姆的棺材就停放在我面前。这差不多就是她的计谋。认识了我,讲给我一些事情,然后死了,在她的守灵仪式上给我留下了这个无言的审判台……

一群小伙子进来了。他们都穿着三件套,三人一组,分列两侧。棺材被抬了起来,缓慢地浮升到肩膀上,又进入了那辆带着出租标牌的白色轻型载重车。

我随着那一小群人走在泥土路的街道上。

我走在保利诺·巴列身边。不知为什么,和他在一起,我感到安全。

我们跟在载重车后面行走。到了山的最高处,又往下向平原走去。有块地方,那里有十字架和片片草坪,在几块石头上面用白粉写着铭文。

载重车走了近半小时。我们似乎逐渐走进了一个越来越白的氛围中。我的裤子和鞋上布满了灰尘。

我们来到一小块平地上。

有人已经挖好了坑。男人们用两根绳索把棺材放了下去。神父说了几句话,我们有几个人重复着"我们为你祈祷,夫人"的句子。接着,一个男人开始填土,女人们哭声四起。

回来后，她家门口汇集了几组人群。我看到了比托里诺·安科先生。

“她没留下个字条，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她恰恰就是在昨天还清了欠我很久的钱。”

“谁来照顾米格尔？”

“她的邻居，梅尔乔拉夫人。”

“他怎么样？”

“他一言不发。他的两个朋友来过。”

“噢。”

比托里诺走了。

“您为什么今天要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她死了？”我问保利诺。

“是她告诉我，万一她有什么事，就给您打电话，博士。”

我看到有个人站在街上。他穿着件脏兮兮的衬衣，头发垂在额头前。我觉得他特别脏。他的头发乱蓬蓬的，面部表情呆若木鸡，他身上的所有东西都让我产生一种本能的恶心。那个人看看我，慢慢地走开了。

我去找梅尔乔拉夫人。她圆脸，眼睛都哭肿了。她见过我几次，可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话。

“她跟您一点儿都没说过她有病吗，夫人？”

“没有，一点儿也没说。她不爱谈这种事情。”

“米格尔在哪儿？”

“在里面，在那儿哭呢。”

“我能看看他吗?”

“请进,先生。”

我走进房间。他坐在那里,几乎一动不动。我蹲了下来。

“米格尔,听我说,我非常遗憾。”我说。

他双手托着脸,身子没有动。

“我想来找你,就明天吧。咱们可以出去转一转。”

他抬起头,眼泪汪汪,却用一种冷漠的目光看着我。我站起身,走出房间。

“我明天能来接米格尔吗?”我问梅尔乔拉。“看能不能开车带他转转。”

“您是米丽娅姆的什么人,博士?”

“是她的一个熟人。我来接米格尔,夫人。明天差不多四点钟来。”

夫人朝保利诺那边望去。

“那么,好吧,”她说,“米格尔需要人帮助他,博士。”

“您有他的出生证吗?”

“是的,米丽娅姆把他的出生证留给了我。”

“我能看看吗?”

女人出去了。就他一人时,米格尔看了我一下,又低下了头。

“在这儿呢。”她说。

出生证的日期是由卢里甘乔的圣胡安市政府填写的。父亲不详。

“行了,夫人,非常感谢。我明天来。”

她点头同意。

我又走近米格尔，真不知如何向他告别。我伸出手去，拍了他几下。他几乎没有动。

在路上，保利诺靠近我。

“您能给我点儿吗？”他问我。

“什么？”

“您能不能给我点儿钱，随便多少，一点儿小费？”

我给了他一张钞票，他赶紧收了起来。

“谢谢，博士。”

“没什么。”

“我能问您点儿事吗，博士？”

“可以。”

“您能在您的企业里给我找份工作吗，随便什么工作？”

“不知道，我没有企业，保利诺。”

“可您在大企业里有朋友，对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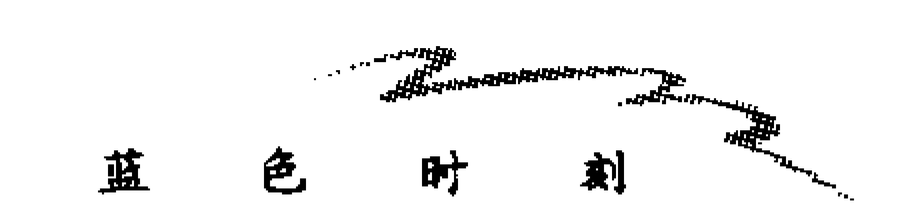
“噢，是的，看看再说吧。”

他低下头。其他人在看着我们。有个人走过去，向他要我刚才给他的那张钞票。保利诺同他嘀咕起来。

我到办公室时差不多五点了。

塔托·哈里森先生已经把签好的文件用一个牛皮纸信封送来了。我坐在我的办公桌前。桌子上的东西好像蒙上了一层阴影。我眨了几下眼睛，阴影还在那里，在一块深色玻璃的后面。

我在椅子上如坐针毡。我终于站起来，在办公室里从



一边走到另一边。我走进浴室。突然电话铃响了。

是克劳迪娅。

“你去哪儿了?”

“参加了一个葬礼。”

“谁的葬礼?”

“米丽娅姆的。”

“谁?”

“我父亲的那个姑娘。”我说。

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天晚上,我吃了几片药,以便能够睡着。药终于起作用了。幸好克劳迪娅没有问我许多问题。

第二天,我同一个新客户共进工作早餐。我和他约好在小白店见面。八点半,我到了。在单间里服务的当地女孩们,是些混血儿姑娘,穿着瑞士农民的服装,这种气氛让我感到一种极度的悲伤,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拿着报纸,在一堵温情的木墙边落座。

我向门口望去。我的客户,阿特亚加先生还没来。

侍者给我送来咖啡。我吮了一口,把嘴唇烫了一下。

我并没想捂住脸。一群穿三件套的男人从我身边经过。我只稍稍低了下头,埋头看报纸,报纸让人焦躁。

拉尔科大街上的车流声使这个地方更加嘈杂,一种乱七八糟的打击乐般的节奏经久不息。

我揉了揉眼睛,向四周望去。我想要杯酒。这时我的客户进来了,我向他伸出手。

我们开始讨论他的新企业。

下午,我去看望米格尔。他在美发店旁梅尔乔拉夫人的家里。

只是这时,我才注意到了他同米丽娅姆的相似之处:明亮的眼睛,阴郁的额头上一道长长的眉毛,厚嘴唇。他就是她。

"我是阿德里安,你还记得吗?"

他没有回答我。

"你愿意明天跟我一起出去吗?我们去吃冰激凌,你觉得好吗?"

"他总是这样,"梅尔乔拉夫人对我说,"已经很长时间了。"

我给了梅尔乔拉夫人一张一百索尔的钞票。给她钞票,我感觉很好。这是个自私的行为,就像给我自己钱一样。

"给他用,我以后再给他些。"

"行,谢谢,博士。"

当天晚上,我失眠了。

两点钟了。我还瞅着床边的小灯,沙发椅,窗帘。

我透过窗户望去。公路上是一片可怕的寂静。

我来到客厅,坐了下来。

我又站起身来,喝杯水。

米丽娅姆。米丽娅姆。



那几个星期,我看见了她,听到了她的声音,触及了她的嘴唇,了解了瓜约和查乔故事背后一个身体的存在。

这几个人的形象在空气中形成了一个旋涡。它们就像黑暗中的明信片,似乎每张都在看我,我在美发店里见到她的第一天,我们去马克斯先生那儿聊天的那天下午,我在那里拥抱过她的油橄榄树林,她向我说出她对家人的思念的旅馆房间,她要求同我见面的第一天。猛然间,其中几个场景形成了一个链条。

那天下午她为什么给我打电话?她在美发店里拒绝和我出去之后,为什么那天下午又给我打电话?也许那天她发现了自己的心脏有问题?她那天给我打电话,找我,是不是就是想找个人,能够把孩子放心地托付给他?就是为此,她才允许我跟她在一起,也许就是为了这个,她才问我,米格尔怎么那么像你?因为她知道她随时随地都可能消失。

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也许这不符合情理,我不知道。

现在,她的身体像个幻觉出现在我面前。那几个星期里,米丽娅姆曾在我身旁呼吸,她和我说话,她的手抚摩过我的手。我曾想得到她,拥抱过她,同她做过爱。我曾以一种向往和一种无法解释的忧伤思念她。她的声音吞噬着我的心。我仍然能够感到她温暖的皮肤,她头发的柔和击打,她那在我背上划过的指甲。她的身体在黑暗中重建了一个娇柔的完美。她的眼睛正在我的身体里看着我。她就像未婚妻一样来到了我的生活中。给我们带来这种关系的事实缘分继续留存在这些沉积的小小回忆里。好像只有现在我

才准备好，接受父亲临死前孤守在床时跟我说的话……“有个女人在万塔，”他跟我说过，“你必须找到她。”那些胡言乱语般的喃喃之声却像火种一般留存了下来。“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你父亲是个脆弱的人，就像你一样，是个脆弱的人。”米丽娅姆的话又唤醒了我父亲，他现在就站在我面前，就在客厅里，穿着他那墨绿色的军服，戴着饰带。她为我重建了这个幽灵，把它还给了我。我只能感谢她。米丽娅姆的到来打开了冷漠宫殿的大门，宫殿里的大厅我都已经去过。极度的恐惧和小心形成的堤坝，使我从第一次打听到她时就开始退却了。比尔马·阿古尔托只是一张入场券，由此开始了一场迷茫的通向罪恶的魔怪地区，通向我父亲和米丽娅姆曾经居住过的王国，通向那块嘈杂地带的旅行，刽子手和军官们就从那个地带经过。我自私的小心谨慎和我不开化的高雅，使我在此之前一直远离他们，我已经习惯于以一个鬼脸来排除外界的小问题，我已经准备好在客厅里与莱蒂西娅·拉雷亚，阿罗多·加拉，我的合作伙伴爱德华多坐在客厅的软垫上之前，关上这充满无尽揶揄的窗帘。死亡、贫困、残暴，都曾作为现实的偶然事件和短暂的无关片断从我面前闪过，我必须迅速把它们忘掉。现在我却觉得它们像我刚刚发现的礼物。

我家庭制造和埋藏的苦痛对于我来说，就像一笔财富，要求我去寻找。而且在那个时候，它成了我唯一拥有的东西。我应该感谢我的父亲，他把他过去的战利品留给了我。米丽娅姆就像一位来自于我的地狱里的天使。她从远处向我展示了那个深渊，许多像我一样曾经到过万塔，到过圣胡



安·德卢利甘乔的男男女女都是从那个深渊回来的。那些人每天起床后都坚持着不死去,坚持着不丢掉继续活下去的兴趣,这首先要熬过战争关,然后再熬过贫穷关。在那个时刻,我觉得他们就像行尸走肉。每天早晨起床后,他们都要面对挂在房间墙壁上的肖像,固执地念叨着他们父母或兄弟姊妹或子女,那是些已经在卧室的空气里消散的形体,我们在这儿,我们不想走,我们在这儿和你在一起。对他们来说,那是些不可挽回的生命。任何一个晚上的凝固的寂静都是一种恐惧的寂静,你家的房门总是一个即将爆炸的房门。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然而,那些面孔还在游荡:有你们的兄弟,他们问你怎样才能逃走;或者你们的父亲,他们哄你睡觉;或者你们的母亲,她们为你奉上一杯牛奶。所有这些温情的幽灵就在房间的空气中飘荡。

米丽娅姆也是如此。从万塔到瓦曼加的那个夜晚之后,她就从来没有摆脱过那个阴影,也离不开她的眼睛独创的那条引路之线。这条线曾经断过。黎明降临之前,在那个危险地方天亮之前,凌晨的蓝色时刻到来之前,她必须跑。奔跑的时候她会更好,可是现在,她已经停止了。现在她正在去往万塔的两山之间的一段洼路上,正处在众多无名幽灵之中。在她周围,是其他人的躯体。有乌戈·马塔的躯体,他不让光辉道路分子烧他的车,头被枪击而身亡;有莱昂尼达斯·西斯内罗的躯体,他是个副镇长,他不让光辉道路分子进他那个镇子;有特奥多罗·西利普的儿子的躯体,光辉道路分子向他身上浇了汽油,把他捆绑放在中午的烈日之下,让他的身体慢慢燃烧;有路易斯·萨拉特先生的

躯体，光辉道路分子砍了他的头，把他挂在圣米格尔·德赖梅广场上；还有保拉·索科夫人的六个儿子和丈夫的躯体。这些人都曾经存在过，曾在我头顶的蓝天下呼吸，曾在我身旁。可是现在，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他们已经不存在了，什么都不是了。对他们的回忆只能是山路上的无尽沉寂。他们只能被他们身边的少数人回忆一段时间。在那边，只能被那边的人想起。

他们，那些幸存者，那些曾经面对死亡的人，是生活中独有的真正居民。他们背负孤独，就在那里，日复一日地站在那荒凉的土地上。他们不像我。我每天和克劳迪娅一同起床，然后到办公室同爱德华多和我的客户们谈话。

我胆小怕事的天性形成了一条比我研究过的所有刑法条文都有力的定律。然而，我并不觉得我比路易斯·萨拉特或特奥多罗·西利普差，也不比他们好。我同他们还保持着距离，他们与我如此不同。事实上，当我逐步揭示了他们的时候，我也理想化了他们的遭遇。我想象他们拥有着他们并不具备的美德。其实，他们和其他人一样，都是那个德行（保利诺·巴列就在埋葬米丽娅姆的当天向我要钱）。有时候，关于他们，我们曾想因为他们是穷人，所以他们就是好人。可是现在我们知道了，穷人并不都是好人，有过遭遇的人并不都是好人，阿亚库乔人也并不都是好人。他们像我们一样，是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的。他们可以是白痴笨蛋吝啬鬼，就像我们一样，也许比我们还有过之。然而尽管我知道，这并不是他们的天性，天性也不会使他们变得更好，但是他们面对死亡所保持的沉默还是让我吃惊。他们并不

寻求达到一个如此分化、如此充满人为沟壑的现实，也不寻求出生在世界的另一面。把他们和我们分割开的那条线是被一把巨大剪刀的锋刃刻划出来的。显然，我不会做任何事情去弥补这个与现实罗织在一起的不公平，我无能为力，我不会帮助他们，大概我对此也不感兴趣。然而，当我知道有如此多的死亡、拷打和强奸后，我又感到非常伤心，而且还有点羞愧，我也不明白为什么羞愧。我不会忘记他们。尽管我只是这样对自己和对她讲过。

但愿如此。但愿所有这些感觉转瞬即逝。也许很快我会把这些事情放在一边。我需要再一次昏睡，回到我认为是美梦的美梦里，赶紧回到我的位置上，用白净的遗忘之被单蒙住我的头，进入细微的鼾声中，让所有那些事情与米丽娅姆一起消逝。高大的家门将再次打开，我还要坐在客厅里。我的事务所，我的花园，我的朋友们，那才是我的位置。

我回到卧室，躺在克劳迪娅身边。

二十一

第二天早晨，我跟她进行了长谈。她好像很平静地接受了我的故事。她对我说，我们不应该对我的母亲做出评判，甚至也不应该评判我父亲。我们不能允许我们的女儿们受到这件事的影响。“她们不会受到影响，”我对她说。

沉默了一阵后，克劳迪娅告诉我，我看上去很疲惫，我应当离开事务所几天。我觉得相反，我不能不管工作，好吧，现在重要的是，我们要感觉好些。

她跟我说话的时候，我把她想象成一尊雕像。

克劳迪娅就是一尊白色雕像，但保持着警惕的姿态，不会有一片叶子落在她头上，或者一只鸽子在她头上栖息。

她说她担心的是，我们的女佣胡斯蒂娜已经决定离开我们家，她想自己做生意。有人会给她送来水果并带来她



的妹妹,她要去批发市场上卖水果。

“行,好吧,要是她愿意,就干吧。”

“当然,你说起来轻巧。可我呢,我到哪儿去再找个姑娘?你来洗盘子?或是擦地板?”

“也行,”我对她说。“这也挺好。”

“哎呀,阿德里安,告诉我,你是怎么回事?”

第二天,爱德华多给我打电话。我去了他的办公室。我好像第一次去见识他的办公室:包皮家具,大垫子,几支长茎花,许多标牌和徽章。

那天,爱德华多的脸上湿漉漉的,他涂了一种油脂,想祛除额头上新生的皱纹。“我们丢了两个客户,”他说。“我非常担心。青年律师现在也在开事务所,他们收费特低,他们想抢我们的行市,真麻烦,不过还得争一下。我们疏忽了,”他坚持认为,“另外你最近总是心神不定,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那天你怎么了,把波苏埃洛先生撂在你办公室里,自己走了,什么也没对他说,也没跟他告别。幸好他笑笑就算了,也没生气。不过你现在很古怪,哪儿也不去了,也不外出了。你知道,我们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见面,参加活动,拉关系,除了事务所的工作外,这些我们都得考虑。可你呢,我不明白,您看着总是那么累,你现在干事越来越少,我必须跟你说,我是真心的,你什么事都交给珍妮,你让她干,她确实是个很好的姑娘,已经学了很多东西,可她不是律师。得是你写报告,同客户谈,不是她。”

爱德华多跟我说话的口气激烈,但语调平静,他跟我说事情,但又注意不惹我生气,也没让自己生气。我觉得好像

不是他，而更像是个无名氏在跟我说话。他甚至可以在一个遥远的国度里发布一份很好的气候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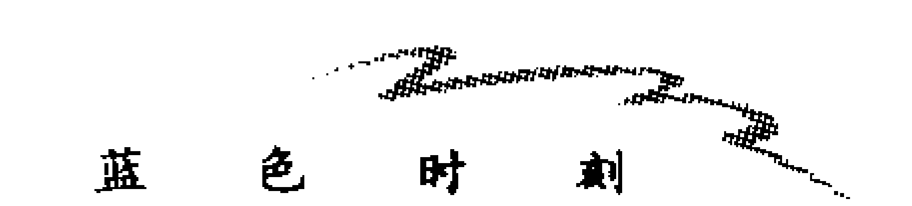
他跟我说这些话，我既没恼火，也没暴跳如雷，甚至没有为街上的打孔声感到不舒服(自来水公司定期在我们这个地方凿洞)。

忽然，我看到爱德华多办公桌上有个玻璃小象。我盯着小象，觉得它摆放在那里有点奇怪，我问自己，它什么时候放在那里的。它有点儿像个游手好闲的怪兽，像个凝固的动物，正在桌边屠杀一个隐形生灵。

这时候，我跟他讲了几句，大意是："你知道，弟弟回来时，告诉我一件有关我父亲的麻烦事，他在阿亚库乔和一个女人的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他说这些。事实是，我开始跟爱德华多说了已经发生的事。我跟他说了我母亲的去世，我弟弟的出现以及他透露的有关我父亲的事情。我把我已经写到现在的这些事跟他扼要地讲了讲。刚讲了一会儿，我就意识到，我说话的时候几乎没有看他。我拿爱德华多当个目标，一张脸，两只耳朵，我仿佛要在它们面前高声证实已经发生的事情。我对他只是有种盲目而又恰当的敬重，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工作关系，我们并无深交，我在内心深处恨他。他认为我是个自命不凡的小伙子，那我就顺势利用这一点。

不，并不是这样。我觉得事实是，我想伤害他。就是，伤害他，诋毁他，用我的故事搞臭他，改变他那张如此自信的脸。他开始时还顺从地听着，而后转为惊讶。他用双手



抱着头的时候，我感到了惬意。突然我停住了，我记得我是停在半句话的地方，仿佛我的嗓音在什么地方断了。我没有把事情全部给他讲完，可是我从他的办公室出来了，走进走廊。我顺路向一位女秘书打招呼，打开了我办公室的门。我坐在办公桌前，开始来回晃动着玩弄一支圆珠笔。我开始写起来。

我现在手里正拿着我那天写的那张纸。

"有一次，一只小象在一个律师的办公桌上独自走动。小象非常渴，就到烟灰缸里去找水，接着到一本书那儿找，随后又到灯那儿去找。可是谁也没有给它水。于是小象绝望地跳下深渊，撞死在地毯上，摔成了碎片。"

我笑起来。

我向窗户望去。电话铃响了。我断定，我将要听到的是我母亲的声音。

"你怎么样了，孩子？你感觉怎么样？"

"都好，妈妈，一切都好。"

第二天，我与实习生恩里克一起工作。他已经从他的心脏问题中恢复过来了。现在，他早睡，每天按照既定的时间起床散步。

"一个人很少能想到自己会死，"一天早晨他对我说，"这有点儿不现实。告诉你，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很好，我跟你说这个，是因为想到也可以不说这个，这好像有点儿奇怪，就像我现在跟你说话一样。我欠谁的命了？好吧，医生给我做了手术，用救护车把我送来了，像你这样的人帮助了

我。是的，可能是这样。可是那个人忘了这些，又投身于他每天必须做的事情，他又做这些事情，没有人会记起他差点儿死了，最好不要这样想，真的。”

基克说这话的时候差点儿笑了起来。

我的生日也在那几天。我的女儿们和克劳迪娅为我准备了一个相册，那些从女儿们刚出生几天开始的照片，构成了我们的家庭史。

她们三个人聚集在一块儿，一起走进卧室。她们进来时唱着“祝你生日快乐”，把一个带有我两个女儿的照片和“送给爸爸”彩色字样的相册送给我。我看到当年我如此年轻，她们又那么幼小，很惊叹。那次我们去瓦拉斯的时候，她们在海滩上奔跑，坐在旋转木马上嬉闹，在拉坎图塔山上骑马，在皑皑帕斯托鲁里山巅攀爬，在利安加努科湖的绿色涟漪中荡漾。相册下面有句话：“阿莉西亚和露西亚与伟大的爸爸在世界顶峰。”我被这个相册感动了，好一会儿没有说出话来。我拥抱了她们。

在办公室里，大家向我祝贺，吻了我。莱蒂西娅·拉雷亚给我打来电话，阿罗多·加拉让秘书打来电话问候。

第二天，我比家里其他人起得都早。

我坐在床边，放在地毯上的两只脚像两个奇怪的动物，两个粗鲁而又无助的孩子。他们与窗帘、家里其他人的肖像和墙壁无可挑剔的颜色很不协调。我看着身边克劳迪娅的形体。她脸朝上睡着，而这个时间她一般很少睡觉。

十六年来，我一直睡在她身边，已经太了解她了。我了解她按部就班、爽快大方的秉性，她的聪明敏感。这是个如此熟悉的肌体。然而，尽管我理解她，我能分享她的内心世界，可克劳迪娅想掩盖我父亲的事情的那种不声不响的绝望却让我气愤。并不是我想传播这件事，我知道这件事情会给我带来的不便。我不想传播这件事，也不想掩盖这件事。

我力图在水上行走，在水面画出一条长长的倒退之路。我有一种欲望，想恢复那些剪碎的照片，照片上，我父亲正在和米丽娅姆做爱。要是把照片让我叔叔费德里科，我姑姑弗洛拉，甚至我女儿和我妻子看，应该是挺有意思的。我应该喜欢围着两个尸体的照片跳舞。当然，这是一种荒唐的不健康的冲动，我永远不会做这类事情。可我还是觉得，光我一个人看这些照片也不公平。

我站起来，开始在房间里走动。

我记得，帮助露西亚复习功课的时候，曾经读到过，“冥王星上的温度不到二百二十度，海王星上的风速高于每小时两千公里。怎么刮这么大的风，爸爸？”

我走进露西亚的房间，看见她正在睡觉。她浓密的睫毛，平缓的嘴唇，丰厚的肌肤。我现在马上就要享受到的快乐，就是送她去学校。

这一天，除了与客户的见面外，就是为几个报告准备材料，时间慢吞吞地过去了。我想第二天我还得去找米格尔。

可第二天，我没有去找米格尔，而是去见了比托里诺·

安科先生。

那是个灰色的下午。汽车都走得特别慢,就好像大家都不想快点儿到似的。我开车沿着桑洪大街走,快到国家体育场的时候,我打开了收音机,心不在焉地看着卖气球的小贩。

解放者大道上的人好像比平时少。我把车停在停车场里,上了台阶,来到了一个破旧的门前,在门上短促地敲了三下。他本人开了门。

“喂,下午好。”他说。

他把手慢慢伸向房间里面,把我让进去。我坐在他对面,看着他靠在椅背上。他的礼貌有种格格不入的品性,从第一天见面时就表现出来,这是一种平和举止的集合体,从一打招呼开始就疏远了同我的距离。

“我觉得下葬那天,我没能向您说出,我多么为米丽娅姆惋惜。”

“谢谢,我知道她对您也很赞赏。”

我无言以对。“赞赏”,一个费解的词。她赞赏我,也许多少有点。赞赏,好感,鄙视,仇恨,都有可能。

“我想帮助米格尔。”我说。

“他是个好孩子,另外他还有他的问题,这您知道。”

“什么问题?”

“他的问题,好吧,任何一个处于他这种境况的人,这您知道,总是会有点儿问题的,博士。”

“是的,这我知道。米丽娅姆总是谈起他,特别担心



他。”

我觉得我是在激他。

“她一直想着他。不过,要是您能够帮助米格尔,就像您说的,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他对我说。

我在椅子上坐好。

“您知道谁是他父亲吗?”

“这个您本来可以问米丽娅姆的,博士。我不明白您为什么现在要问我这个。”

“对,您说得有道理。堂比托里诺,她跟您谈起过我吗?”

“谈过,博士。她非常感谢您帮助了她。”

“她没再谈起过我别的事吗?”

“她跟我说了些事情。不过这是她与我之间的事情,我不能出卖她跟我说的话,您能理解我吗?”

当然能理解你,我心想。你只能把它保留在你那里,我只能了解我已经了解到的东西,她是你们家的人,现在还是和你在一边。

堂比托里诺的宽脸看着我,脸上逐渐形成了一种不耐烦的表情。

“当然。好吧……我会在米格尔允许的情况下去看望他几次。您现在是他们最近的亲戚。您能同意我常去看他吗?”

“凡是能帮助他的事都没问题。”

“行。”

电话铃响了。他迟疑了一下,终于拿起话筒,说那个时

候不能谈,让对方过一会儿再打来。我坐在椅子上,想到是该走的时候了。

他挂了电话。

“堂比托里诺,感谢您所做的一切。”

“我不明白您有什么可以谢我的。”

“还有最后一件事,我想问您,堂比托里诺。”

“好吧,您说吧,博士。”

“告诉我,您的侄女米丽娅姆,她不是死于心脏病,对吗?”

“这我也是听说的。是心脏的毛病。”

我无话可说。在那个时刻,他肯定知道,我是在怀疑,这是几星期前米丽娅姆做出的可怜的计划,她都是为了等着付完买店铺的钱,她只可能对他说实话。

“她是自杀的,堂比托里诺,不是这样吗?”

我正面看着他。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说这些。”

“她自杀,是真的?她已经向您付完了买那个地方的钱,已经再也不能忍受那些回忆了,是不是?她太想念她的父母和兄弟姊妹了。她割断了静脉,坐等死亡,是不是?是您发现了她。”

他的面孔僵住了,用一种类似好奇的目光看着我。

“我不明白您为什么会这样想,博士,”他终于说话了,“她犯了梗塞,这是完全意想不到的事情。”

“您知道她曾说过死亡的最佳年龄吗?她说上帝会和她在一起。她做了她要做的事情。”



比托里诺惶恐不安地看着我。

我想象着他们之间的一次见面。米丽娅姆对他说过,我会照顾米格尔?他们拥抱了一下告别?她对邻居说心脏有问题,是为了放个烟幕弹?米格尔那天晚上没有在梅尔乔拉夫人家过夜?那个遥远的下午,第一次,她给我打电话约见面,因为她刚刚决定不继续活下去了。从那以后,她只是寻求把米格尔托付给我,就像父亲把她托付给我一样。

比托里诺一言不发地看着我。他的白眼球似乎在维系着他那宽领西装的尊严。一道线条从他高昂的下巴延伸至他的长排衣扣上。他原地不动,一股神秘的精力支撑着他。那种精力足以使一个已经活了足够时间的人,于死亡在他周围倍增之前,足够地了解生命的支撑点。米丽娅姆没那么幸运。在她刚刚成为一个小青年,甚至还是女孩的时候,死亡就包围了她,她不仅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爱,而且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感受对生命的崇尚。比托里诺先生保留的那些形象永远不会在他对我的忏悔中出现。我只能在他与我保持的距离之外,直觉感受那些恐怖的新近回忆。我觉得我现在还能看见比托里诺先生的脸,看见他当时以温和的嗓音跟我说话的样子:

“米丽娅姆的死是她自己的事,博士。您不必卷进这件事情。”

今天,当我想起这句话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我感到了一种安慰。

我站起来,向他伸出手去。

他陪我到门口。他再次向我伸出手，嘟囔了一句感谢的话，随后对我微微一笑，说："再见，奥马切博士。"

我走向楼道。他马上关上了门。

二十二

直接抄录我的日记如下。

昨天我去了梅尔乔拉夫人家。米格尔在那儿。他头发直立，眼睛大而紧张，上身穿着开了线的绿毛衣，下身一条黑裤子。“你愿意跟我去转转吗?”我问他。他一动不动。梅尔乔拉夫人一再说：“去吧，米格尔，跟先生去吧，你别这样。”终于，他站了起来，跟我走向汽车。他用大大的眼睛望着我，我对他说，“咱们去吃点儿东西，”他才微笑了。

车行驶在维塞大街上，我放了音乐，问他是不是喜欢。他没有回答。后来他告诉我他喜欢歌手埃米嫩。我们找到一家汉堡包店。

第二天，我找了一位女心理医生朋友，玛丽亚·格拉西

亚·马丁内斯博士。马丁内斯博士以她世俗语气的嗓音把她的医学学识和被升华了的破坏性普通意识结合在一起。

从那天开始,我就带米格尔和梅尔乔拉夫人去见玛丽亚·格拉西亚,让她给做系列检查。"米格尔的情况是一种自闭症,就像一个人不愿意走出洞穴。他完全能够理解所有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可以进行一下治疗。时间会很长,但我们能帮助他,肯定能。当然,他妈妈的死使事情变得更糟糕。"

返回途中,我在一家商店前停下车,给他买了衣服和学习用具。他说他喜欢画画,我又买了水彩画笔、炭画笔和一叠纸。

一有时间我就去观察他,但尽量不让他发现。他嗓音雄厚,超越了他这个年龄段。他只用一个单音节回应我带他出去的邀请,跟他的闲谈中,他几乎不搭话。可是后来,当我差不多失去了让他说话的希望的时候,他才简单地说几句关于学校的老师,他的朋友马丁,或者跟他表舅给米丽娅姆上坟的事。

我认识马丁。这是他唯一的朋友。一个眼睛活泼、头发卷曲的男孩子。我在他家见到过马丁。他与米格尔不同,向我提出关于我的车和衣服的各种问题。有几次,我带他们两人去维塞大街的烤鸡店吃饭。有马丁在身边,米格尔情绪就好,话也多些。

每星期我都给梅尔乔拉夫人两百索尔,让她支付家庭



开销(美发店已经变成了卖蔬菜水果、汽水和罐头的小店)。她还用这点钱给米格尔买衣服、光盘和书籍。我每星期二去看他。如果有什么急事去不了,我就派内尔松送钱去。内尔松知道这是件半地下的事情,他为此感到骄傲。回来后,总是带着微笑说:“行了,博士,都办好了。”他肯定认为米格尔是我儿子。

有一次,我不是中午,而是晚上七点去看米格尔的。到了他家,我鼓动他跟我去维塞大街的烤鸡店。那天晚上,他的情绪特别孤僻。我和他坐在黑色的纤维板桌旁,他拿起桌上的烟灰缸,在手里转玩着。

“您为什么要这么帮我?”他突然问。

他的话像箭一样迸发出来。

“什么?”

“您为什么来看我,还送钱给梅尔乔拉夫人。您为什么要做这些,先生。”

他的嗓音更重了。他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我,可是我发现他的手在颤抖。他把手放在桌子下面。

“因为我认识你妈妈,好吧,还有,我觉得我需要帮助你们。”

我又补充了几句什么在秘鲁有很大的社会经济差别,我们这些幸运儿有义务帮助那些并不那么幸运的人。我觉得好像有人在授意我该怎么说。

“就为这个?”

“对。”

“您怎么认识我妈妈的?”

我迟疑了一下才回答他。

"因为我爸爸认识她。我爸爸认识你妈妈。她在阿亚库乔的时候认识她的。我爸爸是奥马切司令。他去打仗的时候认识你妈妈的。是跟光辉道路打仗。那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现在那儿还有光辉道路分子,不过已经很少了。自从抓到阿维马埃尔·古斯曼以后,几乎就没什么恐怖主义活动了。"

"这我知道。"

"好吧,差不多就这样。"

"我妈妈和您的爸爸是怎么认识的?"

"因为你妈妈,是这样,她被俘虏了,所以他们就在一起了。好在她后来逃跑了,从他那儿跑了,来到了利马。"

服务员给我们端来两瓶汽水。米格尔用双手转着空杯子。

"她逃跑了?"

"是的,你表舅给她帮了很大的忙,我估计这些你都知道,是不是?你妈妈担心,她特别担心你,我记得她总是说这个,可是,现在,看到你在玛丽亚·格拉西亚大夫的照顾下,情况挺好,我很高兴。跟她在一起,你挺好,是不是?"

米格尔低下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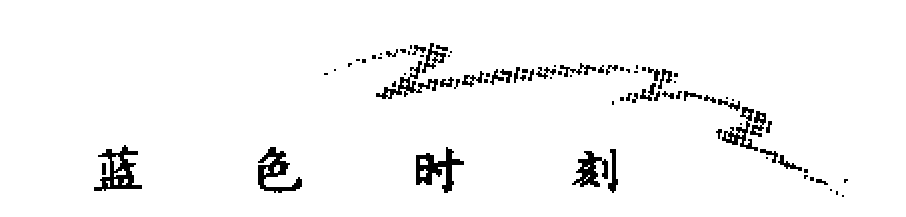
"您觉得奥马切司令是我爸爸?"他问。

自从安葬米丽娅姆那天起,我就准备好了回答。

"这事我问过你妈妈。"

"她跟您说什么了吗?"

"她跟我说不是。"



“行了。”

他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我给他的杯子里倒满了汽水。他没有看他的杯子,可我拿起我的杯子喝了几口。

我们默默地吃着饭。他忽然抬起了头。

“我妈妈是个伟大的女人,是吗?”

“是的,”我对他说,“一个伟大的女人。”

他再次低下了头,并且一直这样。他把盘子放到一边。

“您以后会继续帮助我吗?您会继续帮助我,还只是现在这样?”

“不知道,”我说,“现在我想帮助你。以后呢,我不知道。我想一直帮助你,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能够做到。”

我们又谈了会儿学校的事。他最喜欢的是画图画和水彩画。

“我想回家。”他后来说。

我结完账,把他送了回去。路上他跟我说,第二天他们要考语文。分手的时候,我跟他说,“我星期二去找他。”他同意了。

回我家之前,我在小区里转了几圈。我只看到了米丽娅姆的脸,后来米格尔的脸又叠在她的脸上面。猛然间,我好像又看到了米丽娅姆的床,可她已经不在上面睡觉了。

我摸着米格尔刚刚坐过的车座位,手从黑椅皮上掠过。就是那个座位,她在上面坐过多少次。

我看着座位上带长条纹的黑色皮套。这个长方形的座椅,他们两个人都坐过。看着它,就能让人本能地想到在她儿子的身体上面,有着米丽娅姆硬邦邦的身体。两个人的

身体都在他们坐过的地方留下了忧伤的汗味。路灯和大树从车两旁掠过，挡风玻璃吞噬着公路。那张刚刚跟我说过话的脸，“我母亲是个伟大的女人，是吗？”

“是的，她是伟大的女人。”

我到了家。下车前，我在车上坐了一会儿。

已是六月份。那几天，我写了点有关利马冬天的情况。不久前，我把它找了出来。

“冬天里，利马把对穷困意识的表现达到了极限。穷困就像一块薄钢板，它铺在地上，却扎根在物体的深处。潮气就是它的结晶，是个非现实传染性体系，可以逐渐生长在房屋的墙面上，车舷上，裂缝中。事物没有边界。海就是天。地就是空气。冬天的颜色不是灰色，不是白色，也不是铅色。是一种难以抓住的、没有颜色的颜色。也许我们可以把利马的冬天叫做渺小的光辉。关于它所存在的一切，最突出的就是它的一无所有。”

一天早晨，我去了米格尔的学校。我自我介绍说，我是他的监护人。我和纪廉老师谈了话。他对我说了他有关米格尔的意见：特别不爱说话。

我们在院子旁边的一个石灰墙大教室里。接着我去找萨拉维亚老师。萨拉维亚老师皱着眉头教历史和语文。我跟他说，“米格尔有点儿问题，不过他正在接受治疗。”萨拉维亚对我没太在意。跟主任谈时，我就没那么幸运了，不过他的数学老师塞加拉小姐对我挺重视。“无论如何，早晚您



得找我们谈,"她对我说。"尽管让人不能相信,他有时候来上课,成绩正上升。"我又跟其他几位老师见了面,他们其中两位要求我为他们找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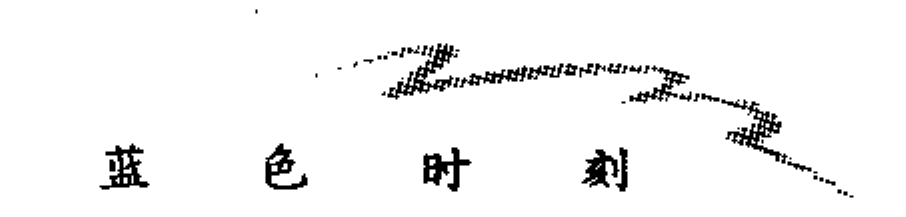
二十三

就在那几天，我给克劳迪娅许了诺，是在晚上，我记得很清楚。那是星期五，就我们俩人。去阿尔卡萨电影院之前，我们在波西米亚咖啡厅喝了咖啡。我刚刚给米格尔打过电话。

克劳迪娅继续为那个孩子的问题烦恼。那天晚上，她跟我说，“我应该绝对为这个孩子的存在保密。是个问题，”她解释说。“我明白，这让你难受，那个小孩也让我难过，可怜的孩子，可是我们还有自己的女儿，得想想她们，是吧，亲爱的。你跟那个孩子的关系，跟谁说起来都不好听。”

我记得我喝了杯啤酒，看着她。“你别担心。”我回答说。“没有人会知道。”

还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有传闻，可是除了珍妮和普拉



顿，我没跟任何人说过，那当然。我再也不会对第三个人讲了。

克劳迪娅和我之间的情况恶化了。只是现在，我才能想起来，是因为米丽娅姆插在了我们俩人之间。

一天晚上，迪纳·阿特亚加邀请我们去吃饭。她是克劳迪娅的一个姨，跟我岳父岳母的关系特别好。阿特亚加夫人有个习惯，总是穿带花和其他自然产物的衣服。她着魔于炫耀上面带有各种代表性花园、森林、热带雨林的衣料。攀缘植物、藤本植物、花束、草丛，还有老虎、蝴蝶和马。一个人完全可以戴上帽子，灌满水壶，然后交点门票钱，进入她的衣服去野餐或狩猎。

那天聚会邀请的客人很少。我们坐在她在圣伊西德罗的宅第的客厅里，宅第就在高尔夫俱乐部的对面。阿特亚加夫人，她的丈夫温贝托和她的姊妹们都参加了聚会。和他们在一起，总得探索出新词语，寻找落脚点，以便能使聚会得以继续下去…… 阿特亚加家庭的成员排坐在他们在高尔夫大街上的宅第的沙发椅上…… 我现在还能看见他们…… 他们都带着丑陋的厌恶表情，好像他们一生都在积蓄那种畸形沉默。大家都看着我们，而克劳迪娅尽力赞扬着他们的新窗帘。

我觉得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全是由我的一种感觉造成的，我不知道该如何称呼它，大概是由于和他们在一起时间过长引起的疲惫。这并不是我想为自己开脱。

一切都发生得很快。我们正喝着咖啡，我不经意地抬

起手,咖啡杯打翻在阿特亚加夫人衣服上。她的反应是高举着双手,有礼貌地叫了一声。衣服上的花草被流淌的咖啡线分成了几块,流淌的咖啡就像土地上的小路。阿特亚加夫人继续叫着。我吓了一跳,但也感到了愉悦。“完美无缺,”我伸着手指说道,“一条完美的小路,以便某一天到田野去。你不这样认为吗?”紧接着,我弯下腰,用张餐巾纸去擦她的衣服。带着同一种冲动,我大声对她说:“如果不是你穿这件花鹦鹉似的衣服,我也不会走神。”说完这句话,我看见我的话飞在空中,带着红色字体的余波在惊骇的听众中漫游。

只是当我摆脱这种状态时,克劳迪娅面对面地看着我,以冰冷的声音对我说:“你现在就去向我姨道歉。”我马上答应了。然而,我同克劳迪娅的争吵持续了几天。她说了几句和解的话,但也说了别的话。

那段时间里,我觉得另外一个男人占据了我的身体。我忽然觉得,我有这种感受再自然不过了。这是种愤怒和热情交织的感受,把我从我原来坐过的所有位置上赶了下来。我只是想米丽娅姆。看见她在看着我,听着她的声音,“你真像米格尔,”我感到她的长嘴唇吻在我的嘴上。“我爸爸半疯了,”露西亚对她的一个朋友说。

有一次,我去岳父家吃饭。那天晚上,他再次说起了他的迈阿密之行。在小哈瓦那街刚刚开了一家美味海鲜馆,在那儿吃饭都嘬手指头,他们跟我说过,有一种米饭,里面有一种难以置信的海洋食品,听着,看看咱们哪个星期去迈阿密尝一下。

我听他说着，还没等岳母补充这条美食信息的细节，我就看着岳父，对他说："你不适合吃海鲜饭，它会增加你的胆固醇，你看你都胖了。你最好节食，锻炼，这对你好。"在桌上的窃窃私语和小声嬉笑中，我停顿了一下，把手放在嘴边，低声微笑着补充道，"你得明白，跟昂贵的烟花女躺在一起，并不是祛除脂肪的唯一办法。虽然你在苏尔科的那个小地方已经搞了好几个，而且也很漂亮。"

我岳母对她丈夫去苏尔科妓院的事有所耳闻。要是她不在场，我的话还算中听。沉默之后，克劳迪娅对我岳母说，我们最好离开。

我们上了车，回到家之后，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几天没有跟我说话。那天晚上，我睡在沙发上。最后，经过一番大声争吵，所有这些都解决了。

我给岳父岳母打电话请求原谅。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先生，我去找我的一位心理医生朋友，看看我是不是哪根神经出毛病了，我千百次地请求你原谅，跪着请求。"

"停了一下，"他们叹了口气。"好吧，咱们忘记这些吧。我们说过，你脑子有毛病。"

同克劳迪娅为些小事的每一次争吵，都使我和她的关系越来越坏，越来越疏远。对于这个过程，我好像是在远远观望，没有任何兴趣让它停下来。

"你是不是和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所以你总是和妈妈吵架？"露西亚问我。"我能认识她吗？"接着露西亚又问了一系列问题，我几乎无法回答。在学校里他们跟我说过性，

爸爸。他们说:如果性在口头上说得好,那么写出来该是什么样呢?

克劳迪娅和我之间的最后一场争吵发生在一个凌晨,我们从她表妹多利家吃饭回来的路上。她开始了。

“你整个晚上都不说话。大家都兴高采烈的,都挺高兴,就你不说话。你是怎么了?”

“没什么。”

我记得掉了几滴雨点,在玻璃上变成几个蘑菇大小的东西。

“你为什么不说话? 闭着嘴,什么都不说。”

“是我没什么可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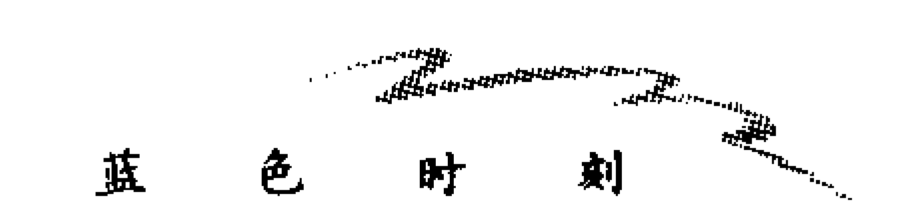
“不是这么回事。是你觉得多利和佩佩在你面前显得太傻了。他们和你不是一个档次的,是不是?”

她举着手,高声说完最后这句话,气息直吹到我脸上。不知为什么,我却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前面的玻璃上。小雨滴已经在挡风玻璃的两侧形成了细流,细流中又碎成了笔尖似的小箭头。

“安静一下,克劳迪娅。”我对她说。

我觉得我跟她说这句话,是我最后一个严重的小错误。

“什么我安静下来? 你想让我安静下来? 首先是你随便跟一个印第安女人搅在一起,你还想让我安静下来。好吧,很好,让你看看我多安静,”说着她伸出她的手让我看,“你看到我的手抖得多厉害了吧,明白吗? 我这么安静多好啊,就我现在这样,我想跟你说,你离开这个家吧,可不是明



天,也不是下个星期。我想咱们很快就到家,你拿着你的东西滚蛋,让你走,你听明白了吗?你去找个旅馆,明天再去找个房间。真的,我早就想跟你说这些。另外,更好的是,你还成了女儿们的最坏榜样,她们也不想知道你的任何事,她们这样对我说过。”

一直到家,我们都没说话。忽然我听到了抽泣声。我想安抚她,可她拒绝了。车窗上形成了一条长长的水线。我还不能走,我要留在那里。那是我的家,至少那个晚上。

第二天,我在圣伊西德罗找了一套房子。特别合适,因为它位于事务所和我家之间。

在那几个星期和几个月里,我独自生活。我觉得米丽娅姆和我在一起,好像和我一起在过夫妻的日子。我觉得她就躺在我身边,她的身体就躺在床上,她的声音对我说,她要去准备咖啡。临走时,我放了一段她喜欢的音乐。

我觉得那个幽灵帮助了我很长时间。她现在还在帮助我。这是个持续的存在,非常可靠。我觉得只有我能拥有她。我去看米格尔的时候,差点儿对他说,我把她妈妈留在我的卧室里了,她很好。这让我惊讶。

那段时间里,我终于同克劳迪娅有了种正常的关系。我频频给她打电话。我开始每天到学校去接露西亚。每周末,我都去看望阿莉西亚。我继续看望米格尔。去了米格尔家几次,我终于让他给了我几件米丽娅姆的东西。她的白衬衫,绣花蓝工装裤,她的梳子和肥皂刷,她的尖头皮鞋。那个时期,我还到她的坟上去过几次,都是和他一起去的。

有一次,我在办公室开每周例会的时候,仿佛看见了她。

我们在环绕阿亚库乔兵器广场的高山上。天特别黑,可是我能看到在她的身体上,反射出一种光。她让我继续向前走。她赤身裸体,在空中大步跳着,像是在飞。她数次出现,声音都不一样。她看着我,她不是带着爱,也不是带着恨,而是带着种冷漠的表情看着我,这使我更加亢奋。

米丽娅姆,可爱的反叛幽灵,她的不慎患病,她的高贵病态,她的干巴声音,令我不能忘怀。她的声音有时和我母亲的声音混合在一起,看我能不能听懂。我不想让事情这样。我期待的不是这个。你为什么这样对待克劳迪娅?为什么不去找她和解?你们这样吵架,女儿们怎样成长?

不管怎样,克劳迪娅是我的女人。我已经和她生活多年。关于这件事,有一天晚上我写了一点儿。

“经历了各种浮华、想象和愿望之旅,我们必须回到我们周围的环境里。现实是一种忍受。我们不得不看到,我们真正的孤寂就是现实。我们必须踏上从想象之旅返回的路程,面对大量事实,即我们有家庭,有如愿而成的伴侣,还有众多人曾在教堂里听我们说‘是’的事实。我们的悲剧不在于我们已经证实我们不再爱或喜欢那个人了,而在于经历了苦痛之后,我们继续爱着,却不理解它,还带着习惯上的无奈激情。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周围的所有幻想都是畸形的镜子。我们是宣誓要忠实的伴侣,而不是把伴侣仅当作很好的搭档。衰老意味着,我们已经意识到,没有任何人



比自己的伴侣更好。孤独就是这个话题的关键。在笼子里,我们必须像温顺又凶猛的动物一样走路,总是会与我们的镜子相撞。”

二十四

已经过了一段时间。现在阿莉西亚正在学法律。她在何塞·乌加斯的律师事务所里实习,这让我高兴。我刚送她一辆汽车。露西亚在天主教大学里学习艺术。胡斯蒂娜已经离开了我家,不过她不时回来看看。她的位置被她的外甥女伊丽莎白占据了。克劳迪娅叫她利萨。我跟露西亚和阿莉西亚谈了米格尔的事。她们俩人都说过,想认识米格尔。

我给鲁文发了电子邮件。告诉他这里发生的一切。他的回答很短,我简直不能相信:我想认识那小家伙。

昨天晚上,我坐在自己的床上,想到了这个故事的真正作者,就是我的母亲。她把比尔马·阿古尔托的这封信放到



箱子里，锁好，接着就回到自己的房间，给我留下了书面遗嘱：你去查查那个姑娘是谁，看看你父亲到底是什么人，还有就是，你是谁，我是谁。

对于母亲的慈悲，我无以指摘。只是现在，我才懂得，她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人物：她低声细语，哼着歌哄我睡觉；我进学校时，她向我告别的稳健嗓音；去学校接我时，她穿的蓝白色衣装，她的半白头发，她关于友情的无可争议的教诲，她跟我们的谈话，在她家里有茶水、点心和音乐的小聚会，她的高风亮节化解了我们孩子之间的争吵，并且在我遇到疑问时，尽量帮助我做出决定，你看孩子，你得看看你是想学法律呢，还是想学文学，你把优势列在一边，把劣势列在另一边，你想跟克劳迪娅结婚吗？她是个好姑娘，不过你得看看她是不是适合你，你考虑一下，然后再做决定，没有人催你，别忘了你弟弟鲁文，只要可能，我都给他写信，你在这后面也写上几句，即使是句拥抱你和再见，随便写点什么。亲爱的鲁文……

普拉顿和我继续见面。有一次，在德利卡斯，我们同招待我们的服务员聊了一会儿，那是一个摇摆不定的瘦高混血儿。他对我们说，他每天下午学习自动机械。“你看，一个人可以觉得自己要多重要有多重要。”只剩下我们俩人时，普拉顿对我说。“一个人可以觉得自己要多重要有多重要，可是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总应该知道，至少有一样东西他是不了解的，从发动机如何运转，到天是怎么亮的。”

“什么？”我问他。

从米丽娅姆去世到现在已经三年了。我仍然置身于我的日常成就中,就像任何一个像我一样的律师一样。我现在同克劳迪娅的关系特别好。我发现,她是我一个不可或缺的伙伴。我可以不坐在她旁边,可是我不能想象,我坐在我的电脑前,却不知道她的声音在附近哪个房间里响起。就这样,几个月前,请求她原谅之后,我回到了家里。我第一天把米格尔带到家里时,克劳迪娅亲昵地对待他。现在,有时候她看也不看我,便打听米格尔的情况。

当然,有许多关于我私生活的传闻,我不置可否。有人说,我有个情人,是我家的女佣,还说米格尔是我儿子。他们看见我有时带着他散步。有的人在我背后笑,说是我跟一个混血女人有桃色事件,好在克劳迪娅宽恕了我。这都是冲着阿德里安的钱去的。

在玛丽亚·格拉西亚大夫的帮助下,米格尔这几年的进步很明显。现在米格尔在学校里有很多朋友,他跟我的话也多了,成绩也很优秀。今年他中学就要毕业了,可能明年会进入国立工程大学读书。他的面孔也瓷实了,我觉得在这个年龄,十七岁的年龄,他已经是个可信赖的小伙子了。他不时还和他表舅比托里诺去阿亚库乔。

珍妮还继续在事务所里陪着我。我常常跟她讲米格尔的进步。我以前和现在都非常想念珍妮。她是我理所当然的伙伴。每次走进办公室,看见她时,我都感到了小小的直率的快乐。我害怕她某一天离开事务所,抛弃我。我害怕她走,可是我没跟她说过,以后也不会说。



现在我是晚上写作。家里的人都睡觉了。今天是七月五日。我想讲讲发生的事情,结束这个故事。

今天,大概是一点钟,我跟一个客户告辞,回到我的办公室。我还有几个合同要审阅,文件都堆在那里。我坐了下来。露西亚在美术馆里,阿莉西亚跟随她的几个女朋友在某个咖啡馆里吃午饭。克劳迪娅去了她妹妹家。

我出来做了点我常做的事情:开车转转。我上了通向哈维尔·普拉多大街,几乎想都没想,就到了米格尔家,到了米丽娅姆以前的美发店。我忽然想起来,她好像在看着我,好像她看到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如同那天我坐在镜子前的椅子上,让她给我理发。

我在街上看到了米格尔。他正背着书包走路,脸上容光焕发。

“我给您看点儿东西。”他说。

他进了家。出来时拿着一个画夹。他打开画夹,让我看一张在卡片纸上画的风景水彩画。蓝天,绿山,山上有黄花。一条道路连接着两座山。风景的绿黄蓝色与山上的两块红色岩石形成反差。“这是万塔,”他说,“是我的家乡,您看像不像。”

我提议出去转转,还可以吃点什么。他上了车。我们放了张埃米嫩的唱盘。

我想去米拉弗洛雷斯。路上,我们没有说话。我们来到法蒂玛教堂的院子里,从那儿可以看到旅馆的建筑,码头的栈桥,拉蓬塔的巨大海湾。

我们来到防波堤边上。

海浪形成了一条宽带,又在岸边消散。拉罗莎航海俱乐部的餐厅,我和米丽娅姆曾在那里进过餐,它仿佛是海上一座雾霭宫殿。延伸的人行道,圆形的装饰物,扑向岸边的漫漫水沫,进入了巨大的海湾,又消失在天际。海浪在愉快的冲动中爆发,在海滩上咽气,随即又从远处返回。这一切都好像发生在远处的一幅巨大的恐怖帷幕上。

"有一天,我去了你家附近的一个学校,"我对他说,"那儿有考工程大学的补习班。你可以去那里补习数学,准备参加入学考试。咱们回去的时候到那儿去看看,看看你能不能开始学起来。"

他好像没有回答我。可当我转过身时,米格尔正看着我。他第一次面对面地看我,我记得他好像从来没有这样看过我。于是我看见了他的褐色眼睛,这眼睛我曾在医院的病床上见过。可与今天不同的是,以前我转过身去,把他留在那儿,让他死掉。现在我坐在他身边,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想跟您说点儿事,"他对我说,"……早就想说了。"

他看着地平线,冬天在海上漫延,一直消失在拉蓬塔漫长的海湾里。

"我想感谢您,"他说,"感谢您。没别的。"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蓝色时刻
作者=（秘鲁）阿隆索·奎托著
页数=306
SS号=11817929
DX号=000006123539
出版日期=2007.1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